

# 想想 歷史

Although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s not an easy book to read today—eight hundred pages long and haphazardly organized, it takes for granted a deep background in English history—it immediately became the gold standard for what was known as the “new social history.” Two of its legacies have been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historical writing. First, much of Thompson’s book concerns workers who were not in the vanguard organizing and making socio-political demands; his “working class” includes the very poor, the marginal, the frangible, those on the “losing side” of history. They, too, he maintained, deserve our attention. “I am seeking,” he memorably wrote, “to rescue the poor stockinger, the Luddite cropper, the utopian artisan . . . from the 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 Second, Thompson insisted that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were not sociological abstractions that could be deduced from statistics or numbers but particular relationships and experiences that needed to be studied in a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class consciousness was just as present in the workers who blackened their faces and rode out at night to smash the new machinery as it was in the aristocrats who assembled to hear the millenary oration that would wrath upon the “whorish” mobbed elite, as we now know it. . . .

resources bred grievances, should their stories be told, their puzzling beliefs, taken seriously, who should be considered a merit of the scope of social history. But it did not mean that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everyday life were irrelevant. In this period, he argued, because of the “ways early capitalism” pressures affected not just their incomes but their family lives, their patterns of work and recreation,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their customary ways of doing thing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began a process of rescuing Trevelyan-type social history—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onditions, family life, folk customs, and beliefs—from its second-class status by showing how these themes might be connected to such obviously “public” matters as industrial change and radical protest. It was difficult, from then on, for anyone to denigrate social history as “apollitical.”

時報出版

文化思潮

想想歷史

THINKING ABOUT HISTORY

莎拉·瑪札 著

陳建元 譯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川安（中研院史語所博士後研究員）

涂豐恩（「故事」創辦人）、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專業推薦

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莎拉·瑪札 Sarah Maza

由美國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莎拉·瑪札（Sarah Maza）所撰寫的《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書中每個單元皆圍繞著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中心問題構成，為討論歷史這個學門提供了絕佳素材和案例，並將帶領讀者思索歷史學在近半世紀來如何改變，為何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空間和物體，而歷史生產過程中的衝突又引發了哪些學界內外部的熱議，進而一探創新與爭議如何形塑歷史研究領域。

為什麼我們學習歷史？因為歷史回答了其他學科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正因為歷史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並有著無可抹滅的影響力，因而有關歷史研究的爭論在學術界內外不斷出現。歷史學充滿活力、不斷變化並與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想想歷史》想要提供的不是答案或處方，而是持續與過往對話的邀請函，藉由向歷史不斷地提問，回應時代的需求和好奇心。基於所有耳熟能詳的理由，我們需要我們的集體過往：從我們的祖先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智慧和靈感、找出我們是誰，並且滋養我們的想像力，進而找到繼續前進的各種可能方向。



ISBN 978-957-13-7533-9 (601)  
RAY0195  
NT\$480

時報出版

不可或缺的佳作。

——《Choice》雜誌

我們終於能夠讀到瑪札既具有高度綜合性又切合當代的作品，此書反映了歷史寫作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當前沒有第二本書能像《想想歷史》一樣具備可讀性並涵蓋眾多主題，這是本博學多聞、反映現況以及引人入勝的概述。瑪札精彩地掌握住幾個世紀以來困惑著歷史學家的許多問題的複雜性。她提出了對的問題，回顧了適當的學術成果，並且選擇從最關鍵的領域介入。《想想歷史》是簡潔又深具反思性的史學史回顧典範，也是此類著作中最好的綜述之作。

——大衛·布朗(David Brown)

伊麗莎白城學院(Elizabethtown College)

在歷經了過去五十年間歷史學家不斷地重新思考他們研究歷史的方式後，瑪札針對歷史在今日是如何被「落實」的，提出了許多深具洞見的反思。她同時引領讀者迅速地掌握在這半世紀間興起的不同史學流派以及研究方法。《想想歷史》對我而言是有關這段時期西方史學發展最優秀的概論之作。

——艾倫·梅吉爾(Allan Megill)

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

When  
came  
always  
social  
democ  
implem  
poor  
nations  
century  
the libe  
Michael  
Garcia  
quantit  
democr  
affairs  
were br  
the ex  
instant  
century  
school  
dedicat  
histori  
regions  
appea  
extens  
twenty  
hundred  
powers  
of Fran  
The tw  
majority

no historical  
ic set of political  
is not  
in practice. From its beginnings,  
has nearly always been linked to  
progressive agendas, with "social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r "the  
in which "the people" act out a  
first appeared in the nineteenth  
ern democracies, written by men on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such as  
Macaulay in Britain, and George  
United States. In later generations  
has begg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history, since it offers a way of  
generations to "vote" on who they  
they did by drawing conclusions from  
of majorities. In France, for  
middl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ers of the cutting-edge *Annales*  
y (named after their flagship journal)  
selves to recovering their nation's  
ing massive works about French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and  
at the French peasantry. These  
ductions, which could take fifteen or  
to complete, and often included  
pages of tables and graphs, were  
believe that the true and deep history  
ed in the peasantry which had until  
century made up the overwhelming  
French population.

作者  
莎拉·瑪札

西北大學歷史學教授、藝術與科學「簡·朗」  
教授(Jane Long Professor)。

譯者  
陳建元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英國愛丁堡大學  
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 想想 歷史

莎拉·瑪札 著  
陳建元 譯

THINKING ABOUT HISTORY SARAH MAZA

## 導讀 新的歷史地景，不一樣的漫遊指南

陳建守 一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創辦人

我第一次認識《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的作者莎拉·瑪札是在二〇〇四年的夏天，那時我承負她一篇討論歐洲文化史作品中的歷史敘事論文的譯事工作，譯稿完成後，我時不時關注她的動向，本書就是她在二〇一七年最新出版的著作。《想想歷史》是一本關於歷史學方法論的著作，討論的是歷史學這門學科與其他研究領域的獨特之處，瑪札縱筆所及，特別關心的是歷史學所呈現的「折衷主義」(eclecticism)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引發這門學科的內在張力與爭議。在瑪札之前，有許多歷史學家投身探索史學史／歷史編纂／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這方天地，書名相近者則有美國老牌文化史家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的《以歷史來思考：對現代主義的探索》(*Thinking with Hist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assage to Modernism*，一九九八年)與迪耶戈·歐

斯坦 (Diego Olstein) 的《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2015年) 這兩本書。

休斯克的大作關注的是精英文化的範疇，他所要論辯的是「現代性」的課題。休斯克認為二十世紀的歐美知識人不以歷史進行思考，無論是現代藝術、建築、音樂或科學都不是面向過去而生的領域，而是從一種嶄新且自主的文化空間中所發展而出的領域。這與十九世紀懷持歷史主義的人們大相逕庭。然而，不論是十九世紀依戀過去的歷史主義者亦或是二十世紀拋棄過去的現代主義者，兩者皆企圖探詢歐洲文明的意義與型態，等於是表述「現代性」焦慮的不同方式。休斯克書末則順筆提及歷史學如何在後現代文化的脈絡下，尋找新的出路與用途。

歐斯坦的大作可謂是全球史的操作手冊，提出全球史的四大分析策略：比較、連結、概念化和脈絡化。歐斯坦本人是研究中世紀西班牙和世界史的專家，他的祖父母從東歐移民到南美，屬於第二代阿根廷移民的他，耳際聽的是用意第緒語 (Yiddish) 吟唱的民謠，開口講的是西班牙語，腦中的智識洗禮則來自以色列的學術社群和獨裁統治下的阿根廷，寫作此書之際的他則是匹茲堡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歐斯坦的成長歷練，就彷彿全球思想的旅程一般，為《以全球視角思考歷史》預先譜下豐厚的樂章。歐斯坦跨越國族疆界、語言隔閡和區域分界的人生經驗，與全球史關懷歷史經驗的全球網絡和跨國接受若合符節。歐斯坦提出如何書寫大規模 (big scale) 歷史的十二種可能取徑：比

較史、關係史、新國際史、跨國史、海洋史、歷史社會學、文明分析、世界體系、全球史、全球化的歷史、世界史和大歷史。歐斯坦的所思所為正是要提供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各種故事，打破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而這種浪漫主義式的國族中心方法論正是休斯克筆下十九世紀流行的歷史書寫模式。《想想歷史》出版於這兩本著作之後，我注意到瑪札似乎沒有引用這兩冊書名近似的著作，我無法斷言瑪札的這本書必然後出轉精，但《想想歷史》是以一種更加全面的方式來概述過去半個世紀以降歐美史學思潮的流變。更重要的是，《想想歷史》是立基在折衷或辯護的立場上，探討歷史知識性質、書寫技法，以及這門學科特質的著作。就如同書名所示，思考關於 (about) 歷史的二三事，這比用 (with) 歷史進行思考更加寬泛，也比在全球範圍內思考歷史更為折衷。

過去對於歷史學方法論或史學思潮的寫作大抵不出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時間的先後序列進行鋪陳，以歐美近代史學思潮為例，首章披掛上陣的可能是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和蘭克 (Leopold von Ranke)，再一路順筆而下論及一九六〇年代橫掃千軍的社會史、一九八〇年代異軍崛起的文化史以及上個世紀末的後現代／結構／殖民主義的後學家族；另一種類型則是各個次領域的盤點清單，寫作者以學林點將錄的形式，介紹歷史學的分支和該領域的重要人物。讀者會看到性別、勞工、底層、社會、文化、思想等克利奧女神在史學萬神殿中的位置。瑪札的這本大作則不從此道，她先從歷史學的三個 W 進行提問：誰的歷史 (who)、何處的歷史 (where) 和

什麼的歷史 (what)，下半部則以三個篇章針對歷史學性質的提問和論爭作結。對於瑪札來說，歷史學較之其他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歷史學家側重的是深描細寫事件發生的經過，並且注意事件和脈絡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想想歷史》中，瑪札在每一章中都提出一個思考的論題，但不提供標準答案。就如同她所說的，這本書的主題是要告訴讀者，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歷史，而非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歷史。歷史（過去）之於我們的重要性不證自明，我們所要知曉的是過去數十年的創見和爭議，如何型塑這門學科和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本書的前三章，瑪札要談的是歷史學家如何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劃分和新的事物。她所措意的是新的人群分類如何帶來新的敘述方式。當研究者著手研究婦女和奴隸的歷史，背後的意義是要訓練我們所有人都要去尋找過去「正規」的歷史上那些沒有聲音的人們，挖掘在過去的社會中沒有被言明、存在於縫隙之間以及被壓抑但始終頑強存在的層面。瑪札告訴我們歷史上的「何物」與「何者」密切相關，這裡的「物」不是專指可見的物質或物件，觀念、思想這類抽象的精神世界也包含在內。將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合併在一起討論，意味著打破過去精神在上、物質在下的舊有階級關係，偉大的思想和創見不再是亙古不變的觀念，而是受到現實世界物質性設施、社會地位甚至是人類野心影響下的產物。

就以「科學」這個概念為例，科學史家告訴我們，「科學」概念的變化深受科學實踐的影響，而科學實踐過程中的物質、環境性因素也是影響「科學」的一大因子，並由此探知知識生產與傳播的過程和外在因素。譬如謝平 (Steven Shapin) 研究科學革命這段歷史時，特別措意在實驗如何作為製造知識的實踐過程。由此延伸，作為文化實踐的「知識」和「資訊」成為思想史的新發展，有助於理解「知識」在不同脈絡時空中所扮演的角色與置放的位置，以及知識如何生產、傳播和被接受的過程。思想史不再只是一「脖子以上的歷史」，而是在知識網絡的具體世界、在作家的社交世界、在讀者的情感和感官世界、以及在生產和消費書籍的世界中，所具體打造的精神世界。當我們將研究過去的視野擺放在不同的人群和事物之上，這也連帶影響了我們對於空間的劃分與認知。瑪札在第二章談論的重點就在於打破國別史的中心主義，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晚近的發明，是歷史學家、政治家和其他弄潮兒攜手打造的結果。瑪札引入海洋史和全球史的思考取徑，認同邊緣、排拒中心，試圖去搜尋歷史上文化交流的跨國心聲。瑪札所排拒的中心，不僅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中心，更是以歐美為代表的中心。她所要提倡的是一「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歐洲以外的歷史不再是歐洲主流敘事的變奏曲，而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主體。

舉例來說，我們在課本上所認知的「啟蒙運動」，是作為一個開啟西方現代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命題」(modernization thesis)。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再從啟蒙運動到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概念，因而澤披後世。這樣的歷史敘事

邏輯預設了一個立場：單一的與法式的啟蒙運動。於是，英年早逝的英國史家波特（Roy Porter）告訴我們，我們需要打破以法國為中心的啟蒙運動研究，將啟蒙運動置放於不同的國族脈絡中予以檢視。啟蒙運動不是非得要如同法式啟蒙一般，擁有革命、顛覆性的運動性質，在其他國族脈絡中的啟蒙哲士，對於創建秩序的渴求要比法國的啟蒙哲士更為深刻。以波特自己的著作為例，他所研究的英國啟蒙運動就不是以推翻舊秩序和建立自由的世界為要務，英式的啟蒙不是以激進為特質，關注的重心也從政治的向度轉為道德的問題。波特的研究等如把啟蒙運動置放在國族的脈絡底下，成為複雜的啟蒙運動。威瑟斯（Charles Withers）則將空間視角從國族往地理區域轉移，措意的是啟蒙運動如何置放於地理學的脈絡之中，地理學這項出現於十八世紀的科學如何與自然和世界產生連結，而不再強調啟蒙運動國族特徵的重要性。倘若進一步將視角從各色的國族脈絡往全球史的脈絡推進，檢視啟蒙運動的全球史意涵，則能進一步地去除啟蒙運動的歐洲中心論，重新考慮這個由歐洲創發的概念，如何輸出到世界的其他國度。由這個角度出發，啟蒙運動是概念交換和交織的歷史、是翻譯和引用的歷史以及共同生產知識的歷史。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全球啟蒙運動的時間和空間向度，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大部分是由位居地方的（local）歷史行動者加以型塑的概念，而非由歐洲的原生脈絡文本搏成的概念。作為概念的啟蒙運動讓地方的歷史行動者開始進行全球式的思考方式，並將自身的處境置放於世界的位階。這樣一來，歐洲以外的世界不必然要亦步亦趨跟隨歐洲的啟蒙方案，

要討論的是啟蒙運動與全球世界的創造之間的關係。

「歷史是什麼？」——來自過去的聲音？人類經驗的傳承？還是帝王將相的生命史？這句標語是初入史學門徑的學徒，日夜吟誦和提問的基礎。「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則是另一句金科玉律。「歷史是什麼？」一語來自於卡耳（E. H. Carr）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卡耳在學術研究上，主要是以俄國史的研究為主。他曾經發表過與俄國有關的人物傳記，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八年間出版了十四冊大部頭的《蘇維埃史》（*History of Soviet Russia*）。因為研究蘇俄革命及個人背景的原因，使卡耳對歷史產生興趣，這也影響了他研究歷史時所切入的視角。諸如「個人與社會」、「自由意志與物質決定論」、「因果關係與偶然性」和「客觀性與主觀性」都成為他思索歷史問題的主要關鍵點，也構成《何謂歷史》書中的主要內容。在本書瑪札的後三章基本上圍繞著卡耳的這個命題進行開展，分別討論歷史學（知識）如何被生產、歷史解釋的因果關係和意義以及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和虛構。瑪札對這些問題所提出的解答，與一甲子前卡耳所提供的答案已經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一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

無論是歷史寫作中的事實與虛構，抑或歷史解釋中的因果關係，這都涉及到歷史（知識）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過程。本書的第四章討論的就是另一個W：歷史如何被製作（how）。瑪札告訴我們歷史學的折衷特質，就在於歷史書寫的工作並不壟斷於學院派史家

之手，任何有讀寫能力和蒐集檔案的人，都能從事書寫歷史的工作。通俗史家和專業學者的差別在於，學者要開拓新的知識疆界、尋找新課題和新方法，通俗史家則是要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來吸引新成果。伴隨著通俗史學而來的是「公共」歷史如何呈現過去的課題，這涉及到博物館、檔案館、歷史紀錄片和口述歷史如何保存和呈現歷史的方式。這些機構和展演歷史的另類方式，一方面暗含了檔案文件該如何被保存與歷史該如何被書寫，另一方面則是與學院內的研究者進行對話，嘗試打造出「正規」歷史學的另一番面貌。

瑪札在第五章主要談論的是因果關係／事件的二元對立，如同卡耳所言「研究歷史就是在研究原因」，無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年鑑學派或受社會科學影響的歷史學，皆是透過尋求原因來創建解釋的模式，而且相信作為底層建築的社會和經濟因素在歷史上會發揮高於一切的影響力。作為浪花頂端泡沫的事件（布勞岱爾語）重回研究者案頭的議程表，這是出自於長期強調結構的反動，於此，事件本身不作為歷史事件的原因，而是作為變革性的力量。事件的回歸標誌出一個時代的結束：試圖對歷史變遷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科學的解釋之時代的結束。事件的形式呈現了人類對身處脈絡的回應，而非因果關係的影響，並且提出一套關於人類如何行動以及世界如何運轉的設想，特別是那些影響（但並非決定）人類行為的因素。

本書的最後一章聚焦的是歷史學的客觀性問題。現代主義以降、後現代主義的洗禮，層層挑戰與更新研究者的視野與思維。研究歷史這件事不再等同於卡耳筆下，手工業抄寫檔案時代就存在的一種古老技藝——所謂「據實以告的人」。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下，歷史學家早就揚棄歷史學是全然客觀的學門這一觀念。後現代歷史學家指出，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涵蓋並復原過去的所有事實，沒有任何敘述可以向過去本身查證，只能依靠其他敘述進行查證。後現代的浪潮使歷史的價值和內容劇烈震盪，就如同本章的小節名稱所示：「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後現代歷史學的大將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名作《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一九九一年）在一九九六年由麥田出版社引進漢譯本。再隔四年，臺灣學者古偉瀛和旅美中國學者王晴佳合著《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巨流圖書公司）出版，後現代歷史學在當時的臺灣有駭駭然蔚為大國的態勢。二〇〇六年，《歷史的再思考》出版修訂譯本，當時麥田出版社的叢書主編盧建榮還為此撰文介紹漢譯本出版十年的時代意義。古偉瀛亦以本地學者介紹後現代歷史學之姿，列為修訂譯本的另一位導讀者。後現代歷史學模糊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線，歷史寫作中的虛構並非造假，虛構的部份反倒是展演真實的必要之處。

本文絮絮叨叨討論《想想歷史》的寫作向度和理念，終究只能觸及這本書的幾個側面，無法得其全貌。從一九六一年卡耳的《何謂歷史》，中經一九七三年懷特（Hayden White）的《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一九九一年詹京斯的《歷史的再思考》再到本書，一條隱然可見的歷史變遷



線索於斯可見。我們可以發現專業歷史知識生產的轉變，單數大寫的歷史書寫文化業已瓦解，新的歷史圖像隨之浮現。不過，當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框架被請下神壇後，我們該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獨特的歷史？「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止盡的對話」，自從卡耳為歷史下此定義之後，各方的書寫論客莫不以此探究過去——現在之間的關係。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世界，歷史就像一方承載各色記憶的水塘，任何人皆能心領神會，各取一瓢飲。就如同瑪札所云，「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 目錄

導讀——新的歷史地景，不一樣的漫遊指南／陳建守  
導言

017 003

### 第一章 誰的歷史？

上層的歷史：「偉大的男人」和一些女人  
社會史與量化方法

愛德華·湯普森的史學革命  
抵抗與能動性  
權力和私人空間

062 055 049 037 032

### 第二章 何處的歷史？

國別史如何變得不再理所當然？  
海洋、中間地帶及邊境  
全球史的崛起  
被取而代之的歐美

131 124 106 090

### 第三章 什麼的歷史？

從觀念到事物  
不斷變化的觀念史  
湯瑪斯·孔恩的科學革命  
歷史脈絡中的科學  
新物件史  
自然和其他非人類行動者

181 172 166 161 153 150

### 第四章 歷史如何被製作？

從史官到學院學者  
通俗和公共歷史  
正統與修正主義：辯論如何塑造歷史？  
史料和檔案是否創造了歷史？

243 232 214 206

### 第五章 原因或意義？

因果關係和歷史  
追尋規律和模式：社會科學式的歷史與比較

276 270

馬克思主義與年鑑學派  
多元歷史與事件的回歸  
追尋意義：微觀歷史  
紀爾茲、傅柯與「新文化史」

308 299 289 283

### 第六章 事實還是虛構？

客觀性的興衰  
後現代主義和歷史：激進的懷疑主義及新方法  
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  
門口的野蠻人  
扭曲或想像：我們如何劃定界線？

375 368 363 353 340

結論  
致謝

405 399

---

## 導言

歷史學家的工作，看似不證自明，不過一旦你開始加以思索，就會發現這其實出人意料地難以定義。大多數人會描述歷史學為「對過去的研究」。但是「過去」是一個龐大的集合，它包括了從你開始閱讀這個句子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在此脈絡下所說的「過去」指的是：「在一段相當長度的時間逝去後，我們對其有一些看法」，實際上這往往讓我們至少要回到一、兩個世代以前。科學以外的大多學科都會處理到這層意義上的「過去」。大多數人文學科研究（文學、藝術史和哲學科系）都涉及到人類的過去。許多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所使用的素材，也都可以追溯到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前。那麼歷史學作為一門學科有何獨特性呢？

雖然歷史學確實獨一無二地特別關心過去，但其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卻十分不尋常

地缺乏一個總體結構或是明確定義——正是這種特性反而矛盾地解釋了為何它在學術界以外具有廣泛而持久的吸引力。人文學的其他領域和社會科學，相比之下更加緊密地受某些經典作品或知識體系，或是以上兩者兼具的約束。

在文學科系任教的人，一般都被認為應該要閱讀過許多重要的小說、戲劇和詩歌作品，即便在數十年間有些作者會被淡忘，而某些作者重受青睞。社會學家被要求應熟悉諸如馬克思 (Karl Marx)、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和韋伯 (Max Weber) 等主要學者，哲學家則要熟讀一群奉於萬神殿上的核心作家，上從柏拉圖 (Plato) 下至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文學和藝術史研究發展出分析文本和解讀圖像的特定研究方法；有些領域則需要數學或量化的專業知識——這些共同點賦予其他學科凝聚力，但這往往也帶來構成問題的副作用，那便是「行內話」(insider-speak) 的出現，在某些情況下就成了晦澀難解的技術術語。相較之下，歷史系中可能有德川時代日本的專家、研究鄂圖曼帝國的專家、研究雷根總統在位時期史的專家。他們所接觸的書可能永遠沒有一本相同，因為沒有歷史的「正典」(canon) 存在，但他們必須去評價關注不同主題同事所從事的研究，並要向他們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正是為何歷史學者所寫的作品與其他領域相比，行話和技術術語出現的頻率較少，而且較容易讓一般讀者感到親切。理想情況下 (儘管實際狀況並非總是如此)，任何人拿起任何一本歷史書甚至是學術專書，在未受過事先訓練的條件下都能夠理解其中的內容。

這並不意味著歷史的研究和寫作毋須特定技能；相反的，這取決於一個人所關心的時代與地域，有時候對技能的要求會相當嚴格。你可能需要掌握一種困難的語言，像是阿拉姆語 (Aramaic) 或中文，而某些情況下你甚至必須精通超過一種語言。一些子領域，如中世紀歷史，需要受進階的古文字訓練才能夠閱讀文獻；在其他領域，你則可能需要考古學、宏觀經濟學或語言學方面的專業知識。(以母語研究當代歷史，雖然乍看之下相對容易，不過從事準當代歷史 [quasi-contemporary history] 的專家會告訴你，無窮無盡的潛在材料是這學門所受的詛咒。) 歷史學沒有一種主宰性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包含了許多方法，從篩檢塵土到閱讀哲學作品。不過歷史學家一旦完成研究，就應該要能夠提出一套任何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敘述和論點。人們經常會說，歷史是由專家針對非專業人士所寫的，但事實並不總是如此：我們經常可以見到，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寫出優秀的歷史作品。過去十五年美國最負盛名的歷史獎項普利茲獎 (the Pulitzer Prize) 的受獎者，當中包括了一位英語文學教授 (二〇〇二年)、兩位記者 (二〇〇三年和二〇〇七年) 和一位銀行家 (二〇一〇年)。作為對比，不妨想像一下，若諾貝爾物理學或經濟學獎頒發給不曾正式受過這些領域專業訓練的人！

折衷主義 (Ecclecticism) 正是歷史學活力十足且廣受歡迎的原因，因為專家和業餘人士都具有研究歷史的能力。為了定義出最關鍵的問題，專業史學家必須浸淫在大量討論該主題以及學術論辯的研究成果中：如果要準備有關於美國奴隸制、大英帝國或越南戰

爭的研究計畫，你必須要先在眾多既有研究中找出你的獨特性，如此你才能夠確定自己的研究具有新意並值得被討論；另一方面，在所謂的研究過程，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是邊做邊學，除了像語言或是古文字學等技術問題，歷史研究幾乎無法被傳授。這需要獨創性（天曉得我怎麼會想到要開始尋找有關十七世紀同性關係的證據？）；具備主動性去思索事物從何開始，應該要與誰交談，還有該前去何處；並堅持在檔案史料中翻箱倒櫃，或是在線上文件中篩選，爬梳出那些難以捕捉的證據。你有方法去教導研究人員，當他們前往的檔案館中沒有他們需要的文件時，如何應對這種挫折的能力嗎？或是從這些起初令人失望的文件中扭轉乾坤般地找出寓含著預期之外內容的想像力？優秀歷史學家的技能和氣質與成功的記者非常相似：好奇心、聰明才智、耐心和頑固。此外，好的歷史學家如同記者，知道如何編織出有憑有據的故事，並能夠讓廣大讀者理解。

因此，與其單刀直入描述史學「方法」，藉由與其他學科的比較來加以定義會來得更加明瞭。藝術史、文學或哲學等領域的學者通常研究的是一個既存的「對象」：他們運用各種解釋文本或圖像的技巧，展開其研究——像是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小說、加泰隆尼亞的教堂裡的羅馬式壁畫，或是黑格爾（Hegel）全集。<sup>1</sup> 歷史學家則不是從這類對象切入，他們的工作在於透過研究創造出其所關心的對象。社會科學家通常從某種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和某種假設來展開其研究計畫，並使用問卷、實驗或計算來加以證實或反駁。歷史學家也是從一個問題或初步論點開始，但他們通常無法直接接

觸到研究對象；常見的狀況是，在歷史研究過程中所生產的紊亂證據，由於無法提供給原本問題有可信度的答案，最終使得該問題必須要被重新定義。

因此，歷史學家的研究工作比起其他學科受理論的影響較小，但這並不意味著理論不存在於史學中。正如威廉·西威爾（William H. Sewall Jr.）所言，歷史學家對於社會科學的獨特貢獻，在於分析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行為如何發展。<sup>2</sup> 所有歷史學家的研究皆奠基在某個時間和地點的具體細節，它們與其他時空環境因為標準不同而無從比較起：歷史學家在此意義上，是絕對的經驗主義者（empiricist）。但西威爾認為，歷史學家同樣會重建「事件」發生的順序及其影響，會追溯複雜的因果關係模式，並留心於一連串讓某種情況變得可能的複雜背景因素。歷史學家側重詳細描述並且注意事件和脈絡間相互作用的作法，正好證實了「社會時間性」（social temporality）理論左右了歷史學家的研究。「歷史時間性」，西威爾寫道：是「顛覆、不均勻、不可預知、不連續的」，而且會被戰爭和革命等事件加速推進。<sup>3</sup>

歷史學家即是依據各種時間性和因果關係的理論來進行其研究，儘管他們往往不會明言之。理論在歷史學作品中的位置不被強調，部分是因為此學科強調經驗的傾向，部分則是長久以來對於敘事的信奉，與作品必須能喚起讀者情感之理想。多數歷史學家或許會同意他們的研究，在理想上有兩層意義：解釋過去的變化如何展開，以及在讀者眼前重現過去的人們和場景。要成為傑出的歷史學家，你需要的不僅是記者的技巧，也要

有小說家的技巧。(許多人被歷史上的某一時期吸引而投身學習，不是因為某個知識層面上的問題或是某種政治主張，而是因為有關這時代的小說或電影刺激出他們源源不絕的想像力。)[「歷史」(history)和「故事」(story)在某些語言中是同一個詞，就如同過去的史學家一直是其社會中最優秀的故事編織者。

歷史學既是徹底的混合領域，其語言和方法大量借用自社會科學和其他人文學科；同時也是最經常從學術界跨足公共領域的學科。心理學、社會學或經濟學的普及作品雖不時會躍上暢銷書榜單，但是歷史書籍始終都在榜單上占有一席之地。這是歷史學另一個顯著的特徵，它在公共生活中無處不在——從低年級開始就被列入學校課程中；在博物館、戰爭紀念館、遺址和主題公園中；在政治家的演講中經常被引用。不同於社會學，歷史學有自己的電視頻道，不同於經濟學，歷史學有書友俱樂部。正是因為歷史對公共生活中有著無法抹滅的影響力，有關歷史探究的內容和性質的爭論在學術界內外皆不斷出現。

本書第四章描述了遺址和博物館之間的爭端，不過沒有論及圍繞著學校歷史課程的典型爭論：孩子應該學習自己國家歷史的哪些部分，還有應該如何學習？在美國關於此議題最大的爭論，發生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即全國中小學教育標準被努力推動建立之時。〈一九九四年全美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The 1994 National History Standards)乃由學者、學校教師與行政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所共同起草，並且結合了婦女史與少數族群史

的新學術成果，主張以全球史的課程取代傳統課程中對「西方文明」的鳥瞰方式。<sup>4</sup>甚至在課程標準尚未發表前，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保守派前主席琳恩·錢尼(Lynne Cheney，諷刺的是，她正是起草委員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就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題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嚴厲抨擊該課程標準。她指責，擬議的課程將歷史中的行動者，像是將逃亡的奴隸塔布曼(Harriet Tubman)放到歷史舞台幕前，因而犧牲掉更為重要的人物的篇幅，如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和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此外由於對三K黨和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等主題的著重，新課程所描繪的美國歷史「既暗淡又陰鬱」。該報紙的其他投書亦同聲出氣，指控起草者運用〈全美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來落實「灌輸」學童自由派的「仇美」陰謀，並且推動美國多元文化的「巴爾幹化」(balkanization)。<sup>5</sup>這場騷動是在因政治權力交替而起的緊張時刻爆發的：在民主黨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於一九九三年就任總統後，自由派如今可

①譯注：「巴爾幹化」是一個常帶有貶義的地緣政治學術語，其定義為一個國家或政區分裂成多個互相敵對的國家或政區的過程。

以自在地追求其既定的目標，這無疑使右派人士感到焦躁。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學校課程亦都經歷過相同的「歷史論戰」，而其他國家如俄羅斯、南非、法國等地，則得面對權衡愛國情感與承擔起過去所犯下的不堪錯誤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sup>6</sup>雖然英語文學系同樣在一九九〇年代因為「文化論戰」而吵得天翻地覆，爭辯哪些作家應被納入文學正典中（或是正典究竟是否應該存在），不過歷史學仍是最常被捲入公共爭議的學科。<sup>7</sup>其原因很清楚，歷史學家所構建的各種故事，提供了社會上各群體如國家、地區或民族等的集體認同，這與我們藉由自己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來建立個人認同，是同樣的道理。我們當然可以努力拓展出新的觀點，這能讓人對原有故事徹底改觀，也讓我們對自身有全新看法：心理治療中的許多形式正是要幫助患者做到這點。改變一個共同體的故事，像是國家，其效果可以是解放性的，但這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遭逢強大的阻力。

「歷史」受到現實中不同動機的驅使下不斷地改變——這通常被描述為「根據現在的需要向過去學習」。在古代和階級制的社會中，君主、軍事領導人和偉大王朝的過去方為「有用的」；在民主社會中，公民希望知道「人民」的歷史。自十八世紀末以來，無論在西方或其他地方，菁英們想要述說的而人們也想聽到的，則是他們國家獨特的命運。某些群體（工人、婦女、少數民族或種族）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此國族主義敘事之外，因此開始體認到必須要有研究能充分體現，他們與主流敘事存在差異的親身經驗。近年來在我們經歷了全球化後，讓我們意識到地球上的人們無論在現在或是過去都緊密相連，

全球史因此開始擺脫國族敘事。與此同時，歷史學家若是不尊重過去的話，他們也沒有存在的意義，歷史學比起大多數其他學科更加折衷，對於研究趨勢相對不敏感，這尤其是因為許多大部頭、扎實的書籍，其研究和寫作可能需耗費十到十五年的時光。長久以來不斷滿足大眾閱讀興趣的軍事史和傳記，這類傳統類型的歷史，還有全球史和環境史等新類型歷史，都持續地蓬勃發展。不過歷史學在每個時代往往都有最「前衛」的領域（不久前是文化研究，現在是全球與跨國視野），傑出著作之所以突出，大多數都是因為能層層剖析，並將各主題和方法揉合為一體。

《想想歷史》力圖描繪歷史學的廣泛和多樣性，同時突顯型塑此學科的內在張力和頻繁爭論。每章皆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而構成，它為討論提供了素材，但不提供標準答案。本書的前半部分思索歷史學在近數十年來如何改變，這表現在歷史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新的行動者、新的空間和新的物體：我們寫的是誰的歷史，以及當要描述不同的人群時，這會如何影響被述說的故事及其被述說的方式（第一章）？人們是怎麼開始將國家視為歷史中必然的脈絡，而且由於許多故事的發生，有的早於國家體的出現，有的發生在國家體之中，而有的發生在國家體消失之後，那麼如果我們跳出國家空間的框架來思考歷史，會發生什麼改變呢（第二章）？以及自從歷史學傳統將各主題按高低排列的方式——知識在上，自然與物件在底層——受到新方法的震撼後，歷史學中的各領域出現了那些變化（第三章）？

本書的後半部分圍繞歷史研究引起內外部爭議的三種方式——亦即歷史學中生產層面的衝突。第四章「歷史如何被製作？」追問學術、公眾和通俗歷史之間的差異和重疊，還有歷史學家所使用的史料，其不易掌握有時甚至充滿問題的本質；第五章「原因或意義？」關於歷史詮釋，密切關注描述（description）以及廣義的詮釋（interpretation）之間的鴻溝何在；最後一章「事實或是虛構？」從一九九〇年代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所捲起震撼學界的風潮切入，探討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與虛構，這些長久以來的棘手問題。我在這裡指出，雖然這場危機已經消退，它仍以一種持久的方式塑造了我們對歷史學家實踐的思考。

這本書的主題是——我們如何思考歷史，而不是為何要研究它。許多企圖要解釋閱讀及寫作歷史之重要性的書籍，都往往流於「那些不讀歷史的人必然會重蹈覆轍」這樣的陳腔濫調。歷史並不是要給予教訓，試圖把過去的情境硬搬到當下會是場災難：「我們將解放伊拉克，就像我們解放歐洲一樣！」「不要尋求外交手段來解決問題——銘記慕尼黑！」<sup>②</sup>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都同意，忽視、歪曲或抹去過去的企圖將帶給社會災難性的後果。

學習歷史有很多種原因：政治上的激情、追尋身份、知識上的好奇、對異國情調的品味，而且多數人都是出自好幾種原因，才因此被吸引去研究過去。正如歷史學家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所言，歷史的道德價值不在於從過去整理出清楚明白的「教

訓」，而是藉由想像位處於與當下環境極為不同的地方，進而解決種種複雜的問題，從中拓展心靈視野的經驗。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向讀者證明，歷史對他們及其社群的重要性；相反地，本書將研究過去的重要性視為理所當然，其目的是陳述創見與爭議在過去幾十年中如何型塑這個研究領域。

在以下章節中我盡我所能不帶成見地敘述，那些在近年來引領著歷史寫作發展的問題和爭議。但正如本書所言，特別是最後一章，今日絕大多數的史學家都駁斥，任何學者都可以具備真正「客觀」的觀點，我跟他們一樣都同意這一點。雖然我借鑑了各式各樣的例子，由於我的研究領域是社會和文化史，而不是軍事或政治史，這必然影響了我對問題和書籍的選擇方式。我的法國（以及廣泛而言歐洲和西方）歷史的專業更深刻地影響了我的觀點：在書中多數的事例以及所討論的作者，幾乎都屬於歐洲史和美國史領

② 譯注：慕尼黑會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九月三十日）是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四國首腦在德國慕尼黑召開的會議。英法為避免戰爭爆發，簽署慕尼黑協定而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出賣了未在场的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是一項緩靖政策。希特勒在這次會議上曾聲稱，蘇台德地區是他對西方的最後一次領土要求。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對此毫不懷疑，回到倫敦下飛機的時候，還興高采烈地聲稱，他帶回來「一代人的和平」。而希特勒卻食言，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域。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喜歡與否，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震撼了歷史學的問題和概念——勞工和社會史、能動性 (agency) 和抵抗、性別、文化分析、物質文化，以及社會實踐，這些僅為數例——最初皆由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學家所提出。雖然近年來有了重大變化，歐美歷史在以下篇章佔據的顯著比例，反映了西方在過去幾個世紀支配世界其他地區之大背景，這型塑了全球各地的知識面貌等各層面。但是，援引世界不同的歷史學風格，終究無法讓我擺脫困境：儘管我請益過研究非洲和亞洲歷史的同事們來糾正我的侷限性，但是我一定沒有擺脫我的訓練和領域所施加的有色眼鏡。討論這種主題的書若是由研究非洲、亞洲、澳大利亞或拉丁美洲的歷史學家來撰寫，很可能會相當不同。

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主旨，那就隱含在篇章的安排之中。本書的章節圍繞六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組織而成，描述了這數十年來的對話和爭議。《想想歷史》提供的不是答案或處方，而是繼續對話的邀請函。出於所有耳熟能詳的理由，我們需要我們的集體過往：從我們祖先的成功和失敗中獲得智慧和靈感、找出我們是誰，並且滋養我們的想像力。但如果我們只是紀念它而不相互論辯，過去必然會死去。本書所根據的前提是，對於歷史的興奮與激情大多是來自於其所引發的實質和方法論上的爭議，而本書目標便在於貢獻心力讓這些爭論持續進行下去的這項迫切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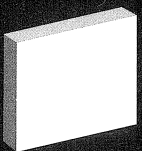
## 注釋

1. 關於研究對象是存在或是建構的爭論，請參閱Gabrielle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65 (January 1990): 75. 文學和藝術史學界的研究範圍已超越了傳統的文藝作品，擴展到了廣泛的「文本」和「視覺文化」的無數對象。但我認為，即使研究對象發生變化，這些學科的慣習仍將持續下去。
2. William H. Sewa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1-21. 中譯本：小威廉·H·休厄爾，朱聯璧、費濤譯，《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 *Ibid.*, 9.
4. Gary B. Nash, Charlotte Crabtree, and Ross E. Dunn, *History on Trial: Culture War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2nd ed. (New York: Vintage, 2001), 第17-19章。
5. *Ibid.*, 1-6, 189.
6. *Ibid.*, 第六章。Steven L. Kaplan, *Farewell Revolution: Disputed Legacies, France 1789/198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uart Macintyre and Anna Clark, *The History Wars* (Carlton,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 一本討論「正典論戰」和「歷史論戰」歷史脈絡的傑出作品，請參閱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未經出版。

o Peter Mandler, *History and National Lif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145-47.

CHAPTER 1  
THE HISTORY OF WHOM ?



第一章  
誰的歷史？

## 上層的歷史：「偉大的男人」和一些女人

誰是歷史的行動者？直到幾代前，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歷史的製造者」是有權力影響他們周圍世界事件的人。統治者、軍事指揮官和過去社會的其他領導人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因為他們作出的決定，塑造了數千萬同時代人的經驗。當個人擁有這種權力時，他們的生命似乎與其所處時代的歷史無法區分。人們將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希特勒（Adolf Hitler）或毛澤東視為他們所屬時代的歷史核心原則，以此來書寫並閱讀他們的故事。

對「偉人」（great men，有時是女性）歷史的普遍興趣仍在今日非常活躍：美國暢銷書榜單幾乎總是包括美國建國元勳和總統的傳記，以及諸如被讚賞或是爭議的人物，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或瑪麗—安東尼（Marie-Antoinette）。傳記這種文類正是偉人歷史寫作成功的關鍵。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歷史書籍有時候似乎是抽象的或是鉅細彌遺到令人困惑。將一個時代的事件與一個頂尖人物的生平連接在一塊，能賦予過去血肉以及色彩。原本可能被蘇俄革命史嚇得退避三舍的讀者，卻能夠被最後一個沙皇尼古拉二世（Nicolas II）在地窖中，與妻子還有五個孩子被布爾什維克<sup>①</sup>（Bolshevik）當局殘酷地處決，這般戲劇性命運所吸引。歷史傳記蓬勃發展不只是因為閱讀起來饒富興味，也是

因為某些個人的行為和人格確實對其時代的人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在位處公私不分的政治體系中權力無限的統治者身上尤其如此：誰會否認亨利八世（Henry VIII）在情慾和王朝榮耀的著迷對於英國歷史的影響？亨利決定與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並與安妮·博林（Anne Boleyn）結婚，從而促成了英國教會從羅馬教會分離，引發了一代又一代出於宗教信仰爭議的暴力，這是一個人的特定選擇毫無疑問地型塑了其當代及後世，在宗教、社會、政治、外交生活的最佳範例。

在大多數世界文化中，最古老的歷史以政治和軍事領導者為中心。在西方，從古典時代到較晚近的過去，對歷史學家而言最重要的「人」往往是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這個領導人最重要的活動是發動戰爭：古典政治史，與軍事史和外交史有高度重疊。從希羅多德（Herodotus）到不久前才剛出版的關於林肯的成堆書籍，非凡的領袖有著忠實追隨的學者和讀者，他的事蹟創造了在他們歷史上最激勵人心的篇章。「偉人」文類（包括少

<sup>①</sup>譯注：布爾什維克，在俄語中意為「多數派」，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個派別。布爾什維克派的領袖人物列寧（Vladimir Lenin）認為，社會民主黨應該建立一個以少數「職業革命家」為核心、多數黨員對其絕對服從的組織模式，即所謂民主集中制。

數的偉大女性像克麗奧佩托拉 (Cleopatra)、伊麗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或英迪拉·甘地 (Indira Gandhi) 等) 一詞隱含著一種觀點，即一個人的行為可以塑造一個時代，而且如果沒有他們，事情就必然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開。

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大多數的「偉人」是環境的產物。在一七九〇年代後期，法國人剛剛經歷了一場讓這個國家痛苦分裂的革命，政治階層大多失去了聲望及影響力。法國唯一順利的事情就是在歐洲的戰爭：一群熱心愛國的公民士兵經常將對手打得落荒而逃。將軍比政治家享有更多的聲望，而後者則需依賴前者的政治支持。在這種情況下，類似拿破崙一樣的人物難道不是極有可能會奪取國家的控制權，就算這個軍事領袖不像身材矮小的科西嘉軍官那樣聰明有魅力？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是一位精明、受到廣泛尊重並慷慨的領導人，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南非終結種族隔離的過渡時期，正好出現並親自見證此過程，這是天降鴻運或是這樣的歷史時刻就是適合這樣的人物出現？「個性還是環境？」是課堂辯論的傳統論題，一個絕對無法被解決的問題，有助於讓學生一方面整理出社會與經濟的條件，另一方面思考個人特質，並且深思它們之間的聯繫。

雖然大多數人會承認，環境對非凡人物的出現上至少起了一定作用，但許多人仍然抱持從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化中所繼承的個人「天才」(genius) 觀念。<sup>2</sup> 即使是最堅定的社會決定論者也容易被極為特殊的個人所迷住，像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莫罕達斯·甘地 (Mahandas Gandhi)，或者是定義迥然不同的天才——希特

勒。正如馬丁·路德的例子所顯示的，以「偉人」作為認識過去的方法，並不僅限於統治者和政治領導人。政治和軍事問題是歷史寫作史上最古老的課題（想想《舊約》的〈列王紀〉，或是荷馬〔Homer〕的特洛伊戰爭故事），而廣泛定義下的觀念史則是緊追在後的第二位。在此類歷史中，我們思考和相信的方式之變遷，通常被歸功於孔子、哥白尼 (Copernicus)、馬克思、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等個人的天才。變革的要素可能已經俱備，但是必須要有特殊的個體——像是亞當·斯密 (Adam Smith)、哈里特·史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或史蒂夫·賈伯斯 (Steve Jobs)——方能將「改變世界的想法」給具體闡述出來。智識上的「天才們」一直是傳統歷史書寫的對象，所根據的理由與之所以研究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相同：假定了人類過去歷史上最有興趣或最重要的生命，就是那些特別有天賦和有影響力的人。

探問「誰的歷史？」相當於思考人類活動的哪個方面重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被視為重要的歷史是關於政治的，而「政治」則被定義為公共權力的行使或鬥爭。在西方直到十八世紀，唯一能被想像的政治史就是正統的朝代，王公、君主以及像統治佛羅倫斯的梅第奇家族 (the Medici) 這樣統治全國的家庭。統治者的家庭樹可能會因為家庭支系之間的鬥爭，或是被突然崛起的僭位者所主張而要求被修整、被裁剪、被分開或甚至被複製，但類型大致相同的家庭樹始終存在。在十八世紀末期，美國和法國的革命開創了一種將統治者家庭樹連根拔起的傳統，這

些革命擴大了一偉大的國家領導人」之人數，包括了那些在根本上挑戰，或有時破壞了既有政治制度的人群。此後的政治歷史開始包括了反對派或革命英雄，如羅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胡志明（Ho Chi Minh）和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其領導者的能耐，往往綜合表現在政治、智識和精神幾個層面上。

沒有任何統治者或領導人在社會真空中行使權力，而在傳統「由上而下」的歷史中，他們與「執政」或「政治」階層分享著舞台。歷史學家對傳記的熱情，一直延伸到諸如絕對君主制下的官員、皇室顧問和軍事指揮官，像是英國的混合體制下的首相與重要政治家，而在民主國家則有更多人物躍然紙上。即使是獨裁者也有密切的合作對象，他們的行動是許多敘事磨坊中的穀物。領導者及其同夥往往與一群政治菁英合作，像是皇家或王室顧問、總統內閣，或是某種形式的代表制議會。幾個世紀以來，歷史學不斷記錄了男男女女們在這些環境中的活動。

直至約半個世紀前，大多數專業歷史學家仍普遍認為，領導者、政治菁英和國家相關活動的歷史是最重要的；事實上，現今學術界內外的許多人依然抱持這種看法。在傳統的政治歷史優先說法下有一套未言明的假設，而這在過去幾十年中即便沒被推翻亦面臨了嚴重挑戰：國家和政府是人類活動中最重要、政治領袖在推動歷史變遷上的影響力超過任何人、以及「政治」是在公共領域發生的一種活動。一些政治史的擁護者甚至會說得更加徹底，直言不諱的保守派史學家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遵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指出政治史比起其他歷史都重要，因為國家是人類追求其理性發展的最高之處，這一反映在透過法律、憲法和政治機構進行的社會理性排序和組織中」。她贊成並引用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政治是人類與動物之所以不同的關鍵因素，政治活動發生在「城邦的高層，人們在此追求共同利益以及『美好生活』，這就是理性最純粹的表達方式。」。

## 社會史與量化方法

歷史學的演變方式，並不是某種歷史突然地被完全取代。強調政府和領導者的政治史，至今仍存在且活躍著；相反地，社會史在過去許多時代都存在著，於十九世紀尤為顯著。從一八二〇年代以降的法國，如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和朱爾·米榭勒（Jules Michelet）等受革命啟迪的歷史學家所寫作的歷史中，像「資產階級」或「人民」這些群體是推動反抗自貴族史詩般鬥爭的主要動力，且於一七八九年透過革命最終造就了法國這國家的新生。頂尖的英國史學家遠在一九六〇年代以前就寫作「社會史」：湯馬斯·巴賓頓·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於一八四八年寫就並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著作《自詹姆士二世即位以來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記錄著英格蘭在政治解放後的進步，書中有一節討論一六八五年時的英格蘭，其中涵括了包括社會階級到咖啡館、路燈、以及新聞報紙等所有事物。<sup>4</sup> 近一百年後，在二次大戰中，麥考萊的曾甥，劍橋史學家屈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寫就了相當成功的《英格蘭社會史》（*English Social History*）。屈威廉的書出版於一九四二年，這本六百頁的書探討了中世紀到一九〇一年的英格蘭社會狀況，與麥考萊的書相同，涵蓋了廣泛的主題，從貿易路線、人口趨勢到婚姻習俗及飲食。透過翻閱屈威廉的書，你可能會遇見在喬叟（Chaucer）的時代裡被迫與不喜歡的伴侶結婚的年輕女孩，十七世紀晚期上流階級飲酒和吸菸習慣的報導，或是以想像力生動地描述在一七五〇年左右的農家生活景況（例如極度潮濕等等）。<sup>5</sup>

麥考萊和屈威廉所寫的這種社會史，在其他國家傳統中亦可找到相似者，這種社會史顯然是政治史的從屬與附加物。<sup>6</sup> 在麥考萊的《英國史》中，篇幅頗長的開卷部分（一六八五年英格蘭狀態），其作用是作為背景交代，來引出主舞台上的重要作為，像是詹姆斯二世（James II）、奧蘭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及其他合作夥伴間的政治角力。《英國社會史》作為屈威廉的晚年作品，有別於他早期的政治史著作，主要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戰時士氣，大抵上類似莎士比亞式對於充滿茅草屋以及「粗壯農夫」（*scour yeomen*）的國度之讚美詩。本書恰如其分地說明了屈威廉所謂社會史即為「把政治抽離其中的人民史」，這句經常被引用、充滿爭議和簡潔有力的描述。<sup>7</sup> 屈威廉這本書體現

了關注「風俗與生存條件」的老派社會史傳統，但是實際上其假設值得被注意，也就是「政治」是那些僅發生在上層的有目的之行為，因此在社會中大體上是不可見的。窮人和中間階層被假定對於歷史變遷毫無影響力；因此，《英國社會史》這樣的書讀起來像是一系列風景如畫的描述，而不是一個主張或故事。

如此說來，普羅大眾從未被歷史學家完全忽視；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他們很少被認為是歷史的重要參與者。當大眾作為有影響力的人群——在波士頓茶黨事件、圍攻巴士底獄或是席捲冬宮<sup>②</sup>的時刻——史學家會讚揚他們推動了具前瞻眼光的上層人士計畫，不過從不會以個人名義來認可他們。

這一切都在一九六〇年代開始變化，因為「正規」（政治、外交、軍事）歷史變成了二元歷史中的一元而已，史學家開始說過去的那種歷史為「上層史」，與其對抗的則是「下層史」，或者可說是「由上而下」（*top-down*）對抗「由下而上」（*bottom-up*）。突然之間，似乎所有人都想從群眾而不是菁英的角度寫歷史。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

② 譯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士兵和工人攻佔冬宮。冬宮為當時俄國皇室所居住的宮殿。

一九七六年的著作《戰爭的面目》(The Face of Battle)最恰當地說明了歷史學的新轉變所帶來的不穩定創造力，本書亦標誌著所謂新軍事史的出現。從前軍事史雖然多少會對普通士兵的經驗有所著墨，但是基根的書是第一本使其成為研究核心主題的重要著作，從而顛覆了我們對何謂戰鬥、勝敗的理解。

在《戰爭的面目》中，基根質疑軍事史學家之間的主流觀點——戰爭的成敗取決於領導、指揮和紀律。他指出，戰爭「與任何其他他人類活動一樣複雜多樣，而且需要考慮到會影響結果的決定因子還更多。」<sup>9</sup>即使是帶著理想的勇敢士兵所希望的結果也不必然與其指揮官一致，而一般所認為的戰鬥人員在面對危險時繼續推進的動機（訓練、強制性和同袍情誼），往往在面對實際危險時使煙消雲散。基根堅持認為，主宰戰爭勝負的是軍隊而非指揮官。因此，軍事史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在「戰場」上的實際感受，究竟是那些情況可能促成士兵固守崗位或是抗命逃跑。

在基根對滑鐵盧戰役精彩的重構中，即拿破崙的軍隊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輸給威靈頓公爵(Duke Wellington)的一役，他首先重建起了雙方士兵的身體狀態和經驗：前一天的長途行軍消耗殆盡了體力，由於徹夜的寒冷潮濕而睡眠不足，戰鬥人員的感官在戰場上遭到密集轟炸，如黑色火藥武器所散出的煙霧，以及成排子彈打在劍上聽起來像是「拿一根棍子沿著公園欄杆劃過去」的聲響。<sup>10</sup>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異常恐懼的反應並不足為奇。當法國皇家衛隊發現自己要面對在咫尺霧中突然冒出一個旅的英國部隊時，

儘管他們的人數比起敵方還多，但是他們陣形崩離析隨後跟著就撤退了。基根推測，英國士兵之所以比起對手更加堅守崗位，不是出於優越的指揮，真正的原因一方面是疲憊與酒精的結合，另一方面是方陣陣型讓他們感覺到受同袍保護（雖然實際上這樣的大型編隊會是砲擊的主要目標）。<sup>11</sup>基根的作品提供了生動的示範——但將視角從身處帳篷和馬上的官員轉移到在黑煙中摸索的部隊後，所以洞察到的深刻見解。他的作品引人注目地強調普通百姓（雖然在此是非出於自願）在「偉大事件」的影響力。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社會史」這個領域開始席捲美國的歷史界（「從下到上的歷史」和「自下而上」的說法因為聽起來充滿價值判斷以及有些諷刺意味而逐漸不被使用）。在一九四八年，美國大學幾乎沒有人提交社會史的學位論文；到了一九七八年，比例則達到四分之一且持續增長。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每年在哈佛、耶魯、密西根州和威斯康辛州等大學開設的社會史課程從零門到二門不等；二十年後，這些教育機構一年開設有十三到十七門相關課程。<sup>12</sup>

然而，即使在作為歷史學創新領導者的全盛時期，關於何謂「社會史」以及如何實踐幾乎從未有共識存在。早期流行的一個觀點認為，社會史是社會結構的歷史，而且捕捉「社會」的最佳方式是：儘可能有系統地收集有關過去人類最大數量的可比數據。換句話說，歷史學應該被看作是一門社會科學。如果人們認為數字不會說謊，而且樣本越大越能被信任，那麼歷史中最確切的事實就必須建立在儘可能大的數量上。這種推演下

來的結果是，量化歷史的出現並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的興盛。

許多歷史學家至今仍然採用的量化方法，最初是社會史樹立其「科學」性的一種方式。藉由收集和比較大量數據，並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追蹤變化，來提供無法辯駁的證據，這種方式是屈威廉所用的那種文學筆觸證據或描述性證據所無法做到的。量化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其最可靠的史料來源，集中在可被預測的領域。各式各樣的機構在幾個世紀以來持續地追蹤經濟活動，如價格和收益，並記錄下了人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出生、婚姻和死亡。幾個世紀以前，政府開始進行人口普查以制定更有效的稅收機制，而現代民主國家通常保留了選民的居住類型以及政治選擇的紀錄。簡而言之，量化最適合關於人口、經濟和群眾政治這類範圍廣大的歷史問題。

在歷史研究中對量化的持續使用，至今仍在經濟史領域盛行，該領域長期以來被稱為「計量史學」(cliometrics)的方法所主導，亦即「經濟理論和定量技術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sup>13</sup> 經濟史最初就跟著其他領域一樣具有敘述性，其中包括對農業技術、牲畜和貿易路線等問題的描述。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受經濟學訓練的一群年輕美國學者開始提出，可以從中世紀的各種歷史資料中提取關於物質生活基礎的量化證據並加以分析，類似於主流經濟學家對當代數據的研究：就如當前的量化史學是出自對歷史學有興趣的經濟學家，而不是對經濟學有興趣的歷史學家。<sup>14</sup> 自一九六〇年代以降，「新經濟史」蓬勃發展，不過間或有爭議存在，最為惡名昭彰的是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苦難的時代》

(*The Time on the Cross*)，本書的目的在於證明美國的奴隸制度是一個有效且相對溫和的生產體系。<sup>15</sup> 而在計量史學的熱潮逐漸消退後，經濟史領域更加多樣化，其討論內容包括從觀念與科技再到家庭與銀行的所有事務。<sup>16</sup> 經濟史不僅比其他任何歷史更集中致力於量化方法的使用，有跡象顯示數字在不久之後所佔的比重還會更加突出。隨著人口、軍事徵兵、婚姻以及死亡等記錄的不斷增加，以及資料庫之間的彼此連結技術越來進步，正如雷恩·亞布拉米斯基(Ran Abramitzky)所說的，「將大量質化資訊轉換為量化數據」的工作將變得更加容易。<sup>17</sup> 儘管近幾十年的電腦革命提升了經濟史在經濟系的地位，其他領域的歷史學家們大多不願意把數字作為其主張的核心。

量化方法在當時是歷史領域的主流，歐美歷史研究者群體中對此方法的熱情於一九五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初達到頂峰。對於西方的歷史學家來說，收集和整理有關匿名生活的大量數據，這與冷戰時期對科學和民主的信奉完全吻合(詳參本書第四章和第六章)。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八年，美國主要歷史期刊中包含數字表格的頁面百分比增加了五倍，而大量研究生和年輕教授參加了由頂尖機構主辦的暑期課程以學習統計學的奧妙之處。<sup>18</sup>

量化歷史在其鼎盛時期提出許多大問題，並根據大數據加以回答。美國史研究中的一個傑出例子是史蒂芬·瑟恩思忒隆(Stephan Thernstrom)於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其他波士頓人》(*The Other Bostonians*，書名意味著「除了婆羅門菁英以外的人們」<sup>19</sup>)，這是一項關於波士頓從一八八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的社會流動研究(在當時蔚為新潮)，



透過電腦輔助分析從人口普查手稿、婚姻記錄、出生證明書和波士頓城市名錄中提取出的大量數據。透過追蹤在這段時期中許多個別男性的樣本，比較他們的職業與父親，並且關注從一個住處搬遷到另一處的變化，瑟恩思忒隆藉此得以作出有據可查並合理的結論。他表明，在這個時期內，人們從體力勞動流動到非體力勞動工作的速度大致相同，但是社經地位的變化通常是有限的（工廠工人的兒子更有可能成為店員而不是醫生）；一些團體（俄羅斯猶太人）在社會中比其他（義大利人）更快地上升；然這樣的流動對波士頓黑人而言幾乎不存在。<sup>19</sup>《其他波士頓人》和其他學者的研究一樣，對於解答以下問題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美國是否真的是一個機會之地，若真是如此，又是誰的機會之地呢？

對於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許多專業歷史學家，如瑟恩思忒隆的作品體現出「社會史」的精髓。如果社會史是指「社會的歷史」，那麼追問和回答關於社會流動的問題，顯然應該是這個領域關注的核心。量化來源納入了儘可能多的個人於其中，而且雖然關於方法論的爭論無休止，但往往能夠產出有說服力的可靠資訊。但是，兩個相關的問題從始至終都糾纏著量化歷史：一方面此種歷史將人類簡化為一元化的集合體，另一方面也鮮少能讓讀者感到興奮。瑟恩思忒隆作為此流派的行家，思緒清晰且行文優雅，但要能夠閱讀完他的書仍需要相當的勇氣，書中大部分的字句都像是一出身自中產階級家庭而從事藍領工作的男性，在他們當中超過一半的人——分別是百分之六十三、五十一和五

十一——只是短期性地從事努力工作而已；他們後來都回到了原本的階級。相較之下，只有半數到三分之一出身藍領的青年和以藍領為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後來爬升到非努力工作職位。<sup>20</sup>數字背後確實有故事可以講述，有時能扣人心弦或令人不安。例如，晚近關於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圖集提供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地圖，例如顯示一六四二年至一八〇七年期間從西非帶來的奴隸總數的圖表；其中粗紅箭頭代表著運送三百二十萬黑人奴隸到加勒比海的英國船隻，還有三百萬黑人奴隸到巴西的葡萄牙船隻，儘管你不認識其中任何一個人，但仍會感到反胃。<sup>21</sup>

然而，即使在它的聲望最高時，量化史學仍讓許多專業歷史學家不滿意，而不僅只有著名方法學保守派學者卡爾·布里登鮑夫（Carl Bridenbaugh）這麼覺得，他在一九六二年的美國歷史協會主席致辭中抨擊「在臭婆娘『量化』女神（Birch-goddess QUANTIFICATION）的神殿中膜拜的那些人，絕不是優秀的歷史學家」。<sup>22</sup>

③ 譯注：此處的「婆羅門」指波士頓乃至新英格蘭地區的傳統上層階級，他們多受高等教育且擁有大量財富，一般會上溯其家族的歷史至最早定居於此的英格蘭移民。

④ 譯注：Birch-goddess，除「字面意義」外，亦有會帶給信徒榮華富貴的女神之意義，不過往往帶有貶義，因信徒必須出賣自己的靈魂。

統計方法允許歷史學家能夠根據資料中所提供的最大群體提出論點，並透過追蹤資料庫中長時間的變化，回答變遷的問題並讓人得以信服；研究者可以藉由資料，具有相當確定性地追蹤小麥價格的上漲和下降以及嬰兒死亡率的型態，或是波士頓愛爾蘭工人的社會流動性。但數字並不告訴你農民家庭是否將飢荒當作來自上帝要他們經受的折磨，也不會告訴你他們是否因為另一個小孩的死亡而感到悲傷，還是因為瘟疫失去了三個小孩早已麻木，或者美洲的實際狀況跟約瑟夫·奧謝（Joseph O'Shea）在克萊爾郡<sup>⑤</sup>（County Clare）時所想像的相比究竟是較好還是較差。

正如史蒂芬妮·斯莫爾伍德（Stephanie Smallwood）所主張的，歷史學家傳統所關注的於中間航程<sup>⑥</sup>（the Middle Passage）上死亡的奴隸數字，成了一種令人不愉快的奴隸統計；它掩蓋了對於仍在船上的奴隸來說每一個人死亡的實際意義，他們的心中會飽受折磨，因為他們知道那個死去的人的靈魂將被困在船上無法與其祖先會合。<sup>23</sup> 計量可以從外部去描述一大群人的經歷，但是無法解釋離鄉背井、結婚，或者被奴隸船運送對於個人的意義。這反過來又是一個有更大問題的症狀：計量歷史中的個人不僅沒有姓名，而且也不具備行動能力。數字以被動的語句呈現了令人震驚的事實：數百萬奴隸「被運送」穿越大西洋。但是參與了對奴隸商人註定失敗的反抗的那些俘虜，他們究竟是誰呢？量化可以告訴你，「社會」多數人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不會告訴你社會上的個人做了什麼，以及這些行為對他們的意義。它仍然是分析過去許多不同類型數據的有力手段，

可以被運用來讓相關所有事情變化（從閱讀品味到世界氣候變遷）的主張更有說服力。許多歷史學家繼續將量化分析作為其工具箱中許多法寶之一。然而，完全依賴於數字的歷史作品現在已不多見：大多數情況下統計數字皆與更具敘述性的其他證據結合。「社會史」中的「社會」可以指「整個社會」（不過在此應該註明，瑟恩思忒隆的研究將半數的社會——「婦女」排除在外），但是對於二十世紀的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而言，「社會」就等同「工人階級」。這個等式是十九世紀的遺產，當歐美的改革者表達出對所謂的「社會問題」震驚，這問題指的便是工業革命對工人生活的破壞性影響。在一八三〇和四〇年代，中產階級觀察家寫下了揭露有關現代城市工人悲慘生活的著作，引進新機器和新技术的清楚後果，以及其所帶來的勞工剝削；其中最著名的是馬克思的親密合

⑤ 譯注：克萊爾郡是愛爾蘭的一個行政區，位於愛爾蘭島西岸。

⑥ 譯注：中間航程指的是從非洲到美洲的航線，之所以稱為中間是因為被視為大西洋三角貿易的第二段航程。第一段為當中美洲種植園的甘蔗被製成糖、糖蜜後，西歐國家便以船隻運送至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城市，交換一些商業成品，然後透過第二段航程將其帶至非洲海岸，以便換購奴隸。最後這些奴隸被帶至加勒比海地區，賣給奴隸種植業或是再轉往北美與南美，所賺的盈餘便購買糖再運至歐洲，此為第二段航程。

作者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十九世紀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啟發了第一代勞工史家，他們在一九〇〇年前後的幾十年裡活躍，不僅寫下工業化對工人造成的影響，而且還描述了工人如何回應的歷史：組織、抗議、罷工及帶頭革命。這群歷史學家——包括約翰·勞倫斯 (John Lawrence)、芭芭拉·漢蒙 (Barbara Hammond)、英國的韋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德國的愛德華·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以及法國的愛德華·多萊昂 (Edouard Dolléans)——往往不是學術界人士，而是親近勞工運動的新聞記者、作家和政治家，有時甚至是工會成員。他們所提供的是內部成員的觀點，所以可預期地對於其研究主題抱持相當的同情心。

若將屈威廉的話顛倒過來，早期的勞工史是把政治放回來的社會史，不過其作法往往有些矯枉過正。英國左派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曾指出，大多數傳統的勞工運動史在「技術上和方法上仍舊相當正統」，與老式的政治史非常類似，因為它側重著墨在領導階層活動而不是普通工人的經歷，後者經常湮沒於關於運動內部無窮無盡派系鬥爭的紀錄裡。<sup>24</sup> 社會史中，經典的勞工史以貧窮勞工的世界中存在著高低等級的觀點為前提，而其中男性工會成員是工人階級的主要人物；在這個觀點上，「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意義是相同的。<sup>25</sup> 經典的勞工史大多於二十世紀的早期和中葉寫就，呈現了工人（幾乎從不提及女性）如何在政治舞台上展現集體力量的努力。因此，它代

表了「下層歷史」的一種重要早期形式，在這些歷史中，過去的鬥爭提供了後來的進步和激進傳統如何敘述其起源的材料。然而，對於與任何勞工運動不相干的人來說，這些黨和工會鬥爭的編年史僅是佈滿了相互競爭的群體們的首字母縮略詞 (TUC 和 STUC、SPIO、CGT 和 CGTU、AFL 和 IWW、CISL、DGB)。就勞工運動的局外者而言，勞工史的經典作品所關注的地方大體而言似乎往往過於狹隘且令人卻步。

## 愛德華·湯普森的史學革命

上述背景有助解釋《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九六三年) 一書激進的新論點和巨大影響力，其作者為愛德華·湯普森 (E. P. Thompson，一九二四—一九九三年)，被認為是「全世界最常被引用的二十世紀歷史學家」。<sup>26</sup> 湯普森這本記錄新興資本主義在一七八〇年至一八三〇年間對一般英國大眾造成之影響的長篇著作，重新定義了勞工史，甚至是整個社會史領域的研究規範。至少在英語世界中，《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無疑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被最多專業史家閱讀以及引用的著作。為何此書有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本書的影響力有一部分自然是與作者的人格和聲望有關。口齒伶俐，富有魅力，

異常英俊，湯普森出身於英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家族成員多為傳教士和學者且散布世界各地。湯普森是詩人、文學評論家、政治活動家以及歷史學家，他一生中都以敢於違逆時局，做出堅守原則的選擇而著稱：他在學生時代加入了共產黨，當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恐怖統治為世所知時他便決定離開；他最早的工作是工人成人教育班的教師而不是尋求大學的職位；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投身於社會和政治運動，例如世界各地的裁核運動。<sup>27</sup>在英國及其他國家懷抱左派政治立場的人們心目中，湯普森代表著道德權威，這無疑影響了這本書還有他後來的著作是如何被人們所接受的。

雖然如此，湯普森最著名的還是其文字作品，尤其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湯普森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基於此思想傳統，他的核心關懷是記錄和解釋資本主義對窮人生活造成的破壞性後果。<sup>28</sup>標準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聚焦在勞工運動的勝利和失敗上，不過《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並不太討論工人組織；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嚴格的「科學性」，不過湯普森的書中連一張數字表格也沒有，而是聚焦在故事主角的主觀經驗上。《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所關注的對象不是過去往往被視為工業化下主要受害者的工廠工人。相反地，本書呈現的是早期資本主義對英國傳統工人的影響：機械化和廉價的非技術性勞動力的競爭，使得織工、鞋匠、鐵匠和其他工匠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注定沒落。湯普森認為，他們所面對的不僅是經濟上還有文化上的壓力。工人失去了對自己時間的主導權，例如，不再能夠將精力在密集的工作中完全耗盡，然後在週日喝

得痛快，接著以紀念「神聖禮拜一」（Saint Monday）為由在週一放自己假，他們現在受到現代「工作紀律」的規範，必須要保持規律的生產力。雖然窮人的孩子不論在那個時代都得努力掙錢，但他們以前是在家人的監督下於家中勞動，青少年如今則被迫進入遭剝削風險要高得多的工廠和礦山。湯普森寫道：「（工人的）悲慘經歷有上百種不同的形式；對於田間勞動者而言，他失去了村莊公地的使用權和村莊層級的民主；對於工匠而言是工匠地位的喪失；對於紡織工而言是生計和獨立性的失去；對於童工而言是不再能夠在家工作和玩耍；對於實際收益增加的許多工人們而言，喪失的是安全、休閒以及惡化的城市環境。」<sup>29</sup>基於這些經驗，階級意識（因察覺到被集體剝削）隨之誕生。

雖然《英國工作階層的形成》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書——長達八百頁、組織鬆散、且預設了讀者具備相當的英國史背景知識——但其立刻成為日後所謂「新社會史」的經典。本書對於歷史寫作有兩個尤為重要的影響：首先，湯普森此書所關心的工人，大部分並未在組織中領頭或做出具體政治要求，他的「工人階級」包括了極端貧窮、邊緣化、不識字的人，那些在歷史上屬於「輸家」的人們。他堅持，他們同樣值得我們的注意。他令人難忘地寫道，「我尋求把可憐的織機工、強烈反對機械化的農夫（Luddite）<sup>30</sup>、相信『烏托邦』的工匠……從後代人嚴重的自以為是中解救出來。」<sup>30</sup>其次，湯普森堅持認為，「階級」和「階級意識」不是從理論或數字推論出來的社會學抽象名詞，而是需要特定時間和地點方能被描述出的獨特關係和經驗：階級意識不僅出現在工會中，也出現

在紡織工人他們抹黑臉龐在黑夜去砸毀新的機械化工廠，或者出現在成千上萬的人聚在一塊聆聽相信基督將復活並為王一千年（千禧年）的女先知喬安娜·索夫葛特（Joanna Southcott）呼喚上帝並以憤怒處罰「放蕩的」有錢菁英的場合中。<sup>31</sup> ⑧

這些主張對當前的我們來說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這正證明了湯普森和像他這樣的歷史學家，在拓展歷史中「行動者」的定義、以及何謂在「政治」做出要求的定義上所取得的成就。過去絕大多數人沒有物質和教育資源，沒有辦法記錄下自己的夢想或不滿；但難道他們的故事不也應該被述說，難道他們憤怒和蔑視的姿態、他們令人困惑的信仰，不應該被認真看待嗎？湯普森的研究拓展了誰應該被認為是「工人階層」（或社會階級）成員的定義，以及社會史的視野。但他的成就不止於此，湯普森致力於認真看待物質條件和日常生活：他主張，工人在此期間變得激進是因為早期資本主義的壓力，不僅影響他們的收入，更影響到其家庭生活、工作和娛樂的方式、宗教信仰，還有他們習慣的做事方式。《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透過展示如物質環境、家庭生活、民俗風俗和信仰等歷史主題，是如何與許多顯然「公共」的事務如工業變革和激進抗議活動密切相關，開始了屈威廉式社會史自其從屬地位解放的過程。從那時起，任何人若想將社會歷史貶低為「非政治的」會變得相當困難。

理論上，沒有任何一種歷史方法在本質上具有一套具體的政治信念，但在實踐中卻並非總是如此。社會史從一開始就幾乎一直與民主或進步的主張密切聯繫，「社會」意味

著「大眾」或「窮人」。紀錄「人民」影響國家命運的歷史，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的西方民主國家，由政治自由派的成員寫成，如法國的米榭勒、英國的麥考萊和美國的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sup>28</sup> ⑨在接下來的幾個世代裡，量化標記了民主和社會史之間的聯繫，因為量化提供了這麼一個方法，透過從多數人的經驗中得出結論，讓過去幾代人得以「投票」決定他們是誰以及他們做了什麼。例如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法國，引領學術界的年鑑學派成員（以其頂尖期刊得名），藉由撰寫大量有關早期近代法國地區，特別是法國農民的著作，致力於還原自己國家的歷史。這些大部頭的作品可能需耗時十五年或二

⑦ 譯注：在此指的是勒德分子（Luddite），十九世紀初參加搗毀機器的英國農夫、手工業工人。

⑧ 譯注：喬安娜·索夫葛特（Joanna Southcott，一七五〇～一八一四年）是英國一個以她名字索夫葛特命名的基督教派創始人。她生於英格蘭西南部德文郡（Devon）一農舍。她四十歲以前一直是家庭工人。一七九二年，她宣告自己是基督二次臨生前與神溝通的人，並且以散文和韻文的形式發表關於戰爭、農業收成和天氣的預言。一八一〇年以後，她作為預言家的名聲越來越大，信眾也越來越多，慢慢形成了一個教派。一八一四年，索夫葛特死於中風，其教派也開始衰落。

⑨ 譯注：朱爾·米榭勒（Jules Michelet，一七九八～一八七四年）出生於法國巴黎，法國歷史學家，被譽為「法國史學之父」。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一八〇〇～一八九一年），美國歷史學家、政治家。著有十卷本《美國史》，被譽為「美國歷史之父」。

十年才能完成，經常包括數百頁的表格和圖表，支撐這些研究的信念是，相信真實和深刻的法國歷史存在於農民生活中，因為在二十世紀以前法國絕大多數人口皆為農民。<sup>33</sup>

「社會史」是否意味著「貧困多數人的歷史」？不必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層階級的描述性歷史有時被專業歷史學家認為是瑣碎的消遣，類似於觀看一部BBC古裝劇。不過在該領域起步的階段，社會史關注的主要是窮人，即使是具有堅實左派資歷的歷史學家也承認，「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一樣都是社會群體，他們的集體行為和命運都有其重要歷史意義。例如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研究英國都鐸王朝（the Tudor-Stuart）時期的頂尖學者之間有一場大規模的學術辯論，爭論一六四〇年代的英格蘭革命是否肇始於英國的統治階層成員之間地位和財富的大洗牌，小地主們組成之鄉紳的競爭是否動搖了上層貴族的至高地位。

參與這場論辯的一位主角日後描述這「像是場角鬥士競技表演，彼此之間毫不留情」，在論辯中新社會史是其交戰的武器：關於土地權、莊園、債務模式等詳盡的數字彙編，以及較為傳統的描述性材料。<sup>34</sup>歷史學家之間激烈的辯論，同樣出現在探討資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起源中的作用，以及美國奴隸階級的性質之時：法國的資產階級是一群具有階級意識且意圖推翻貴族的人們，還是其實在擁護著貴族的價值觀和願望？美國奴隸主是資本主義商人還是前工業時代的家父長？<sup>35</sup>即使沒有重大爭議，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菁英階層社會史，現在也被廣泛接受對於理解任何社會中的階級關係和社會變遷皆至關

重要。<sup>36</sup>

## 抵抗與能動性

社會史的中心關懷一直是重現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命、聲音和鬥爭。對於湯普森的同代人或於一九六〇年代成年的一代而言，窮苦工人抵抗和叛亂的歷史自然為其關懷所在。研究組織性勞工的史學家，在解釋工人罷工背後動機時永遠不乏答案——他們為什麼會組織起來抗議低工資、糟糕的工作條件和其他形式的剝削很容易可以理解，尤其是在有充分理由相信集體努力能帶來成果這樣的背景下。然而，一九六〇年代以降的「新社會史家」被其他形式的抗議行動所吸引——那些古老的、沒有任何成果的以及非理性的窮人叛亂。這些作者的目的是要呈現出，被剝奪者如何採取行動對抗其所認為的不公正。儘管他們抗議的具體形式，可能令現代觀察者感到困惑。湯普森在一九七一年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十八世紀英國群眾的道德經濟〉（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提供了一個範例。<sup>37</sup>湯普森不滿意於將前工業化暴動行為解釋為面對糧食短缺未經思考的暴力反應，他指出這些行為以及訴求當中的特定模式：農村人群去襲擊農場、工廠或糧倉，不是出於無意識的憤怒或企圖掠奪糧食。他們

有特定的訴求，像是被放置於農民穀倉裡的匿名信件如此寫道：「先生，要是你不把小麥帶到市場上並以合理的價格出售，那麼你的穀倉就將被摧毀。」<sup>38</sup> 有時由婦女領導的人群抓起成堆的穀物，不過並非為了偷竊，反而是將糧食沿路散落，或將其傾倒在河裡。他們以社群的名義企圖威脅商人、農民和磨坊主以他們認為「公平的價格」出售，這個價格是讓最貧困家庭可以生存下去的「合乎慣例」水平。總而言之，他們在言語和行動上以基於社群價值觀的「道德經濟」來對抗市場非道德性的運作方式。

隨著新社會史的興起，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到缺乏權力或教育的人們如何反抗與提出要求。已經有些研究討論了一八三〇年代英格蘭大規模農業暴動，在暴動中農民破壞了打穀機並且留下寫著「斯溫上尉」(Captain Swing)的字條<sup>39</sup>；在法國西南部自稱為「女士們」(demoiselles)的農民，同樣在此年代抗議嚴苛的新森林法(Forest Code)，他們的做法是將臉龐塗成紅黑相間在晚上騎馬外出，並且將衣服懸掛起來隨風飄揚；而較前者稍微晚十年左右，威爾斯的「麗貝卡」(Rebecca)暴動分子，在憤怒地攻擊他們視為稅賦不公的徵收過路費的城門之前，會先換上異性的服裝。<sup>39</sup> 十六世紀法國城鎮的年輕人和十八世紀位處大西洋上的水手們，都曾組織了嘲諷法庭(mock courts)來揶揄真正的法庭。<sup>40</sup> 在十九世紀的非洲斯瓦希里人(Swahili)村莊，年輕人慶祝開齋節(Eid al-Haji and Eid al-Fitr)的方式為穿上華麗衣裳以及表演舞蹈和諷刺歌曲，這些演出很容易對社會階級較他們高的人構成威脅，而且有時候會演變為暴力衝突。<sup>41</sup>

歷史學家透過仔細研究他們的社會經濟背景來解釋這些抵抗行為，要解釋他們究竟是為什麼觸發(在大多數情況下，外人所做的決定會被視為是對於傳統生計和價值觀的侵犯)，並解讀他們的象徵性面向。例如，對於前工業時代的工人而言，在暴亂中男扮女裝是出於許多互相關聯的原因：女裝是最容易取得和最便宜的偽裝；婦女實際上經常參加糧食騷亂，而且當她們被逮捕時，傳統上不會被起訴；性別交換是嘉年華中的象徵節目，在嘉年華時變換身份和嘲弄某人的「上級」是可以被接受的；正如導演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所理解的，一位彪形大漢光是穿著女裝就很嚇人，特別是如果他再蒙上面具或塗上面漆。受到湯普森作品的啟發，歷史學家從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開始指出，民眾對主人或市場規矩的抵制，就算是發生在工會這類組織之外，並且乍看之下奇怪之至、不合常理或是以自欺欺人作為幌子，也同樣重要或值得關注。

社會史家已經表明，即使在極度貧困和無能為力的情況下，歷史上的男男女女也能透過尋思策略來挑戰、規避，或在精神上戰勝壓迫力量，來劃出自己自由的空間——美

<sup>38</sup> 譯注：斯溫(Swing)一詞既為人名亦為動詞，其作動詞時有揮動之意，與農民以人力打穀時的動作相同。

國奴隸制的歷史即為驗證這個命題成果最豐富和最有爭議的領域之一。

關於北美奴隸文化和抵抗的爭論，在許久以前就被史丹利·艾爾金斯（Stanley Elkins）的《奴隸制：美國制度和知識生活中的一個問題》（*Slavery: A Proble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一九五九年）所引發。艾爾金斯同情奴隸的困境，並深受二戰帶來的恐怖所影響，他主張北美奴隸制是一個「絕對性的制度」，就像集中營的世界一樣，剝奪了其中的「囚犯」原有的非洲文化，並且暴力地剝奪了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使奴隸們心理扭曲且失去所有文化資源，因而無力抵抗所遭遇的殘酷境況。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尤金·吉諾維斯（Eugene Genovese）、勞倫斯·萊文（Lawrence Levine）、艾拉·柏林（Ira Berlin）、菲利普·摩根（Philip Morgan）和其他歷史學家的傑出學術著作徹底駁斥了艾爾金斯的論點。例如，萊文和斯特林·史塔基（Levine and Sterling Stucky）清楚說明了非洲裔美國人民文化中的豐富活力。<sup>42</sup>

北美的奴隸幾乎不可能公然挑戰這個殘酷地對待他們的制度。這跟加勒比地區的奴隸形成鮮明對比，因為他們至十九世紀為止已經進行了多次成功的反抗，美國奴隸通常在較小的農場和種植園工作，他們的主人彼此認識並密切監督著每一個奴隸，而且白人的人數遠遠超過他們。吉諾維斯在他的經典研究《約旦河波浪滾滾：奴隸制創造的世界》（*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一九七四年）當中，描述了他認為存在於舊南方奴隸主與奴隸之間文化性對抗中的諷刺。這個諷刺正是來自於美國奴隸制度的小規模以及個人

化本質。奴隸主每天羞辱和剝削他們的奴隸；但是，他們也把自己看作是眷顧「其子民」之福利且仁慈的家父長，正是這種眷顧鼓勵了某些組織與價值（如家庭與教會）的發展，正是這些發展讓奴隸得以生存下去並至少得以在心理和精神層面從事抵抗。奴隸主表面上基於道德因素鼓勵奴隸繁衍和組成家庭，而奴隸在組成家庭後反過來仰賴著其家庭所提供的物質與心理資源，藉此得以面對奴隸體制的嚴酷，儘管習慣的命名方式拉開了他們與奴隸主所屬文化的距離，但是這卻能讓家庭成員在被迫分離後有朝一日得以相聚。同樣，奴隸主不鼓勵非洲宗教而贊成基督教，他們認為這將會促進順從以及溫和；但奴隸轉化基督教傳統和聖經來幫助自己的目的，在基督教中找到加強社群感的手段以及歌頌救贖和解放的理想。<sup>43</sup>正如一位前奴隸所言，「那個白人老傳教士只會告訴我們奴隸要對主人順從。我們不會理會他說的那套東西，因為我們想用自己的方式唱歌、祈禱、侍奉上帝。」<sup>44</sup>簡而言之，吉諾維斯認為，奴隸們充分利用了奴隸主自我合理化的家長式主義來創造出「在受監視下」他們所特有的抵抗形式。

吉諾維斯的這本書問世以後，受到同儕史家對其批評，他們反對吉諾維斯誇大了奴隸主的慈愛程度，而且低估了奴隸自發的主動性以及創造性的程度，他們實際上是完全不服從的。<sup>45</sup>

儘管如此，本書建立了一個里程碑，因為它號召歷史學家思考即使在最嚴格控制的環境中，人們還是有辦法採取具隱蔽性的日常抵抗方式。為了識別和解釋這些策略，歷



史學家經常借鑑其他學科的見解。在一九九〇年代，不少史學家人受到政治學家兼人類學家詹姆士·史考特 (James C. Scott) 著作的影響，他創造了「隱藏的筆錄」(hidden transcript) 這個詞來描述那些沒有權力的人在「舞台下」的言論和行為。雖被迫要「公開寫下自己的服從」，不過下屬之間會在主人背後使用不同的符號：他們不僅表達出對「上層」的真實感受，而且他們可能會達成默契，像是不太賣力工作，或在特定價錢以下讓自己不被出售。奴隸和其他沒有權力的人也會發展出史考特所說的「內部政治」(infrapolitics)，也就像是浪費時間、破壞工具、從工作場所消失，或假裝不懂規矩等行為，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何某些群體被刻板印象定型為懶惰或無能；被壓迫者也可以培養情感策略，比如訓練自己不要對侮辱作出反應，就像非洲裔美國男孩在互相「辱罵」(dozens) 時所做的那樣：學習保持「冷靜」是某些群體保護自我的重要手段。<sup>46</sup> 諸如「底層政治」等概念已經大大地擴展了我們對於日常生活中稀鬆平常活動的認知，可以將其重新理解為反抗壓迫力量的架構。

因此，許多社會史關注的問題是，力量微弱或是沒有任何力量的群體所採取的諸多形式反抗，從組織嚴密的罷工抗議，到難以察覺的微妙破壞行為，還有僅僅只想尋求情感與精神上的依靠來避免絕望。權力之間愈是不平衡，歷史學家就覺得越有必要去重新捕捉無力者反抗壓迫者的方式。例如，華特·強生 (Walter Johnson) 在討論美國國內奴隸貿易的經典作品中，記錄了一些淪為商品的男男女女，如何能影響拍賣讓自己避免

落入不受歡迎奴隸主的手中：他們改變自己的聲音和體態、煮出糟糕的食物、撒謊或是對疾病直言不諱，買賣雙方始終都走在一條危險的細繩上，對任何一方都可能遭逢可怕的後果。正如前奴隸約翰·帕克 (John Parker) 的回憶，「我決定要選擇自己的主人，所以當有不喜歡的人來檢視我的時候，我只用一句『是』來回答所有的問題，而且扮演成個令人討厭的人。」<sup>47</sup>

展示出某些群體（前工業或工業時代的工人、殖民地人民、文盲農民、奴隸等）如何公開或隱微地、實際上或象徵性地進行抵抗行為，這一切有何重要性？為什麼要研究這樣的歷史？下層者的抵抗紀錄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能夠作為那些可能去壓迫他人者所要避免的教訓，還是作為今日政治辯論中的論據，又或是能作為一個群體在今日自我認同中的一部分？我們是否假設讀寫歷史的「我們」是受壓迫者的後裔或盟友？這些歷史是否累積成為了一個普遍化的主張——不平等群體之間的拉扯角力是我們人類共同過去中最重要特徵？或者，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任何「族群」，無論是韓國還是西班牙，酷兒 (Queer) 或切羅基 (Cherokee)，是否都需要一個涵括了壓迫、抵抗和勝利的故事？

許多研究被壓迫團體的史學家在過去幾十年中指出，他們的目標是要授予或是恢復研究對象的「能動性」(agency)——以表明奴隸、工人、農民、囚犯或邊緣化少數民族的成員不是僅僅被動地受到傷害，而是採取有明確目的之行動對抗他們所處的情況。前文曾提及華特·強生討論奴隸貿易的書，他也曾寫過一系列精闢的論文追索為何這個

主題（特別是在美國）成為社會史家的一個核心關注對象。強生問道，我們為何會自以為能夠「重新賦予」這些早已作古的人們能動性等事物？（他指出，「能動性」包括了犯罪、背叛和與壓迫者合作，並不總是如思想正直的歷史學家所希望的那般。）他提醒道，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時刻警惕，意義上與「自主行動」大致相同的「能動性」，通常被指的是隱含於自由個人主義當中的理想。此理想假定了人類生活的核心目的（所以自然而然成為歷史探究的焦點）就是採取行動並改善自身所處的環境，這樣的假定除了存在於現代歐美世界對自我改善的理想，在其他地方很少有類似的想法存在。<sup>48</sup>這並不是說能動性的概念應該被拋棄（強生也沒有這個意思）；不過如果我們要賦予它如此大的重要性，我們應該要解釋能動性究竟為何以及為何什麼重要。

## 權力和私人空間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婦女是其「能動性」得到顯著恢復的一群。正如前文所言，婦女的歷史在新社會史中較晚受到關注。湯普森的工人、瑟恩思忒隆的波士頓人以及在早期經典著作中記載的各種農民和工匠幾乎都是男人。婦女的存在必須要被肯定：若是要盡責地研究農戶、手工作坊、糧食騷亂或工廠，就必須要注意女性的存在和活動。但是女

人似乎從來沒有對這些故事有任何改變；她們仍然處於陰影中，聚光燈瞄準的是別處。

與「社會史」相似，「婦女史」已經出現了很長一段時間，發展出許多經典作品，像是愛麗絲·克拉克（Alice Clark）的《十七世紀的女性工作生涯》（*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九一九年）和艾薇·平奇貝克（Ivy Pinchbeck）的《女性工人與工業革命》（*Women Worker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九三〇年）。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女性的歷史被視為一個狹小的專業領域，適合作為學術界中為數不多的女性研究者的研究焦點，或者給偶爾出現的古怪男性研究者，如法國學者萊昂·阿本蘇（Léon Abensour），其作品為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女性主義通史。<sup>②</sup>長久以來，婦女佔了人類一半以上人口的事實似乎從來不重要，對老派史學家來說當然如此，除非是伊麗莎白·都鐸（Elizabeth Tudor）或是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碰巧成為討論焦點時；對

① 譯注：切羅基人是一支生活於北美洲的民族，分布地區相當於現今的美國東南部；大多數在後來被迫向西遷徙。此民族是美洲原住民中的文明化五部族之一，其語言切羅基語屬易洛魁語分支。根據二〇〇〇年的普查，切羅基人是經聯邦政府認可的原住民族中人數最多的一支。

② 譯注：該書原法文書名為 *Histoire générale du féminism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於二次戰後的新社會史家而言，他們也有很長一段時間如此認為。就算是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埋首於重尋工人歷史的激進年輕史學家們當中，過去的女性生存在歷史之外這種成見仍然存在：婦女充其量頂多是有益的輔助者，她們居住於遠離政治的私人領域，她們繁衍後代而非從事生產工作，除了罕見以及歷時不長的例外情況像是選舉權運動之外，她們從未推動歷史變革。婦女的生活因此可以被打發到富有當地色彩類型的社會史當中：婚姻、家庭、養育孩子、食物以及烹飪、僕人、女演員、妓女，這些主題可能讓好奇的業餘史學家感興趣，但是討論權力、衝突和變化的專業史學家對此則意興闌珊。

家庭是沒有權力鬥爭的競技場這種概念，若被曾經為人子女、父母或配偶的人聽到，他們頂多會認為這是種黑色幽默。實際上，這種成見激起了早期女性主義歷史學家的憤怒，因此她們的研究圍繞著對「父權制」起源的揭露。舒拉米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和瑪麗·歐布萊恩（Mary O'Brien）等理論家主張，在家庭結構中婦女遭遇的工作剝削和性剝削，與階級統治的關係相似（且更早開始），女性主義歷史學家受她們啟發，開始分析男性壓迫女性的起源與發展。<sup>49</sup>像是席拉·羅柏森姆（Sheila Rowbotham）的《從歷史中隱藏起來：三百個女人的壓迫與反抗》（*Hidden from History: Three Hundred Year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一九七三年）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的《父權制的創造》（*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一九八六年）這些書籍無情冷酷地強調婦女如何被壓迫與剝削，在今日看來或許有些辛辣嚴厲，但是對於喚醒

歷史學家開始關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之間的關係，還有承認剝削和暴力行為存在於私人領域中，這些開創性的作品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sup>50</sup>

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年輕女性在決定學位論文題目時仍會被警告不要選擇婦女史。在最好的情況下，它會被視為學術圈中一個孤立的領域，與過去的重要問題毫無關係；而在最壞的情況下，選擇這個領域可能會讓你被貼上「憤怒的女權主義者」的標籤。通常的建議是，「你可以先保留，等到你獲得終身教職後再把它作為第二本書的主題」。一些最早期和最強悍的婦女史學家沒有興趣把他們的領域「納入主流」：就像上世紀七、八〇年代的激進女權主義哲學家，如安德里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所說的，所有的異性交合都跟強姦沒有兩樣，一些「她的歷史」（Herstory）的支持者認為，在過去男女之間唯一可能的關係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過，即使是對在意識型態上立場最堅定的女權主義者而言，認為男／女關係完全類似於老闆／工人或主人／奴隸之間關係的想法一直都是有意義的，原因很清楚：大多數工人、農民或奴隸與老闆、領主或主人幾乎沒有直接的聯繫，而幾乎所有的男人都是由女人撫養、與她們同床、為人父，或者在每日的生活中以親密的方式面對彼此。與勞工史學家將雇主排除於其對勞工的研究外相比，對於婦女史學家而言要把男性排除在外則更為困難，相對地，主流歷史學家也不可能沒有辦法忽視女性。

婦女史中的一些重要早期研究，被歷史主流派認為是帶有「補償性質」的，或者僅僅是補充性的，等於是說「沒錯，女性也在那裡」。例如，我們了解到女性在法國大

革命中活躍著：有的寫了小冊子，有的參加過遊行示威，少數女性像著名的羅蘭夫人 (Marie-Jeanne Roland) 在高級政界有影響，還有更多的女性參加平民份子「無套褲漢」(sansculottes) 的激進活動，而一些中產階級婦女設立了政治俱樂部。<sup>51</sup> 懷疑論者不以為然：這些訊息也許可以發展為一場有趣的演講或者教科書的一個額外章節，但是它有改變了任何一絲我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基本理解嗎？

在某些情況下，婦女史對歷史上「重要事件」的定義提出了挑戰。例如，瓊·凱利 (Joan Kelly) 在一九七七年著名的文章提出了「婦女是否有文藝復興」的問題。眾所皆知，文藝復興是西方「現代人」的濫觴，近代早期的義大利出現了新形態的國家和先進的商業經濟，並且有著被稱為「人文主義」(humanism) 的豐富文化表現形式，歌頌個人，並吟唱對人類的禮讚。如果說對於菁英階層來說，「文藝復興」帶來了新的自由和創造的形式，凱利主張，對當時的女性而言，她們的遭遇則恰恰相反。在文藝復興之前，以農業為基礎的封建社會，菁英婦女往往擁有相當大的權力；繼承法對她們有利，而且她們的丈夫因常年在出征戰而不在家。在某些情況下贊同通姦的宮廷愛情文獻，間接地表現出某些婦女可能享有情感和性愛自由。商業社會的興起，以及個人與公共生活之間更加嚴格的分割，帶來了兩性之間新的關係，其大大地削弱了上層階級女性的自由和情感表露。凱利武斷地總結道，「婦女並沒有再生，至少不是在文藝復興時期。」<sup>52</sup> 抱持相同關懷的研究亦指出，法國大革命對希臘羅馬式男子氣概的崇拜，並把軍隊中的「手足

之情」奉為人文理想，這對婦女而言實際上是種退步。以上這些詮釋方式意味著，女性所得到的與其說是法國大革命，不如說是法國大反動。<sup>53</sup>

因此，婦女史研究中開創性的女性主義作品，大部分都在強調過去受壓迫的女性，或者男性與女性歷史經驗的差異。「不好意思，我們也在場，事情對我們來說不是這樣的。」這是起始時期必要的聲明。儘管婦女史學家持續強調獨立的女性經驗，但是她們幾乎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婦女史的真正力量是在於展示出女性的故事與男性的故事是無法分開的，而且如果性別關係沒有認真地被納入思考中，那麼歷史中所有的關鍵之處都會被忽視、會變得難以理解，或者是變得貧乏。

婦女長久以來在歷史中被忽視的一個原因是認為她們不從事勞動的這種臆測，或者是假定了她們所做的工作不具有創造性、生產性或重大意義，因為這些付出沒有被轉化成「真正的」金錢報酬。事實上，幾乎在所有我們已知的社會中，無論有酬或無酬，大多數婦女都終身勞動，而且她們的勞動一直處於大多數經濟體的核心部分。婦女史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清楚呈現出這個純粹的事實，並評估它在任何特定社會中的重要性。重點不在於說照顧嬰兒和種植園藝蔬菜是值得（在歷史上）受肯定的活動，但對於富人以外的人們而言，如何維持家庭生計一直都是牽涉到整個家庭，包括婦女、兒童以及男性的統籌安排。在殖民時期的肯亞，女兒將在首都奈洛比 (Nairobi) 賣淫的收入寄回家，解救被乾旱與疾病侵襲的家庭農場，以及支付兄弟的聘禮費用。<sup>54</sup> 直到十九世紀，歐洲

婦女所做的從來不僅僅是家務勞動，除了與男性一同種植、收割和飼養牲畜外，她們還得在家中紡織、編織、縫紉掙錢，哺育別人的孩子，並在十幾歲時就離家去擔任僕人或工廠女工來賺錢。<sup>55</sup>

同時代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掩蓋了女性的工作，因為家庭領導人的身份和地位，傳統上決定了家庭如何被定義。像許多歷史學家一樣，瑟恩思忒隆藉由追蹤男性的職業來研究社會流動，而沒有提到另一性的「其他波士頓人」。不過，正如一些優秀研究所表明的，男性往往是透過家庭等級和剝削來實現和維持其地位。就像湯普森筆下處境艱難的英格蘭工匠一樣，在特絲·劉（Tessie Liu）對十九世紀法國西部紡織工人的研究中，描繪出男性織布工在其所處的世界必須奮力掙扎，以求在面對工藝存亡威脅之際，能維持傳統生產者的經濟獨立和尊嚴。她闡明，他們之所以能夠成功達成，是因為其妻女長時間從事低工資的工作，像是地位低下的「流汗」行業，大量生產服裝和鞋子所換來的。這種剝削性的家庭等級階層才讓一名工人得以維持其尊嚴。<sup>56</sup>同樣地，在內戰前的南卡羅萊納州低地地區<sup>③</sup>（Lowcountry），農民（小地主）也為自己的自力更生和他們與像貴族一般高人一等的種植園主鄰居之間在理論上的平等感到驕傲。

但是，這些「小世界的主人」之所以能夠宣稱具有獨立地位，都是依靠他們的妻子（以及家中的幾位奴隸）生產出能銷售的貨物和耕種田地。南方的自由農民之所以熱心地支持分裂主義，想要支持的不僅僅是奴隸制度，還有在他們看來遵循相同原則由上帝規

範的家庭與性別階層制度。<sup>57</sup>

總之，就算女性作為行動者的存在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掩蓋，婦女史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展現出女性和男性之間的關係如何塑造了過去的每一個社會。一些婦女史學者更喜歡「性別史」（gender history）這個詞，因其捕捉住了男女性歷史交織在一起的方式，以及這種關係的意識形態層次。正如歷史學家瓊·史考特（Joan Scott）在依舊是此主題上最著名的文章中所解釋的，源於語言學的術語「性別」（gender）傳達的觀點是，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是被社會建構的類別，這些氣質會隨時間和地點而改變，而不是出自絕對性的生理性別差異。她指出，性別也是一表明權力關係的主要方式。<sup>58</sup>性別意識形態是大多數人類活動的大架構，包括同性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在吉姆·克勞<sup>④</sup>（Jim Crow）時代的美國南方，私刑（未受官方批准對黑人的謀殺）被那些人以這是種「騎士精神」的形式來辯護——面對黑人解放的白人恐懼和怨恨，被說成是要先發制人保護其女性同胞

③ 譯注：低地地區，用來稱呼南卡羅萊納州南方濱海地區，過去因位處亞熱帶氣候以奴隸種植稻米與靛青著名。稱為低地因為其位於瀑布線（fall line）以下。北美洲東部的阿帕拉契山與其東側的海岸平原，由於岩層軟硬差異，形成高低落差大的一連串急流與瀑布。阿帕拉契山脈以東至大西洋海岸之間為低平的海岸平原，山脈與平原交界處即瀑布線。

性別分析大大地擴展了婦女史的影響範圍，因為它清楚地揭露出，即使是男性最傳統的追求和獨佔領域（尤其與公共權力相關的），早已被女性的所作所為，亦或是對於想像出來的女性氣質產生具有象徵意義的對立所深深影響。像是二十世紀世界大戰的「總體戰」(total war)「如儀式般地區分清楚了社會上所有人的性別，無論他們是否上戰場」。即使在家鄉的女性自願或非自願進入因男性缺席而開放的角色和活動，她們仍然被理想化為最傳統的樣子——護士、母親、耐心等待的妻子，而在前線的男性活動則承擔起「經濟與文化上的重要任務」。60再舉一個例子，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政治機構之所以標榜清一色為男性，乃是源於公民意識和契約政府這兩個現代觀念當中的性別區分。公民及其代表的必要特質（獨立性、理性、對廣泛政治體的奉獻），被想像為必然是男性的行為，恰恰相反於女性典型的依賴狀態以及對狹隘的家庭福祉之重視。

因此，性別史之所以能夠涵括歷史寫作最傳統的領域——戰爭和政治——正因為這些領域屬於「男性」，而「顯然不屬於女性」這樣的定義，強迫將男性和女性行動者套上截然二分的角色。這種論點主張，男性透過強調男子氣概才能主張自己擁有權力，這本身就必然是不斷排斥與壓迫女性特質的過程。與此同時，關於女性的語言一直是描述和理解男性權力關係的一種方式。性別史家已經指出，例如在帝制中國時代，上層階級婦女的個人行為為替政治忠誠提供了典範：妻子在丈夫死後如儀式般地自殺，或是將餘生奉獻給家族，

體現了一個君子和其君主之間的理想關係。相反地，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初斥責傳統的女性形象以及像是纏足等習俗，是「無知、經濟寄生、中國受列強羞辱」的象徵。<sup>61</sup>

性別分析不僅擴大了婦女史的範圍，而且有助於開拓其他領域，特別是同性戀的歷史。後者引發歷史學家提出了特別有趣的問題，因為同性戀者不僅僅在歷史記錄中被忽視，如同婦女和窮人；大多數同性戀在過去甚或直到現在，在大多數文化中對周圍的人來說是隱形的，在很多時候甚至在他們彼此之間都是如此。男女同性戀歷史沿襲了與婦女史相同的歷程，早期的大多數研究多基於文獻，而到後來則是發展出對所有歷史研究領域都具有影響力的詮釋性見解。這領域比起婦女史所受的鄙視還要更多，最初面對的是輕蔑和質疑，被斥為只是一個小圈子狹隘而微不足道的關注。不過對於選擇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還有比上述更為深刻的影響，由於當時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仍然普遍存在於學術界，這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就等於宣布出櫃。早期的同性戀研究大多數旨在尋回直至彼時為止，長久以來被歷史學家忽視的世界：中世紀的男性神職人員充滿激情的

<sup>61</sup> 譯注：在此指的是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泛指一八七六至一九六五年間美國南部各州以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主要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但同時也包含其他族群）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

友誼、文藝復興宮廷中的雞姦、十八世紀的男妓、同性寄宿學校裡的親密關係等等。然而，最優秀和最野心的同性戀歷史研究，透過歷史迫使我們重新評估一直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有關性別認同和親密關係的信念。

在一九八〇和九〇年代，這個領域的經典作品扭轉了關於過去和現在態度異同的過度簡化觀點，該觀點認為除了在古希臘以外，同性戀在各處皆受到譴責和迫害，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後半葉較為開明的聲音才逐漸浮現。中世紀研究學者約翰·博斯韋爾 (John Boswell) 的權威作品《基督教、社會寬容和同性戀》(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一九八〇年) 力求表明出無論是聖經或早期基督教會，其反對的是各種形式的縱慾而非那麼在意同性戀本身。博斯韋爾認為，同性戀行為在中世紀早期既不被視為犯法，也沒有受到迫害，並且像是在十二世紀的貴族階層中同性戀關係便是公開的。只有從十三世紀開始同性戀才被個別挑出來受暴力譴責，面臨酷刑或死刑的懲罰。<sup>62</sup> 在日本，正如格雷戈里·普弗格非爾德 (Gregory Pflugfelder) 所指出的，男人和青少年男孩之間的性關係被歸類為「青少年行為」，並被標榜為是種需要具體知識和技能的追求，在不禁止非生殖性行為的文化中，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一直要到明治時期 (一八六八—一九二一年)，因為開始追求與西方的社會規範一致，男男性行為方開始被取締，而且一直到一九〇〇年以後日本醫生才開始將同性戀視為疾病。<sup>63</sup>

自一九八〇年代以降探討男女同性戀歷史的重要著作，挑戰了我們所定義有關於性別

認同和社會認同的一切，就算只是發生在不久以前。直到一九九四年喬治·昌西 (George Chauncey) 的《同志紐約》(Gay New York) 出版之前，人們普遍以為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前，美國都市裡同性戀男子的生活籠罩在掩飾和羞愧之中，而一九六九年的「石牆事件」<sup>64</sup> (Stonewall riots) 則被視為分水嶺，觸發了個人的出櫃，以及集體表達反抗以及驕傲，最終凝聚成了公開且積極行動的同性戀社群。昌西在這本現在被視為是社會和文化史上的經典著作中闡明，一八九〇年代到一九三〇年代的紐約同性戀世界無比複雜和令人驚訝，其與現實世界直接關聯的程度，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高。<sup>64</sup> 昌西的研究挖掘出複雜的身份認同景色——「仙女」(fairies)、「三色堇」(pansies)、「娘娘腔」(sissys)、「南西」(nances)、「同性戀」(gays)、「拍檔」(trade)、「基佬」(faggots)、「酷兒」(queers)，而非簡單的同性、異性戀的二分法。<sup>65</sup> 例如在一九一〇和二〇年代，愛爾蘭和義大利的工人以及岸上休

<sup>62</sup> 譯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午夜，警方臨檢格林威治村的石牆酒吧 (Stonewall)，逮捕了數位同志，並驅離其他人，然而現場的同志群起拒捕，持續對峙幾天，並引起多次示威抗議。石牆暴動常被認定是美國史上同性戀者首次反抗政府主導之迫害性別弱勢群體的實例，亦被認為是美國及全球同性戀權利運動發跡的關鍵事件。

假的水手，毫不費力就能勾搭上嬌柔的「仙女」，就像尋找妓女一樣容易，事實上後者還曾抱怨這種不公平的競爭。與「仙女」（被認為是所謂的第三性別）發生性行為的男人認為自己相當正常，只要他們在性行為中扮演主動的角色。與此同時，抱「獨身主義」的中產階級男子並不認為自己是可恥地躲在櫃裡，而是自認過著扮演兩種角色的雙面生活，有時候甚至相當自在與享受。直到戰後對於個人「本真性」(authenticity)理想的出現，這樣的雙重生活方才成為混亂和自我厭惡的源泉。同性戀生活在戰前相對開放，在逐漸累積的發展下出現了男扮女裝的同性戀大型舞會，將異性戀的紐約人拉入了當時所謂的「三色堇狂熱」<sup>①</sup> (pansy craze) 中。在那時候被創造的「出櫃」(coming out) 一詞，顯然是將上層階級女性的成人禮舞會，以明白的同性戀色彩加以詮釋。正如昌西敏銳地評論道，這個詞的起源深刻揭示出：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同性戀並不想像自己是從櫃子裡「走出來」，反而是想像自己「進入」了「同性戀社會」。<sup>65</sup>

昌西的重點不是要將兩次大戰之間紐約同志生活描繪地無比美好，其實在這裡的同性戀者往往被嘲笑和鄙視，而且經常被騷擾、毆打和逮捕。像博斯韋爾一樣，昌西試圖歷史化被我們稱為「同志」的性別認同與性習俗，他說明了這些事情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和社會階層存在著很大程度的異同，因此像是從糟糕的舊時代到被解放的現代，這類關於進步的簡化敘述，根本無法徹底說清楚同志的歷史。正如昌西的著作所表明的，性傾向 (sexuality) 的種種歷史要求我們去質疑那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分類和標籤。例

如，其他歷史學家記錄下了親密的同性關係，不過那在過去卻完全不被認為有一絲一毫不妥：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女性朋友們寫給彼此充滿熱情的信件，在親吻中共浴、在床上擁抱度過夜晚。一八七〇年左右，莫莉·富特 (Molly Hallock Foote) 寫信給她親愛的朋友海倫娜 (Helena)：「親愛的，請想像我親了你十幾次。我們分隔兩地或許對你是好

① 譯注：「仙女」指的是行為舉止有點像女性的男子。「三色堇」指的是打扮優雅，帶著脂粉氣的男同性戀。「娘娘腔」一詞源於sister，指的是不符合社會一般期待的男性，像是喜歡打扮、追求時尚等等，並不必然為男同性戀者。「南西」來自一般女性的名字，指的是氣質陰柔的男同性戀。「拍檔」一詞經常指的是非同性戀的男性藉由成為同性戀男子的伴侶以獲取金錢或是其他不同形式的回報。舉例而言，像是一九三〇年代富有的英國男子會在倫敦貧民窟物色經濟條件貧困的「拍檔」。「基佬」是對男同性戀者十分蔑視的稱呼。本詞原本指的是捆起來燒火用的木柴。之所以有男同性戀的意思，一說是從十六世紀開始對於貧苦老年女性的蔑稱，因為她們貧苦以撿拾木柴維生，故得此名。後來也用此詞來蔑稱帶有女性氣質的男性或男同性戀者。另一說本詞是源自意第緒語的小鳥 (faygele)。「酷兒」一詞原先是奇特、古怪的意思，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被用來蔑稱男同性戀，但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這個詞在同性戀族群中被廣泛的使用，作為擺脫受污名化的名詞。

② 譯注：「三色堇狂熱」指的是於一九三〇~三三年在紐約與洛杉磯等城市，變裝皇后在當時的地下圈子中受歡迎的程度遽增。



的。你或許會注意到我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感謝，而非用強烈的方式。」<sup>66</sup>同時代的人們認為莫莉和海倫娜這種女性朋友之間的親密關係非常得體。那麼這種關係是否屬於「同性戀歷史」的種類？正如該篇文章的作者指出的，重點不在於這些年輕女性是否發生性行為（這也引出了究竟我們認為算得上「性」的標準是什麼的問題），而是為什麼女性之間的友誼於這個地方與時代在情感與感官上會如此強烈，還有為何這些年輕女性身處的社會不僅容忍而且還鼓勵這種關係。<sup>67</sup>男女同性戀的歷史呈現給我們的是：除了最有想像力和毅力的歷史學家以外，對其他所有人而言，這些極其隱秘和流動的身份認同是難以捉摸的；這刺激了我們去思考自己過去研究的群體之定義。

這一章絕不是要列出所有被史學家個別研究的人群——其他人，雖然無法被全數納入，仍會出現在後面的章節中。

僅僅列舉可以為歷史對人群的分類標準增添的新分類，如職業群體、種族、宗教多數和少數民族等等，並沒有意義。從本章前面所述浮現的意義類同於在每一次新一批行動者主張要尋回過去時，歷史研究本身以及史學家提出的問題就隨之變化。例如，計量方法的興起是出於對普羅大眾的民主式歷史的深刻投入，無論其不足之處為何，都與傳統政治史的敘事模式有很大的差異。各種形式的社會史教導我們去破譯行為模式，使我們能夠接觸到弱勢者和文盲的信仰和渴望。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學家不得不提出新的方

式來解釋例如只是為了要丟棄糧食就發起糧食暴動，那些對於「理性的」頭腦而言沒有意義的行為。

美國奴隸制的歷史帶來了全新的議題，正如學者們開始試圖了解一代代的奴隸和婦女，除了他們是如何堅持下去以外，還有如何在被剝奪了自由並處於不斷的危險之中，仍能肯定自我並且發展出豐富的文化。隨之而生的問題——文化、抵抗和能动性，所型塑的領域已遠超過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婦女的歷史讓歷史學家認識到，他們所認為的「正規」歷史，實際上是男性的歷史，男性和女性的生命不可能被分開，以及社會理想和價值觀的任何一種傳達形式，都是關於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暗示或明確的表述。婦女史訓練了我們所有人都要去尋找，在過去未被說出、存在於間隙以及被壓抑但始終頑強存在的層面。同性戀的歷史和廣義上性的歷史，迫使研究者和讀者學會面對，我們所處的現代分類體系的不足之處，並沒有能力真正理解過去的親密行為和身份。總之，每當我們重新構思歷史畫面某一部份以便將另一群人也納入其中時，圖像整體也會隨之變化。正如下一章將要呈現的，歷史的「所在」也是如此——我們如何理解過去，不僅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人，而且取決於我們如何劃分空間。

<sup>1</sup> Robert K. Massie, *Nicholas and Alexandra: 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Last of the Romanovs and the Fall of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Atheneum, 1967)。在出版後幾年都是暢銷書，並於一九七一年被改編成電影。

<sup>2</sup> Darrin McMahon, *Divine Fury: A History of Geniu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sup>3</sup>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Critical Essays and Reappraisals*, 2nd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9, 43。中譯本：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著，余偉譯《新書歷史學》（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sup>4</sup>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3rd ed. (London: Longman, 1849-1861)。第一卷第三冊。

<sup>5</sup> G. M. 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Six Centuries from Chaucer to Queen Victori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46), 64-65, 314-15, 430。

<sup>6</sup> 自一九四〇年代以來，法國的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製作了四百多冊的相當受歡迎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叢書，這些討論世界各地過去的口譯生活。

<sup>7</sup> 屈威廉的傳記作者大衛·康納汀（David Cannadine）認為，這句著名的話已經被抽離了原有語境，屈威廉帶著猶豫與不情願以這段話來描述這本書，而且此書原先確實是計畫用來補充其政治史著作的。

Cannadine, G. M. *Trevelyan: A Life in Histo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2), 224。

<sup>8</sup> 少數美國歷史學家早在戰前幾十年就編寫了關於非洲裔美國人、美國原住民和工人階級的歷史：請參閱 Ellen Fitzpatrick, *History's Memory: Writing America's Past, 1880-198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9</sup> 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A Study of Agincourt, Waterloo, and the Somme* (New York: Vintage, 1977), 53。

<sup>10</sup> *Ibid.*, 134-43, 卅四頁 141。

<sup>11</sup> *Ibid.*, 167-84。

<sup>12</sup>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336, 350-51。

<sup>13</sup> "Cliometrics," in Joel Mokyr,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46-47。

<sup>14</sup> 描述該領域如何誕生的早期研究著作請參閱 D. N. McCloskey,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June 1976): 434-61。較為晚近的說法，請參閱 J. W. Drukker, *The Revolution That Bit Its Own Tail: How Economic History Changed Our Ideas on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 Alcant, 2006)。*屈威廉與雅利安經濟學* Francesco Boldizzoni, *The Poverty of Clio: Resurrecting Economic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中譯本：羅伯特·威廉·福格爾·斯坦利·恩格爾曼著·顏色驊·《苦難的時代》·美國奴隸制經濟學》(北京市：機械工業出版社·2016)。

16. 對此領域目前寬廣的涵蓋範圍上優秀的敘述·請參見喬爾·莫基爾 (Joel Mokyr) 在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中所寫的述評·1:xxi-xxvii。

17. Ran Abramitzky, "Economics and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i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4 (December 2015): 1248.

18. J. Morgan Kousser, "Quantitative Social-Scientific History," in Kammen, *The Past before Us*, 437-39, 449-50.

19. Stephan Thernstrom, *The Other Bostonians: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0. *Ibid.*, 95-96.

21. David Eltis and David Richardson, eds. *Atlas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 即使是最「客觀的」量化數據也能夠作為辯論的依據·參閱史蒂芬妮·斯莫爾伍德 (Stephanie Smallwood) 對於艾爾提斯 (Eltis) 以及理查森 (Richardson) *Atlas* 一書多個章節對於奴隸制·參閱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58 (January 2011): 253-61.

22. Carl Bridenbaugh, "The Great Mu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8, no. 2 (January 1963): 326.]

23. Stephanie Smallwood, *Saltwater Slavery: A Middle Passage from Africa to American Diaspo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第二章。

24. Eric Hobsbawm, "Labor History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1974): 374.

25. *Ibid.*, 372.

26. Eric Hobsbawm, "E. P. Thompson," *Radical History Review* 58 (1994): 157.

27.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第七章·-- Bryan D. Palmer, *E. P. Thompson: Objections and Oppositions* (London: Verso, 1994)·第一章。

28. 關於馬克思主義史學·請參閱上文第五章。

29.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3), 445. 中譯本·.. 卞· 叻· 吳普霖著· 賈士衡譯·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30. *Ibid.*, 12.

31. *Ibid.*, 382-93, 523-30.

32. Thomas N. Baker,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Age of Michelet, Macaulay, and Bancroft,"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2002), 185-204.

33. 參閱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and André Burguière, *The Annales Schoo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rans. Jane Marie Tod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美國學派的著作中包括· Pierre Goubert, *Beauvais et le Beauvaisis de 1600 à 1730* (Paris: SEVPEN, 1960), and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Les paysans de*

*Languedoc* (Paris: Mouton, 1966). 另見下文第五章。中譯本：彼得·柏克著，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台北：麥田出版，1997）：二〇一六年新譯本：彼得·柏克著，劉永華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201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34. 有關對該爭議的總結，請參閱 *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第三章，頁四，p. 31；這個辯論的參考書目可以在該章節（頁41-43）的尾註中找到。中譯本：勞倫斯·斯通著，舒麗萍譯，《英國革命之起因（1529—1642）》（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35. 請參閱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ugene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Pantheon, 1974); and James Oakes, *Slavery and Freedom: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South* (New York: Knopf, 1990). 中譯本：威廉·道爾著，蔡百銓譯，《法國大革命的起源》（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5）。

36. 例如，近幾十年來關於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重大著作問世。一些突出的例子是 Peter Gay, *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5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1998);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以及 Jerrold Seigel, *Modernity and Bourgeois Life: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since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7. E. 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50 (February 1971): 76-136. 中譯本：艾德華·湯普森〈道德經濟學〉，收錄於湯普森著，沈漢、王加丰譯，《共同的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8. *Ibid.*, 125.

39. Eric Hobsbawm and George Rudé, *Captain Swing* (New York: Pantheon, 1968); Peter Sahlin, *Forest Rites: The War of the Demoiselle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David J. V. Jones, *Rebecca's Children: A Study of Rural Society, Crime, and Prote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40. Natalie Zemon Davi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第四章；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s, and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17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245. 中譯本：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鍾致譯，許平校，《法國近代早期的社會與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41. Jonathon Glassman, *Feasts and Riot: Revelry, Rebellion, and Popular Consciousness on the Swahili Coast, 1876-1888*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95), 170-74.

42. 相關爭議和結論的實用歸納著作 - 請參閱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619-187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3) - 特別是第五章。

43.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 開篇章節「論家長主義」(On Paternalism, 3-7) 勾勒出本書的分析框架。

- <sup>44</sup> 同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44.
- <sup>45</sup> 請參閱·例如 Peter H. Wood 於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第 5 卷 (Autumn 1975): 289-97, 以及 James P. Anderson, "Aunt Jemima in Dialectics: Genovese on Slave Cultur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61 (January 1976): 99-114.
- <sup>46</sup>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作者特別在其著作中討論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提出類似於德邦 · 不過更強調農民於特定對象上 · 中譯本 · 詹姆斯 · 斯科特著 · 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 · 《弱者的武器》(北京 · 譯林出版社 · 2011) 。
- <sup>47</sup> Walter Johnson, *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6-88 · 同頁 179.
- <sup>48</sup> 最完整的聲明與 Walter Johnson, "On Agenc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7(Fall, 2003): 113-24. 或 Johnson, "OAH State of the Field: Slavery," <http://156.56.25.5/meetings/2004/johnson.html> (accessed February 3, 2016), 以及 Johnson, "A Nettlesome Classic Turns Twenty-Five," *Common-Place* 1, no. 4 (July 2001), <http://www.common-place-archives.org/vol-01/no-04/reviews/johnson.shtml> (accessed February 3, 2016).
- <sup>49</sup>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orrow, 1970); Mary O'Brie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 <sup>50</sup> Sheila Rowbotham, *Hidden from History: Three Hundred Tear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It* (London: Pluto Press, 1973). 羅柏森姆的書在翌年於美國出版 · 其副標題變得沒那麼辛辣 · 「在十七世紀到現代的歷史中重新發現婦女」(*Rediscovering Women in History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或 Judith M. Bennett, "Feminism and History," *Gender and History* 1 (Autumn 1989): 251-72 · 同是繼續使用這種方法的例子。
- <sup>51</sup> Dominique Godineau, *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Katherine Steip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sup>52</sup> Joan Kelly,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9. 這篇文章最初是在一九七七年以 Joan Kelly-Gadol 的名字出版。有關該領域的發展情況 · 請參閱 Laura Lee Downs, *Writing Gender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2004).
- <sup>53</sup> Joan Landes, *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Lynn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中譯本 · 林 · 亨特著 · 鄭明萱 · 陳瑛譯 ·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臺北 · 麥田 · 2001) 。
- <sup>54</sup> Luise White, *The Comforts of Home: Prostitution in Colonial Nairob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sup>55</sup> 請參見 · 例如 · Louise Tilly and Joan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Owen Hutton, *The Prospect before Her: A History of Women in Western Europe, 1500-*

1800 (New York: Knopf, 1996) - 樂 | 一 | 水 | 轉。

§ Tessie P. Liu, *The Weaver's Knot: The Contradictions of Class Struggle and Family Solidarity in Western France, 1770-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歷史學雜誌轉。

§ Stephanie McCurry, *Masters of Small Worlds: Yeoman Households, Gender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Low Coun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特設  
叢報 | 轉。

§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一九八六年的《美國歷史雜誌》。

§ Nancy Maclean, *Behind the Mask of Chivalr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Ku Klux K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rgaret Higonnet, Jane Jenson, Sonya Michel, and Margaret Weitz, eds., *Behind the Lines: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 7.

§ Gail Herschatter and Wang Zheng, "Chinese History: A Usefu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December 2008): 1407-9.

§ John Boswell,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ity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Gregory M. Pflugfelder, *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19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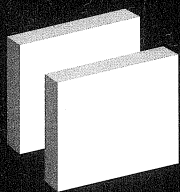
§ George Chauncey,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 1890-194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 *Ibid.*, 7.

§ Carroll Smith-Rosenberg, "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Signs* 1 (Autumn 1975): 6-7.

§ *Ibid.*, 27-29.

CHAPTER 2  
THE HISTORY OF WHERE ?



第二章  
何處的歷史？

## 國別史如何變得不再理所當然？

國家一般被默認是歷史的「所在」之處。儘管有越來越多擺脫國家框架的嘗試，「正規」的歷史仍然深植於這個獨立的政治文化地理單位。各級院校提供了大量的「世界」或「全球」歷史的課程，而主題、比較或跨國歷史的課程也大大增加，但大多數情況下，教職人員仍然繼續被歸類為研究「美國」、「中國」或「德國」的歷史學家。實際面和後勤行政的問題使得擺脫這傳統極為困難：為了成為受敬重的研究墨西哥史或南非史專家，你不僅要掌握該領域的重要研究（成堆的書籍和論文），而且還要去了解什麼資料可以在哪些檔案館和圖書館找到，必須精通一種或多種語言，並在國內外相關地點花費大量時間。以研究美國的歷史學家為例，在生涯中段由於對巴西或日本歷史的某個主題突然感到好奇而轉換跑道，這是極其困難的，基本上可說完全不可能，重新開始的成本實在太高。直到最近，能夠同時研究一個以上國家脈絡的專業史家都還相當罕見。

歷史學家被訓練成自認為是某個國家的專家（國別史家），如果他們有研究生，他們通常會把這種關注傳承下去。此外，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某些國家歷史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的歷史：在具有相當規模的美國大學歷史學系，英國、法國和德國史領域至少都有（往往超過）一位教師，還有一大群的美國史學者，與此同時，要求一位老師教授全拉丁美洲或全非洲的歷史卻也能夠被接受。研究北美或西歐以外地區的學

者，常常附屬於跨學科「區域研究」群，這是在冷戰期間由基金會和政府機構資助建立的。這樣的安排方式顯示出東歐、印尼或埃及等地的歷史本身並不被重視，之所以要被研究乃是作為一個地區專業知識的一部分，並在國家利益有需要時能被運用。<sup>1</sup>

直到晚近，歷史著作中以國家作為焦點完全不會引發任何爭議，因為大多數人過去想像（很多人到現在還是這麼想），各種「歷史」的發展是在具有明確輪廓、在地圖上容易辨認的特定陸地區域內所發生的：非洲大陸、六角形的法國、鑽石形狀的印度、不列顛群島。<sup>2</sup>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體現在——國家的歷史發展命運被想像成理所當然會被地理環境所決定。長久以來人們理當如此地以為，近代早期幾位國王的統治期間統一了法國，就像十九世紀的俾斯麥（Bismarck）統一了德國一樣，彷彿散亂的拼圖被擺回正確的位置。在這種解釋下，二十世紀透過反殖民主義抗爭「解放」的國家像是阿爾及利亞、印尼和安哥拉，這樣的國家單位在十九世紀被殖民以前並不存在。義大利或德國的人民在被聯合成一塊以前，真的認為自己是「離散」的嗎？有人規定，美國必須從這片海洋延伸到另一片海洋，或是義大利就得看起來像一隻高靴子？我們稱之為大不列顛的大島似乎是一個必然存在的國家單位，但是包括蘇格蘭人和威爾斯人在內的大部分國民直到十八世紀後期才開始自認為是「英國人」。<sup>3</sup>

我們現在視為天經地義的國家和民族歷史，都是晚近的創造。當今世界地圖上的大多數國家在數百年前都不存在：它們取得獨立，但是邊界最初是由西方帝國主義者所劃定



的，他們的母國也是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革命之後方才出現。在十九世紀以前，「國家」通常不是西方歷史寫作的背景或對象。過去的編年史可能集中在較小的單位上，比方是希臘、羅馬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城邦，或是更大的單位，像是基督教世界或羅馬帝國。歐洲的歷史著作圍繞著家父長、教皇、統治者和朝代的命運，而不是以一大片土地為單位的故事。<sup>4</sup>所有這一切變化都是在十八世紀後期美國和法國革命時代開始發生的。愛國情緒在十八世紀之前當然就已存在，並且通常表現在對抗其他國家或宗教群體之時。在十六世紀，你明白自己是荷蘭人，因為你厭惡西班牙人，在十八世紀你明白自己是英國人，因為你鄙視法國人。<sup>5</sup>但是，在「革命的年代」民族主義與民主結合了起來，借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說法，成為了相信「國家權力應該代表，居住在廣袤且明確的領土上特定人群或『公民』的集體意志」的一種信仰。<sup>6</sup>在十九世紀，西方各地的歷史學家們發表了經典的民族史學著作，這些著述的寫作皆根據一種假設——他們國家的過往展現在人民身上即將到來的可敬價值觀與理想。米榭勒的《法國大革命史》(*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八五三年)顯示了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替法國人民奠定了圍繞著其核心「農民」團結起來的根基，並且踏上通往更加完美的自由非凡道路。麥考萊的《英國史》展示了英國人民和國家作為克制和溫和的典範，透過漸進式改革明智地取得進展。班克羅夫特的《美國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成書於一八五〇～七〇年代，將民主和宗教等種種主題融於敘述中，歌頌美國人對自由精神奉獻，以及他們對上帝導引之手的虧欠。在這些例子

中，每位作者所屬的國家，命運都獨一無二，而且是其他人的光輝榜樣。<sup>7</sup>

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也與種族假設糾纏在一塊，如英國關於淵遠流長的盎格魯—撒克遜認同之神話，或在歐陸國家保守分子身上常見的「血與土」(德語：Blut und Boden)信仰。血與土是近代德國的種族意識形態之一，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統)和土地(農業生產的基礎)，同時也強調了農業的重要意義以及農村生活的美德和傳統價值。<sup>8</sup>那個時代的種族思想也在其他根深蒂固、出自想像的地理知識上留下了鮮明印記。為什麼今天的人們不經思考地便將來自塞內加爾或波札納(Botswana)的人稱為「非洲人」，而他們永遠不會把義大利人或瑞士人稱為「歐洲人」呢？多重歷史和文化之所以被折疊成為單一、大陸性的認同，部分是由於長期以來西方的偏見和無知。但這也源於十九世紀懷抱進步主義的美國黑人泛非主義者，如亞歷山大·克魯梅爾(Alexander Crummell)和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以及二十世紀以非洲為中心的黑人自覺運動<sup>①</sup>

① 譯注：黑人自覺運動是一九三〇年代由法國黑人知識分子如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出身的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以及法屬圭亞那的里昂·達瑪斯(Léon Damas)發起的運動。他們拒絕法國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主張黑人的非洲遺產是對抗法國政治、知識霸權和統治最好的工具。

(Nigride) 支持者之努力，他們認為所有的非洲人背負著共同的命運，這不是出於共同的生態或歷史這樣的原因，也不是因為他們屬於同一個種族，而是因為都經歷過西方的殖民。<sup>9</sup> 分屬不同種族信念的非裔美國人和非洲知識分子，因而著手推動將「非洲」視為一個統一單位，這模糊了非洲大陸在語言、宗教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

就歐洲而言，十九世紀後期以歷史專業化的方式，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和民族主義的興起。一八七〇年代和之後發展茁壯的許多大學，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屬於國家機構。而英美兩國著名的私立高等學府則以其他方式與政府密切合作，因為教授們與政界人士同是一個上流小圈子的成員。第一代「專業」史學家除非不可避免，都很自然地關注並且通常在歌頌他們各自國家的歷史。<sup>10</sup>

當然，大多數歷史書籍不是對一個國家過去的全面調查，他們處理更集中的題目——一個人或一群人、一座城鎮、一起事件、一項特定的主題。對於專業歷史學家而言，區域性的規模使材料易於掌握並方便深入研究；為了深入討論關於賈淫、勞資糾紛、宗教活動、消費文化或戰爭影響，通常最好把重點放在特定的領域。舉個例子，利奧諾·大衛杜夫 (Leonore Davidoff) 與凱瑟琳·霍爾 (Catherine Hall) 被視為經典著作的《家庭財富：英國中產階級的男人和女人》(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該書的第一句話即為：「《家庭財富》一書討論了，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中產階級的思想、制度和實踐」。<sup>11</sup> 事實上，這本書乃是聚焦於一個特定的地

區——製造業城市伯明翰 (Birmingham)，以及毗鄰的兩個農村郡，艾塞克斯 (Essex) 和薩福克 (Suffolk)。然而，作者把他們的結論應用到整個「英格蘭」，論述中產階級根據自己對福音派新教主義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 的實踐，藉此聲稱自己擁有了高於貴族和工人階級的道德優越，而女性是此發展過程的中心，他們以宗教為中心的文化「不論對兩性間的關係，還是定義了誰是英國的一分子，都有持久的影響力」<sup>12</sup> 在多數學術歷史研究核心中皆存有像是《家庭財富》這樣的悖論，很容易就可找出其他數以千計的例子，而為了完成嚴謹的研究，你只能關注局部的問題；但如果你的問題要被認真看待，則必須要關注到國家層次。<sup>13</sup> 你可以研究美國肯塔基州 (Kentucky)、墨西哥恰帕斯州 (Chiapas) 或者中國的湖北省，但是你也同時加入了有關美國、墨西哥或中國的專業歷史學家的學術對話。研究生撰寫碩士論文，或即使是大學生撰寫報告或論文，這些成果經常被他們的教授標榜為，對重大問題的辯論做出了貢獻。所謂的重大問題幾乎都是從國家的角度出發。

為什麼我們不該繼續 (事實上我們多半還是如此)，像是討論國家事件和國家命運一般地寫作歷史？答案基本上是雙重的：首先，數十年來的盤根錯節發展讓學者們開始強調，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晚近的、人為的、脆弱的，並且在文化意義上是狹隘的；其次，近年來學者們尤其是歷史學家更加意識到，如果我們只侷限於國家背景，過去的許多方面將不是被忽視就是被扭曲。正如我們在上一章所見，隨著我們所關注的過去人們的類型不同，歷史研究的性質便會顯著地改變。同樣地，問題和答案也會根據你如何劃

分空間有顯著的變化。

民族主義在一個世紀以前發展至頂峰。當歐洲戰爭在一九一四年因國際外交種種不明朗的原因而爆發時，各國的政黨們拋開分歧，士兵們籠罩在愛國熱情之下遊行，幾乎沒有人質疑屠殺歐洲同胞或榮耀戰死沙場的必要性。然而從那時起，這種不容質疑的民族主義激情已隨著多重和相互重疊的歷史發展成為過去。在上個世紀間，不論是那些在道德上可受檢驗的戰爭，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或是為數更多的其他戰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都讓人困惑為何在「國家利益」的大旗下必然伴隨著如此多人的死亡。甚至「正義之戰」的原型也造成了廣島和長崎的慘狀。極端的民族主義，因為其與西班牙、義大利、日本，特別是德國的殺戮專制政權的聯繫，在二十世紀中葉飽受惡名。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對西方的批評家開始指出，民族主義和其標準概念乃是強加於殖民地人民頭上的歐美發明物。隨著民族主義主張日益受到質疑，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尋求實現那曾經與民族精神緊密相連的無私理想主義，他們投身於像是聯合國或國際刑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國際機構，特別是加入例如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和無國界醫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等非政府組織中。最後一點，近幾十年來航空旅行和電訊服務（尤其是網際網路）變得價廉可親，這更讓國界所構成的障礙日漸消弭，特別是對能讀、寫、教、學歷史的人們而言。

世界上的這些發展，也反映在學術圈中興起的將國家地位「去自然化」（denaturalizing）

潮流上，透過探究此類想像人類社群的特定方式是如何以及為何出現，來揭露其人為的性質。政治學家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九八三年）一書，開啟了此研究潮流，至今仍深具影響力。<sup>14</sup>在大多數人仍視「民族」為自然和無可避免的團體單位之時，安德森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定義：這個「民族」是「一個想像中的政治共同體，被想像成在本質上是有界限的，並且具有主權。」他認為，民族是想像出來的，不同於教區、村莊或城邦，它們主要由永遠不會遭遇彼此的人們所組成：他們僅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中，而不是真的存在於「那裡」。與帝國或宗教等有可能涵括廣泛人群的「存有物」（entities）不同，一個民族被想像成是有限的，其具有受物理條件限制的邊界，將它們與其他國家區分開來。其作為主權國家，獨立於任何超國家機構，如「上帝之下，未可分裂之國度」<sup>②</sup>（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作為一個「共同體」，民族是由情感關係和信仰緊密聯繫起的水平式平等「同胞」，由於這種聯繫是如此的鮮明，因此其中的人們（長期以來公民被想像為僅有男性）願意為彼此出生入死。<sup>15</sup>安德森認為，民族主義或許是出自本能以及理想的，但它是拜技術和商業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發展所賜而茁壯，像是帶給我們全國性報紙的「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那些在同一天以該國特定語言接受相同資訊的讀者，透過這種時間和空間的儀式，不斷地被提醒和自己有連結的他者之存在。<sup>16</sup>在十九世紀的西方，信仰對個人來說

依然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指引和安慰，但是隨著宗教信仰不再能夠作為回答廣泛的公共和歷史力量的解釋方式，作為具有特定救贖命運的「民族」一分子，成為將隨機的個人命運與更大的目的聯繫起來的一種方式，即「在死者與尚未出世的人之間建立聯繫。」<sup>17</sup>雖然安德森之後的學者強調現代國家既不自然也不「永恆」，但他們也認識到，民族採取的具體形式導致實際效果。「想像中的共同體們」創造出了官僚主義、軍隊、學校、法律、警察、人口普查、護照等等——簡而言之，各種形式的命令和控制有時會悲慘地影響到數百萬人的實際生活。

大約在與安德森的書問世同一時期，歷史學家開始關注現代國家歷史深層根源的各種虛構形式。<sup>18</sup>在歐洲和美國，大多數主要國家象徵（民族旗幟、國家首都、國歌、紀念碑和紀念節日）是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方才開始出現：巴士底日直到一八八〇年方成為法國的國定假日，英國在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統治下才開始慶祝皇室統治週年，此外正如每次爭議爆發時我們就會聽到的效忠誓言（Pledge of Allegiance），雖源自一八九二年但一直要到一九四二年方獲得美國聯邦政府的認可。共和國並不是唯一致力於編造淵遠流長幻象的政體。最具創造力的民族「傳統」建築師是英國人，他們後來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時期開始編造並銷售皇室儀式和服飾，這些儀式和服飾不久後便被視為是從遙遠的過去保存下來的習俗而備受尊崇：皇室婚禮、加冕儀式、禧年慶典（jubilees）、葬禮、國會開幕大典，有著馬車及華麗的禮服和飾品——所有這一切都無法

被兩個世紀以前的英國人所承認。<sup>19</sup>（然而，不列顛群島「被發明的傳統」當中最令人震驚的例子，發生在彼時一個世紀之前的一七六〇年代，此時崇尚蘇格蘭往昔的熱衷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嗅覺敏銳的英國商人，創造了蘇格蘭高地的傳統，像是未裁切的大張布匹〔the whole cloth〕、方格呢短裙〔concocting kilts〕、格子呢〔tartans〕，以及一個完全虛構出來的古代吟遊詩人歐西安〔Ossian〕。<sup>20</sup>也是在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的政治菁英受西方的發展啟發，構建了「長達數百年以上」的天皇信仰作為民族化身，於一八八九年建立了皇居，舉行了眾多以君主為中心的儀式，並且讓他前往四處進行皇室巡訪，讓儘可能多的人民能夠親眼目睹他。在明治時代之前，大眾對天皇的印象是模糊的，宛如不存在，或者混雜於跟政治或民族意識無關的民間信仰之中。<sup>21</sup>

那麼，民族所有的政治、文化和情感力量，都是晚近歷史上發展的結果，之所以有

② 譯注：此段引文源自美國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效忠是指向美國國旗以及美利堅合眾國表達忠誠。誓詞最初於一八九二年由法蘭西斯·貝拉米（Francis Bellamy）撰寫，並於一九四二年被美國國會採納。全文為：「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國，上帝之下，未可分裂的國度，自由平等全民皆享。」（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深厚歷史根源這種假象，要拜長久以來歷史學家、政治家等人創造所賜。他們的創作乃是基於國際間情勢和國內的發展：最初形式的現代民族主義出現於在南北美洲，乃是為了反對英國和西班牙殖民母國而被打造出來。而最近發展的現代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的非洲和東南亞，則是對外國殖民者模仿和否定的複雜關係的一部分。<sup>22</sup>儘管這一切都是相對晚近的發展，但民族認同已經成為人們自我理解中重要的一環，而歷史學家們一直都在探索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作為「韓國人」、「愛爾蘭人」或「澳洲人」，以及這種身份的具體組成成分如何隨時間而改變。

對於社群和個人而言，我們選擇去做什麼（能動性）是與我們認為自己是誰（身份）分不開的，而後者又取決於我們如何選擇和管理作為個體以及所屬群體共同經歷的往事。正如認知心理學家提醒我們的那樣，「記憶」是一個不斷流動的過程，它既與我們對於未來的願景有關，也跟我們對過去的看法有關。<sup>23</sup>當歷史學家在一九八〇年代開始把現代民族視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此時一個致力於研究歷史上記憶的新研究領域也出現了，特別是現代民族國家的領導人和人民從集體經歷的過去中，除了選擇出要被記住的部分外，更關鍵的更是選擇出哪些部分應該被遺忘。正如十九世紀法國作家勒南（Ernest Renan）著名的言論：「一個民族的本質是，所有人除了擁有許多共同的東西以外，他們也一樣都已經忘記了許多事情。」<sup>24</sup>

大多數現代國家都是透過拒斥和紀念，這樣雙重的過程而誕生的。例如在法國，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份子，很快地就開始稱呼他們要保持相當距離的過去為「舊政權」。並推出了一個新曆法，將成立共和國的一七九二年稱為元年。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藉由舉辦大型慶典來歌頌一位歷史學家所謂的「神話性的當下」：在巴士底獄倒塌一週年之際，數十萬人從全國各地聚集在一個巨大的「聯邦慶典節」中，這是日後許多這種慶祝新政權成立活動中的濫觴。<sup>25</sup>美國的誕生是由於拒絕殖民統治而誕生的，正如後來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國家也是如此。伴隨著紀念革命起源而生的慶祝活動——煙火秀、演說、軍事遊行，因為被視為是打造和加強國家認同的最明顯表現手法而讓歷史學家感興趣。然而，國家記憶的歷史研究大體上已經轉向去注意各國如何舉行戰爭紀念儀式：在一場死傷慘重的衝突之後，什麼被記得、如何被記得以及為何被記得？

在二十世紀之前，軍事英雄之所以被紀念在歷史、繪畫、掛毯和雕塑之中，乃是被當作統治者和指揮官的功績：「贏得」戰爭的是亞歷山大大帝、穆罕默德二世<sup>③</sup>

③ 譯注：穆罕默德二世，也被稱為征服者穆罕默德（一四三二—一四八一年），鄂圖曼帝國蘇丹。他也經常被人們直接以外號「法提赫」（Fatih，意為征服者）相稱。他率領鄂圖曼土耳其大軍於一四五三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終結了東羅馬帝國。

(Mehmed II) 或者腓特烈大帝 (Frederic the Great)，而不是在軍隊開拔前，被急忙地扔進亂葬坑中的那位充作炮灰犧牲的無名小卒。那些在暴力衝突中死去的無名大眾，在二十世紀之前雖偶爾會被列在紀念碑上——如一八一九年彼得盧大屠殺<sup>④</sup> (Petersloo Massacre) 中的英國暴動分子，或是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中喪生的巴黎人，不過一九一四到一八年的第一次大戰則是全國性紀念活動民主化的分水嶺。歐美各國政府第一次開始記錄下人名，並試圖確認了在戰鬥中死亡的數十萬普通士兵屍體的身份。英國政府早在一九一六年就開始將屍體集中起來，並為盡可能多的戰死者鐫刻墓碑，一旦戰爭結束，其主要戰場就以巨大的死亡墓地和紀念碑作為標誌。數百座法國村莊的市中心廣場，都豎立起一尊法國陸軍士兵 (Poisu, 滿面鬍渣的戰壕兵) 的雕像，而雕像的基座上則列出了當地犧牲者的姓名，另外為了紀念那些在屠殺中遺體或姓名遺失的人，政府則建造「無名戰士」的墳墓，致上隆重敬意。<sup>26</sup>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越南及其他地區的現代戰爭紀念儀式，進而強化了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聯繫：在門寧門<sup>⑤</sup> (Mein Gate) 或越南戰爭紀念碑上那些延伸得比你還高，或是圍繞著你的數不勝數的死亡士兵名字，動人肺腑地展示出一個國家存在的終極證據——大量「無名英雄」在戰場上為了完成目標的犧牲。那麼，國家的存在便是建立在他們選擇記住什麼，以及如何記住。但是，正如勒南指出的那樣，在製造和培育國家的過程中，各種形式的集體失憶症往往也會運用到，特別是在悲劇性的分裂事件之後。以美國內戰為例：當戰爭結束後，美國應該如何面對在這場撕

裂國家的戰爭中死亡的六十二萬名士兵？這種深刻分裂的大殺戮怎麼樣才有可能被紀念呢？正如大衛·布萊特 (David Blight) 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種族與團聚》(Race and Reunion) 中所說的，戰後南北能重新結合在一塊，靠的是刻意「遺忘」作為戰爭起因的奴隸制度，還有黑人解放這個戰爭的成果。在內戰後的數十年，「和解」的主題主導了官方紀念活動，像是「掃墓日」(Decoration Days)，以及其後改名成的「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強調「藍軍」和「灰軍」陣亡將士之間的共同點。詩人、政治家和退伍軍人本身強調南北軍人之間的相似之處，指出軍人們為他們堅信的正義目標奉獻了生命。與此同時，以白人至上主義對歷史事件做出的詮釋中，最著名的是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 的賣座影片《一個國家的誕生》<sup>⑥</sup> (Birth of a Nation, 一九一五年)，此片號稱黑人以某種方式引起了「雅利安」兄弟之間的鬩牆，並在性方面上威脅了他們的女性同

④ 譯注：彼得盧屠殺，指發生在一八一九年八月十六日英格蘭曼徹斯特的鎮壓示威事件。事件中，一隊騎兵衝進人數最高達六萬人的要求改革議會人群，造成十八死、七百傷。

⑤ 譯注：門寧門是一座戰爭紀念館，坐落於比利時西佛蘭德省伊普爾的東側。主要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於第三次伊普爾戰役時伊普爾突圍戰中戰死的身份不詳的英國和大英國協士兵。一次大戰期間，門寧門為士兵往前線作戰的必經之路，因此門寧門成為當地人心目中對於喪生在一次大戰中士兵的象徵。

胞。在一九一三年七月初紀念蓋茨堡戰役<sup>⑦</sup>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五十週年紀念活動中，有五萬多名倖存的戰鬥人員和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出席了會議，在此對於奴隸制和解放隻字未提，而且黑人退伍軍人被明確排除在儀式之外。非洲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被布萊特總結說，成為「團圓祭壇上的獻祭品」。<sup>27</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團聚與和解對於法國人同樣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他們的國家在一九四〇年陷落後，法國人被德國當局和合作的貝當元帥 (Marshal Pétain) 維琪政府共同統治，而戴高樂將軍則逃到倫敦，在那裡他宣布自己是自由法國 (Free French) 的領袖。一九四一至四五年的「黑暗歲月」是一段妥協和背叛的混亂時期，最惡名昭彰的是，法國官員積極參與並在某些情況下主導，將大約七萬七千名猶太人驅逐出境，其中大部分的人後來被納粹殺害。儘管有時候顯得太遲了，部分法國人與許多反德抵抗組織開始聯合起來；解放後，反抗者以暴力清算已知或涉嫌與納粹合作的人。戴高樂和他的合作者，在一九五〇年代掌權後，藉由鼓吹維琪政府得不到民眾支持，大部分法國人屬於或支持抵抗運動，這類關於不久前過去的敘事，來將全國凝聚在一塊。新領導人有意識地推動了對法國抵抗運動的領袖尚·慕蘭 (Jean Moulin) 的崇拜，他受到德國人的折磨和處決，在戰爭年代成為自由法國的官方象徵。德國人於一九四四年在法國中部的奧拉杜爾村 (Oradour-sur-Glane) 屠殺了六百多名村民，此地早在一九四六年便成為朝聖地，該地遺棄的廢墟為了訪客被精心保存下來。法國當局一直要到幾十年後，才承認將數百

名猶太兒童送上死路，他們也有份。<sup>28</sup> 正如美國內戰的情況一樣，民族凝聚力是以刻意去遺忘為基礎。在法國的情況中，試圖被遺忘的便是他們與德國人的積極合作及法國人在大屠殺中的角色。<sup>29</sup> 在美國和法國的例子中，研究國家認同如何被建立的歷史學家揭露了，領導者和人民如何創造載有一些回憶的故事和儀式，並且有時候會將其他人的故事掩蓋起來，儘管有時候的代價是背後的一大群人。民族國家作為「想像的共同體」、「被發明的傳統」、「國家記憶」的培養和操弄，所有這些研究領域都刺激了歷史學家的研究和寫作，來支持「國家認同」不必然為根深蒂固、不可避免，或是永恆的說法。即使大多數歷史學家繼續把重點放在像日本、德國或巴西這樣的政治實體上，但有賴於這幾十

⑥ 譯注：《一個國家的誕生》由格里菲斯執導，情節時間設定在南北戰爭期間及戰後，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八日首映。由於拍攝手法的創新，以及因為對白人優越主義的提倡和對三K黨的美化所引起的爭議性，使得此片在電影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⑦ 譯注：蓋茨堡之役（一八六三年七月一日～三日）於賓州蓋茨堡及其附近地區爆發，是美國內戰中最血腥的一場戰鬥，經常被引以為美國內戰的轉捩點。聯邦軍喬治·米德 (George Meade) 少將所率之波多馬克軍團 (Army of the Potomac) 抵擋由邦聯軍的羅伯特·李 (Robert E. Lee) 將軍所率領北維吉尼亞軍團 (Army of Northern Virginia) 之進攻，獲得決定性勝利，終結了李將軍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進軍。

年來對於「文化建構」的國家情感之研究，面對歷史曾經不言自明地與國家脈絡連結在一起這樣的思想，人們的懷疑態度變得更加明顯。伴隨著國家的去自然化，人們愈發意識到，人類過去的許多層面（包括其中非常重要的部份），若是被限制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根本無法被研究。

## 海洋、中間地帶及邊境

不僅超越國界而是超越大陸鴻溝的最著名歷史例子，也許就是大西洋奴隸販賣的故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大約有一千一百萬非洲人（確切的數量是有爭議的，但是規模之廣則無異議）從他們的大陸被強迫運送到美洲。長期以來，主要發生於十八世紀的「三角貿易」，被認為是歐洲近代早期歷史的一個道德上應受譴責，卻不受重視的特徵：英國和法國的商人為容易相信他人的非洲酋長帶來了「小飾物」，並且把這些飾物交換為奴隸，把他們的人類貨物換成殖民地產品，藉此讓自己還有國家變得富裕。幾十年後的現在，歷史學家已經遠遠超越克這種簡化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描繪，因此得以證實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歷史漫長、深刻且牽涉到許多國家，其源自充滿爭議的原因並帶來巨大的影響——這個故事可以基於世界某個地方開展研究，但其最終決定性的解釋需要具備許

多人口、經濟和文化的背景知識。<sup>30</sup>俘虜和奴役非洲人的數量至少能夠追溯到十六世紀，當時葡萄牙人把他們運到在亞速爾群島（Azores）、加那利群島（Canary Islands）和佛得角群島（Cape Verde）等大西洋地區的種植糖廠工作。歐洲西端的所有國家都牽涉其中，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荷蘭和英國，造成的不僅僅是美國歷史上學生所熟悉的那種種植園奴隸制，還有像是在墨西哥和巴西的黃金、白銀、鑽石開採到新英格蘭的家政服務等強迫勞動。

要解釋大西洋奴隸貿易需要拋棄簡單的假設（「非洲人注定要被奴役」、「奴隸販子是邪惡的種族主義者」），並且提出需要深度了解三大洲的經濟和文化方能回答的問題。為什麼歐洲人不直接運輸自己社會中的窮人？為什麼他們不奴役美洲的原住民呢？而最有爭議的是，有多少非洲人為奴隸市場掠奪同胞，還有為何他們積極參與此貿易呢？這些問題及其他問題的答案牽扯到歐洲人口和勞動力市場的知識、拉丁美洲在被殖民以前的土地持有方式和政治結構、流行病學、非洲的戰爭史、商業機構以及前近代歐洲對於宗教和種族上的「他者」之態度，以上僅為一長串主題中的一小部分。正如這個浩瀚的歷史背後的原因，其所造成的後果也是超過單一國家甚至大陸的背景。若要了解為何無論是在新世界還是在非洲本土的許多非洲人都接受了基督教，這就需要深度去了解非洲和歐洲的宗教傳統：共同性（兩種傳統都圍繞著對啟示的解釋）及差異（非洲的精神生活對外來影響較為開放接受，與歐洲相比起來較為不容易落入僵化的基本教義傾向）都



一樣重要。<sup>31</sup>若要了解一七九一年八月在海地發生導致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的大規模奴隸叛亂，除了需要去了解非洲信仰傳統中的巫術和薩泰里阿教(Santeria)，還必須了解島上糖廠的工作和社會關係，以及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sup>32</sup>簡而言之，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過程長達數百年，其後果仍然影響著大半個西半球，是超越人們所熟知的國家框架的人類歷史事件。

當你探究歷史時，若將研究的重心放在水體而不是大陸時會發生什麼變化？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學術研究，可能是以海洋為核心擴張而不是以國家或大陸為核心這種獨特和日益流行的歷史研究形式中最著名的例子。這種研究類型的模板是地中海的歷史，長期以來一直是西方古代研究的背景知識，但近幾十年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歷史研究也開始出現。<sup>33</sup>這些「海洋」歷史的流行清楚地反映出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關注焦點，我們注重文化往來和混融，以及人類的移動(從商、移民、旅行)，而不是傳統和停滯。

例如，大西洋史的研究者坦承，大西洋史這個大標題下涵蓋了大量不同的問題和方法。<sup>34</sup>儘管名為大西洋史，但是本身卻很少涉及海洋本身：一些學者指出，洋流、貿易風和支流(萊茵河、亞馬遜河、聖勞倫斯河、密西西比河)已經塑造了這個地區的歷史，另一些學者則反駁說是氣候差異為南北大西洋定義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自然世界。<sup>35</sup>無論如何，「大西洋」與任何陸地國家一樣，都是一種文化建構物。它是在歐洲人開始航行和量

測其水域後，方被認定為一個獨立的水體。大西洋史上若是以純然字面的意義來解釋，可能被視為在海上的故事，其中很多內容歷年來以高超技巧所記載：商人、探險家、水手、海盜和罪犯的歷史，海上戰爭的歷史，最悲慘的是奴隸們在惡名昭彰的「中間航程」期間經受折磨的歷史。所有的這些現在都納入大西洋史的主題，而過去的研究則是較為傳統的「海洋史」正典。<sup>36</sup>

從更為廣泛以及被眾人接納的意義而言，大西洋史不再格外關注這些與水有關的經驗本身，而是記錄下在海洋廣闊的人群之間的相互作用：非洲奴隸的運輸、歐洲人往南美洲的移民、貨物的雙向移動、經濟體之間的關聯以及思想與文化上的交流。這個領域時而遭受批評或者被懷疑乃是根植於冷戰思想——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卡爾頓·海斯(Carlton Hayes)於一九四五年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其中鼓吹學者們像史學家過去研究地中海一樣關注大西洋，尤其是英美之間在其中的聯繫，因為這個新的「西方文明內海」此時正遭受到東方勢力的威脅。<sup>37</sup>

我們可能已經擺脫了哥倫布(Columbus)和其他人「發現」所謂的「新世界」這個

③ 譯注：薩泰里阿教為結合非洲部落信仰如眾神崇拜和女神崇拜，以及天主教教儀式的一種宗教。

想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歐洲歷史開始在大西洋領域中佔據重要地位，通常認為始於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員於十五世紀朝西航行，在「大西洋革命」時代達到高潮，隨著十九世紀更加全球化的世界體系發展逐漸消失。正如一位評論家所描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探索並沒有發現一個新的世界，而是「兩個舊世界之間突然而嚴酷的相遇，這兩個世界將彼此轉化，並整合成一個新的世界」。<sup>38</sup> 至今已經過許多年，不過最重要的莫過於自從克羅斯比 (Alfred Crosby) 一九七二年的經典著作《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 問世以來，我們已經習慣於把大西洋看作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 (至少有) 雙向交流過程場景。跟著歐洲人一起來到的，除了牛、馬、羊等家畜，還有致命的天花；他們帶著同樣多樣的祝福和詛咒回到自己的祖國：馬鈴薯、豆類、玉米、木薯、可可，還有梅毒。<sup>39</sup> 計算這種交換的成本和收益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如何在天花對數百萬美洲印第安人造成的致命影響，以及各大洲獲取各種牲畜和作物的益處之間做出衡量？不可否認的是，美歐兩洲的生態互相滲透徹底改變了彼此。「哥倫布大交換」就是對這一點經典的描繪，「海洋」史的全景、跨國界的視野讓我們得以能夠揭開關於人類過去本來難以被述說的重要故事。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海洋歷史都必須用大規模來述說：在許多情況下，歷史學家利用更廣泛的洲際流動框架來闡明特定的地區。二〇〇四年出版的兩本書分別以大西洋兩岸之一來提供補充這種方法的例子。哈特菲爾德 (April Hatfield) 所著的《大西洋的維吉尼

亞州》(Atlantic Virginia) 描繪十七世紀維吉尼亞人的貿易路線是如何從波瓦坦印第安人 (Powhatan Indians) 那裡學習來的，他們同時以加勒比海社會特別是巴貝多 (Barbados) 為範例來調整他們蓄奴的方式；透過不同的移民群體，該州的各地區得以與法國、西班牙和英屬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地相互交流聯繫。在海的另一端，正如胡安·哈維爾·佩斯卡多爾 (Juan Javier Pescador) 在《巴斯克村莊中的新大陸》(The New World inside a Basque Village) 中所展示的，從拉丁美洲返回的新移民，破壞了巴斯克小鎮多諾斯迪亞 (Donostia) <sup>40</sup> 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因為一些居民變得更加依賴皇室關係而不是本地關係。<sup>40</sup> 多虧了研究北美洲的環境史學家，我們已經了解到遠程移民和商業如何重塑當地特有的景觀，像是當法國新教徒難民向英國殖民者展示了如何從樹木中提取松節油、康乃狄克河 (Connecticut River) 流域的改變，或者是歐洲人對華麗獸皮的渴望導致了海狸大壩的消失。<sup>41</sup>

◎譯注：西班牙吉普斯夸省省會，巴斯克語稱多諾斯迪亞，而西班牙語稱聖塞巴斯提安 (San Sebastián)。正式官方稱呼則為多諾斯迪亞—聖塞巴斯提安 (Donostia-San Sebastián)，屬於巴斯克自治區。

大西洋的歷史甚至可以採取個人傳記的形式。最近跨國和全球歷史趨勢的一個缺點即為專擅更大規模的敘事使得難以專注於小團體和個人命運。歷史學家們最近已經找到了將地理橫掃與普通人的故事相結合的方法，例如追蹤跨越國界甚至海洋的個人。<sup>42</sup>舉例來說，詹姆斯·斯威特（James H. Sweet）最近的一本書，講述了非洲奴隸多明戈斯·阿爾瓦雷斯（Domingos Álvares）被販運到巴西北方蔗糖種植園工作後，又被賣給另一位主人的故事，而最終其奴役是因為被宗教裁判所逮捕才得以免除。天主教當局將他運送到葡萄牙接受酷刑，幾乎等同於被處死，然後他消失在伊比利鄉村中。阿爾瓦雷斯之所以從具有相同經驗的數百萬人中脫穎而出，除了其橫跨三大洲的艱險旅程外，就是他作為治療師（僧侶）的技能，這可能是學承在非洲的父母；他作為拜物信仰帶領者的身份，讓自己在這個被迫進入的世界中有了一些影響力，因為他的主人既害怕他同時也依賴他。一直要到阿爾瓦雷斯在里約熱內盧作為獨立治療師獲得成功後，他才引起了宗教當局的注意，正是因為他被主人釋放才輕易受到逮捕，而我們之所以得以知悉他的人生故事，也要拜宗教裁判所六百頁的檔案所賜。阿爾瓦雷斯意外被記錄下的傳奇故事，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文化的傳播和轉化（阿爾瓦雷斯改信天主教但卻未放棄其非洲式信仰），以及在其他脈絡下，也可從此觀察諸如醫治之類的習俗，那些已經從數以百萬計的人們身上被剝奪的文化，如何被保存和延續下來。<sup>43</sup>

阿爾瓦雷斯故事的核心部分也提醒我們，大西洋洋流所運送的不只是人員和物品，

還有文化和思想。關於這個主題最經典並為人熟知的說法，是描述在十八世紀晚期自由的風潮來往於大西洋兩岸之間，在名為「民主革命的年代」（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在此 Revolution 為單數——這全都算是「一場」革命）令人敬重的研究中：法國啟蒙思想激勵了北美十三個殖民地的領導人，他們的自我解放於一七八九年激勵了法國人；法國大革命反過來使海地奴隸和自由黑人質問為何他們沒有被列入《人權宣言》中，他們於一七九一年以後的成功起義，點燃了往後數十年以降中南美洲的革命希望（對黑人而言）以及鎮壓的偏執情緒（在白人之間）。<sup>44</sup>十八世紀大西洋革命的故事至今仍然常被呈現為人類朝向現代世界進步的開端：在這個想像中，十八世紀末法國和美國之間在思想與政治上的角力與互動，為全世界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模板，這是被稱為「現代性」的模糊實體出現前的一個先決條件。<sup>45</sup>歷史學家現在按照慣例地將這個時期的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革命納入在「大西洋革命」（Atlantic revolutions）這個「概括性術語」（umbrella term）之下，但敘事模式往往仍是歐洲的進步或革命思想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這種自由向四處傳布的經典故事。社會學家保羅·吉洛伊（Paul Gilroy）討論大西洋奴隸制在思想和文化上遺緒的歷史之著名研究《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一書中，便對此敘事提出質疑。在經典的敘事中，大西洋的歷史主要集中在（儘管並非完全集中）在非洲人及其後裔的遭遇。而吉洛伊的研究則是關於奴隸的後代做了什麼——他們寫作和創作的內容，以及數十年來這些內容如何提供了另一種不同於歐洲大西洋的必

然勝利故事。吉洛伊認為，現代西方的黑人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都創造出既跳脫出同時又挑戰國家框架的文化和思想傳統：黑人文化，無論是杜波依斯或理查·賴特 (Richard Wright) ②等知識分子的作品，還是放克 (funk) 或饒舌 (rap) 音樂，都源於奴隸制的跨國經驗。他認為，非洲裔美國人和歐洲黑人生存在杜波依斯所謂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 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與所生活的地方不相容，對於任何國家實體都不可能產生徹底的認同。吉洛伊所謂的「黑大西洋」的是黑奴後裔所佔據的文化空間，他們祖先的「現代性」是由鞭子、鐐銬和奴隸船組成的。傳統的「大西洋現代性」敘事認為新解放思想在新舊世界之間來回奔放，吉洛伊的黑色大西洋主張「現代性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of modernity)，這是一個無國籍的抗爭空間，並呈現出如何在國家框架之外，甚至是在反對國家框架的情況下寫下知識和文化史的一個鮮明例子。<sup>46</sup>

以海洋 (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 為中心的歷史已經表明，挑戰傳統的地理學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如何理解過去，就像擴展我們的注意力到過去所忽視的人身上一般。如果你以不同的方式劃分空間或者把目光從顯眼的地方移開，你很可能將會遭遇到不同的行動者和不同的故事。以國家為基礎所寫作的傳統歷史，寫作方式是從中心向外，這表現在對於統治菁英如何「建造起國家」的描述上，他們有時候在建造過程中還得到「人民」起義的幫助。標準的歷史敘述通常看重首都或其他中心城市，而且儘管他們的語氣並不全然皆為必然勝利的，但是他們通常認為所有人最終都成為「英國人」、

「波蘭人」或「澳大利亞人」。尤金·韋伯 (Eugen Weber) 的《農民變成法國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一九七六年) 可能是當中的典型例子，本書生動地描述了不識字、說方言與信仰巫術的農民，是如何於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間因為鐵路、免費的小學義務教育以及普遍徵兵，開始認為自己是法蘭西國家的一分子。<sup>47</sup>

但是，如果我們採取相反的觀點——身份認同不是在中心區域而是在邊緣地區打造出來的，定義你是誰以及為何如此定義的這些問題，只有在偏遠地區當一群人遇到另一群人時才會變得重要。這就是研究成果為數龐大且仍不斷增長的被稱為「邊疆」(borderlands) 史領域背後的假設。與前述韋伯的國別史截然不同，彼得·薩林斯 (Peter

② 譯注：杜波依斯 (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W. E. B." Du Bois，一八六八—一九六三年)，美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民權運動者、泛非主義者。他是哈佛大學第一個取得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畢業之後任職於亞特蘭大大學，教授歷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杜波依斯是一九〇九年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ACP) 的創建者之一。他的文集《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 是非裔美國文學中開創性的一部作品。理查·賴特 (Richard Wright，一九〇八—一九六〇年)，非裔美國人作家，哈林文藝復興運動 (Harlem Renaissance) 肇始者之一。他的代表作《黑孩子》(*The Black Boy*) 對後來的非裔美國人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Sahlins) 的《邊界：法國和西班牙於庇里牛斯山脈中的建立》(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一九八九年) 專注於一個微小的偏遠地區：塞爾達尼亞(Cerdanya)，被法國和西班牙邊界一分為二的庇里牛斯山脈中的一個高山谷。這個地區在十七世紀發生了戰爭，並在一六六〇年分裂於這兩個國家之間，不過邊界直到一八六八年才確立。塞爾達尼亞中的各個小村莊居民共享了相同的文化和語言(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但屬於不同國家的管轄範圍。幾十年來，他們越來越強烈地宣稱自己擁有使用牧場、策壩攔河、分流河水的權利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並且訴諸各自國家的政府力量。拉圖德卡羅勒(La Tor de Carol) 村居民於一七四〇年向法國當局提出的涉及土地爭議的請願書當中多次提到「西班牙人的傲慢和侮辱人的處事方式」，並且將他們描述為「外國鄰居」，儘管對方是來自附近一個村莊的加泰隆尼亞人，而且與請願者之間有密切的姻親關係。<sup>48</sup> 由於土地糾紛，邊疆地區是首先體驗到國家不再是種管轄區域，而是種領土這種現代定義之處。因此，塞爾達尼亞的一些居民可能比大多數同胞更早地認定自己是一「法國人」，而不僅僅是「法國國王的臣民」。薩林斯認為，將「法國」想像為一個固定邊界的廣闊領域，最就是在像庇里牛斯山脈這樣的邊緣形成的。

美國歷史上對邊界的興趣比其他大多數地方更為顯著，因為我們現在稱之為「美國」這個地方的誕生，就是一連串許多人群之間複雜且漫長的衝突和談判過程。早期的一個觀點是，一個國家的中心是由邊緣所界定的，即為史學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在十九世紀末闡述的「邊疆學說」(frontier thesis)。透納在一八九三年提交給美國歷史協會的一篇論文〈美國歷史中邊疆的意義〉(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中提出，美國政治和文化的核心特徵是從西進的過程中出現的。那些經過幾代人的推動越來越向西的經歷，帶來了美國最壞和最好的特色。除了暴力、個人主義以及對上層文化的敵意，便是活力、勇氣和對繼承性特權的民主式厭惡：這些在國家邊緣磨礪出來的特質定義了其核心的文化價值。透納的論點代表了他的時代闡述「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 的一種新穎和挑釁的方式：「美國」絕不是像大西洋海灣的高雅城市人所想像的那樣是歐洲的延伸，而是一個被無止盡的衝動推向未知荒野的獨特社會。透納寫道：「美國邊疆與歐洲邊疆有很大區別，因為這是一條穿過人口稠密地區同時具備戰爭工事的邊界線。」<sup>49</sup> 「美國邊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處於自由之地的邊緣。」<sup>49</sup>

透納的早期美國人進軍「無主地」的想像在今日被人們所質疑，因為我們已經意識到在大多數情況下，歐洲拓荒者們跋涉進攻的土地本來已經有其主人——原住民，而非他們用權利或命運為藉口就可以號稱具有所有權。<sup>50</sup> 透納只授予白人先驅者了歷史能動性，隨後的歷史學家則講述了更複雜的遭遇和談判的故事。我們現在所說的「美國」和「加拿大」這些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帝國間的邊界，是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的貿易商、戰士、傳教士與原住民相遇的地方。這些不同人群之間的接觸地帶被稱為「邊疆」，這個術語所指的與其說是某種地方，不如說更是種研究國家歷史的方法。借用一篇有關

此主題的重要文章的說法：「如果邊境（frontiers）是過去我們的美國主流敘事被訴說的地點，那麼邊疆就是這些敘事被拆解的地方……如果邊境是封閉敘事的空間，那麼邊疆就是故事不可預知的轉折點，很少如預期般的那樣結束。」<sup>51</sup>只有當國家建立起牢固的法定邊界時，這些內陸邊境和邊界地區才會失去其戰略和文化上的重要性：當邊疆成為「具有邊界」的土地時，邊界內的每個人便獲得了作為公民或外國人的身份。<sup>52</sup>

「邊疆地帶」的歷史有時涉及到發生在現代國家官方領土界線之處的歷史，也就是我們稱為邊界的地方，在此僵硬固定的邊界被移民、走私者，或是被共同的語言和習俗所破壞。而且有時候它描繪出大國相遇之處，也就是在帝國邊緣，更加混亂的互動。理查·懷特（Richard White）的經典作品《中間地帶》（*The Middle Ground*，一九九一年）講述了十七、十八世紀時，北美大湖地區西部密歇根湖和蘇必略湖接壤處，法國人、美洲原住民和英國人彼此間在此發生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接觸。在這裡，法國和英國的行政官員、士兵和貿易商，遭遇了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美洲原住民社群，其大多定居在村莊中。正如懷特所指出的，他所說的是一個在帝國野心的世界體系（法國和英國的早期現代化擴張）中發生的故事，不過它發生在該體系的邊緣，此處是帝國的力量最鞭長莫及之處，而且力量薄弱的探險者在此必須得見機行事。<sup>53</sup>在距離本土遙遠之處相互競爭的法國人和英國人不得不依靠土著居民，而土著則依靠歐洲人：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只靠著武力來為所欲為。當歐洲人和土著試圖理解和駕馭彼此的文化，結果就成為一個相

互滲透和調解的顯著過程。例如，一六八二年，奧吉布瓦族（Ojibwe）領導者的兩個兒子和另一個戰士殺害了兩名法國商人並偷走了他們的貨物。當地阿爾岡昆（Algonquian）部落透過跟法國人一同抽煙斗<sup>①</sup>（calumet）的方式試圖維持和平，並提供給他們奴隸來「代替」他們的死者。這不符合法國領導人丹尼爾·杜爾胡特（Daniel Dulhut）的意願，他試圖以某種形式的法國法律來規範處理的方式，不過同時還是將印地安人納入處理程序之中，他邀請他的原住民盟友——渥太華（Ottawa）、奇普瓦（Chippewa）和休倫—佩頓（Huron-Petun）等部落的首領一起參加審判，並要求他們處決有罪的當事人。反過來，阿爾岡昆人感到憤怒和困惑，因為法國人拒絕了他們所提供的奴隸，在他們的文化中，這是解決盟友之間謀殺事件的方式，而處決當事人的要求，對他們來說則形同宣戰。最後，法國人試圖透過只執行處決三名兇手中的兩名，這種一命抵一命的方式來平息美洲原住民的怒氣。即便如此，印地安人震驚於對他們看來的又一次謀殺，而法國人隨後又做出了一系列的儀式性作為來安撫他們。<sup>54</sup>此一事件不但展示出兩種文化方法之間的緊張關係（一種以個人內疚為中心，另一個是結盟原則為中心），同時也表明了雙方藉由在不

① 譯注：calumet為北美原住民所用的一種菸斗，又為和平的象徵。

同的正義觀念之間進行類比，從一個陌生的意義體系中找出方向的努力嘗試。懷特的書名「中間地帶」指的不僅是地理位置上文化相互接觸的大陸中間處，同時指的也是一個隱喻的所在，其構成要素為：行動者所採取的策略、他們所創造的共同文化，以及在雙方力量相互平衡而且合作至關重要的歷史情況下「找到中間立場」。（一旦權力被集中到美國這樣的單一實體手中，政府就有資源向印第安人發動戰爭，這個政治文化中間層也就隨之消失了。）

歷史學家用什麼詞語來描述位於遠離權力中心區域的接觸經驗相當重要，懷特進行了一些概念性的革命，把自己所寫的東西貼上「中間地帶」的標籤而不是「邊疆」，因為就像在透納的論文中所說的，「邊疆」意味著探索者或者先驅在空曠的荒野中進行單方面的活動。歷史除了當你注意到邊緣時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當你從雙方不同的角度來講故事時也會如此。

像懷特的《中間地帶》一樣，史奈德（Timothy Snyder）的《血色之地：史達林和希特勒之間的歐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Stalin and Hitler*, 2010年）講述的是一九三〇、四〇年代東歐和中歐大規模謀殺的歷史，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以一種斬新方式講述一個熟悉又殘酷的故事。<sup>55</sup>二十世紀中葉大規模暴行的歷史通常是被分開講述的：一方面是蘇聯勞教營、有計畫的飢荒以及政治清洗；另一方面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屠殺猶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當我們想起史達林的罪行時，在西伯利亞的古拉格<sup>⑫</sup>（Siberian

Gulag）便會湧上心頭，而大屠殺讓人想起了奧斯威辛（Auschwitz）等集中營。但正如史奈德所指出的那樣，絕大多數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遇害的歐洲非戰鬥人員是在田野、森林、村莊和城市人死亡，而不是因為集中營、餓死或是被一槍斃命，也不是系統性地以火車運送或以毒氣殺害。最為顯著的是，史達林和希特勒的平民受害者，其中有一千四百萬人死於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歐洲地區，這地方被史奈德稱之為「血色之地」：北至波羅的海、南至黑海地區，其中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西部邊界地區。史奈德寫道：「史達林的罪行經常與俄羅斯連結在一起，而希特勒則與德國在一起。但非俄羅斯人的外圍地區方為蘇聯最血腥的地區，納粹在德國以外的地區也廣泛地殺害人們。」<sup>56</sup>我們將目光聚焦在此區域上並將其視為一個整體，而無視國家邊界，該邊界無論如何在這段時間下來一定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讓我們得以用全新的方式接近這個時期的那些無法被理解但又為人所熟知的暴行。

在一九三三年的飢荒中，超過三百萬人（主要是烏克蘭人）死亡，這是由於強迫農業集體化以及對糧食的強制徵用，而後者又與史達林的蘇聯經濟五年計畫有關。當德國人在

⑫ 譯注：古拉格為俄國勞改營的總稱。

一九四一年入侵蘇聯時，也造成了可怕的飢荒，造成四百多萬俄羅斯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平民和戰俘的死亡；這還不包括納粹為了追求此區域的歐洲種族「淨化」動機，而屠殺的五百四十萬猶太人、羅姆人以及同性戀者等。這些恐怖事件背後的手段似乎與共產主義者——納粹之間的截然二分法並不吻合，以動機來說也是如此。然而，成千上萬的其他平民，特別在波蘭和白俄羅斯，於共產主義者與納粹的鎮壓和報復行動中被消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德國人和俄羅斯人都想要消滅的波蘭菁英階層。為什麼史達林和希特勒手下的受害者往往是同樣的人群呢？為什麼這麼多人死亡，還有為什麼都在這個特定的區域？

在冷戰時期，有一個悠久的傳統，把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兩個政權都置於「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這個總稱下。然而，史奈德的做法並不是基於對稱的指責（「共產黨人跟納粹一樣糟糕」），而是基於對這兩個給予其人民烏托邦願景的政治怪物，在地緣政治需求和野心的相似性之分析。這兩個獨裁者都注視著相同的幾個地區——包括易受攻擊但在地緣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緩衝國波蘭以及巨大的「糧倉」烏克蘭。史達林暫時放棄了在全世界範圍內擴大蘇維埃革命，但是他所全心投入「在單一國家中的社會主義」之成功則需要鞏固周邊的關鍵領域。希特勒滋養了帝國的野心，部分原因是他對戰勝的執念——而且始終夢想著將領土不斷向東擴張，直到他可以殖民當地人並且驅逐帝國裡不受歡迎的人們。<sup>57</sup>雙方透過找出和消滅作為代罪羔羊的人們來動員他們的同胞：史達林用陰謀論來合理化他對波蘭人的大規模謀殺；希特勒要猶太人為歐洲的大部分問題負責。一

且兩個獨裁者彼此開戰，傷亡人數就會隨之增加，因為非戰鬥人員也會被指控搞破壞和抵抗，或者是僅僅出於功利主義的理由就被直接處決。

簡而言之，希特勒和史達林並不是在帝國的地理中心而是在其邊緣進行他們最糟糕的政治屠殺。史奈德對跨國性和地理上的關注所呈現的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驚人——在相對較小的歐洲地區存在一千四百萬受害者，並且掌握了導致這種長期暴行相互連結的許多故事。《血色之地》的例子說明了，一本書如何採用了一種基於政權邊緣而非其中心的跨國家取徑，來重新改寫眾所皆知的說法。

正如我們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樣，一旦聚光燈聚焦在新的人群中時，歷史學家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講述的故事就會徹底改變。將歷史空間重新配置也有相同的效果：當我們從邊緣向內望，或在人群相遇和國家衝突的混亂邊界上觀看時，又或者當我們把水域而不是土地作為分析的核心時，我們可以追蹤到那些以國家和首都為中心的傳統框架中隱而不見的歷史。就如我們所見到的那般，在新的地理區域尋找新的故事有時候能夠賦予一個小區域一種新的結構：歷史學家們已經發現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壓力是如何匯聚在庇里牛斯山脈、巴斯克地區、維吉尼亞州以及北美大平原上。相比之下，其他的敘事則需要一個更大的規模，所採用的不是人類學家而是太空人的視角。



## 全球史的崛起

近年來流行程度不斷上升的大規模歷史就是所謂的「全球」或「世界」的歷史（這兩個術語的含義略有不同，實際上卻可以互換使用）。<sup>58</sup> 如果國別史的修辭是令人熟悉的——一個國家的起源和發展在其領導人或人民中表現出來的故事，通常以積極的角度來述說，而且與其他不那麼傑出的人的命運相比形成未言明的鮮明對照，「世界」的歷史是相當難以想像：什麼樣的方法，什麼樣的分析，可以理解整個地球的經驗？就像任何國別史都遠不能無所不包，世界史實質上也就是關於選擇要強調什麼，還有選擇的理由為何。一個相當實際的定義可能是，世界或全球歷史通常涉及跨越國界並將地球不同地區的現象結合起來。其中一些最早期的研究是有關經濟的，就性質上而言大致上是物質性的：就像大西洋貿易那樣，商業建立起遙遠地區之間的聯繫。跨國銀行和企業等金融機構以及印刷或互聯網等遠程通信方式也是如此。同樣超越國家甚至大陸邊界的，還有疾病傳播等生物或生態事件：所謂的黑死病即為十四世紀亞洲至西歐地區多達二億人死於腺鼠疫的爆發，顯而易見可算是「世界歷史」事件，如同現今的全球暖化。文化也連結起了世界上遙遠的地區，就像最有影響力的宗教那樣：在此僅列出最大的宗教，像是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和佛教，它們已經聯繫起世界各地的社群，因此既需要從全球範圍，也需要從其在地方上的實踐來對其加以理解。<sup>59</sup> 所有這些現象都與所謂的「去地

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有共通之處：世界歷史的焦點通常不在具體的地方，而是在諸如貿易、信貸、疾病或信仰等將距離遙遠的人群聯繫起來不斷變化的無形事物，這些事物即使無形，但帶有非常具體有時甚至是毀滅性的影響力。<sup>60</sup> 歷史學家和學生現在對這些過去的全球「連通性」事例的好奇心，清楚地反映了全球較富裕、識字的人群彼此之間互相連結的這種日常經驗。世界歷史也許是今日最「實用的過去」。不過許多古老形式的世界歷史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包括神話和宗教記載像是《創世紀》，所有這些記載都提出了有關地球上人類生命起源、發展和性質的理論。數十年前，當大多數歷史涉及統治階級時，跨國研究經常被歸入「國際」或「外交」的歷史，記錄下世界各國政治菁英之間的事務。<sup>61</sup> 但正如社會史之所以出現，是被對社會不平等的批判意識所驅動，世界史的核心分析關懷因此圍繞著世界各地之間財富和權力的差異這種擔憂，催生出名為「世界體系」(world systems)這種富有影響力的理論。

各種強調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間關係的研究方法，都在某種層面上深受馬克思著作的影響。馬克思在一八六七年發表了《資本論》(Das Kapital)的第一卷，並於一八八三年去世，他找出了他所認為社會發展的一致模式，這模式乃是基於物質世界的資源、財富和社會力量彼此的互動關係。馬克思在與恩格斯共同撰寫的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社會從部落制到奴隸制，再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再轉變為社會主義。在他的理論中引起轉變的力量是複雜的，包括經濟體內部的矛盾

(像是生產的增長矛盾地降低了商品的價值，而這又會觸發對新的利潤來源之尋求)，或者在社會秩序之內，當一個群體（資產階級或工人階級）開始意識到它正在生產財富，而勞動所產生的利潤和根據其勞動應該被賦予的權力卻被剝奪了。馬克思的理論不是基於種族或民族特性的主觀判斷，而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假設這個客觀衡量標準，提供了對世界各國情況的全面性解釋。馬克思認為，在他自己的時代，歐洲在工業化和資本主義方面的發展領先群倫，北美滯後於早期，亞洲社會則尚未結束脫離封建主義的過渡期；世界上一些地區像是美國南部具備結合不同階段的要素，但是在像是非洲等地區則因為偏離了模式而導致停滯。<sup>62</sup>

儘管認為世界各個地區經歷了相似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觀點已不再被廣泛接受，但馬克思主義仍然對世界歷史的研究者具有相當影響力，不僅僅是其分析範疇（很少有人會質疑所謂「資本主義」對世界歷史的意義），也是因為它有助於後來的學者能夠以類似於社會群體之間的方式來概念化國家之間的關係。如果說馬克思是世界現代史的祖父，那麼歷史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或可被稱為父親，他從四十年前開始闡述此類歷史方法中最著名的「世界體系」。非洲研究者出身的華勒斯坦多卷鉅著《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的第一卷於一九七四年問世。在他的敘述中，我們居住的星球大約在一四五〇年到一六五〇年之間，開始成為近代早期的世界體系，那時歐洲經歷了與惡劣天氣（「小冰河時代」）和獲利衰退相關的長期經濟危機。西歐

的主要國家（英格蘭、法國、西班牙和荷蘭）回應的方式為「君主專制」的集權形式。十五世紀以降的探索旅程，便是由這些強大的國家和他們所庇護的股份公司資助的，無論早期現代的探險所明言的目的為何（尋找到中國的路線、找出伊甸園的所在、讓異教徒皈依），都導致了自然資源（如原材料）和人力資源（如奴隸）的被運用，幫助歐洲擺脫了經濟低迷。從那以後，華勒斯坦所稱之的「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間便形成了剝削和依賴的模式。統治和依賴所導致的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二元對立，因為歐洲一些中央集權不強以及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地區，如日耳曼地區以及東歐的斯拉夫國家，乃是作為提供市場和原材料的「半邊緣區」。華勒斯坦將世界地區分為等級體系——核心（core）、半邊緣（semi-periphery）和邊緣（periphery）——這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華勒斯坦認為，核心—邊緣的區別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因為有些地區會上升成核心（如北美），而另一些則衰退為半邊緣（如西班牙）；華勒斯坦師法馬克思，假定資本主義內部週期性的危機，刺激了在不斷擴大的邊緣地區中尋找新的市場和新的資源，同時定期破壞現有的模式。華勒斯坦的著作可想而知已經被許多人挑戰、批評和否定，但它仍然是在單一框架內理解相互依存的全球發展模式中嘗試的里程碑。<sup>63</sup>

跟隨著其他具開創性的世界歷史學者，華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了一個問題，並主導了此種大規模歷史日後的解釋：歐洲和後來的美國為什麼在過去五個世紀裡，在

物質上、軍事上和 culturally 宰制了世界？最近幾十年來型塑世界歷史領域的那些重要辯論，其所圍繞著首先即為上述問題的可能答案；其次是，這問題是不是當初就不該以這種方式被提出？少數歷史學家仍然堅持，歐美人是因為西方文化的積極特質而位居前頭——獨創性、個人主義、勤勞以及日益開明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所起的穩定作用。近年來討論這個主題的知名著作包括，經濟史學家大衛·蘭德斯（David S. Landes）的《國家的財富和貧窮：為何有些人如此富有，為何有些人如此貧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are So Poor*，一九九八年）和哈佛大學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 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二〇一一年）。<sup>64</sup>然而更為常見的情況是，這種辯論的出發點是在強調亞洲和中東社會在歐洲人稱之為中世紀晚期的時代相當強大與發達，與其歐洲競爭對手相比絲毫不遜色。因此重點議題便是要找出經濟史家稱之為「歐洲奇蹟」（*European miracle*）或是「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原因：歐洲以及後來的美國憑什麼以及為何什麼，在十九、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成主宰世界的強權？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World Economy*，二〇〇〇年）是近期對這場辯論最值得注意的貢獻，同時也是這個世界歷史新興領域中最常被引用的作品之一。「歐洲奇蹟」的經典敘事追溯歐陸主導地位的根源到至少兩、三個世紀以前（宗

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有些敘述可以追溯至中世紀）並強調歐洲在體制、文化或地理上深刻的例外性。與前述相反，中國史學者彭慕蘭則認為，西方直到一七五〇年以後才領先於亞洲，而且後來這種分歧乃是出於偶然原因。彭慕蘭把在一八〇〇年以前的世界經濟描述為多中心體系，其中有著多個人口稠密的核心以及工業化地區——而不是只有一個獨大的中心。那些主張十九世紀「歐洲」比同時代「亞洲」更先進的比較研究，彭慕蘭認為它們受到規模標準不同的影響而失之偏頗：亞洲在平均情況的結果是不如歐洲來得好，這是因為其中任何一個大國（例如印度）的疆域毫無疑問都大於整個西歐。若是採用在人口和財富上大小相等的單位來比較會更為合適，因此比起用整個中國來做比較，大約在一七五〇年左右，有三千一百到三千七百萬人口，大部分居住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大城市的中國長江三角洲地區，會是與英國更為貼近的對等單位。他寫道：「除非故事以國家政策為中心，不然國家並不是在多地之間皆能通用的單位。」<sup>65</sup>他總結說，一旦比較單位彼此更加匹配，一八〇〇年以前世界局勢的局面不是歐洲地區佔據優勢地位，而是在歐亞大陸兩端的高度工業化和人口密集的核心區域彼此旗鼓相當。

如果情況真是如此的話，那麼歐洲在十九世紀擁有引人注目的財富和崛起為世界大國的原因是什麼呢？到近代早期即將結束時，歐洲和亞洲的核心地區都面臨著人口過剩和生態耗竭的危機，這些地方的森林被大面積砍伐，越來越多的人擠在枯竭的土地上。<sup>66</sup>在這個關頭，兩個偶然的歷史發展使得歐洲的西部邊緣地區，尤其是英國得以繼續向前發

展。其中之一是在地質條件上的幸運，即煤炭接近英格蘭的工業核心；中國在北部和西北部省份有著巨大的煤炭儲量，但是這些地區在地理位置上遠離了長江三角洲這樣的繁華地區。<sup>67</sup>因此，英國可以較容易地從木材轉向煤炭，從而推動了鐵的生產並且為新經濟的工業化進展提供了動力。煤炭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砍伐森林的作用，但卻無法緩解英格蘭（或一般來說的西歐）人口和資源之間的不平衡。英國和歐洲之所以能比世界其他的可比較地區更快並更徹底地擺脫這個馬爾薩斯的「人口成長陷阱」（Malthusian trap），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取得殖民地的勞動力以及產品。歐洲之所以能夠避免陷入生態上的僵局，是因為其殖民地邊陲地區（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相當低的成本供應了食品和紡織品、吸收了過剩的人口，並且作為其製造商品的市場。歐洲甚至透過向中國市場出售大量的美洲白銀，從他們的亞洲競爭對手那裡獲得了財富。由於煤炭和殖民地這兩個原因，西歐享有了一「喘息的空間」來開發讓人口和生產力平衡的技術手段，從而超越了亞洲的競爭對手。

《大分流》在幾個方面上是今日世界歷史研究的象徵。雖然本書的論點並不包含世界所有地區——作者承認，有些地區像非洲雖然有被提及但並不是本書分析的核⼼——但其視野是以整個星球為考量的。而彭慕蘭的書也僅為某一個領域的代表性作品，該領域的許多實踐者正在試圖要不再將歐洲，以及更概括地來說的「西方」，擺在「其他人群」的榜樣和領導者的地位上。在早先的世代中，就算是那些批判西方霸權的學

者，如華勒斯坦，都是根據歐洲中心論的立場來推論：無論是出於歌頌或是批判目的，其核心目標都是要解釋歐洲和北美是如何比其他任何群體更快「抵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帝國主義）。可以肯定的是，彭慕蘭雖然也是在解釋一段歐洲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但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故事即變得非常不同，在這段故事裡東西方之間在好幾個世紀的時間中皆旗鼓相當，而且歐洲的優勢是出於偶然並且相當晚近才發生的。像彭慕蘭這樣的學者所實踐的世界歷史，提供了另一個實例說明了，在地理上重新界定過去如何帶來概念上的突破。

## 被取而代代之的歐美

世界歷史的研究透過將相機拉遠並且採取關照整顆行星的視野，提供了一個觀點：我們藉此能夠質疑那些認為歐美的主導地位，既是中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注定的敘事。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深深植根於西方及其外的歷史寫作中，因為專業歷史研究（系所、期刊和專業協會）在歐洲與美國是於十九世紀後期發展成形的，在這個時期歐美確實主宰了世界上大多數人民，而他們在這個時期的優勢又被解釋成從過去以來便一向是如此。在西方直到二十世紀，學術領域分門別類的方式使得歷史學家只關注歐洲，而東

方學家負責研究亞洲「複雜而傳統」的文化，人類學家則研究非洲和大洋洲「原始而不變」的社會。<sup>68</sup> 歐美具有「歷史」而世界其他地區則是充滿異國情調的「不存在時間的國度」，要糾正以上這種假設的過程是漫長的——直到一九五九年，在美國有一千七百三十五名歷史研究生，其中專門研究非洲的只有一位。<sup>69</sup>

由於專業歷史研究發展在歐洲帝國主義鼎盛時期達到成熟，歐洲大陸的歷史從一開始就不僅是研究歐美的歷史學家的標竿和樣板，對於研究非洲、亞洲和拉美等地歷史的同行也是如此。正如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他有影響力的《將歐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二〇〇〇年）一書中所說，「歐洲」依然是所有歷史研究中在理論上最為至高無上的研究對象，這其中包括了我們所謂的「印度」、「中國」、「肯亞」等地的歷史。所有這些歐洲以外的歷史往往以奇特的方式成為所謂「歐洲歷史」主敘事的變奏。他指出，「第三世界」的學者長久以來被要求必須了解歐洲的歷史和與其相關的歷史變遷理論，而西方學者大多不知道自身歷史以外的歷史（他稱之為「不對稱的無知」[*asymmetrical ignorance*])。<sup>70</sup> 然西方發達國家的解釋模式在被抽離其原有背景之後往往不再具有意義。非洲史學者史蒂芬·菲爾曼（Steven Feierman）指出，與更為原始的「文化」相比，成熟的「文明」社會的經典定義是：文明是動態的，它們的特點包括政治和經濟上的階層制度、文字、耕種以及特別是在城鎮的高密度人口。費爾曼指出，問題在於上述的部分特徵長久以來都存在於非洲的許多地區中，而另外一部分的特徵則不存在

於此：奈及利亞東南部的伊博語族（Igbo）地區的人口稠密，並且具備包括長途貿易在內的市場，同時具有複雜的農業，不過不具備政治階層以及書寫系統。歐洲對發展的分類方式並無法解釋伊博社會究竟是「文化」還是「文明」。<sup>71</sup>

更廣泛地說，歷史詮釋中的「西方對抗世界其他地區」（*West versus the rest*）是在現代性概念之下將空間和時間混為一談的命題。「現代」不僅是一個不斷在變化的時間範疇（在任何特定的時間點，從觀察者所在的時空延伸到過去一、兩個世紀），同時也是一個具有價值判斷的範疇，其中包含了某些被假設為具備正面意義的特徵，像是民族國家、城市化、參與式政治、工業化、教育和人權。<sup>72</sup> 現代性以及「文明」的概念，自從它們開始被用來替西方殖民主義辯護以來便極具爭議性，而在後來所謂的現代化理論的情況也是如此，這是一種用來判斷一個社會在發展道路上前進了多遠的一種範疇，而其所根據的便是歐洲的樣板。這種樣板的時間觀認為西方的才是屬於當下的，而其他社會應該儘快地擺脫他們的過去好迎頭趕上。再一次借用查卡拉巴提的說法，「歷史主義（*historicism*）……在十九世紀來到非歐洲人民身上，就像有人對別人說『還沒好』一樣。」<sup>73</sup> 屬於所謂「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思潮的學者（其中很多成員為南亞知識分子）認為，即使帝國已不復存在，但由於這種西方敘事仍被土著菁英所接受並強加於印度等地區的「庶民」（*subalterns*）身上，處於後殖民主地時代的人們仍然與其真實、自主的自我疏遠。<sup>74</sup>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在抗議反對他們

所研究的社會被視為「落後」的假設。正如一位非洲史學者所描述的，非洲歷史「之所以出現，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要挑戰包含在何謂現代的觀念中，種族主義的、目的論的以及傲慢的假設。」<sup>75</sup>然而，這些歷史學家所面臨的困境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民主和人權等現代性的特點擁護為積極的理想，並且欣然承認他們所研究領域的居民具有追求上述理想的正當性，至今依然如此，而現代性的許多層面，也包括了各種形式的物質舒適和安全。對於許多人而言，擺脫這種矛盾的辦法是將現代性轉化為複數形式，並且描述他們的主張為對「現代性」的研究：許多社會以各式各樣無法以相同標準衡量的方式在追求以及獲得更多的自由、教育以及物質繁榮，而歷史學家的任務便是描述出不同社會以各自的方式變得現代化的種種方式。<sup>76</sup>

例如，認為十八、十九世紀非洲社會的變化是肇始於如大西洋奴隸貿易與資本主義貿易網絡崛起等歐洲主導的全球現象，這種想法極為常見。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到這些發展，我們便無法去理解，或是不能夠去真正地明白，對於特定地區的實際居民而言更為切身的歷史上的其他互動關係。菲爾曼提供了一個例子，即生活於十九世紀晚期東非（今日位於坦尚尼亞和尚比亞之間的地區），一位名為納文巴（Narwinba）的女性的故事。納文巴的生命危機四伏，因為其丈夫的早逝和資源的匱乏讓她變得容易受到傷害：她曾經被俘虜，幾乎被當作奴隸賣出不過後來脫逃了，但卻無法順利地拜託丈夫的親戚以迎娶她作為某種免於被奴役的保護方式。由於納文巴微不足道的社會地位，她的女兒

被迫與一個沒有支付聘禮、地位低下的男子結婚，這個安排結果反而又使她的孫女成為酋長家庭中的弱勢成員，而讓她孫女陷入危險的處境，這個年輕女孩最終被賣掉以用來償債。這個故事背後更大的背景是什麼？傳統的答案會包括了全球商業和奴隸貿易帶給納文巴所處社會（特別是她所屬的納戈德〔Ngonde〕族）的壓力，因為非洲的這個地區不久前才向印度洋和奴隸貿易開放。但是納戈德族本身的情況則可以用來解釋在這些年間他們社會所經歷的變化，乃是出自皇家的婚姻模式讓貿易形式向東移的結果，而納文巴的脆弱性則是源自她的家族曾遭受自非洲南部恩戈尼（Ngoni）戰士的掠奪。這裡的區別不在於「更宏觀」或「在地」的脈絡之間的差異，而在於究竟是以歐洲為中心或是以非洲為中心來閱讀這相同的一系列事件。<sup>77</sup>

雖然非洲歷史學家現在表明了，這個大陸漫長而複雜的歷史不一定需要，也不應該圍繞著它與歐洲貿易和殖民主義的遭遇，不過亞洲的後殖民歷史學家堅持，傳統／現代的二元區分方式是無法理解印度等地的文化模式的。查卡拉巴提寫道，把二十世紀印度農民的文化歸類為「古老的」或「前政治性的」，就是在堅持著「人類的時間是單一、同質和世俗化的這種觀念」。相反地，我們應該努力去理解對現代性的經驗如何與其他形式的主體性交織在一塊的方式。在此脈絡下研究現代性，其所追問便不是歷史如何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而是其間如何轉化的。「對於幫助我們思考非西方國家如何體驗政治現代性的問題上，歐洲思想既不可或缺但同時也是不足夠的，因此將歐洲地方化成

為了探索歐洲思想……如何能夠藉由邊陲地帶並為了邊陲地帶而重生的工作。」<sup>78</sup>正如班納迪克·安德森在研究印尼史多年後，提出了他關於民族性是如何被打造的變革性洞見一樣，查卡拉巴提以及其後殖民研究的同儕皆主張，除了西方歷史主義不能夠簡單地被投射到其他背景下，而且在研究和分析的重心上將地理中心加以轉換能夠對西方歷史思想的核心分類方式提出饒富成效的質疑。

對於歷史「處於何處」的思考，向今日歷史探究的本質究竟為何提出了複雜而具有爭議性的叩問。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在從事研究時依然是位於某個國家領域的範圍之內，且通常圍繞一個或多個重大的事件或概念來組織其作品：中國革命、義大利文藝復興、第三帝國、英國工業革命或印度獨立。關於這些主題的精彩書籍固然不容忽視，而且歷史學家的訓練和想像力多半還是以國家為框架，但是我們早已經不再會天真地相信所有關於什麼是國家，以及它們是如何產生的說法。

隨著歐美研究領域的發展，以及這些置身於傳統外學者的批評，現在要繼續假設民族國家是自然和必然的歷史單位日益困難。世界史學者和後殖民學者呼籲「歐洲的地方化」，這不僅意味著將歐洲邊緣化，而且還質疑過去歐美所強化的分類方式，這在對「落後」與「現代」社會的區分上表現得最為清楚。這種思考方式發揮到最極端便表現在，去質疑如果歷史不以歐洲為中心是否還有可能寫得出來，因為我們今日所認可大多數的

寫作，其都是透過思考時間、空間和人類進步的方式來構思的，這種方式最先被清楚闡釋的時候，便是當西方世界在物質上和上都凌駕於世界其他所有人之時。這些批評家追問道，如果不去使用歐洲文化的分類方式，是否仍有可能書寫下歷史變遷呢？<sup>79</sup>

總而言之，關於歷史的「何處」問題現在正激盪著歷史學科，其激烈的程度比起上一代關於「何者」的問題有過之而無不及。並非所有對傳統地理知識的挑戰都引起了同樣的爭議。「海洋」、「跨國」或「邊疆」歷史是多民族的，而不是反民族的；這些類型的歷史透過聚焦於在國家出現前的時代或是國與國之間的空間，說出了新的故事，並且有時表現得十分出色。另一方面，全球和後殖民歷史則構成了更為激進的批評：首先，是將我們先拉回到原本的狀態，並且鼓勵我們採取一種將西方去中心化的思想角度；其次，藉著將視角拉近來觀察所謂的現代性在地方上以及出人意料之外的實例；然而，跳脫到「國家」和「現代性」之外思考的代價是巨大的：它需要放棄熟悉的故事（即……的「崛起」、「發展」或「勝利」），也可能要放棄所有關於過去無所不包的故事。歷史學家們現在正在思考，如果歷史不再具有宏大的敘述、國家或世界範圍的框架賦予它們的意義，我們該如何繼續寫下自己獨特的歷史？

1.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特別參見 Bruce Cum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The State, the Foundations, and Area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261-302。
- 2 關於地理想像的歷史，請參見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中譯本：馬丁·W·劉易斯、卡倫·魏根著，楊瑾、林航、周雲龍譯，《大陸的神話：大地地理學批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3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譯本：琳達·科利著，周玉鵬、劉耀輝譯，《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7》（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 4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2002)。第一～六章。
- 5 請參見·例如 David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Inventing Nationalism, 1680-18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Colley, *Britons*。
- 6 Lloyd Kramer, *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America: Politics,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since 17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29。
- 7 Thomas N. Baker, "National History in the Age of Michelet, Macauley, and Bancroft,"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185。
- 8 Hugh B. MacDougall,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Trojans, Teutons, and Anglo-Saxons*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2)；Zeev Sternhell, *Neither Right nor Left: Fascist Ideology in Fr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 Kwame Anthony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London: Methuen, 1992)。特別參見 1～11 章。
- 10 Geor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第二章。中譯本：格奧爾格·伊格爾斯、王晴佳、蘇普里婭·穆赫吉著，楊豫譯，《全球史學史：從 18 世紀至當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譯注：瑪莎未列出此書第三位作者蘇普里婭·穆赫吉〔Supriya Mukherjee〕）。
- 11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3。
- 12 *Ibid.*, 450。
- 13 這種地方／國家模式尤其適用於社會史。專業史學家的典型做法，即以對細部的仔細研究來做出關於大規模範圍的論述，在其他領域中以不同方式被運用，就像一本副標題為「十六世紀科學思想」（Scientific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的書，乃是建立在一個圈子十幾位的科學家各自的研究上頭。
- 14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st



-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中譯本：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1999）。
15. *Ibid.*, 6-7.
16. *Ibid.*, 22-46.
17. *Ibid.*, 10-11.
18. 與《想像的共同體》於同年出版，開創此研究觀點的書為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譯本：霍布斯邦、崔姆一路普、摩根、康納汀、康恩、藍傑著，陳思仁、潘宗億、洪靜宜、蕭道中、徐文路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貓頭鷹，2002）。
19. *Ibid.* - 第 1、四、七章。
20. *Ibid.* - 第 1 章。
21. Takashi 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 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2.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第四、七章。
23. Jay Winter,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4.
24. 引自 Kramer, *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America*, 73. 或見 John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25.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中譯本：林·亨特著，汪珍珠譯，《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莫娜·奧祖夫著，劉北成譯，《革命節日》（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26. Thomas W. Laqueur, "Memory and Naming in the Great War," and Daniel Sherman, "Art, Commerce,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mory in France after World War I," in Gillis, *Commemorations*, 150-67, 186-211; Winter, *Remembering War*.
27. David W. Blight, *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9.
28. Sarah Farmer, *Martyred Village: Commemorating the 1944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29. Henry Rousso, *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44*,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 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獻汗牛充棟，英文部分包括下列作者的著作：Philip Curtin, David Eltis, Stanley Engerman, David Galenson, Herbert S. Klein, Joseph Miller, David Richardson, and John Thornton 等。有關該主題極為生動的概述，請參閱 Eltis and Richardson, eds., *Atlas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概述該著作，請參閱 Klein 在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其中包括一一篇實用的文獻回顧。

<sup>15</sup> John Thornton, *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 1400-16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第九章。

<sup>16</sup> Laurent Dubois, *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 The Story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17</sup> 有關這種調查模式的實用介紹，請參閱論壇“Oceans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II (June 2006): 717-80 · 其中包含有關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歷史中的一篇概論和數篇有用的文章。來源：Jerry H. Bentley, Renathe Bridenthal, and Kären Wigen, eds., *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 (Honolulu: History of Hawaii Press, 2007).

<sup>18</sup> Alison Games, “Atlantic History: Defini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II (June 2006): 741-57.; Bernard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Concepts and Contou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ck P. Greene and Philip Morgan, eds., *Atlantic History: A Critical Apprais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Armitage, “Three Concepts of Atlantic History,” in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eds.,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sup>19</sup>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83; Greene and Morgan, *Atlantic History*, 6.

<sup>20</sup> 有關此方法的例子，請參閱 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s, and the Anglo-American Maritime World, 17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

*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 (Boston: Beacon Press, 2013).

<sup>21</sup>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12-13. Armitage and Braddick,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3-14.

<sup>22</sup> D. W. Meinig in 1986 · 西田田 Bailyn, *Atlantic History*, 55.

<sup>23</sup> Alfred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1972). 中譯本：亞佛烈德·克羅斯比著·鄭明萱譯·《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台北：貓頭鷹·2013)。

<sup>24</sup> April Lee Hatfield, *Atlantic Virginia: Intercolonial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Juan Javier Pescador, *The New World inside a Basque Village: The Oartzun Valley and Its Atlantic Emigrants, 1550-1800*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2004).

<sup>25</sup>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2nd ed. (198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3); Strother E. Roberts, “The Commodities of the Country: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Colonial Connecticut Valley,” PhD dis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11.

<sup>26</sup> 例如：Natalie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ntheon, 2007); Rebecca Scott and Jean Hebrard, *Freedom Papers: An Atlantic Odysse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關於德國聖多明哥歷史的書籍：維參呀 Amy Stanley, “Maidservants’ Tales: Narrating Domestic and Global History in Eurasia, 1600-190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1 (April 2016): 437-60.

- <sup>53</sup> James H. Sweet, *Domingos Álvares, African Healing, a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44. 聚焦在歐洲和北美的「大西洋革命」的經典研究為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1965)。關於特定地區的研究所，請參閱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Durand Echeverria, *Mirage in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Image of American Society to 1815*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6); Laurent Dubois, *A Colony of Citizens: Revolution and Slave Emancipation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1787-180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David Geggus, ed., *The Impact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rolina Press, 2001)。中文本：伯納德·貝林著·漆水庭譯·《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形態》(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 <sup>54</sup>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Jacques Godechot, France and the Atlantic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70-1799*, trans. Herbert Rowe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關於歷史上現代社會發展 - 請參閱“AHR Roundtable: Historians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 (June 2011): 631-751.
- <sup>55</sup>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up>56</sup>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up>57</sup> Peter Sahllins,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62-63.
- <sup>58</sup> Frederick 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894), <https://www.history.org/about-aha-and-membership/aha-history-and-archives/archives/the-significance-of-the-frontier-in-american-history> (accessed January 22, 2016).
- <sup>59</sup> 美國歷史學家巴納德·貝林著·漆水庭譯 Patricia Nelson Limerick, *The Legacy of Conquest: The Unbroken Past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 <sup>60</sup> Pekka Hämmäläinen and Samuel Truett, “On Borderlands,”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98 (September 2011): 338.
- <sup>61</sup> Jeremy Adelman and Stephen Aron, “From Borderlands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States, and the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June 1999): 814-41.
- <sup>62</sup>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i.
- <sup>63</sup> *Ibid.*, 77-82.
- <sup>64</sup>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 <sup>65</sup> *Ibid.*, xi.
- <sup>66</sup> *Ibid.*, 156-58.

58. 「世界歷史」是一個更加中性和廣闊的術語，意思是最廣泛的，有時甚至是全球範圍的歷史。「全球歷史」通常被理解為具有更具體的含義：它與「全球化」有關，林·亨特把這個術語定義為「世界變得更加相互聯繫，更加相互依賴的過程。」 Hunt,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4), 52. 總之，「世界」強調規模。「全球」強調相互依存。見 Pamela Kyle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中譯本：柯嬌燕著，劉文明譯，《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史的第十一章》(台北：廣揚出版，2012)。
59. Jerry H. Bend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393-416.
60. Hunt, *Writing History*, 54-55.
61. David Washbrook, "Problems in Global History," in Maxine Berg, e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lobal: Challeng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
62.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54-65.
63. *Ibid.*, 89-95; Hunt, *Writing History*, 56-57.
64. 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Poor and Some Are So Ric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8); 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London: Allen Lane, 2011). 中譯本：尼爾·弗格森著，黃煜文譯《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台北：聯經出版，2012)。
65.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12. 中譯本：彭慕蘭著，邱海生等譯，《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北：远流圖書，2004)。
66. *Ibid.*, 兼序章。
67. *Ibid.*, 57 ff.
68. Jerry H. Bentley, "Globalizing History and Historicizing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s* 1 (September 2004): 70-71.
69. Steven Feierman, "African Historie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World History," in Robert H. Bates, V. Y. Mudimbe, and Jean O'Barr, eds., *Africa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Contributions of Research in Africa to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68.
70.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28.
71. Feierman, "African Histories," 176-77. 法國世界歷史學家費南多·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於一九八七年闡述了「文明」的定義。
72. Carol Gluck, "The End of Elsewhere: Writing Modernity 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 (June 2011): 676-77.
73. Richard Wolin, "Modernity: The Peregrinations of a Contested 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 (June 2011): 743;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8.
74. 有關這個有影響力的學派概述，請參閱 Prasenjit Duara, "Postcolonial History,"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417-31.

55. Lynn M. Thomas, "Modernity's Failings, Political Claims, and Intermediate Concept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 (June 2011): 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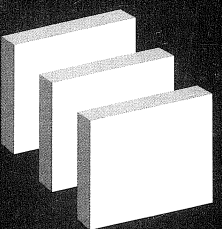
76. *Ibid.*, 731.

77. Feierman, "African Histories," 193-99.

78.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16.

82. Nicholas Dirks, "History as a Sign of the Modern," *Public Culture* 2, no. 2 (1990): 25-32; Arif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Cultural Critique* 42 (Spring 1999): 1-34.

CHAPTER 3  
THE HISTORY OF WHAT ?



第三章  
什麼的歷史？

## 從觀念到事物

比起「何者」(who)和「何處」(where)·「何物」(what)的歷史可能是更加不言自明的：歷史是關於人類的。一九四四年，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在他那本被廣泛閱讀、有關歷史學技藝的導論書籍中，寫下了這樣的典型陳述：「優秀的史學家就像是童話裡的巨人。他知道無論在何處只要能夠聞到人肉的味道，那裡就是他的獵物所在。」<sup>1</sup>這種比喻精確地直入核心，而且在布洛克寫作的當時意義可能還沒那麼明顯。他在這種方法於歷史學中成為標準之前，便大力鼓吹「由下出發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正如食人魔(ogres)和食人女妖(ogresses)要吃你時，它根本不關心你的地位或職業，歷史學家也應該對各式各樣的人一視同仁地感興趣。

歷史確實是關於人的。正如後面的章節將更詳細解釋的，過去的研究圍繞著人類認同的問題(我們如何與過去的人類相似，以及如何變得與以往不同?)以及意義的創造(我們的先輩是如何理解世界的?)男男女女以數之不盡的方式來接觸這世界，像是搜集垃圾、推演數學定理還有性愛等等。他們的活動受到物質條件的影響——自然環境、天氣、動物的生命、他們自己的身體條件等各方面所造成的機遇和障礙。因此，雖然歷史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人類，但歷史學家早已經將他們有關「何物」的探問整理成一長串過去人們，如何與周圍世界交流之各種方式之清單。

歷史上的「何物」傳統上與「何者」密切相關。直到一個世紀以前男性菁英都一直被默認為是歷史中的行動者，過去的編年史聚焦於男性如何統治其他男性與世界；軍事和政治成就就是最主要的，此外還包括了體制上和知識上的傑出表現，例如在教會歷史中所記錄的，以及見諸偉大的藝術家、思想家和科學家歷史中的那些記載。或許可以將本章所謂歷史中的「何物」描述為是隨著「何者」不斷演變的；例如，若是當焦點放在女性上時，就能夠拓寬家庭史的視野；若將注意力擺在勞工上則會開創出勞工史，或像是若留心於過去的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者，則能開創出「性史」。從何物到何者這個方程式確實相當有用，不過卻也顯露出了一些問題：首先便是，事實上有些「物」並沒有可以對應的「人」——環境史並不是必然有關於特定的某群行動者，經濟史可能在某些情況中根本不涉及可見的人，而思想史與文化史有時候採取的形式更是非常抽象的。

比起對新物體與新人物如何一起出現這樣平鋪直敘的描述相比，本章的故事更為複雜也更為有趣。歷史學家早已認識到，他們這行的技藝涉及到廣泛的人類活動，在傳統上經常是按照從精神到物質如此的層次所排列的，宗教和思想的歷史在頂端，而像是農業和礦業等主題則在底部。這個等級體系是在肇始於十九世紀的專業學術界中確立的，有著較「高等」追求的歷史有了它們自己的系所：藝術、宗教、文學和哲學的歷史一直是傳統文科課程的核心，而不是農業或漁業的歷史。然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關於食物、服裝、物品、消費文化、身體習慣和習俗，還有自然環境，以及許多其他傳統的

「世俗」事物都已經成為歷史經典的一部分，它們對於這個學科的重要性已被視為一如對政治生活或宗教衝突之研究一樣重要。<sup>2</sup>

本書的前兩章已經描述了建立高低等級體系的難處：由於人們對窮人和晦澀事物的興趣激增，因而取代了對於社會和政治的菁英份子之傳統關注，而且國家作為約定俗成的討論背景，還有其未言明的歐洲中心論立場，開始讓位給其他地域單位。「何物」的故事則以不同的方式展開。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許多歷史學家基於意識形態上的理由堅持說道，對於民主和進步的社會而言，關於農民、工人、奴隸和婦女的研究應該比白人菁英階層的歷史更重要，而在二十一世紀初，另一代的人亦出於政治理由來質疑民族國家的歷史優先地位。但是，以研究人類的經驗而言，若是出於意識形態而去攻擊「思想」、「宗教」或「科學」，並且主張食物、傢俱或森林對歷史學家而言是在政治上更為要緊的問題，是非常愚蠢的。雖然在意識形態兩端的任何一方陣營中，偶爾都會有怪人主張分婉的歷史是微不足道的，或者主張應該拋棄菁英主義的思想史，但是絕大多數歷史學家皆認為，所有的經驗領域以及各種形式的行動和創造，對於理解人類的過去都很重要，並且能夠以極具啟發性的方式來加以研究。

這些歷史探究的領域之革新，不是透過以較低等的「何物」去取代較高等的「何物」，而是透過方法論上的創新，將各種不同的人群經驗拉近在一塊來觀察。本章主張史學家在近幾十年來讓傳統上「較高」的領域變得較為具體實在，而讓過去聲稱「較低」

的領域更為與文藝修養相關，並且藉由以上主張來描述歷史研究中幾個領域的轉變和新領域的出現，不過他們同時質疑人類擁有無限能力來隨心所欲地改造世界的這種觀念。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最初定義的「人文主義」經典概念認為，「人」在創造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在一條上達上帝和天使下至無生命物質的鎖鏈，「人」佇立於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交界之處，具備得天獨厚的能力，既有可能向上提升趨近神明，也可能向下沉淪屈服於動物本能（婦女享受不到類似的自由，因為她們更屬於物質世界）。男性因為具有能按照自己意志改造世界的偉大力量，所以必須擔起作出選擇的重擔。<sup>3</sup>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學術研究已經削弱了這種古典的人文主義觀點，重新劃分了從高到低的分類，並對人類是否具有無窮盡地利用周遭的世界，同時不造成任何有害後果的能耐抱持著強烈的質疑。本章追溯了歷史研究的新對象如環境史等的出現，同時描述了傳統研究領域如何因為受新方法刺激而更新的一些方式。

## 不斷變化的觀念史

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s) 是歷史學家所關注最抽象並最難以捉摸的，同時是最傳統的主題之一。以下的說法雖然耳熟能詳，但是要說明其中的意義卻頗為棘手：寫作一個

觀念或一系列想法的歷史，到底是什麼意思？一個老生常談的答案會把觀念視為生物現象，它們如同一個遺傳基因，從一個思想家傳遞給下一個思想家，或者像疾病一樣傳播，而歷史學家的任務是追蹤從一位思想家傳給接下來幾代人的過程中各種觀念的傳播和突變。亞瑟·洛夫喬伊 (Arthur Lovejoy) 於二十世紀初在美國開闢出此領域，同時創辦了《觀念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他在一九四〇年的第一期中徵求旨在探討「古典時代如何影響現代思想、歐洲思想傳統與作品如何影響美國文學、藝術、哲學和社會運動」的文章。<sup>4</sup>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思想史的傳統方法有時是藉由把思想物化——將它們視為客體來進行的。洛夫喬伊本人正是以創造出「觀念單位」(unit ideas) 一詞而聞名：他認為世上存在著固定數量的基本哲學觀念，幾百年來的思想家們便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來組合這些觀念。在他最著名的著作《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注意其Idea為單數)中，他將西方存在已久的具有上下階層的「存在鏈」(chain of being) 創造觀念，解釋為三種觀念單位各樣重組的方式：柏拉圖最初提出的「充實」(plenitude)，以及我們承自亞里斯多德的「連續性」(continuity) 和「等級層次」(gradation)。<sup>5</sup> 在這種方法之中，觀念就像是思想家在玩的一整套積木，而且偶然的靈光乍現能從中構築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成果——事實上洛夫喬伊和其他觀念史學者所做的也是如此。

「觀念史」傳統創造並持續產出了令人著迷的學術成果——從法蘭克·曼紐爾 (Frank Manuel) 及弗里切·曼紐爾 (Fritz Manuel) 對西方世界中不同烏托邦的考查 (一九七九年) 到近來對「幸福」、「天才」和「常識」概念歷史的研究。最為簡化的觀念史在教科書和調查課程中仍然很常見，其包括了一系列偉大思想家的傳記，他們每個人都對人類知識的累積性進展做出重要貢獻：馬基維利<sup>①</sup> (Machiavelli) 將政治與宗教的分離，方使霍布斯 (Hobbes) 得以提出契約政府的假設，洛克 (Locke) 接著將霍布斯的這個假設朝民主方向調整，而盧梭 (Rousseau) 則是將霍布斯的說法朝更激進及平等主義的目的調整，這後來又影響了馬克思等人的思想。觀念史即使在其最為線性論和目的論的形式中也一直多少對脈絡有所關注：你必須掌握一些關於十六世紀義大利城邦的背景才能夠理解馬基維利的著作，而霍布斯對人類動機和政府起源的尖銳觀點，必然與他那個世代在英格蘭血腥的內戰經驗有關。然而，在較為傳統的方法中，「脈絡」僅是觀念出現的背

① 譯注：馬基維利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年)，義大利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及外交官。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除了《佛羅倫斯史》(Florentine Histories) 外，著有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君主論》(The Prince)，以及闡述共和主義理論的《論李維》(Discourses on Livy) 等書。



景——觀念的偉大之處正在於它們「超越了它們的時代」。

觀念史在被創立後的幾十年中被理解為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各方偉大的經典思想家們彼此對話、繼承以及有時甚至相互駁斥的系譜。年輕的學者在一九六〇年代打破了傳統方法，尤其是劍橋的歷史學家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他們指出觀念史僅僅去注意後來被認為是知識巨人的思想家，而忽略了如今雖然無人認識但在他們的時代相當重要的人物：簡而言之，當時的思想史研究是非歷史和菁英主義的。史金納在〈觀念史的意義和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一九六九年）一文中既嘲諷了假設觀念有其自己生命的「內在主義」的方法，也嘲諷了傳統上對「脈絡」的主張，認為這兩者都不是理解過去觀念的合適方式。他寫道，認為某些想法，比如說「進步」或「平等」，是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橫空出世，然後努力進入到自己的時代，有時候會「消失不見」，是愚蠢的做法，而認為思想家X提供了幾個世紀以後Y發展的腳本（「盧梭要為極權主義負責」）或者批評思想家們「無法預見」他們作品的某些含義，都是同樣荒謬的。思想史家也不應該把一致性強加在作者的作品上，或是試圖去確立一本著作的「本質性意義」。7 史金納尖銳地駁斥本質主義的思想研究方法，不過對標準的脈絡詮釋卻很友善，但儘管也不是不帶批判性：他指出，「歷史」的方法經常導致了粗略的化約論解釋，像是霍布斯被認為是第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或是洛克被視為新

生資本主義的理論家。<sup>8</sup>

史金納本人主張的脈絡主義方法，建立在對作家所處時代的思想風氣深入地了解。他提供了以下例子：當馬基維利寫道，「一個君王必須學會如何不具備美德」，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解釋這段敘述——它可以是與許多其他著作相呼應的一個普通說法、一種激進的聲明，或者是一則笑話。只有去掌握大量的當代著作才能讓我們確定它是什麼意思，因為「對文本的理解……預設了如何理解他們所意圖表達的意思，以及他們想要讓這個意思被如何理解。」。比如說，在我們自己的世界裡，「Do you have the time?」（你知道現在幾點嗎？）這個問題的適當答案，不是「Yes.（我有。）」（像是吝嗇的新英格蘭人的陳年笑話），而是「Yes, 2:45.（是的，兩點四十五分）」。來自另一個文化或者另一個星球的人可能會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合理回答應該就是「我有」，但是我們對相關脈絡的掌握則提示了我們這個問題的實際意思是「你是否知道現在的時間，那麼能否請你將那資訊分享給我？」史金納認為，思想史家必須著手理解的是這種未被明說的知識：每一個文本都是在某個特定語境中借鑒了一系列當代的理解方式所提出的話語，並且針對的是那些具有其自身文化期待的觀眾。一位哲學家感興趣的可能是柏拉圖或霍布斯著作的「永恆」意義，但一個思想史家必須弄明白每個文本如何與同時代的其他文本相互對話。從方法論上來說，史金納的方法意味著，既必須要閱讀所有典範作品，同時也要遍覽這些典範作品所根據和回應的許多不太著名的其他著作——這種脈絡分析形式可以被理解為思想史的「民主化」，因為這種形式為了詮釋的目的，將典範作品從與世隔絕、高高在上的地位給請下來。<sup>10</sup>

由於像史金納這樣的人的挑戰，「觀念史」這個詞已經不受青睞。如今，學者們更傾向於把自己形容為「思想史家」，儘管在其他領域中，關於究竟是什麼構成了「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尚未有一致的意見。高登 (Peter Gordon) 簡明地將這一領域定義為「知識分子、思想和知識模式如何隨著時間推移之研究」，而另一位學者將其描述為包括了思想家傳記、書籍史和閱讀史、機構諸如大學和更多非正式的學會等的歷史，以及思想的各種模式與潮流。<sup>11</sup>目前唯一的共識似乎是，大多數實踐者都會強力否認自己並未採取洛夫喬伊的方式來研究「思想史」。不同風格的思想史持續蓬勃發展，其中一些著作因為十分抽象與大膽以至於跟哲學著作相似。然而，隨著現代社會史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出現，這個領域大體上已朝著重視社會特定現實面這樣子較為具體的研究方式發展。

這種趨勢的象徵之一是出現了所謂的「觀念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其中一位開創者和最著名的研究者是專精十八世紀法國史的歷史學家羅伯·丹屯 (Robert Darrton)。一九七一年，丹屯在其最早期發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思想史上的經典問題：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聯繫是什麼？這個問題的答案看起來似乎總是顯而易見的，包括對這個領域的大多數學者而言：被稱為「哲士」(philosophes) 的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思想家，透過寫作和（非法）出版嚴厲批評教會、君主制和貴族制的作品，破壞了舊政權法國的現狀。丹屯接著開始在這個天衣無縫的情節設計中捅出許多大洞：沒有任何一位重要的哲士曾質疑過君主制的合法性，他們自身大多數都是貴族或者與貴族

有密切聯繫關係，而且無論如何，革命是在他們死後才爆發的。「啟蒙運動」在傳統的定義上挑戰的是思想上的正統觀念，而不是政治或社會秩序，而且在法國大革命前夕四處傳閱的最激進文學作品並不是由伏爾泰或盧梭等人所寫的。丹屯深入探索警察檔案和書商的記錄，他發現一七八〇年代的暢銷書包括許多八卦式的黃色著作，書名像是《穿睡衣的修女》(The Nun in a Nighgown) 或《安東尼的逍遙時光》(The Pastimes of Antoinette，影射當時皇后)。為了解這些作品從何而來，他開始致力於採用社會學的方式來研究十八世紀文學世界，並發現這些所謂誹謗作品的作者為職業寫手，即無法在思想沙龍和貴族資助的小圈子世界中獲得成功的邊緣作家。他們透過寫作許多情色的、捏造醜聞的小冊子來養活自己並抒發心中的苦悶。他主張，這些不屬於「上層啟蒙」經典的作品，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以及激進化提供了彈藥。<sup>12</sup>

丹屯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就深化和擴大了他有關「格拉勃街」<sup>②</sup> (Grub Street) 的論

② 譯注：格拉勃街 (Grub Street)，是一條以前英國窮苦文人集居的街道，又譯作「寒士街」，十九世紀以前位於靠近倫敦舊區穆菲爾茲 (Moorfields) 的街道，即現在的彌爾頓街 (Milton Street)，以其聚集了大量窮困的僱傭作家 (hack writer)、富野心的詩人以及低級出版商和銷售商而出名。

點，並且此論點也歷經其應得之批評意見還有後續的修正。<sup>13</sup>姑且不論其最初論點至今仍有多少站得住腳，丹屯的著作樹立起了一個開創性且富有影響力的範例，展現出當學者離開圖書館並在不同的檔案館中深入研究時，我們對於思想和事件之間關係的理解會如何發生變化。廣義而言，思想史領域目前也包括了不同團隊的學者們追蹤書籍和小冊子的製作和傳播過程，還有出版社、作者、發行人、暢銷書、通俗文學、羅曼史小說等等的歷史。它甚至延伸到像是閱讀行為的歷史這樣令人著迷的專門研究：人們是在歷史上的哪些時候閱讀，而且是哪一類的人在閱讀？他們是獨自一人還是三兩成群地閱讀？是大聲朗讀還是默讀？是一遍又一遍地閱讀同本書，或者博覽眾書？他們是帶著什麼形式和怎樣程度的情感和專注？

就像是其他領域一樣，多元化的趨勢給思想史帶來相當的影響。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女性主義學者闡明了女性對過去思想活動的貢獻：早期的女權主義思想家，如瑪麗·沃斯托克拉夫特<sup>③</sup>（Mary Wollstonecraft），著名的近代早期義大利女性知識分子像蘿拉·巴斯<sup>④</sup>（Laura Bassi），還有十八世紀法國與十九世紀德國的沙龍女主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主人兼仲裁者，在她們所處時代的思想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都在我們的思想史上佔據了一席之地。<sup>14</sup>總而言之，讓觀念史轉型的力量包括了在不同文本和不同人們聲音在數量上的增加，並且將精神世界建立在以下各層面中：在知識網絡的具體世界中、在生產和消費書籍還有其他媒介的行業中、在作家的社交世界中，以及在讀者的情

感和感官世界中。正如一位學者所言，思想史已經不再只是「脖子以上的歷史」。<sup>15</sup>

### 湯瑪斯·孔恩的科學革命

與「觀念」相同，「科學」是歷史中另一個重要的無形物體，儘管我們馬上就會留心到兩者之間的差異。科學通常是知識追求中最富「交際性」的，因為其中牽涉到團體與組織的合作，而且雖然其成果有時是抽象的，但是科學研究中大多數的運作機制——實驗、實驗室或實際應用，與哲學家或政治理論家顯得更孤獨和偏重於大腦的活動形成了鮮明對比。<sup>16</sup>此外，「科學」經常被當作「知識」的同義詞，而「觀念」的意義則比較偏

③ 譯注：瑪麗·沃斯托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一七五九—一七九七年），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哲學家 and 女權主義者。《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七九二年）是她最著名的作品。

④ 譯注：蘿拉·巴斯（Laura Bassi，一七一—一七七八年），十八世紀義大利科學家，她是歐洲第二位獲得學術資格的女性，同時也是歐洲第一位女教授。

向於代表「意見」：我們很容易會去假設，關於最佳政府形式或美好生活本質的許多理論，它們之間可以也應該能夠同時並存，然而即使科學提供的答案是暫時性的而且還在不斷演變，科學所努力追求的是關於「重力」的唯一正確理解，或是對「遺傳學」的最終解釋。比起西方思想的典範式歷史有過之而無不及，傳統上科學史是由接連出現的、站在彼此肩膀上的天才們的史詩故事所構成，其中的每一位都改進了前人的成就。從十九世紀後期到冷戰時期，許多科學史家都渴望把各自領域的故事放在那種被想像出來的篤信宗教蒙昧態度之對立面，描述科學進步的步伐邁進為「實證研究結果的累積，並且被納入了更廣泛的適用法則中。」<sup>17</sup>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科學史在許多方面與其他歷史領域一樣，從單一的、自上而下（上層階級偉大的男性天才）的方法改變為更為折衷的觀點，像是去研究過去究竟是哪些人在「從事科學」以及他們是怎麼做到的。然而，這個領域的特殊之處是在於當為了要回應某本書的巨大影響時，其改變方向的方式比起其他領域都來得更為突然。一九六二年，哈佛大學物理學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發表了《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這本關於科學社會學的著作，後來成為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在藝術和人文學領域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一本書。<sup>18</sup>這本書本身亦是革命性的，其影響力正與書中所描述的過程雷同：孔恩所提出的論點是，科學觀念的變化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像傳統所認知的基於逐步累積，而是透過所謂科學革命這種在概念上的躍進。這

本書最著名的命題之一是科學家在「典範」（paradigms）中從事研究。孔恩將典範定義為「在某個時代被廣泛認同的科學成就，為實踐者群體提供了典型問題以及解答。」<sup>19</sup>在孔恩所謂的「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的時代，支配性的典範在絕大多數的時間中不會受到質疑，有時甚至不被人們所留意。不過，持續累積的實證研究最終會揭露出反常現象，而且會得到一些無法與現有典範保持一致的研究結果。要解決由此產生的危機便只有透過創造出一種與舊有典範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的全新典範。此種劇變最有名的例子發生在十六世紀中葉，當時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提出，只要假設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轉而不是相反情況，那麼當時對行星運動的計算誤差就能被解決。從地心說到日心說的宇宙觀轉變（徹頭徹尾地不可共量的兩種典範）是教科書中探討一場科學革命的經典案例。有爭議的是，孔恩的論點意味著科學不會產生永恆的真理，只不過是提供了暫時性的解決方案，其呈現的形式為存在時間短暫且受歷史條件決定的各種典範。

作為知識社會學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科學革命的結構》對於科學史領域的新定位格外重要。孔恩對於觸發科學革命的人們有著有趣的觀察：他們通常是年輕人，而且有可能是他們所改變領域的新手或者是行外人（有趣的是，孔恩自己也是一位沒有受過正式社會科學訓練的科學家）。<sup>20</sup>然而，這本書更重要的一點是要將科學界以及科學變化視為是社群層面而非個人層面的問題：科學家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在特定的時間和

地點擁有一個合理而富有成效的典範，以及同樣的典範如何以及為什麼會失去其解釋效力？大約與歷史學科轉向「新社會史」的同時（湯普森的傑作於《科學革命的結構》的隔年問世），孔恩的書以清晰而有說服力的方式傳達了以下訊息——在理解科學變革上，專業領域中的結構和互動關係比個人的天才影響更為重大。

孔恩「不可共量性」的概念包含了第二個同時更具爭議性的主張。孔恩多年以後把這個概念的根源追溯到，當他在準備第一門科學史課程時所體驗到的頓悟。在細讀亞里斯多德關於力學（mechanics）的著作時，他驚嘆於這位因為邏輯上的技巧還有在生物學上的觀察評論被尊崇了許多世紀的傑出思想家，居然在物理學上犯了層出不窮的錯誤。他在哈佛的辦公室窗口中突然想到了答案：從牛頓（Issac Newton）以後的角度來看，亞里斯多德的運動理論中任何一部份看起來都是荒謬的，但是若把它們視為一個整體來看的話，其就是一個完美的系統，「是一個……在通往牛頓力學的道路上必須被打破和改革的整體」。<sup>21</sup>《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為此領域中早已在進行的演進，正如他所指出的，提供了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理論框架。當時的科學史家正在逐漸擺脫積累式的歷史，他寫道：「他們不是要追問過去的科學對我們目前的優勢而言有什麼經久不衰的貢獻，而是企圖展示出該項科學在其所處時代的完整歷史面貌。」<sup>22</sup>孔恩對於強調斷裂和不連貫的意義在於，科學史不是一「進步」的線性歷史，而是關於彼此連續的不同世界觀的歷史，每種世界觀都具有它自己的一致性——直到其一致性消失為止。（雖然孔恩堅信自己是科學進步的信徒，但是在

這個傳統中寫作的歷史學家更喜歡談論科學的「變化」而不是「進步」。<sup>23</sup>孔恩的做法催生了一種有時被稱為「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傳統，一位學者將其定義為「相信科學知識是人類所創造的而且是以現有的物質和文化資源所打造出的，而不只是簡單地展示出一個早已被決定而且不受人類行為影響的自然秩序。」<sup>24</sup>

建構主義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早期時，遭遇許多阻力，而且孔恩和志同道合的學者被指責因為質疑了研究好與壞之間的界線，以及科學結果的有效性與實用性——總之，採取了不負責任的相對主義立場而傷害了科學的權威性。<sup>25</sup>但是建構主義者很快就回應道，他們並不想介入關於真實性或有效性問題的爭論（同樣很快地就明確表示，他們就算要出手也會挑選現代而不是十七世紀）。他們的目標是去解釋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被生產與被檢驗的，同時將科學的「真相」打上引號，採用的是所謂「對稱假設」的中立立場——也就是說，作為歷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前提是，他們的作用是去描述而不是去決定不同科學觀點的對錯。<sup>26</sup>

或許被所謂的孔恩式革命對科學史研究最大的影響是宏觀敘事的沒落，這種敘事方式描繪了許多世紀以來「科學的前進」，偏好以「快照」的方式來研究特定機構、人群以及（最典型的）將相互競爭的不同典範彼此對立起來的危機時刻。<sup>27</sup>對建構主義者而言，一旦這個領域變成依據脈絡去理解各種科學觀念的研究，而不再需要操心誰是正確、誰是錯誤的，學者們便能夠開始深入研究特定的科學爭論背後的社會文化。

## 歷史脈絡中的科學

早期的脈絡研究其中之一持久不衰至今已成經典：史蒂文·謝平（Steven Shapin）與賽門·夏佛（Simon Shaffer）合著的《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一九八五年），本書檢視波以耳（Robert Boyle）和霍布斯在一六六〇年代早期的針鋒相對，即兩人爭論真空是否存在以及應該如何合理地證明這個事實。波以耳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傑出科學家，是英國新成立的皇家科學促進會的創始成員，該組織遵循法蘭西斯·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在上個世紀倡導的方式，致力於追求集體的、實驗性的現代科學。七十二歲的霍布斯為《利維坦》（*Leviathan*）的作者，也是聲名狼藉的專制統治辯護者，他因為被懷疑為無神論者而飽受困擾，並因為其固執的意見以及傲慢舉止而被拒於皇家學會門外。28 在一六五八至五九年間，波以耳委託他人製造了一台價格非常昂貴的新機器（如同一位學者所說的「那個時代的迴旋加速器」），這是將一顆三十夸脫的玻璃球安裝於以木頭和黃銅打造的精細幫浦構造的裝置，其目的是要進行實驗來確認真空是否存在。他在一六六〇年發表了《物理機械新實驗》（*New Experiments Physico-Mechanical*），敘述該裝置所進行的四十三次實驗，並且吹噓他的成功。霍布斯於翌年寫了一本小冊子《物理學對話》（*Dialogue Physicus*）回擊，不僅反駁了波以耳的成果，而且全盤質疑以實驗來獲知科學真理這整套原則。

從我們自己的時代回顧，波以耳對實驗測試的熱情與霍布斯堅持認為實驗不是通往科學真理的道路，這兩者之間根本稱不上是種對抗：波以耳贏了，霍布斯輸了，就是這麼簡單。但是謝平和夏佛認為正是這種在科學上互相爭論的時刻，讓我們得以去質疑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它們發生的時間乃是在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科學慣例僵化為不證自明的事物之前；霍布斯能夠對科學實驗加以批評，便正是因為其還處於起步階段。由於它與我們在時間上已有了相當距離，十七世紀的背景能讓我們更正確地認識到，事實並不是透過「將鏡子對向現實」確立起來的。在波以耳的案例中，他所描述的實驗活動的有效性和由此產生的「事實」，這兩者都取決於一台如同現代顯微鏡和望遠鏡那樣「規範」感官的新機器，並在皇家學會的會議室中，對精心挑選過的目擊者公開表演實驗。波以耳進一步將這些結果傳播給了雖然不在眼前但是卻實際存在的一個讀者公共圈子，他借助的是針對志同道合的實驗者所打造具有特定風格（文明、謙遜、樸素）的敘述方式。兩位作者總結說：「實驗性事實的客觀性，是特定形式的論述與特定形式的社會連帶關係（social solidarity）下的產物」。<sup>29</sup>

霍布斯嚴正反對波以耳，他的理由既能說是方法論上也可說是哲學上的。霍布斯強烈反對真空或「無形物質」的觀念，並且擔心這種觀念會落入他極不信任的神職人員之手。他同時認為波以耳所進行的各種實驗，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對於確立自然哲學的終極真相上也是無關緊要的。對於霍布斯來說，唯一可靠的科學就是當時稱之為「幾何學」

的數學演繹，其邏輯真理讓任何具有推理能力的人都能夠清楚明白；科學實驗會產生不一的結果，但數學論證的真相是無可辯駁的。<sup>30</sup>正如同在二十年內戰結束後和專制政體出現的國家一般被預期會出現的情況一樣，關於科學的爭論總是演變成了關於政治原則的鬥爭：波以耳和他的追隨者認為他們的實驗社群是負責任地行使自由的體現，而對於霍布斯而言，在科學和政治上，僅只有單一性的那些原則才能確保國家的和平與穩定。謝平和夏佛大膽地結論道：「解決知識問題的方法便是解決社會秩序問題的方法」。<sup>31</sup>總而言之，他們並沒有以一位擁護實驗的年輕人擊敗懷抱過時思想的怪人的方式來描述關於空氣幫浦的爭論，而是將其描述為相互抵觸的不同世界觀在如何構建「真相」上的競爭。

與主張科學的洞察力是從思想家們的無形思維中迸現出來的早期傳統相反，最近幾代的科學史家是在特定社會和制度當中的互動關係追尋科學真理是如何產生的。他們認為，「真理」(truth)是一個與「信任」(trust)不可分割的概念，理由在於我們都是基於對提供資訊者的信心上，進而消化接受到的訊息。(您正在閱讀的書包括腳註，這個慣例旨在說服您相信作者所根據的是那些擁有學位證書並同樣值得信賴的人之著作。)<sup>32</sup>然而在過去的社會中，具有可信度的聲譽是如何被建立的？謝平在其「空氣幫浦研究」之後的後續研究是一個例子，這是一本名為《真理的社會史：十七世紀英格蘭的文明與科學》(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的專著。<sup>33</sup>謝平

認為，實驗科學之所以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盛行，因為它是由一群從事實驗的菁英分子，即地主上層階級的「紳士們」所進行的，他們彼此信任，並且在整個社會中具有道德權威。屬於紳士階層的這個身份賦予了信譽，因為它的成員被認為既是在物質上獨立的人，又是依循謙虛和正直等基督教價值觀的有德者。一個紳士不需聽命於任何人，且他所說的話就是對他的約束——指責一個紳士不真實，對他這個人而言是相當嚴重的冒犯，唯一能被想像的回應方式便是決鬥。謝平認為，皇家學會是一個有利於追求「真理」的環境，因為它的成員們，即所有的紳士們都能夠彼此信任，而且因為他們的科學發現是由他們的社會地位所賦予的。

兩個世紀之後，可信賴性所根據是具有數據支持的專業知識，而不再是根據於高尚的地位，正如科學史家波特(Theodore Porter)在一系列傑出的研究中所指出的：他藉由比較了十九世紀的英國、法國和美國，表明了當社會越大、越年輕、越民主時，其行政菁英越有可能藉助統計學作為「信任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trust)來說服甚至操縱公民；他認為，用數字來合理化政策，不是出於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力量，而是出於其脆弱性。<sup>34</sup>總之，建構主義者將科學史從純粹的思想領域轉移到了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混亂現實中，謝平最新的論文集半開玩笑的書名便總結了這種方法——《從不純粹：關於科學的歷史研究，宛如它是由位處於時代、空間、文化和社會中的，有身體的人們生產的，並且為爭取信譽和權威而奮鬥》(Never Pure: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as if It Was Produced

將科學史「帶回現實世界」的其他相關方式，則是透過擴大我們關於科學是什麼的定義，以及我們認為誰可以從事科學的認識。關於「現代」科學如何誕生的傳統說法，認為科學真理是由失去可信度的「魔法」或「迷信」信仰的灰燼中所出現的。然而，在二十世紀後期，許多富創意的研究致力於打破「好」與「壞」科學之間的藩籬，以表明這些近代的分類方式之間在三、四個世紀之前完全不是涇渭分明的。像是煉金術等對「隱祕」(occult)的探求與具正當性的科學之間的劃分是在十八世紀方開始變得嚴格，而兩者之間在此以前互相滲透的程度是相當高的：韋斯特福爾(Richard Westfall)和德布斯(B. J. T. Dobbs)等學者已經清楚指出，推動牛頓構思出萬有引力定律(往往被認為是科學革命巔峰)的思想突破，乃是根源於這位偉大科學家對煉金術這種「黑暗魔法」充滿熱情與大量的研究。<sup>36</sup>

將「科學」和「現代性」聯繫在一塊，還有推論我們所謂的科學在「傳統」社會中無法蓬勃發展的信念，這兩者一直以來都比傳統上對於「科學」和「魔法」之間的區分更為僵化。亞洲和中東科學傳統是在類似於西方的思想框架中運作，雖然西方學者早已承認這種傳統的存在，但像是「非洲科學」這種說法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一種矛盾：治癒和占卜這類的行為，以及被認為能妥善地駕馭科學思想的抽象思維，要相互比較這兩者

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孔恩把科學變革描述為一系列不可共量的典範之同時，非洲主義者羅賓·霍頓(Robin Horton)發表了一系列現在被視為經典的文章，主張他所稱的「非洲傳統思想」與歐洲科學有著許多理論上的共同點。例如，非洲的宇宙學跟西方科學訴諸為隱喻的自然或無生命的物體一樣，都具有相同的統合與簡化的功能：「像原子、分子和波一樣……神的作用是把一體性引入多樣性，將簡單性引入複雜性，將秩序引入混亂，將規律引入不規則(anomaly)中。」<sup>37</sup>他認為，在傳統社會中，高度結構化和可預測的人類世界是建立起理論的合理基礎；相比之下，在組成複雜的社會中，其社群世界則無法提供這種保證，思想家們轉而將眼光投向無生命與自然的物體，希望從中明白事物在理論上的本質。<sup>38</sup>霍頓各種論點中的細節一直飽受爭論，但是他的論文破除了「理論」只發生在某些社會中的這種觀念，並為日後成果豐富的非洲科學實踐研究如自然療法奠定了基礎。<sup>39</sup>

總而言之，對傳統科學定義的挑戰打破了被視為正常的觀點——科學的實踐者是受過專業化教育在舊式實驗室中工作的男性。在某些時候，這樣的人確實存在、聚集、彼此合作和聯絡，但是歷史學家認為，科學的世界比起我們曾經相信的還要更廣闊和多樣。在近代早期歐洲，科學是在皇室和貴族宮廷中進行的，對科學有特殊造詣的人(virtuosi)為了讓其贊助者明白，所以在那兒「展演」他們的發現。例如，伽利略在吃飯的時候大聲朗讀他的作品給其庇護者梅第奇家族的柯西莫大公(Grand Duke Cosimo II de'



Medici) 聽，並且將他最近發現的木星衛星作為禮物獻上，並將其命名為「梅第奇之星」(Medeccan Stars)——這位著名天文學家的地位、事業和生計皆仰賴於替他的贊助人生產出科學成果，而他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便深受此事實的影響。<sup>40</sup>「科學」也出現在工匠和藝術家的工作坊中，他們對自然世界仔細審視，以求用極為逼真的繪畫、素描和雕塑來重現它，同時科學也出現在統治者和富人收藏了許多自然和人造奇景的「珍奇櫃」(Cabinets of curiosity) 與私人博物館中。<sup>41</sup>總之，科學不僅僅是由學術團體中的學者們所生產的，同時也是被各種具有非常具體的需要和目標的人們實踐著——在宮廷中表演、為了讓富有的朋友們留下深刻印象、燒製一個精巧的陶器，或者是就妻子和家人的貢獻而言，他們也提供了各式各樣未受到重視的協助。<sup>42</sup>它涉及身體以及頭腦，並且同時仰賴著實踐和理論。當然，科學總是以物體 (objects) 為中心，從最簡單的藥水瓶到波以耳式機器，再到長度長達數英里的粒子對撞機。

## 新物件史

半個世紀前，「物件」很少出現於學院派史學家的著作中。家具、服裝、餐桌、廚具以及食品是考古學家、古文物專家和業餘愛好者的領域，他們擅長查明陶器的日期、

鑑別出扶手椅的風格，或者是要耐高度高的朋友們嘗試一種中世紀的食譜。除了考古學組成了自己的學科，並且替歷史上較缺乏文本資料的領域創造出材料以外，大部分的歷史學家皆忽視物質文化研究，將其斥為是博物館館長以及古裝劇服裝設計師的領域。在最好的情況下，過去的物件也許能帶來些趣味，但是大多數的時候則被視為是瑣碎的老派社會史，長久以來只關注像是驛馬以及夜壺這些東西的細節。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的「新社會史學家」也不關心這些事情：他們書寫（男性）工匠、農民和奴隸的故事，並把注意力放在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身上，尤其再將此時代對消費文化的深刻懷疑納入考量：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新左派史學家研究的世界觀中，生產代表著真實，而購物——有錢人和誤入歧途的婦女之消遣——意味著異化。

歷史學家是如何開始關注事物的真實面貌，而不再只注意被其斥為帶有當地色彩的微不足道要素？這個故事可以用孔恩的風格來講述：一些研究隨著社會經濟史的興起相應而生，而在某些脈絡下，物質文化變革之重要性完全無法被忽視，並且需要一個新解釋典範。學者在研究像是十七世紀的荷蘭和十八世紀的英格蘭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時會遭遇到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消費品騷亂，也就是西蒙·夏瑪 (Simon Schama) 所謂的「富人的困窘」，並開始提出十八世紀「消費革命」的論點，將其與當時的政治上和工業上的革命相提並論。<sup>43</sup>婦女史和性別史無疑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性主義學者堅持認為私人空間一如公共世界受到了社會與政治的影響。受文學理論影響的文化史學家，從同行的詞

彙中引入了「展演」(performance)和「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等詞語，並透過這些詞語指出，過去社會中的人們所選擇的裝飾與服裝，對其身份認同的重要性就跟收入與職業一樣。<sup>44</sup>最後，物質文化的研究在一九八〇及九〇年代時逐漸變得重要，因為此時歷史學家漸漸不再相信像「階級」這樣的巨大抽象信仰能作為解釋社會關係的關鍵。從有形的東西做為開始，無論是咖啡、布料、餐具和壁紙等消費品，或是自己在家中生產的物品像是棉被或是衣服，這些都為探索各式各樣社會關係提供了極具發展性的方式，而毋須將研究對象強塞入先入為主的解釋模式中。簡言之，這是一種研究社會史的新方式。

物件可以訴說出什麼故事？研究歐洲的歷史學家一致同意十八世紀是一個分水嶺：你只需要比較版畫或油畫中所描繪十七世紀上層階級以及一個世紀後相同階級的住宅內部之差異，前者是零星的大家具和古怪的掛毯，而後者的擺設變成軟墊扶手椅、豐富多彩的壁紙和大量的小裝飾物(knickknacks)，你就會察覺到至少對那些生活不虞匱乏的人而言，人類的物質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關於此變化的可能原因已經被不斷地爭論和分解過了，從盜器製造商約書亞·瑋緻活(Josiah Wedgwood)在製造和銷售上的天才，到不斷擴張的殖民地貿易的影響，使得舊大陸被淹沒於新「奢侈品」之中，再到存在著一場早期「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想法，其主張這場革命促使人們不再使用自製的產品，而是透過更賣力工作來購買消費產品。<sup>45</sup>就消費而言，其原因與結果眾所皆知極難區分，不過十八世紀的人很肯定地將消費革命與傳統地位階層制崩壞連結起來。例

如，從對十八世紀的法國遺囑紀錄的研究表明，該世紀末的中上層工人階級婦女與數十年前相比擁有了更多的衣服；他們的衣櫃當中不再只有裙子、襯裙和背心，現在還包括了連衣裙，這讓她們的穿衣風格更接近於上層社會的女性，而且她們擁有像是絲襪等產品，這對過去世代的人而言根本無法想像。在法國和其他地方，時尚的含義逐漸轉變，從強調服裝作為階級的象徵，像是貴族男性跟女性一樣都以蕾絲與緞帶來盛裝打扮，轉變為僅屬於個人(在法國則是全民的)風格的表達，且與女性連結性更高而非男性。<sup>46</sup>

歷史學家已經闡明，消費品、消費文化和行為為具有政治和社會層面上的意義。例如，科林·瓊斯(Colin Jones)就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社會性起源位處於一個「大購物鏈」中，這指的是十八世紀新商品的消費者網絡，他們都參與了市場中平等式的互動關係。同樣，布林(Timothy Breen)將美國革命的起源追溯到一七六五年抵制英國商品時動員所展現出來的力道，而這些商品先前對於殖民者的生活至關重要。<sup>47</sup>麗薩貝斯·科恩(Lizabeth Cohen)從不同的脈絡中指出美國二戰後數十年的消費熱潮，過去屢被政客和商界領袖稱頌為美國平等主義典範，實則是掩蓋了高度分化的市場之騙局，白人男性在這個市場中從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和新稅法中獲取了不成比例的回報。<sup>48</sup>

除了消費行為的政治根源和後果在不同時間和地點上存在很大的差異，獲取和「消費」商品的意義也是如此：歷史學家將強化等級制度的舊式購置與使用模式——取得與運用各種東西來維持地位或參與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和較新的消費文化區別開

來，而商品在新的文化中被認為可以改變身份（這輛車會讓我變得性感！），消費者慾望完全不受控制的潛力則不斷地被廣告專業人士所操縱。<sup>49</sup>

迄今為止所提到的歷史研究都把商品視為一個整體：即使它們提供的是關於服裝、家具和人們日常習慣的鮮明細節，不過他們試圖去理解缺乏、擁有以及甚至杯葛某些商品的累積性影響力切入，而是要從一個特定物體著手，並且試圖重建那個製造出它的社會世界呢？這個類似於博物館館長所採用的方法，已經被一些歷史學家採用，最著名的也許是烏爾里奇（Laurel Thatcher Ulrich）在二〇〇一年的著述《手織物的年代：一則美國神話的創造中的物體和故事》（*The Age of Hometown: Objects and Stories in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Myth*）。烏爾里奇的書圍繞十幾個特定的物體組織而成，從一六七六年（一個印地安人的籃子）直到一八三七年（一個未完成的長襪），其研究包含了從博物館展示品旁的簡短說明到越來越廣泛的背景脈絡。例如，在一八四二年被贈予給羅德島歷史學會的印第安人的籃子，上附有一張解釋紙條寫道，它是在十七世紀末期由一位心懷感恩的阿爾岡昆女子給予一名軍營守衛迪納·芬納（Dinah Fenner）的禮物，作為其贈送牛奶的謝禮。烏爾里奇對捐贈者家族歷史所辛苦完成的重現，除了揭露出了在此籃子的官方敘事中透露出真相的不對勁之處（為何一個來自乳糖不耐症族群的人要來乞求牛奶呢？）也將此籃子，其原料包括樹皮、羊毛和玉米殼，與英國和阿爾岡昆在編織習慣上的交會連

結起來，此外也將其與更大的歷史背景連結起來：迪納的家族在殖民者佔領羅德島以及菲利普國王戰爭<sup>⑤</sup>（King Philip's War）等等暴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簡而言之，此籃子將美洲原住民的歷史和英國的殖民地歷史編織在一起，並且傳到我們手中時，當中伴隨著一個女性如何調解衝突的敘述，並掩蓋了男性暴力的故事。<sup>50</sup>這籃子與烏爾里奇書中的其他物件構成了展示不同手工藝品的陳列室，從一八五〇年代開始的複雜歷史在其中被壓縮入「手織物的年代」的神話中，這個神話就是對殖民地時期美國女性從事手工業的美化，其被作為要舒緩工廠開始出現還有婦女離家工作這些現象的對應產物。烏爾里奇總結說：「手織物的神話仍然存在，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忘記貪婪和戰爭作為美國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們不僅捏造了他們做了什麼工作和他們作了什麼選擇的歷史，也捏造了

⑤ 譯注：為了安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退伍軍人（當時稱為G.I.），美國國會在一九四四年通過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給與退伍軍人各種福利。這些福利，包括了由失業保險支付的經濟補貼、家庭及商業貸款，以及給與高等教育及職業訓練的各種補貼。

⑥ 譯注：菲利普國王戰爭，也稱為梅塔卡姆（Metacomb）戰爭，一場發生於一六七五至七六年間在美洲原住民與新英格蘭英國移民之間的戰爭。這場戰爭得名於美洲原住民的領導者梅塔卡姆，他在英文中被稱為菲利普國王。

他們選擇要記住什麼的歷史。」<sup>51</sup>

迄今為止所提到的所有以事物為中心的歷史都將物體視為物體來研究。人類製造出商品後，然後使用、出售、交易、展示、垂涎這些他們創造出來不具生命的東西，或者是講述有關它們的故事。但是，歷史學家最近一直在問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有一種方式嗎？當今我們日常生活中智能設備的日益增長，不斷地刺激我們去思考人與非人之間的界限，並且思考事物是否能夠以及如何影響甚至形塑他們的創造者。食物的歷史是在此思路中饒富成果的研究領域之一，它屬於「物件」當中相當特殊的一類，因其自然與文化相互參半。食物在物質文化史中有自己的獨特地位，它是一種無處不在而且不可或缺的商品，其中具備了文化意義，既是必需品也是奢侈品；有著轉瞬即逝的本質，因為在以最親密的方式消費完後它便會消失。<sup>52</sup>正如我們被胃部制酸劑的商業廣告所提醒的，用餐者們正遭受到他們的披薩或義大利麵的攻擊（「你最喜歡的食物是否在傷害你？」）食物是一種至少可以在我們的身體上半獨立行事的商品，使我們變胖或不舒服，塑造我們的口味和渴望。

在馬西·諾頓（Marcy Norton）樹立里程碑的論文〈品味帝國〉（Tasting Empire）中，她歷史化了食品對身體造成之效果如何影響人類文化。諾頓問道，最初大多數的歐洲人都對這種在他們家鄉沒有的食物口味避之唯恐不及，那麼究竟歐洲人是如何接受並最終開始渴求來自中美洲的巧克力？<sup>53</sup>傳統的答案是，西班牙人在美洲和他們的母國，透

過消去當地香料和加糖來「校正」這個陌生的食品。只有當巧克力被歐洲人的味蕾所接受時，西班牙人和其他人才會迷戀它令人上癮的刺激性質。這個關於巧克力的傳播版本最初是被十八世紀的西班牙編年史明確有力地表達的，但根據諾頓的說法，它經不起仔細的推敲。在新世界的西班牙人是在印地安人為多數的環境中碰到巧克力的，而且介紹消費可可的物質文化給他們的是以女性為主的僕人們。在家裡和公共場所，他們學會了用當地的方式來飲用——熱的、冷的或室溫，有時與玉米混合，並用蜂蜜和辣椒調味，有時將飲料上方加上泡沫（由可可糊和水的混合物從一個容器倒入另一個容器時所產生）。在一些特別的場合中，像是在不同修會的建築物中印地安人與歐洲人會相互遭遇，此時他們會從特殊的容器中像是為了特殊目的而製造的漆葫蘆吸取飲料。

西班牙士兵、水手和司鐸將巧克力帶回到母國，並以中美洲流行的方式來準備和食用這些巧克力。諾頓寫道：「巧克力在歐洲傳播的頭幾年，印地安人和伊比利人消費的巧克力類型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歐洲巧克力不只是類似於美洲巧克力，而根本『就是』美洲巧克力。」<sup>54</sup>即使西班牙人接受了這種飲料，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擔心與美洲偶像崇拜的聯繫會引誘他們的同胞相信異端，並且將他們誘入新世界克里奧人（creoles）的文化墮落之中。總之，儘管傳統觀點認為歐洲人控制和支配了巧克力，並且以他們的品味馴服了它，諾頓認為在她述說的故事中巧克力「印第安化」了其消費者，正揭示了殖民主義在原住民文化面前的脆弱。在這種情況下，口味的傳播方向與預期的相反：「從被殖

民者到殖民者，從『野蠻』到『文明』。」<sup>55</sup>巧克力的複雜歷史不僅涉及兩個世界之間的相遇，還牽涉到文化藉由食品如何能夠透過身體經驗來移動，而且是以半獨立在人類意志外的方式，巧克力的複雜歷史在這種情況下打亂了既定的上下階層。諾頓將味覺視為一股具有自主性力量的分析，是物體在歷史中可以作為主動能動者這個具普遍效力之論點的具體例子。比如皇帝頭上的皇冠，或者結婚儀式上交換的戒指等儀式物品，都會改變一個人的身份。在可移動式的形式被發明之後，書籍和報紙的作用不僅僅是傳達娛樂和資訊，正如班奈迪克·安德森指出的那樣，它們也創造了一種與其他讀者之間有種類親屬關係的感情，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玻璃窗強化了人們對於公共和私人世界之間分隔的感受。<sup>56</sup>人類一直設計出影響男男女女如何看待周圍世界的物品。例如，從十五和十六世紀開始，歐洲人創造出越來越精確和美麗的鐘錶，這種成為菁英生活中心的物品；反過來，鐘錶使人們特別像是哲學家 and 科學家，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自然，到了習以為常地將人類和動物的身體以及宇宙本身描述為像鐘錶一樣運作的程度。研究鐘錶與觀念彼此之間的關係，正如潔西卡·李斯金 (Jessica Riskin) 所指出的，需要一種能將思想史與物質文化連結起來的方法：一些有形的物體「與思想是分不開的，因為人們不斷地用它們作為思考的模型和例子，而且相應地會以（言明或未言明的）哲學原則為基礎設計與打造機器。」<sup>57</sup>

無論我們是從更為傳統的前提出發，即事物是人類創造力的產物而且完全在我們的控制之中，或者是冒險地使用不太熟悉的概念，即物體能夠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製造者。我們的預設想法一直都是，人類及其物質創造物都屬於「文化」領域。相反地，對於包括動物世界在內的自然環境而言情況並非如此，在沒有人類的情況下，它們顯然可以繼續存在並且繁盛發展，如果不受干擾的話，就會在與人類的時間觀念無法相互比較的時間領域中演化。

### 自然和其他非人類行動者

「歷史」這個詞包含了一個未言明的限定詞：學院的歷史學家實際上是在「人類歷史」的系所工作，這個學科從其成立以來便與「自然歷史」（在自然環境中研究自然生物）有著未言明的差異。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對自然界的霸權被視為理所當然；在西方文化中，這是來自上帝在《創世紀》的命令，人應當「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sup>58</sup>自然界作為一個從屬領域和人類具正當性可支配對象的聖經觀點，在十八世紀開始逐漸為從盧梭到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等作者們所清楚表達的浪漫主義傳統所取代，自然世界被這個傳統奉為是取代人類墮落的有德之物。正如安德魯·艾森伯格 (Andrew Isenberg) 所指出的，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

大多數的學者都將「和諧、自我調節」的大自然，與「充滿算計、不斷變化」的人類世界嚴格地區分開來。這種對被動、不變的大自然的理想化，以及將其抬高到受害者的地位，是催生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最早的環境史著作的原因。自然世界長久以來作為人類活動的背景幾乎不受人們注意，最初是以容易遭受人類傲慢和貪婪傷害的物體被載入史冊的。<sup>59</sup>

所謂「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研究領域最初成形於美國——一個其起源神話懷繞著對大自然的征服的國家。在十九世紀的美國，述說一個國家是從無畏艱苦地開拓荒野誕生的，這種透納風格的勝利主義式(triumphalist)歷史，跟影響力日增，記錄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性影響的衰敗論(declensionist)歷史相互拮抗，此種歷史並與約翰·繆爾(John Muir)和奧爾多·李奧帕德(Aldo Leopold)等早期自然保護主義者的努力趨於一致。<sup>60</sup>此領域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其現代形式面世至今，在持續地與環境保育這個特定的政治主張密切聯繫的程度，皆遠多於其他的歷史領域。或許大多數環境史學者都支持環保主義者的目標，但是隨著環境史發展得更為複雜之後，根據有影響力的評論者所言，該領域不再具有某些原初的政治主張，並拋棄了一些浪漫的願景。<sup>61</sup>例如，西方人和資本主義要替不顧後果地耗盡自然資源負起所有責任這種說法，在這個領域甫建立的時期受到大力擁護，不過卻經不起仔細的檢驗。雖然高人口密度和工業化無疑對自然造成的傷害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嚴重，但是研究成果也展現出，以美洲原住民為例，若

是有機會能夠過度捕撈和捕獵，他們是完全不會猶豫的；印地安人對動物輪迴的信仰，實際上有可能會鼓勵對野牛等動物欠缺思考的大屠殺。<sup>62</sup>環境史並沒有要小看歐美文化在具體層面上長期以來所導致的全球性掠奪的規模，不過他們目前也嘗試要擺脫猶太—基督教的規範與其他文化的規範相比，在本質上就是對於環境更加惡毒的這種論點。<sup>63</sup>

環境史領域雖然依然保留著多數的政治性色彩，近年來則因為，一如保羅·薩特(Paul Sutter)所說的「將大自然作為一種分析類別的困難性」，而在分析上愈趨複雜。早期的研究作品假設了「自然」與「文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分別，而且當前學術界中大多數的人已摒棄了有一個純粹且不受污染的大自然存在著這樣的神話，而傾向贊成「所有環境都是混合而成」這樣的論點。薩特寫道，像是第一代環境史學家便會將美國西部的一座河流大壩的建設描述為一種具破壞性的支配行為，「第二代學者則更有可能將這種干預描述為創造出了河流的『第二天性』……一個『有生命的機器』」。透過將人與自然的關係視為「混融的」(hybrid)或交互的，讓環境歷史學家們得以「用不斷擴張的邊疆地帶來取代自然與文化之間的森嚴邊界。」<sup>64</sup>例如，用「環境」指稱「自然」的這種假定，便遭遇到城市環境歷史中不斷茁壯的子領域的嚴重挑戰，這些子領域歷史致力於闡明自然環境與城市彼此互相形塑的方式，或者是要闡明對於不同階級的人群而言，都市的具體環境如何在社會層面上發揮了不公平的影響力。<sup>65</sup>

環境史將自然世界從曾經只是作為人類活動的純粹背景給解救出來，同時提出了關

於人類與自然關係中的權力和能動性等種種耐人尋味的問題。與本章討論的其他「何物」不同，自然並不是人類活動的產物，而且我們的自然環境既脆弱同時又具有恐怖的威力（例如地震、陷入混亂而相互蹂躪的牲畜、微生物）。因此，在環境史的各種定義中大部分都強調人類與自然之間不斷變化且相互影響的關係。用麥克尼爾（J. R. McNeill）的話來說，「環境史懇請眾人去認識，大自然除了存在著以外還在不斷地變化。此外，它不僅改變了自身樣貌同時也改變了人類的行為，而且在這麼做的同時也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脈絡。」<sup>66</sup>

對於該賦予人類還有大自然各自多少程度的能動性，不同的當代經典環境史著作之間存在著相當的歧異意見。此領域早期的作品因受生態保護行動的啟發往往會強調人類活動的有害影響。即使是最細緻的學術研究，像是威廉·葛隆納（William Cronon）著名的著述《土地變遷》（*Changes in the Land*，一九八三年）也是如此，這本書敘述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人取代美洲原住民成為新英格蘭環境的統治者之後，這樣子的變動對環境造成了什麼影響。

歐洲人大幅改變了新英格蘭的生態，尤其是透過大面積砍伐森林。即便如此，葛隆納並沒有將此描繪為惡棍與受害者的故事，他述說這個故事的方式是，將其視為從一種文化習俗到另一種文化習俗的轉變來分析，同時也分析此轉變對當地環境的影響。

美洲原住民以每季遷徙至能夠取得最多食物的地方，來面對季節變化：當魚類產卵時聚集在瀑布周圍，在狩獵的月份則四散至較大的區域，在某些情況下則在某地停留以種植作物。與其歐洲對手相比，印地安人不那麼關心儲藏食物，他們自豪於自己能夠一連好幾天不進食的能力，這種在飢餓水平線生存的能力，既限制了人口數量，又弔詭地確保了相對豐裕的生活。當歐洲人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們基於以下幾種因素改造了土地：他們的定居習慣和對財產權的理解，他們在道德和經濟思想上對土地「改善」的信念，以及他們將自然產品視為商品而不是資源的取徑。<sup>67</sup>來自不同文化人類的到來不僅導致了原本遠離於此的動植物物種的輸入；它還涉及到一系列相關的文化和生態變化，葛隆納寫道：「豬不只是一隻豬而已，而是一種必然與像是籬笆、蒲公英以及某種對財產的特殊定義等其他事物連結在一塊的生物。」<sup>68</sup>葛隆納在講述一個由人類能動性所引發的故事時，歐洲人到達他們稱為新英格蘭的地方，他謹慎地強調人與大自然之間不斷變化、相互影響的關係。例如，森林砍伐影響了季節性的空氣和土壤溫度、改變了樹木和動物物種的數量、造成了洪水和乾旱，並且創造出了沼澤——包括這些在內的所有改變都深刻影響了人類生活。<sup>69</sup>

與其他許多環境史研究一樣，葛隆納的早期經典作品以人類的事件開頭來講述一個文化相遇的故事。在風格光譜另一端的著作則主張，物質環境完全決定了居住者的命運。例如，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在一九九七年問世後，因為帶有清晰且引人入勝的風格以及

具爭議性的論點，所以在銷售上極為成功。雖然富有爭議性，但戴蒙的暢銷書是正經的學術研究，嘗試回答為何歐亞大陸上的社會在現代主宰了世界其他地方。他問道，「為什麼不是美洲原住民、非洲人和澳洲原住民去摧毀、征服、或消滅歐洲人和亞洲人？」<sup>70</sup>戴蒙在其針對文化或遺傳優勢理論的細膩反駁中，主張歐洲人與亞洲人在地理與環境上是幸運的。歐亞大陸作為地球上最大的東西向陸地，多數地區皆位於溫帶，其上有著極為豐富的動植物物種；而隨著人類趨於頻繁地在此大陸上流動，動植物的物種數量也隨著不斷增加。由於有著地球上最具有效能的營養（草地上具有從地中海地區傳布至全歐亞大陸的大量可儲藏種子），人類和動物在比鄰而居的情況下都還能夠繁衍茂盛。人類因此發展了對天花、麻疹和流感等病毒的抵抗力，這些病毒日後在進入其他大陸時便表現出其致命的威力。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密度的不斷增加使得歐亞社會發展出諸如常備軍這樣的專業單位（一如書名中的「槍炮」和「鋼鐵」），這給予他們更多的優勢。簡而言之，你不需要基督教、資本主義或中國式的工作倫理，遑論去假設白種人或亞洲在基因上具有優越性來解釋歐亞大陸的支配地位。雖然很多人質疑這種赤裸裸的環境決定論，但是像戴蒙這樣的論點亦有助於讓我們去關注物質環境在歷史上所發揮的力量，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幫助我們擺脫視人類為中心的傲慢。

有些方法強調人類活動如何影響大自然（其會以難以預測和控制的方式作出反應），而有些類似於戴蒙那樣的研究則強調地理學和生物學的重要作用，有些歷史解釋折衷於以上兩者之間，它們同時兼顧到了人類與自然的能動性，雖然有時候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來強調後者。克羅斯比一九八六年的《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已成為表述其論點廣為人知的經典作品。不同於戴蒙，克羅斯比從歐洲企圖征服其他世界的慾望出發，但是尋求解釋為什麼它能夠在重重不利的條件之下勝出：「歐洲移民及其後裔遍佈世界各地」，他寫道，「這需要有個解釋。」<sup>71</sup>歐洲人曾經嘗試過佔領許多地方但是並未成功——維京人對格陵蘭虎視眈眈，十字軍曾佔據了聖地、狂熱的帝國主義分子試圖殖民非洲和加勒比地區——不過他們只有在克羅斯比稱為「新歐洲」的地方獲得大規模的成功：這些地方的氣候類似於舊世界而且人口密度低，像是北美洲和南美洲南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雖然最初為數不多的歐洲探險家和征服者，在人數上遠遠不及當地的戰士，但是他們帶著無形而且完全無法被抵抗的生物盟友一同到來：雜草、不斷繁殖的牲畜（如兔子和豬隻）等，以及最為關鍵的病原體。歐洲人和他們的「生物群」（portmanteau biota）抵達北美、澳大利亞東南部、巴西和阿根廷，將他們眼前可見之物清除得一乾二淨。當地的植物完全無法抵擋富侵略性的歐洲禾草的快速進軍，脆弱的南美駱馬將大草原拱手讓給了牛隻以及馬匹，而且當地到彼時為止與世隔絕的人們都死於歐洲斑疹傷寒和天花。有好幾個世紀，正如克羅斯比所說的，蒲公英帝國的太陽都不曾落下。<sup>72</sup>簡而言之，如果我們不將歐洲人的非人類盟友的作用納入考量，新世界被舊世界征服和殖民的故事就會是無法被理解的。



麥克尼爾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是描繪歷史上非人類能動者的最傑出作品之一，本書追蹤了那些微小而且時常會要人命的生物在十八世紀晚期加勒比地區地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儘管作者告誡道，他的書「不是一種對蚊子決定論的嘗試」，當一位讀者認識到埃及斑蚊在這個時代與地區的權力鬥爭中發揮了多麼重要的作用後，這會讓這個人類感受到自己的微不足道。<sup>73</sup>該物種的雌性帶原者，而且大多數是致命的黃熱病（當時稱為「黃色傑克」[yellow jack]或「黑色嘔吐」[black vomit]）的載體。大西洋貿易以及在近代早期加勒比海的港口和甘蔗種植園，非比尋常地適合埃及斑蚊生長。船上有許多積水的容器、用來瀝乾糖的陶土容器提供了理想的食宿地點，成群居住以及駐紮不動的士兵、契約僕人與奴隸提供了這些昆蟲豐盛的「血色大餐」。這些微小的致命疾病帶原者持續存在，因此與人類的旅行、戰爭和種植園農業等活動密切相關，但是它們所造成的破壞對不同人群卻有著不同影響。

蚊子活動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乃是根源自麥克尼爾所說的「免疫力上的差別」：較早暴露於黃熱病的先至者具備了抵抗力，因此比起易受傷害的後之來者具有優勢，特別是當他們能夠操縱相互遭遇的狀況之時。例如，西班牙人在整個十八世紀整體上處於弱勢地位，他們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受到英國和法國等雄心勃勃的競爭對手的威脅。但是，他們不僅建立了對這種疾病的免疫力，而且沿著航線在各戰略要點上，包括哈瓦那(Havana)、聖胡安(San Juan)、卡塔赫納(Cartagena)等地，建造了令人生畏的石造

堡壘。西班牙人的經驗讓他們明白，如果防禦工事能夠阻擋一支來襲的歐洲軍隊，讓他們停留在海灣上不動達一個月或更長時間，那麼疾病便會替他們進攻。而且不出所料的是：在一七四〇年代初期派往加勒比地區的英國士兵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死亡，但只有百分之六的人死於戰鬥；從北美洲出發的部隊總體傷亡人數是百分之六十五，但只有百分之三是死於戰場。在一七六二年的哈瓦那圍困戰爭中，死於「黃熱病」的英國軍人，其數量要高於在英軍於七年戰爭期間在北美洲死亡的總人數。<sup>74</sup>儘管母國的國力不振，但多虧了他們的昆蟲盟友，西班牙人得以維持住他們的帝國。蚊子不只改變了戰爭的進程，也改變了革命的進程，因為像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和西蒙·玻利瓦(Simon Bolivar)所領導的殖民地叛亂軍隊，在戰術上即利用了敵人對黃熱病的脆弱性。在麥克尼爾的故事中，大自然——讓它們得以蓬勃發展的不只是蚊子，還有天氣、農作物與人類的身體——具有塑造國際關係的力量。

⑦譯注：蒲公英原產歐亞大陸，被人工引進到美洲和澳大利亞。因為生長力非常強，入侵並佔領了當地原有物種的生存空間。所謂的日不落指的是歐亞大陸的國家佔領了許多地方，因此在他們的領土中總有地方的時間是白天。

麥克尼爾關於蚊子歷史作用的探索讓我們回想起，本章所描述的所有學術潮流都動搖了甚至是徹底地破壞了各種傳統「人文主義」的信條，這種信條曾被以一條存在鏈的觀念來呈現，人類在其中是精神界與物質界的仲裁者，並且鶴立於生物界等級階層的頂端。仍在茁壯的動物史領域一路追蹤著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多樣和不斷轉變的地位：獵人與獵物、被飼養、被屠殺、遭懼怕、被馴化、被保護、被崇拜。<sup>75</sup>（在過去的很多例子中，「高等」動物，比如獵人和戰士的獵鷹、獵犬和戰馬，比起「作為奴僕」的人類享有更高的地位。）<sup>76</sup>動物史家已經闡明，透露出作為「人類」在過去以及現代究竟代表些什麼的，不僅關乎我們人類物種的勝利和罪惡外，同時還有將我們與其他生物之間分開的不穩定且充滿情感的界限。總而言之，我們似乎正在努力實現威廉·葛隆納的期望：「總會有一天，歷史學家在寫作的時候，不再會以為要理解人類與他們的社會，可以只去考慮人類而不去提及自然系統，不去承認跟我們共同在這個星球生存的其他生物存在。」<sup>77</sup>

反對人文學科傳統正典中的人過去經常嘲笑老式的課程當中只包含了「死去的白人」或「面色蒼白的男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歷史學家的研究主題依然是逝去的人，不過例外確實存在，許多其他的人物已經在過去的幾十年之間加入了白人的行列。歷史的「何者」已延伸到了過去社會中所有可以被想到的行動者群體，這是一種帶來豐富成果的擴張，激勵了歷史學家提出不同的問題和去找出不同的史料。白人男性不斷地被往舞台的

邊緣之處推去，因為史學家改變了理解「何處」的框架，從大陸變為海洋、從民族國家到邊疆地區、從單一地點到跨國性和全球性的廣闊區域，以上種種都對歐洲中心主義提出挑戰。最後一點，「男性」之所以不再獨佔眾人關注的焦點，不僅僅是因為女性起來爭取她們在歷史中應有的位置，更是因為，正如本章所表明的，將精神在上、物質在下這種舊有階級關係打破的富有成效的作法：偉大的思想和創見被拖曳進了充斥著事物、身體、社會地位和野心的現實世界，而且我們現在認識到，不管是什麼地方，物品、食物、動物和自然環境都受到人類的影響，但是同時也一直型塑著人類的生活。一場類似的動盪已經徹底改變了此學科中最傳統的主題之一——宗教的歷史。宗教史在過去多集中於宗教組織、宗教領袖和神學爭議，目前其將視線轉移到信徒的生活上，而且在很久以前便將社會史和文化史中的思潮揉合入其中；與此同時，由於大多數的信仰皆相信肉身經歷（禁食、獨身、疼痛，還有聲音、景象和氣味）是宗教體驗的入口，宗教史家因此一直走在對於在過去社會中非物質性經驗的具體環境研究之最前端。<sup>78</sup>

也就是說，許多或甚可說是大部分的歷史著作仍然以傳統主題為中心，並且以老套的方法來進行研究：在學術界內外，政治、軍事、外交和思想史仍然蓬勃發展，即便因為一九六〇年代以降的各種發展，所有這些領域都已經歷經了帶來豐富成果的爭論了。作為一個群體，歷史學家在本質上是尊重過去的，這包括了在其各自領域中還有在歷史學中的過去研究成果，他們不願意因噎廢食為了要淘汰過時的問題和方法，而將堅實的

研究成果一併拋棄。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相比，歷史學家更傾向去抵制極端追逐最新學術潮流的蠻橫行為。正如本書導言所指出的那樣，歷史研究可以包容幾乎所有的主題和風格；然而在另一方面，歷史探索卻也時常集中於某些時代，並且環繞著特定的主題、問題和爭議。為了要去探討歷史研究的性質和活力，還有寫作背後的問題和困境，讓我們進入本書的第二部分。

## 注釋

1.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Peter Putnam (New York: Vintage, 1953), 26. 中譯本：馬克·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1989年）。
2. 此重新定位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發生於一九八〇年代，當時法國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和喬治·杜比（Georges Duby）所領導的團隊，寫作了五卷《私人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一九八五年），旋即就被翻譯成了許多語言。中譯本：菲利普·阿利埃斯、喬治·杜比著，李群等譯，《私人生活史》（全五冊）（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7-2008）。
3. Arthur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6); E. M. W. Tillyard, *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3); Paul Oskar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The Classic, Scholastic, and Humanistic Strains*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61). 中譯本：諾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鄧曉芒、張傳有校：《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南昌：江西教育，2002）。
4. Arthur Lovejo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 (1940): 7.
5. Lovejoy, *Great Chain of Being*, 3-5. 關於洛夫喬伊方法論的優秀探討，請參見William F. Byrum,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fter Forty Years: An Appraisal," *History of Science* 13 (1975): 1-28. 另見Darrin McMahon, "The Return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5-16.

<sup>9</sup> Frank Manuel and Fritzie Manuel,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Darrin M. McMahon, *Happiness: A Histo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McMahon, *Divine Fury: A History of Geniu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Sophia Rosenteld, *Common Sense: A Political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譯本：達林·麥克馬洪著，陳信宏譯，《幸福的歷史——人類最捉摸不定卻又渴求不已的目標》（台北：究竟，2007）。

<sup>7</sup>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4-35.

<sup>8</sup> *Ibid.*, 39-41.

<sup>6</sup> *Ibid.*, 48.

<sup>10</sup> 史金納——我最著名的同事為政治思想史學家波考克（J. G. A. Pocock）和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史家貝克（Keith Michael Baker）。近來，至少有一位傑出的年輕思想史學家指出了劍橋學派對嚴格脈絡主義之駁斥——些許缺點。Peter E. Gordon, "Contextualism and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McMahon and Moyn,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32-55.

<sup>11</sup> Peter E. Gordon,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ttp://projects.iq.harvard.edu/harvardcolloquium/pages/what-intellectual-history> (accessed February 1, 2016; cited with permission); Daniel Wickberg, "Intellectual History vs. the Soci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 *Rethinking History* 5 (2001): 383.

<sup>12</sup> Robert Darnton,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 Present* 51 (May 1971): 81-115.

<sup>13</sup> 例如：Haydn Mason, ed., *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1998).

<sup>14</sup> Deborah Hertz, *Jewish High Society in Old Regime Berl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Paula Findlen et al., eds., *Italy's Eighteenth Century: Gender and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e Grand Tou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15</sup> David Armitage,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eds.,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3.

<sup>16</sup> 較為抽象的「觀念」和更具體的「科學」之間的這種對比，可能造成而且也應該有許多方面的限制。整個數學領域可以說是介於觀念和科學之間，而其實踐者包括那些作品完全是抽象討論的重要科學家，如亞里斯多德以降至波普爾（Karl Popper）、湯瑪斯·孔恩和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傳統當中被加以闡述，此哲學將思想史和科學史連結了起來。

<sup>17</sup> Ken Alde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r, an Oxymoronic Theory of Relativistic Objectivit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2002), 303-9. 中譯本頁306.

18.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Edward Garfield, "A Different Sort of Great Books List: The 50 Twentieth-Century Works Most Cited in the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1976-1983," *Current Comments* 10, no. 16 (April 20, 1987): 3-7. 自本書出版以來，其關鍵術語（「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典範」〔paradigm〕／「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和孔恩本人一直是大量學術著作的討論對象。請參見近年來的作品，例如：Vasso Kindi and Theodore Arabatzis, eds., *Kuhn'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Revisit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9. Kuhn, *Structure*, viii. 「典範」的概念引發了一系列的學術討論，這是從孔恩本人所開始的，他在第二版（一九七〇年）所附的後記中，幾乎將所有的篇幅都用來澄清「典範」的意義。Ibid., 174-98。
20. Ibid., 89-90.
21. Thomas Kuhn, "What Ar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in James Conant and John Haugeland, eds. *The Road since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3-20. 頁碼頁碼20。
22. Kuhn, *Structure*, 3.
23. Ibid., 205-6.
24. Jan 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25. Kindi and Arabatzis, "Introduction," in Kuhn's "Structure" 1-12. 建構主義的持續（而且毫無領導地位）攻擊為 Paul Gross and Norman Leavitt, *Higher Superstition: The Academic Lef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 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7-9.
27. Ibid., 26-27.
28.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對於霍布斯被排擠於該協會之外原因的討論在原版第一二九～三九頁。中譯本：史蒂文·謝平、賽門·夏佛著、蔡佩君、歐立遠譯，《利維坦與空氣泵浦：霍布斯、波以耳與實驗生活》（台北：行人，2006）。
29. Ibid.，第一章，引用頁 pp. 77-78。
30. Ibid.，第三、四章。
31. Ibid., 332.
32. 這個價例如何產生的故事是由另一個值得信賴的學者所敘述。Anthony Grafton, *The Footnote: 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中譯本：安東尼·格拉夫敦著、張強、王春華譯，《腳注趣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33.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中譯本：史蒂文·夏平著、趙萬里譯，《真理的社會史》（南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34. Theodore Porter, *The Rise of Statistical Thinking, 1820-19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orter,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35</sup>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sup>36</sup> Richard Westfall, *Force in Newton's Physics: The Science of Dynam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donald and Co., 1971); Betty Jo Teeter Dobbs, *The Foundations of Newton's Alchemy or "The Hunting of the Greene Ly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Dobbs, *The Janus Faces of Genius: The Role of Alchemy in Newton's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37</sup> Robin Horton, "African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Western Science, Part I: From Tradition to Science,"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37, no. 1 (January 1967): 52.

<sup>38</sup> *Ibid.*, 64-66.

<sup>39</sup> Steven Feierman, *Peasant Intellectuals: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anzani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David Schoenbrun, "Conjuring the Modern: Durability and Rupture in Histories of Public Health between the Great Lakes of East Af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2006): 1403-39.

<sup>40</sup> Mario Biagioli, *Galileo, Courtie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sup>41</sup> Pamela Smith, *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aula Findlen, *Possessing Nature: Museums, Collecting and Sci-*

*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Helmar Schramm, *Collection, Laboratory, Theater: Scenes of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sup>42</sup> 關於女性和其他「被忽視的技術人員」的工作，請參閱 Shapin, *Social History*，第八章。

<sup>43</sup> Simon Schama, *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New York: Knopf, 1987);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1982);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Routledge, 1993).

<sup>44</sup> 來自於歷史領域以外的具有重要影響力作品包括：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and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中譯本：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联書店，2009）。

<sup>45</sup> McKendrick, Brewer, and Plumb,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Penguin, 1986); Nicholas Thomas, *Entangled Objects: Exchange, 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16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譯本：

西敏司著·朱健剛、王超譯·《甜蜜權利——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sup>46</sup> Jennifer M. Jones, *Sexing la Mode: Gender, Fashion, and Commercial Culture in Old Regime France* (Oxford: Berg, 2004).

<sup>47</sup> Colin Jones, "The Great Chain of Buying: Medical Advertisement, the Bourgeois Public Sphe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February 1996): 13-40; T. H. Breen, *The Marketplace of Revolution: How Consumer Politics Shaped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48</sup> Elizabeth Cohen, *A Consumers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3).

<sup>49</sup> Colin Campbell, *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Roland Marchand,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T. J. Jackson Lears, *Fables of Abun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sup>50</sup> Laurel Thatcher Ulrich, *The Age of Homespun: Objects and Stories in 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Myth* (New York: Knopf, 2001) - 蝦 | 樟。

<sup>51</sup> *Ibid.*, 414.

<sup>52</sup> Brewer and Porter, "Introduction,"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5-6. 請參見·例如· Sidney Mintz, *Tasting Food, Tasting Freedom: Excursions into Eating, Power, and the Past*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97); Rachel Laudan, *Cuisine and Empire: Cooking in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中譯本·西敏司著·林為正譯·《飲食人類學·漫話有關食物的權力和影響力》(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瑞秋·勞丹著·馮奕達譯·《帝國與料理》(台北·八旗文化·2017)。

<sup>53</sup> Marcy Norton, "Tasting Empire: Chocolate and the European Internalization of Mesoamerican Aesthetic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in (June 2006): 660-91.

<sup>54</sup> *Ibid.*, 681-82.

<sup>55</sup> *Ibid.*, 670.

<sup>56</sup> Leora Auslander, "Beyond Word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0 (October 2005): 1017-18. 關於安德森·蝦 | 樟。

<sup>57</sup> Jessica Riskin, "The Restless Clock," in Paula Findlen, ed., *Early Modern Things: Objects and Their Histories, 1500-1800* (London: Routledge, 2013), 84-101 - 蝦 | 樟 97-98.

<sup>58</sup> Genesis 1:26, King James Version.

<sup>59</sup>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e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1983); Andrew Isenberg, "Historicizing Natural Environments: The Deep Roo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pp. 372-75 - 蝦 | 樟 374.

<sup>60</sup> *Ibid.*, 37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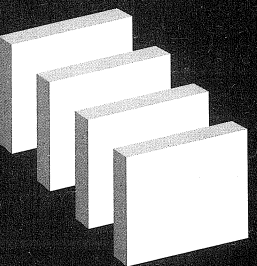
<sup>61</sup>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 [December 2003]: 34;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Polity, 2006), 94-97.
69. Isenberg, "Historicizing Natural Environments," 383-84. 關於資本主義對環境影響的一個仍然受歡迎的經典說法，請參閱 Donald Worster,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關於美洲原住民和歐陸殖民區「浪漫」的討論請參閱 Arthur McEvoy, *The Fisherman's Problem: Ecology and Law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 183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d Shepard Krech III, *The Ecological Indian: Myth and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69. McNeill, "Observations," 7.
69. Paul S. Sutter, "The World with Us: The Stat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00 (June 2013): 96.
69. *Ibid.*, 113-15. 請參閱例如：Andrew Hurley,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Class, Race,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Gary, Indiana, 1940-198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69. McNeill, "Observations," 42.
69.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2nd ed. (198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3) · 特別見錄 11 / 11 章。
69. *Ibid.*, 14.
69. *Ibid.* · 樂仁輝。
70.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15. 中譯本：賈德·戴蒙著·王道還、廖田滿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台北：時報，1998）。
71. Alfred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2nd ed. (19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中譯本：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著·許友民、許學微譯，《生態帝國主義：歐洲的生物擴張，900-1900》（高雄：遠流教育出版社，2001）。
72. *Ibid.*, 7.
73. J. R. McNeill, *Mosquito Empires: Ecology and War in the Greater Caribbean, 162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
74. *Ibid.* · 樂仁輝。
75. 例如：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itvo, "Animal Planet," *Environmental History* 9 (April 2004), 204-20; Erica Fudge, "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 in Nigel Rothfels, ed., *Representing Anima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3-18; Susan Pearson, *The Rights of the Defenseless: Protecting Animals and Children in Gilded Age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76. 請參閱 氏 | 羅威致發性性文增 · Marcy Norton, "Going to the Birds: Animals as Things and Beings in Early Modernity," in Findlen, *Early Modern Things*, 53-83.
77.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173.



78; Miri Rubin, "Religion," in Ulinka Rublack,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7-30. 兩本討論社會、身體和宗教經驗之間聯繫的傑出歷史研究為... Caroline Walker Bynum,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and Peter Brown,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TER 4  
HOW IS HISTORY PRODUCED?



第四章  
歷史如何被製作？

## 從史官到學院學者

任何人都能寫歷史。或者說，任何具備一些基本的先決條件（讀寫能力、時間以及能夠獲取書籍和檔案）的人都能夠對過去的某些方面進行非虛構的描述。在這方面，歷史在各種學術專業中獨樹一幟：它不需要設備、實驗室或詳盡的研究計畫，通常也不需要掌握高度專業化的概念或術語。廣受讚譽的通俗史學家亞當·霍奇爾德（Adam Hochschild）在許多年前這麼描述自己的方法：「如果真有種寫作歷史的新奇技巧，那麼我當然還沒有發現它。所有我試圖跟隨的建議都是非常古老的——廣泛閱讀；研究維多利亞時期英格蘭的歷史學家楊恩（G. M. Young）曾經說過，『要不斷地閱讀直到你彷彿能聽到那些人在談話。』為了追求準確而拼命。牢記你所不知道的事情還多得很。文章要寫得讓讀者放不下書本。」<sup>1</sup>生產歷史自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而且在尚未牽涉到艱難語言還有難以辨識的文件的情況就是如此。史料往往不是太多就是太少，要找出以及檢驗它們則需要想像力、獨創性和堅持不懈以特定方式結合在一塊。即使對歷史界裡最富經驗的老手而言，要能夠如煉金術一樣地將分散四堆的筆記，轉換為優美散文並非易事。然而，歷史學之所以為學院中最受歡迎的學科之一，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歷史研究和寫作的非專門化性質。歷史作為一種實踐，其在學術界內外同時繁榮發展的程度上是非比尋常的，不僅是在學術和通俗層面，而且也以「公共歷史」的形式出現在博物館展覽、紀念碑、歷史遺址等地方。

儘管通俗史學和專業史學在許多方面有所關聯，但是它們像是互相拔河一般地要將書寫過去的方式朝不同的方向拉去，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可以說其中一個方向是要創造出新的資訊，而另一方面是將歷史傳播給廣大的公眾。本章關心的是通俗、大眾以及專業史學家如何生產歷史。本章審視了過去在當代文化中被表達的各種方式，還有其中的異同之處，並且要指出所有這些呈現的背後都帶有選擇和特定觀點，儘管這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其他情況下更明顯。這一章解釋了為什麼歷史學家選擇了他們所從事的主題，以及為何學術界的歷史研究總是環繞在（就算沒有挑明）研究者之間的辯論之上。最後，本章描述了歷史寫作的基石——史料，並探討「檔案」和「文件」這些曾經被視為不存問題的概念，怎麼會變得富有爭議性。簡而言之，本章試圖解釋從暢銷傳記、紀錄片到學術專著這些歷史「產品」幕後的種種細節。以上所有形式的歷史作品如果有時引發了激烈爭論，那是因為很多人發自內心地關心過去，而且是出於很好的理由：正是爭論和分歧讓歷史學在當代世界中不可或缺而且具有重大作用的。

今日，「歷史學家」這個詞會讓人聯想到歷史學教授，但是這個連結是晚近才出現的，從開始到現在還不到兩個世紀。直到十九世紀，歷史大多是由「文人」（*men of letters*，幾乎總是男性）所寫的：他們是有錢有閒的紳士、公務員、政治家，還有那些經常同時擁有這些身份的人們。<sup>2</sup>例如現今被視為是歐洲啟蒙運動時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

法國人伏爾泰和英國人愛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 這兩位作家的生活條件都很舒適，並且是獨立於任何機構外的成功作家，儘管兩人的政治生涯皆微不足道，吉朋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國會議員，而伏爾泰則是在路易十五 (Louis XV) 宮廷短暫而不開心地擔任過皇家史官 (historiographer royal)。

在十九世紀之前，歷史學家經常以某種方式與政治世界有所聯繫。數十個世紀以來，許多著名人物都是這一行的成員，他們在從政之時或者是從政壇退休之後開始寫作歷史，這經常是理解自己學到什麼並且將成果與他人分享的一種方式。公元第一世紀羅馬的歷史學家塔西陀 (Tacitus) 寫作了他對晚近政權的記述：《歷史》(The History) 和《編年史》(Annals)。<sup>①</sup> 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官員馬基維利在一五一二年梅第奇家族重新控制了這座城市之後被監禁起來並且受到拷打，在親身經歷過政權更迭後寫下了其著名的歷史和政治學著作。政治家兼史學家的傳統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如邱吉爾在帶領著英國走過二戰和艱難的戰後時期，同時撰寫了一部多卷的《英語民族史》<sup>②</sup>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一九三七年開始寫作，於一九五六—五八年出版)。

歷史學家在過去社會中經常隸屬於統治機構下的官方職位。在中國由政府支持的歷史寫作始於公元前二世紀的漢代，在唐代時 (公元七至九世紀) 特別盛行：唐朝的皇帝在宮廷中建立了「史館」，其負責監修宮廷日誌、行政記錄和日曆，這些材料最後會被運用於該王朝的官方「國史」中。同樣在早期現代的印度，蒙兀兒王朝的皇帝僱用了數十

位文人官員，其中一些人製作朝代的編年史，另外一些人則根據不同目的記錄過去，像是起草財產權的證明文件。<sup>3</sup> 於此同時，「皇家史官」在許多前現代的歐洲宮廷中是令人垂涎的職位，這通常是由不像伏爾泰那樣喜歡抱怨與富批判性的人來擔任。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存在任何區別的前現代社會中，歷史與權力運作自然而然地連結在一塊。這時候歷史記錄的是偉大人物的生平，而民族或民眾的歷史尚未出現。

雖然許多人想像最早的歷史記錄者是在陶版或羊皮紙上刻字，但歷史並不總是以書寫的形式被記載。在古代的愛爾蘭、南斯拉夫、波利尼西亞 (Polynesia) 和貝南<sup>③</sup> (Benin)，過去的事情藉由表演者以口語形式被保存下來和傳播，他們專門敘述史詩或王朝編年史。在祕魯，以口述紀錄歷史的人運用一套名為奇普 (Quipu) 的不同長度的彩

① 譯注：塔西陀 (Publius/Gaius Cornelius Tacitus, 五十五(?)—一七(?)年)，羅馬帝國執政官、元老院元老，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修辭家，主要的著作有《歷史》和《編年史》等，從西元十四年奧古斯都 (Augustus Caesar) 去世提比略 (Tiberius) 繼位開始，一直紀錄到九十六年圖密善 (Domitian) 逝世。在寫作期間他先後任職為元老院議員以及羅馬帝國亞洲行省的省長。

② 譯注：中譯本：溫斯頓·邱吉爾著，薛力敏、林林譯，《英語民族史》(全四冊)(廣州：南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色打結繩索，作為幫助回憶有關數量以及性質的訊息之工具——不僅計算君主的在位年數，還有他是否被視為是公正或是勇敢的。在波利尼西亞和南非，歷史學家由專門的歌唱者家族擔任，他們以父傳子的方式將知識傳遞下去，每一位歌唱者都像是座會行走的參考圖書館。在這些社會中，「部落歷史口述保存者」(griots)在加冕典禮或酋長會議等特定場合上背誦歷史——例如王朝歷任統治者的順序。正如西非阿爾坎人(Alcan)的諺語，「古老的東西會一直留在耳裡。」<sup>4</sup> 歷史學家的各種社會身份以及所做的事情遠比他們一般給人的學者或隱士的印象要來得多更多。

就西方社會而言，十九世紀顯然是歷史研究事業在組織和性質上的分水嶺。美國和法國的革命不僅具體化「人民」的「國家」歷史這種觀念，而且拿破崙戰爭之後的體制動盪造成了知識組織(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的重大變化。「革命的年代」所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即為國家官僚機構的迅速擴張，因此需要有機構來培訓公務員，這種訓練包括了透過了解國家的過去來培養對於國家一種有見識的忠誠——成果便是現代國立大學的建立或擴大，其原型即為成立於一八一〇年的柏林大學。

歐洲其他國家(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的索邦大學以及義大利和西班牙的幾個學術機構皆有其中世紀的淵源)存在著歷史更為悠久的大學，但十九世紀德國大學的不同之處在於，其在相當早的時候便將全部心力投入了科學探究和民族主義這兩個強大的新理想。在十九世紀初的德國歷史學家中，最著名的是蘭克(Leopold Von Ranke)。

他以宣稱歷史學家應該要像在描述「實際發生的事情」[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一樣地來描述過去而著稱)，他認為史學家的使命除了古老大學所看重的教學外，更是要透過原創性的研究創造出新的訊息。<sup>5</sup> 前幾代的歷史學家，許多類似伏爾泰和吉朋的人們，在統整及文學的造詣上飽受讚譽，而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則渴望著要自己的學科向自然科學看齊，他們在聲望達到頂峰時，更是將「研究」視為歷史學家的中心任務。強調史料是「科學」的歷史研究中的關鍵組成部分，這種強烈的新關注於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出現，並且帶動了大量文獻集的出版，因為其被視為研究各國家歷史的骨幹：「日耳曼歷史經典作品」(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法國史未出版文獻選輯》(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以及《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紀事和經典作品》(Chronicles and Memorial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都是在 一八六〇年代之前推出的。歷史學家用這一套套大部頭的書籍向全世界宣布，他們的作品不屬於猜測性或修飾性的

③ 譯注：波利尼西亞是由位於太平洋中南部，大致在經線一百八十度以東及南、北緯三十度之間；由一大群超過一千個以上的島嶼所組成，陸地總面積一、六萬平方公里，島嶼零星分布，人煙稀疏，其中包括了像是夏威夷、紐西蘭、斐濟等地。貝南共和國是非洲西部國家，舊名達荷美(Dahomey)。貝南南瀕幾內亞灣，東鄰奈及利亞，北與尼日接壤，西北與布吉納法索相連，西和多哥接壤。

純文學領域；就像科學家一樣，他們的研究能生產出堅實、無可爭議且可被驗證的「研究」。<sup>6</sup>

在大學中的歷史學已經不再是富有的業餘愛好者之消遣，它演變成類似於法律或醫學的專業，具備著一個學術專業領域被視為應有的全部特點：德國人再一次走在最前端，他們創辦了歷史學第一本重要期刊《歷史期刊》（*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一八五九年），而其他國家紛紛效仿，隨後於一八七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創立了迄今為止仍然繼續出版的重要期刊（《史學評論》〔*Revue historique*〕、《英國歷史評論》〔*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仍舊是從德國開始，大學開始頒發歷史學的博士學位，告別了紳士學者不需要文憑的傳統。哈佛大學於一八七三年頒授了第一位研究型歷史學博士學位，而創立於一八七六年刻意根據德國大學模式打造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幾乎壟斷了歷史學博士學位的市場。（牛津和劍橋分別直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二〇年才開始頒授歷史學博士學位）。歷史學博士不僅是新近的發明，他們的人數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屬於鳳毛麟角。在一八七〇年代的美國，任職於學院中的歷史學家人數只有十多位，而一直要到一九〇〇年以後，每年方有超過二十名學生獲得博士學位。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在他的自傳中描述道，自己雖然沒有博士學位而且不懂歷史，他之所以還能於一八七〇年被聘任為哈佛大學中世紀歷史的助理教授，大半是得力於他的人際關係：「在他獲得其教授職位並且能以正眼直視其他學者

時，在他記憶所及之處自己只在中世紀時期的歷史，曾經投入不多不少的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sup>7</sup>不過，一九〇〇年之前數十年間的發展確實為我們目前所認識的專業史學奠定了基礎，像是期刊、證書還有像是英國的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一八六八年成立）和美國歷史協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一八八五年成立）這樣的專業組織等等。<sup>8</sup>

在十九世紀的演變下，新的「專業」和「科學」的歷史學變得泰半是在大學之中研究的，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其與懷抱民族主義理想的世俗民主國家的聯繫日益緊密。在像是法國和德國這些國家，對歷史的學習逐漸地被限制要在受國家直接資助的大學中，並且被用來培養教師和其他公務員。例如，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歷史學家在提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和責任的解釋時，已經與政府之間密切地協調過。<sup>9</sup>國家和學術機構之間的官方聯繫，在英國和美國並不那麼明顯，但是在這兩個國家中，教授們與統治者圈子都屬於同一個關係密切以及同質性高的少數菁英階層。<sup>10</sup>例如在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富有的捐贈者直接影響了僱聘人選和課程規範，而歷史專業的領導者由衷地遵行著「盎格魯—撒克遜主義」，這是對雅利安種族優越性信仰的重新包裝，相信他們不僅優於黑人也優於天主教徒和凱爾特人（Celtic），拉丁人和閃米特人的後裔。<sup>④</sup>在所有這些國家力量介入的背景中，專業主義（對追求「客觀」真理的歷史專業自主性的信仰）矛盾地與某種期待共存，也就是期待學院歷史學家所鼓吹的歷史敘述，能夠凝聚共識與激勵愛國

心，並且反映出一小撮知識與政治菁英的觀點。<sup>11</sup>一直要到專業組織中學者有權力能夠自己主導絕大部分的歷史寫作之後，「學術」和「通俗」（或「外行的」）歷史學家之間的差異才開始出現，而且兩者之間的差異在好幾十年間仍舊是模糊的：在美國歷史協會成立的頭幾十年中，其中只有半數成員擔任教職，在大專院校層級任職的僅有四分之一，相比之下今日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成員是在大學任教。<sup>12</sup>隨著二十世紀高等教育和大眾閱讀的迅速發展，歷史著作逐漸被分為「學術」和「通俗」兩類。<sup>13</sup>

## 通俗和公共歷史

學術史學與所謂的通俗史學有什麼區別？區別實際上並不是在於「通俗」歷史學家的身份，因為不少的通俗史家在學術界有著傑出的地位。除了成功的非學術史學家，諸如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大衛·麥卡勒（David McCullough）或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Doris Kearns Goodwin），在暢銷的歷史書作家當中有一大群教授，其中許多人來自於頂尖機構，如賽門·夏瑪、喬瑟夫·艾利斯（Joseph Ellis）、吉爾·萊波爾（Jill Lepore）、大衛·哈克特·費舍爾（David Hackett Fischer）、詹姆斯·麥克弗森（James McPherson）和理查·伊凡斯（Richard Evans）。<sup>14</sup>暢銷的通俗歷史書，其特點中最

重要的一項是：能以優雅生動的文筆將主題以能讓過去對該領域和其中辯論一無所悉的非專業人士也能理解的方式來呈現。通俗史學還有其他特點，雖然不是必然存在但是經常出現。其中之一便是敘事體裁。幾乎所有通俗歷史當中都有故事，而且其中大多數都是以故事的方式寫成，包括像是類別極多的軍事歷史（最常見的是對戰役和戰鬥的記載）以及歷史傳記。當歷史傳記寫得極佳的時候，其能夠從幾個層面上吸引讀者：通常探討一個非凡人物（無論聲名遠播或惡名昭彰）的傳記，其中會包括私密的細節以及對其不斷演變的心理的描繪，其特點是通常會有一群為人所熟知的配角，而且最重要的是，以可預見的勝利和逆轉局勢的故事形式來重現其生平。歷史傳記之所以受到廣泛且歷久不衰的歡迎——有關亞伯拉罕·林肯的書籍大部分是以傳記的形式出版，目前估計大約有一萬六千種——是來自於讀者很容易就可以對另一個人的生命故事產生共鳴，並且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學到有價值的歷史訊息。<sup>15</sup>

通俗歷史書的題材往往比學術歷史更傳統，這應該不會讓人意外。學者們的工作很

④ 譯注：凱爾特人，包括愛爾蘭人、蘇格蘭人和威爾斯人等。閃米特人：包括猶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倫人和古亞述人等。

明確地是去拓展知識的疆界、尋找新課題或找出研究既有主題的新方法。相反的，面向大眾市場的作者則需要用過去已經研究過的東西來吸引讀者，因此關於亨利八世（Henry VIII）和他的妻子們、美國開國元勳當中的一位或數位、拿破崙、第三帝國和兩次世界大戰有著無數的著作。政治家和軍事歷史的傳記佔據歷史暢銷書籍中大多数的位置，儘管大部分學院歷史學家早已不關心偉大領袖和戰爭的豐功偉業。傑出的學院歷史學家高登·伍德（Gordon Wood）在十年前關於一本喬治·華盛頓傳記的書評中曾提到，他的學者同事們對於特別是發生在普通人民群眾身上的種族、階級和性別中各種緊張關係的研究熱忱，並不符合廣大民眾的口味。他寫道：「若只根據銷售數據，顯然大多數美國人想要了解的是，建立這個國家的那些已去世的白人男性——這正是大多數學者不想寫的那類主題。」<sup>16</sup>

雖然伍德關於非專業歷史讀者的保守口味的結論在大部分的情況中或許是正確的，但也有許多例外存在。戴瓦·梭貝爾（Dava Sobel）關於科學史上鮮為人知人物的書籍（一九九五年的《尋找地球刻度的人》（*Longitude*）與二〇〇〇年的《伽利略的女兒》（*Galileo's Daughter*）佔據了暢銷書榜首達好幾個月，還有像是艾瑞克·拉森（Erik Larson）關於十九世紀芝加哥建築師丹尼爾·伯漢（Daniel Burnham）和連環殺手賀姆斯（H. H. Holmes）的《白城魔鬼》（*Devil in the White City*，二〇〇三年），以及蘿拉·希林布蘭（Laura Hillenbrand）所著、奧運選手和二戰倖存者路易·詹帕瑞尼（Louis Zamperini）的

傳記《永不屈服》（*Unbroken*，二〇一〇年），這些著作都在銷售上取得了更為亮眼的佳績。一本廣受大眾好評的歷史書並不一定需要有一個著名的事件或主角。紮實的研究和出色的風格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關鍵的是敘事形式：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精心製作和懸疑的故事是非專業讀者所期待的，而且對其會有最熱烈的迴響。

通俗歷史和專業歷史之間存在著根本區別——寫作和閱讀「非專業」的歷史著作，其動機往往是出於純粹的好奇心：作家和讀者通常是被想要瞭解該主題這種直截了當的渴望所驅使。舉例來說，任何提議要再寫一本，維多利亞女王傳記的人，必然得具備一個新視角或一些全新的資料，才能讓這個計畫為出版商所青睞。事實上，關於具備獨特方法的通俗歷史著作，很容易便可以找到不少例子。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的《無敵》<sup>⑤</sup>（*Team of Rivals*），由林肯決心與他以前的競爭對手合作這樣的角度切入，來講述林肯於一八六〇年當選的該任總統期間的政治史。賽門·夏瑪在一九八九年出版後便一直是暢銷書的《公民：法國大革命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對法國大革命抱持

⑤ 譯注：中譯本：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著，高育慈、許恬寧、陳文和、湛悠文、鍾玉珏譯，《無敵：林肯不以任何人為敵人，創造了連政敵都同心效力的團隊》（台北：大塊文化，二〇一一年）。

嚴厲的批判觀點，主張一七九三年恐怖統治時期的血腥暴行是在革命的早期階段就已經成形了。在第三章中討論過的賈德·戴蒙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在暢銷的歷史書中與眾不同，因為它並不是採用前後相連的敘事方式，也不侷限於單一國家的歷史，並且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地理決定論觀點。通俗歷史著作有時採取強硬的主張，但是他們所互相辯論的議題往往更直截了當（拿破崙：革命英雄或暴政獨裁者？）而跟那些引發學院歷史學家之間爭論的更為錯綜複雜的問題不同。雖然如此，非學術的歷史作品通常也會受到公評，並成功地為讀者提供站得住腳的訊息和出色的文筆。

由非學術界人士寫作的所謂通俗歷史，包括了許多重要而有影響力的書籍。大多數學院歷史學家只能將他們的作品能夠具有新聞記者和非虛構寫作作家亞當·霍奇爾德的《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entral Africa*）那樣的影響力視為夢想。<sup>17</sup> 霍奇爾德的書於一九九八年問世，其中駭人地描述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如何取得位於中非幅員廣闊的剛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並且自一八八五年到一九〇八年統治該處，不受其政府控制。得益於著名探險家亨利·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宣傳活動的幫助，利奧波德在國際支持下取得了這一大片領土，他和他的許多代理人由此後開始野蠻地剝削當地人民長達二十多年，唯一的目的是把象牙和橡膠貿易的利潤用來充盈國王的私人財庫。剛果的居民受到嚴酷暴虐的方法逼迫而成為了如同奴隸一般的勞動力，在用捱餓、鞭打和斷肢等手段來控制

他們在官員和監督員手下工作。比利時士兵將成筐成筐的斷手呈現在他們的指揮官面前（當中還有些喪心病狂的人會用頭骨來裝飾自己的花園），用來證明已經完成了消滅整個村莊的命令，而且四肢是活生生地從拒絕工作男子的妻子和子女身上截下的。根據霍奇爾德的估計，在此期間該地區有一半的人口約一千萬人死於強迫勞動、飢餓和相關疾病，或者是直接遭到謀殺。<sup>18</sup>

正如霍奇爾德自己所聲明的，這本書中大部分的事情早已被其他學者揭露了，只不過都是由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以大部頭書的形式出版（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研究在過去只有佛蘭芒語〔Flemish〕版本）。霍奇爾德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添加進了他精心寫就的故事中，這大部分集中在對於利奧波德國王及其同夥還有為數越來越多的人權鬥士的生動描繪，這些鬥士揭露了比利時的暴行並且發起抗議活動，最終成功迫使國王放棄其領土：非裔美籍歷史學家和活動家喬治·威廉斯（George Washington Williams）、英裔愛爾蘭人政治家羅傑·凱斯門特爵士（Sir Roger Casement）、作家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和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以及曾經是一家利物浦航運公司職員的英國記者艾德蒙·莫雷爾（Edmund Morel）。他最先注意到，開往比利時領地的船舶上只有船員和武器，但是回航時卻滿載財富。《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銷售了幾十萬本，其一九九九年的翻譯版本對比利時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震驚了許多仍然認為自己國家過往的殖民方式相對溫和的人。比利時最重要的殖民博物館立即策劃了一場探索比利時公



共生活中的殖民主義記憶的展覽，隨之而來的是，相關歷史研究和紀錄片的製作數量激增，這個現象直到今天仍在繼續。<sup>19</sup>霍奇爾德的書並不是以多數專業歷史著作所關注的一系列複雜論點為中心：它的影響力來自於以一流的文筆寫出了一個在道德上需要有所作為，而且其所造成的後果在今日仍然清楚可見的故事。

在學術界以外的歷史作品，其生產和消費的方式並不僅限於書本形式。受歷史啟發的電影（更為晚近還有電子遊戲）數量龐大，其內容或許是根據於歷史事實，但當中也包含了像是虛構的對白，撇開這些電影不談，歷史紀錄片是在通俗歷史的各種形式中號稱最接近「事實」的，它煽情地將圖像、文件和場景重新排列，再配上「純正」的或是濫情的背景音樂——管樂、小提琴、高昂的弦樂。

肯·伯恩斯（Ken Burns）稱得上是上個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美國歷史學家，他是一位留著披頭四髮型，熱情洋溢的電影製片人，其關於內戰、爵士樂、棒球和禁酒令等主題的紀錄片吸引了數千萬觀眾。<sup>20</sup>探討過去的紀錄片以幾種方式製造出極為接近真實的假象。其作者通常是藏在幕後的，由於大多數歷史紀錄片從業人士並不像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那樣，將他們指揮的過程或是主張呈現到觀眾眼前，而是偏好採用導演和拍攝主題皆無關係的第三方，來擔任宛如來自上帝的聲音之配音旁白。觀眾將其所觀看的紀錄片的畫面（圖像、文件、實體文物），視為是跟原始材料的直接接觸體驗，而且這種電影通常會不時插入認為具公信力的「旁敘人」（talking heads）的嚴肅評論，並提

供一些看似公正客觀的專業知識。<sup>21</sup>

紀錄片的「仿真效果」及其廣泛流行，引起了一些專業史學家的憤慨。像賽門·夏瑪這樣的英國「電視名人」（telly dons）經常會受到其他（可能是嫉妒的）學者的批評，而在美國，肯·伯恩斯引人注目的廣泛成功，讓他成為許多人喜歡攻擊的目標。研究南北戰爭時代的一流學者們對於伯恩斯關於此戰爭的電影一直抱持著嚴厲的批判態度，抗議該片對於奴隸制度作為該戰爭之起因，以及在內戰結束後重建時代的種族不平等與暴力，都只有輕描淡寫地帶過而已。根據一些研究十九世紀美國的著名歷史學家，如艾瑞克·方納（Eric Foner）和里昂·利華克（Leon Litwack）的說法，伯恩斯將戰爭簡化為一場白人之間的兄弟鬩牆以及隨後之救贖的戲劇，而非裔美國人大多被這排除在此故事之外。<sup>22</sup>終身服膺自由主義的伯恩斯，完全承認美國過去的衝突和暴力，從內戰英雄卡斯（Custer）和謝爾曼（Sherman）（詳參其影片《西部》〔The West〕）對美國土著居民的

⑥ 譯注：麥可·摩爾為美國著名紀錄片導演與作家，以製作諷刺時事的紀錄片聞名，他所執導的《華氏911》（Fahrenheit 911）獲得坎城金棕櫚獎，《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則獲得二〇〇二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滅絕<sup>⑦</sup>，到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蓄奴，以及對待他們的無情。再到對黑人運動員的長期隔離和對工人階級選手的剝削(詳參其影片《棒球》[Baseball])。即使伯恩斯確實有刻畫出過去的偏見和壓迫，但是他所要傳達的最重要訊息仍然是一種愛國的樂觀主義：他堅稱，美國歷史和文化的力量便是它能夠從多元族群中汲取偉大——爵士、棒球以及民主本身，並從悲劇中淬煉出更強的團結。他的紀錄片追求他自己稱之為「情感共識」(emotional consensus)的東西，此共識圍繞美國文化的一個共同核心。<sup>23</sup>

這種理想主義幾乎與學術界的觀點沒有重疊之處，學術圈中致力於批判性研究的學者很少提倡關於民族過去的「情感共識」，對於不久的將來也沒那麼樂觀。一些學院歷史學家將伯恩斯所從事的這種事業斥為乃是屬於麻木人心的「遺產」事業，歷史在其中成為充滿懷舊情緒且帶著棕褐色調<sup>⑧</sup>(sepia-toned)的娛樂。普林斯頓的歷史學家史恩·韋倫茲(Sean Wilentz)在二〇〇一年的一篇備受關注的文章〈美國不再困難〉(America Made Easy)中指責當代通俗歷史是種「消極的、引人懷舊的景觀(spectacle)」。在韋倫茲的猛烈抨擊中，其證據分別是，大衛·麥卡勒稱頌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杜魯門(Harry Truman)和亞當斯(John Adams)的傳記著作(「不過是另一種景觀性鑑賞的體裁」)以及肯·伯恩斯的《內戰》(Civil War)。「其細節精彩，故事說得令人回味，但對戰爭的起源和意義的歷史判斷卻過分地多愁善感和空洞。」<sup>24</sup>

同樣地，被稱為「遺產」的這種一般人接觸歷史的方式(國家遺址的保存還有場

景與事件的重現)，也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研究「文物產業」最著名和最有聲望的學者——大衛·洛文塔(David Lowenthal)一再點明，有許多虛構物存在於受崇敬的國家遺址中：被稱為普利茅斯岩<sup>⑨</sup>(Plymouth Rock)的歡迎遊客造訪的石塊，它是一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被這樣稱呼，此外，馬薩達(Masada)的歷史長期以來被為數甚多的質疑所環繞，這是位於一個荒蕪高原上的一片廢墟，也是有許多人造訪的以色列民族主義之象徵，據說源於公元一世紀約九百六十名捍衛此地的猶太人寧願選擇自殺也不願意向圍攻的羅馬人投降。<sup>25</sup>然而，洛文塔的重點與其說是要指出某些遺址當中存在偽造或扭曲，其

⑦ 譯注：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一八三九～一八七六年)，美國陸軍軍官。一八六八年統率第七騎兵旅。在堪薩斯、達科他和蒙大拿與蘇族印第安人作戰。一八七六年在襲擊蒙大拿領地的小巨角河(the Little Bighorn River)附近的印第安人營地時戰敗身亡。謝爾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一八一〇～一八九一年)，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北部聯邦軍將領。於一八六九至一八八三年擔任美國陸軍總指揮官，在任期內發動了多次對印第安人的大規模作戰。

⑧ 譯注：由於許多老照片帶著棕褐色調，使人看了會覺得很具有「歷史感」。

⑨ 譯注：普利茅斯岩位於美國麻州的普利茅斯，上面刻著1620的字樣，其所處的地方相傳是五月花號可能的登陸點之一，是今日普利茅斯最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又被稱為移民石。

實更在於要點出遺址如何唯我獨尊地以及獨佔地運用歷史：「歷史是所有人的，而遺址只屬於我們。」<sup>26</sup>他主張從城堡到戰場等這類經過精心規劃的地點，激起的是情感交融和崇拜而不是洞見和思辨；你越是試圖把過去保存為「如原本一般」，你越是在阻止討論的進行。對於洛文塔而言，「文化遺產」正是歷史的反義詞。

如果許多遺址為了喚起敬意和懷舊情緒，而以片面或經過漂白的方式呈現過去，這不一定總是管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非洲裔美國人奴隸制度的真實情況是如何被以越來越顯眼而且時常引起爭議的方式，被置入美國一些最神聖的歷史遺址中，從內戰戰場到維吉尼亞州里奇蒙<sup>⑩</sup>（Richmond）的公共空間，再到傑佛遜的故居蒙蒂塞洛（Monticello）。在蒙蒂塞洛中有奴隸存在的事實（不再隱藏在「僕人」這個經過漂白的名詞下），就像傑佛遜與奴隸莎莉·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親密關係和所生子女的事實一樣，近年來開始被公開地承認和討論，雖然這一演變在某些方面遭遇到阻力，但大多數遊客都讚賞這種對莊園當中的社會現實面更為忠實的呈現。<sup>27</sup>

最具爭議性的是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殖民地活歷史博物館（the living-history museum Colonial Williamsburg）對奴隸制度的再現。自從一九七九年以來，非洲裔美國人扮演著這個城鎮過去為數眾多的奴隸，這讓一些遊客感到不舒服，不過最激烈的爭論在一九九四年因為重現一場奴隸拍賣的這個決定而爆發。各個陣營之間和每個陣營當中都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一些自由派組織（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NAACP]）抗議這一

事件是種族歧視的，不過另一些同樣擁護進步改革的陣營，其中包括學術專家和一些非洲裔美國人則替這場重現辯護，理由是它有力地傳達了這個在奴隸的經歷中最高為核心事件的駭人真實情況。然而，這些辯護者也深知重演奴隸拍賣所帶來的嚴重問題：讓許多演員和觀眾都如此不安的主題登上舞台是否正確？在歷史的完整性與娛樂／剝削之間，我們該如何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sup>28</sup>顯然，歷史遺址可以刺激和助長對相關議題之思辯，除了關於遺址內容的真實性外，也關於該如何向公眾展示這些內容。

落實公共歷史的另一個主要場所，歷史博物館的情況也是如此。<sup>29</sup>今日的公共博物館淵源自過去的私人收藏——像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紳士科學家<sup>⑪</sup>（gentleman scientist）所蒐集的珍奇屋（cabinets of wonders），以及研究機構。例如，美國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便是建立於十九世紀英國科學家的遺贈上，其宗旨是要作為存放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和民族誌研究者等人研究成果的資料庫。一直要到二十世紀初，當學術圈的領袖日益嚴厲地指責史密森學會總是有種「過分簡化」其收藏品的衝動，該學會才將其重

⑩ 編注：里奇蒙（Richmond）為美國內戰時期南方邦聯的首都。

⑪ 譯注：紳士科學家指的是不隸屬於特定機構的紳士，為了個人興趣自己投入經費來進行研究。

點從學術研究轉向公共教育。<sup>30</sup>在史密森學會由其最初的學術使命轉型的同時，其他機構也在民間主導下成立。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光裡，許多美國歷史博物館和遺產之所以得以成立都歸功於當地的熱心人士、業餘愛好者和慈善家，像是建立威廉斯堡殖民地的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由於這些舉措通常集中於與在地有關事物以及日常生活上——總統之家、服裝的展示、工藝品——而且因為它們模糊了教育和娛樂之間的界限，像美國歷史協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這樣的專業組織長久以來都對其敬而遠之，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針對學識平凡的參觀者的展覽品過於煽情以及「女性化」。<sup>31</sup>

普羅大眾對博物館的反應遠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歷史呈現都要熱烈。當羅伊·羅森茨維格(Roy Rosenzweig)和大衛·塞倫(David Thelen)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對八百零八名美國人進行調查時，他們發現，在「以一到十分說明你感覺到與過去相連結的程度」的問題中，「參觀歷史博物館或文物古蹟」的評分是第二高——「只有與你的家人聚在一塊」得到了更高的分數。在描述過去時可信度的問題上，博物館得到最高分，有百分之八十的受訪者給予了他們最高的評分，遠遠超過了大學歷史教授(百分之五十四點三)和高中教師(百分之三十五點五)，而且也壓倒地性超越了祖父母(百分之六十九)。<sup>32</sup>

來自受訪者的意見證實了博物館遠比於書籍、紀錄片或者課堂有影響力，它提供了某種不需透過中介就能接觸過去的方式，這讓參觀者相信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中不存有任何偏見。一位受訪者認為，與文物的直接接觸，讓你「能得出一些自己的結論，而不只是光聽別人的結論」；另一位受訪者也同意這說法，認為博物館「並未試圖要給予你任何觀點……你你自己找出結論。」一位中年女性受訪者的觀察為：「當你坐下來注視一件展品時，你的感官便會開始活動。」<sup>33</sup>近距離地接觸實體的過往文物，無疑會引起強烈的情感反應。即使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在處理原始文件時，也能感覺到自己的脈搏加快，無論是世界領袖親筆寫就的信，或是生平早已不可考之普通百姓的名字被潦草書寫於其上的婚約。當參觀博物館的訪客身處於這種過去的氛圍之中時，真實狀況會因此被掩蓋住——任何一場博物館展覽都是經過一系列仔細思考該如何選擇和呈現後的結果。盧德米拉·喬丹諾娃(Ludmila Jordanova)在一個格外嚴厲的指控中寫道，博物館「以暗中為害的方式運作」，其精心挑選了經過「清理、修補、修復和包裝」的物品，並將空白和沉默填補起來。她認為，博物館的陳列品往往圍繞著簡單且情節化的故事安排，例如，過去的生活被描繪成骯髒且危險的或是如田園般單純和安全的。矛盾的是，博物館展示品的具體性和可見性，正是被用來隱藏那些於參觀者視線之外精心計算的選擇和展示策略。<sup>34</sup>

然而，有時候博物館對展覽品的選擇方式會因為展覽品所引發的爭議而變得一清二楚。以美國為例，近年來最令人糾結的例子莫過於，史密森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Smithsonian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於一九九三~九五年間籌劃的，關於在二戰

即將結束之時向日本投放原子彈這項決策的展覽。<sup>35</sup> 這展覽原本預定要與二次大戰終戰五十週年的紀念儀式一起舉行，展覽計畫以 B-29 飛機艾諾拉·蓋伊號 (Enola Gay) 為中心，這架飛機在廣島上投擲「小男孩」(Little Boy) 炸彈，造成七到八萬名日本人死亡和數千人重傷。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退伍軍人不斷敦促博物館展出艾諾拉·蓋伊號，其存放於該博物館的保羅·蓋伯保存設施 (Paul E. Garber preservation facility) 內；這類展覽的相關計畫從一九九〇年開始被搬上檯面，不過不同陣營之間的角度也在這個最初時刻便有跡可循。一方面，出生於戰後的傑出天體物理學家馬丁·哈維特 (Martin Harwit) 自一九八七年以來擔任博物館館長，他將此飛機和其他展示品視為一種改變的方式，將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從單純展示飛機的空間轉變為展示更重視展覽品歷史背景的空間。另一方面，當博物館計畫將艾諾拉·蓋伊號的展覽與飽受爭議的投放原子彈決策一併展出的消息傳開時，退伍軍人團體隨即開始極力反對，指出博物館最初的成立宗旨是：「以能夠鼓舞美國今世後代人心的方式……來描繪武裝部隊男女成員的勇敢和犧牲。」<sup>36</sup>

由數任館長在專業史學家的幫助下所製作的三百頁展覽計畫書於一九九四年一月完成。這場展覽首先要記錄歐洲戰爭的結束和太平洋戰區衝突的擴大，也包括了日本對外侵略與暴行的紀錄；第二個同時也是最具爭議性的部分是將焦點放在使用原子彈的這項決定，並且納入了學術辯論中的各種問題和爭論：這種類型的炸彈當初是否有可能被投擲在德國人身上？美國是否無視日本對和平的倡議？核能的破壞性除了結束戰爭之外，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視為是針對蘇維埃「原子外交」的序幕？計畫書中還談到了針對如果原子彈沒有被投下，美軍在入侵日本的戰爭中可能死亡人數（從五萬到五十萬）的辯論。最後，展覽品將包括來自廣島的遺物在內，作為對逝去的日本人性命的痛切提醒：一只標記著爆炸確切時間的手錶、嬰兒服裝、一個女學生的飯盒。由於美國空軍協會、美軍退伍軍人組織以及各個退伍軍人組織的成員一直相信原子彈拯救了自己與同志的生命，因此隨著展覽計畫公諸於世，他們的反應是憤怒的，因為他們認為不僅是自己戰時的作為還有自己倖存下來的事實，這些意義都被貶低了。在他們看來，這個計畫書將日本人的痛苦置於美國士兵和空軍的犧牲之上。當博物館工作人員急著修改計畫書以安撫批評者時，爭議蔓延到大眾媒體上，輿論一面倒地支持退伍軍人而非博物館策展人和其他學術顧問，同時國會議員則要求哈維特辭職。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史密森尼博物館祕書麥可·海曼 (Michael Heyman) 取消了此計畫中的展覽，哈維特於五月二日辭去館長職務。於一九九五～九八年間，這架飛機的機身就是展覽中唯一的展品。

艾諾拉·蓋伊事件是被單一展覽品的可能性給觸發的，此事件也將歷史（和其他類）博物館中的常設以及特展展覽品當中能夠導致分歧的潛在力量公諸幕前。展覽品如何被挑選出來以及與之相關的呈現方式和評論就像書籍和文章的內容一樣，都是一種論證的形式。一場展出中的特定立場往往只有專家才能看到，不過在艾諾拉·蓋伊的例子中，由於緊張關係存在於各種意識形態和世代之間，環繞著展覽計畫的爭議就此爆發：二戰

退伍軍人在這個時候為數眾多而且依然活躍，而戰後的嬰兒潮世代其中許多人對愛國軍國主義持懷疑態度，當中的某些成員亦在此時作為學者和博物館員工開始活躍。

除了個別展覽引起的爭議外，某些歷史博物館的存在本身和宗旨就可以引發思考與辯論。例如，在二十世紀大多數的時間中，沒有人反對西方國家的博物館展示被視為落後國家的「原始」習俗和藝術，這些地方通常過去曾被歐洲人殖民，他們自豪地把帝國主義搜刮來的戰利品作為其「文明化使命」具有正當性的副產品展示出來。但是當面臨到人們對殖民主義掠奪的認識日益增長，歐洲國家應該如何展示帝國鼎盛時期獲得的寶藏呢？法國兩間新揭幕的博物館，位於巴黎關於「最初」（也就是「原始」）藝術（*arts premiers*）的博物館，還有馬賽的歐洲與地中海文明博物館<sup>36</sup>，分別於二〇〇六與二〇一三年開幕，皆因為輕視或忽略其收藏品與法國過去作為殖民者的密切聯繫而飽受批評——有時候，歷史評論不存在的這件事情就是一種具有詮釋性的選擇。<sup>37</sup>

存在著更大問題的是，比利時依然是利奧波德二世所建造位於特勞倫莊園中豪華博物館的所在地，此博物館被用來作為向世界宣傳剛果自由邦的自然資源和本土工藝品的展示空間。皇家剛果博物館（*Royal Congo Museum*）於一九〇五年開放，展出殖民地產品、非洲物品、絨毛玩具、巨大的地圖以及大型政治性雕像，旨在宣揚比利時為剛果帶來「安全」和「幸福」。在整個二十世紀，數百萬剛果人被比利時的領主打死或弄殘廢的事實從未被提起。亞當·霍奇爾德寫道，「這就像是一間位於柏林的大型猶太藝術和文

化博物館，其中對大屠殺隻字未提。」<sup>38</sup>事情隨著二〇〇一年一位新館長的任命開始發生變化，博物館在二〇〇五年的百週年紀念活動，重點擺在以「剛果的記憶：殖民地時代」為題的展覽。一位歷史學家把這個展覽形容為「一場既冷淡又不情願地練習修正主義的活動」：在「交易」和「遭遇」的標題下，展覽將比利時的佔領描繪為對雙方都有利的事件，同時將持續發生的暴行扭曲為偶爾的虐待行為，掩蓋了殖民主義為剛果人民帶來的災難性後果。<sup>39</sup>博物館在後殖民時代所展現出的有口無心的懊悔明白地表現出，要消除位於那些標誌自己歷史起源的博物館當中最深蒂固的偏見是多麼困難。因此，某些形式的通俗歷史，比其他的形式更容易引發爭議。最新出版的湯瑪斯·傑佛遜暢銷傳記或是二戰紀錄片當中所提供的詮釋，可能會像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所計畫的艾諾拉·蓋伊號展覽一樣引發爭論，不過購買書籍或是收看歷史頻道則是不涉及公共機構或財務的私人決定。另一方面，博物館在許多意義中上是公共機構——由公共資金資助、建築外觀顯

<sup>36</sup>譯注：該位於巴黎的美術館指的是布朗利河岸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展示非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具有特色的藝術，於二〇〇六年開幕；歐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館（*Musée des Civilisations de l'Europ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位於法國馬賽，落成於二〇一三年，同一年馬賽被指定為歐洲文化之都。

眼、將國家的過去呈現給本國人和全世界——也是知識的壟斷，因為任何一個主題在一個國家中只會有一間國立博物館：公民和代表他們的政治家們在「他們的」建築物，因其資金是來自於公民的稅捐，當中展示的敘事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利害關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激烈的辯論多爆發於通俗歷史中最不易被接觸的形式，因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需要一場昂貴且耗時的前往遙遠城市的旅途。然而，由於納稅人的稅金、政治以及可見性在此被結合在一塊，「公共」歷史成為了爭論過去如何被呈現的主要舞台。

### 正統與修正主義：辯論如何塑造歷史？

博物館館長很少會想去招致或者是歡迎會讓他們失去飯碗的爭議。另一方面，對於專業歷史學家來說，無論是多麼相敬如賓的辯論，以及不管是多麼小的分歧都是推動探究的動力，並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自己的學術事業。在實證主義理想鼎盛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和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認為，他們的領域應該是對所有現有證據進行詳盡地彙總，理想的狀況是對過去的某些層面累積出一個明確且無懈可擊的說明：既已將所有可能的事實彙集起來，而且「客觀地」呈現出來，還有什麼需要辯論的空間嗎？<sup>40</sup>正如我們將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過去是完全客觀可知的這種概念在數十年前便已經

被拋棄，讓位於現在普遍所認為的歷史知識要透過新問題、新資料和新解釋方式的結合來推進。對前人研究成果的質疑，從朋友間的辯論到在專業領域中的爭辯不休，推動著大多數的歷史研究和寫作前進。

關於歷史的學術爭議，通常不為大學之外的世界所知，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你需要受過此領域的訓練方能夠理解辯論中的術語和利害關係。例如，一流的研究早期現代英國的歷史學家們在一九九〇年左右相互爭論不休，塞耶—西爾子爵<sup>⑬</sup> (Viscount Saye and Sele) 在一六四七年的英格蘭國會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和他的附庸者所構成的關係網絡，對下議院的控制程度有多高？

這個問題對該領域的專家至關重要，因為這對貴族在一六四〇年代英國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這個更重大的問題相當關鍵，不過一流學者彼此針鋒相對的文章對外人來說幾乎是令人費解的。<sup>41</sup>某些學術上的爭論有時確實也會蔓延到公共領域，這正是因為其涉

⑬ 譯注：塞耶—西爾子爵，名為威廉·范恩斯 (William Fiennes, 一五八一—一六六二年)，英格蘭貴族與政治家，虔誠的清教徒，並且為英格蘭於北美殖民活動的積極贊助者。於英格蘭內戰中曾在地方組織軍隊對抗國王的軍隊，並且對於國會軍隊轉型為新型軍隊出力甚多。

及到人們極為關心的領域，而且討論中所使用的是多數人都理解的術語。

納粹德國的歷史可能是某個研究領域定期跨足進入公共生活最經典的例子：第三帝國和大屠殺事件牽涉的層面極廣，不僅包括猶太人和德國人這兩個必然的成員，也包括了為數眾多受到驚駭的人們，他們想到一個「現代」和「文明」的典型歐洲國家居然對數百萬人進行了有組織的大屠殺便震懾不已。這一領域的傑出學術研究，往往圍繞一般公眾都明白的基本道德和心理問題展開，而且他們往往抱持著強烈的感情和各種看法來接觸這個領域的歷史。

此領域中有各種相互衝突的詮釋，而環繞在這些衝突四周的是強烈的情感，一個戲劇性的例子發生在一九九〇年代兩本引人注目的著作問世之後：克里斯多夫·白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的《普通男人：一〇一預備警察大隊和波蘭的最終解決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一九九二年）及丹尼爾·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的《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普通的德國人和大屠殺》（*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一九九六年），而後者大體上是為了要回應白朗寧而寫的。兩位學者都是為了解決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令人難忘的短語「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所點出的問題：是什麼使「像我們一樣的人」，守法的公民、虔誠的教友和忠誠的家庭成員，縱容或積極配合大規模謀殺那些不曾傷害過他們的人？

白朗寧的研究乃是基於一整套不尋常的記錄，即在一九六〇年代對第一〇一儲備警察大隊的一百二十五名成員進行的司法訊問，這一個連的德國預備役軍人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間在十幾個不同的地點執行了開槍殺死三萬八千名波蘭猶太人的命令。白朗寧的主角們確實相當「普通」：德國漢堡市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大部分平日從事的是藍領工作，其中只有四分之一是納粹黨員。<sup>42</sup>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的第一次行動中，距離這群人抵達波蘭還不到三個星期。他們的指揮官威廉·特拉普（Wilhelm Trapp）少校在當天早上集合了他們，並告知他們即將要執行的令人不舒服的任務：他們要在鄰近的約瑟夫鎮（Josephow）射殺一千五百名猶太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適合工作的婦女、兒童和老人。明顯地感到不安的他告訴他們，如果年長男性覺得無法執行任務，他們可以選擇退出。在一個有五百人左右的營中，最初只有十幾人拒絕參加；而在這一天當中，大約又有另外一到兩成的人們要求退出這個令人心力交瘁的任務。<sup>43</sup>相同的狀況也出現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之間執行更多屠殺的部隊中：白朗寧令人信服地指出，這些被徵召的人除了因為躲避「職責」自己會感到羞恥外，沒有證據指出他們會因為退出而要承擔任何負面後果，但是只有為數甚少的人要求退出。

在與大屠殺有關的材料中，第一〇一營的資料紀錄是獨一無二的。正如白朗寧所說的，「我過去從未遇到過抉擇的難題如此戲劇性地被事件的發展過程影響，而且還被至少一部份的施暴者公開地討論。」<sup>44</sup>從數十個盤問紀錄中，白朗寧透過各種可能的動機來分



門別類，並且還需顧及到參與者自我報告中不可避免的扭曲。

他總結說，殘酷戰爭的背景、對於敵人造成德國隱憂的認知以及對猶太人根深蒂固的蔑視，這種可怕的行為之所以成為可能，上述所有因素都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白朗寧最終認為該營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是決定性因素。全營當中有八成到九成的人進行了大規模謀殺，他們雖然對此任務感到畏縮並且可以選擇拒絕，但是出於順從和對權威的尊重還是執行了任務，而且擔心若是自己拒絕接受這令人不舒服的任務，他們會被弟兄們排擠。他們並不是特別想射殺猶太人，但他們更不希望被上司與同袍拒之門外，因為後者在這個時候是他們生活中的全部。<sup>45</sup>因此白朗寧的結論是，與其說這是「邪惡的平庸」，不如說是集體服從的寒蟬效應。

白朗寧不將反猶主義解釋為最主要動機的作法，引起了一位年輕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家戈德哈根的憤怒，他因而在通俗期刊上發表了對《普通男人》的嚴厲評論。他抗議道，白朗寧照單全收了該營成員們聲明中的片面之詞，從而「把德國人異常與根深蒂固基於種族立場的反猶主義，簡化為常見的社會心理現象的一種表現而已」。他寫道，這些人不是一般而言的「普通人」，而是「非比尋常的政治文化下的普通人」。<sup>46</sup>戈德哈根將狂熱屠殺性的反猶太主義視為是德國文化中已存在數世紀的中心組成部分，並於四年後出版了他自己的書《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

戈德哈根著作的論點是直截了當的：「德國人的反猶太信仰是大屠殺的中心因素……

本書的結論是，反猶太主義促使此了數以千計的「普通德國人」——而且若是他們受到恰當地宣傳影響的話，甚至可以促使達數百萬人——屠殺猶太人。<sup>47</sup>這本書指明眾多德國人共同具有的這種滅絕種族的衝動來源是，被作者稱為從中世紀以來不曾間斷的一種曰耳曼「極端排除異己」反猶主義的傳統，這個觀點在幾個世紀以來「幾乎得到普遍的認同」——猶太人的影響是有毒害的，而且他們應該被逐出德國社會。<sup>48</sup>他認為，當學者們痛心疾首於為何這個理應理性和開明的文化中有那麼多成員幹得出這些事情時，他們其實沒有抓到重點。他認為，德國人不是「正常的」，也不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他們的文化已經被反猶太主義污染了。戈德哈根在本書的幾章中深入研究了同樣被白朗寧所用的史料，不過他得出了相反的結論：絕大多數參與殺戮的一〇一警察大隊成員不是受同伴壓力、服從或職業道德的驅使，而是出於屠殺猶太人的渴望，這反映在他們對這些可憎的冷血殘酷行為的陳述中。戈德哈根的敘述強調了德國士兵在猶太人身上撒尿、強迫他們在地上爬行或挖掘自己的墳墓、還有隊員們拿受害者飛濺的腦漿開玩笑等等駭人的例子，而且他懷疑許多隊員在報告中所謂的不情願以及厭惡感只是戰後的自我開脫。

白朗寧與戈德哈根的著作就是兩位學者檢驗相同的證據、提出相同的問題，而得出截然不同結論的典型例子。戈德哈根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說明了一般稱為歷史「修正主義」的過程，即試圖推翻對於某時期或某事件的既定理解。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反猶太主義引起大屠殺這樣的想法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戈德哈根這單純簡單的論點實

實際上與過去數十年來強調此問題之複雜性的傑出研究成果背道而馳。該領域的主要歷史學家大多認為，通往種族滅絕的道路是條彎曲的道路，當中牽涉到許多突發事件，而不是從仇恨猶太人一路到斬草除根這樣的直線，而且絕大多數德國人有錯的地方不在於積極的勾結而是應受譴責的冷漠。<sup>49</sup>戈德哈根的修正主義並未推進該領域的研究，因為他的作品受到了來自幾乎所有其他同儕學者的嚴厲批評，但他採取了會格外引起大眾矚目的方式來闡述自己論點。《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在美國售出了超過十五萬本。<sup>50</sup>最後到頭來，白朗寧贏得了大部分學者的尊重，而戈德哈根則獲得了某些群眾的讚揚以及比白朗寧來得豐厚許多的收入。

大屠殺領域的研究還有這個特殊辯論中的術語，這兩者都可以被不具備特殊歷史背景的人理解，因為這些問題圍繞著明確且令人信服的道德和社會關懷。白朗寧和戈爾哈根在這個事件的事實抱持相同的意見，數百名普通的德國新兵同意參與他們本來有機會可以拒絕的暴行，但這兩位學者所要追求的目標截然不同：白朗寧想明白為何某些情況會導致普通百姓去參與那些罪大惡極的罪行，不過對於戈爾哈根而言，他所要追問的不是人類動機這樣籠統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中反猶太主義的具體致命程度。在這兩種情況，都是可以很容易地引起普羅大眾熱烈關注的問題。然而，有關歷史的辯論，其影響力能夠及於象牙塔以外的仍是鳳毛麟角。學院歷史學家之間的辯論通常侷限於某個專門研究領域中，不過這些爭論對於要讓學術研究不斷地更新還有讓歷史問題充滿活力

至關重要。出於這個原因，無論是在大學或研究所的歷史系學生都被訓練要以「論文」或論證的形式來呈現他們的工作成果。

胸懷大志的歷史學家被教導，僅僅去發現和提出證據是不夠的，呈現研究結果的形式，無論多麼畢恭畢敬，都必須是針對某人曾經說過的某個論點的挑戰，或者無論多麼微不足道，都是種能夠改變既有認識的貢獻。和其他學科一樣，專業史學家之間的各種爭執，在視野以及態度上都大相逕庭。

有些領域彼此合作並且相敬如賓，而有些領域則分歧為交戰陣營，研究生被號召要批評其導師的對手或是他們的學生。在某些情況下，分歧反映在意識形態的信念或方法論的立場上（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傳統主義者對抗新社會史家，以及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所有人對抗後現代主義者）。而在某些情況下，長期的爭執不下是被個人野心或在專業上的嫉妒心所驅使的。這些動機相互重疊在一塊更是常見的情況。不過在最好的情況中，爭執不休也可以是富啟發性的甚至是能帶動變革的。

帶動變革的修正主義中一個典型例子是法國大革命的歷史研究從一九七〇年代以降所歷經的徹底改革，而這場變革已經相當令人信服地被用孔恩解釋科學革命的方式（參見第三章）陳述了。<sup>51</sup>就像孔恩設想的情況一樣，這個領域的研究自十九世紀以來，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某種框架內進行的，這種框架由於非常根深蒂固以至於看起來像是太陽會繞著地球運轉一樣天衣無縫的常識。<sup>52</sup>在這個例子中的「常態科學」是一種溫和的

馬克思主義，其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視為兩群人不可避免的衝突下的結果，一方是十八世紀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因新興的資本主義而變得富有，被啟蒙運動的思想所激勵，但是卻得不到政治權力；而另一方是腐朽的貴族階級，在反對改革的君主制度保護下緊抓著不正當的特權不放。許多十八世紀法國的最為人所知的事實似乎都吻合這種假設。法國經濟確實蓬勃發展，像伏爾泰這樣的自由派哲士也正在針對貴族和君主制度提出批評，而且一七八九年五、六月的政治危機便是在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中達到頂點，他們高聲疾呼爭取無特權者的權利，並且最終觸發了革命。

上述說法本來極具說服力，如同孔恩設想的狀況，直到其不再能夠自圓其說。反傳統的英國學者柯班(Alfred Cobban)於一九六四年所發表的《法國大革命的社會解釋》(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發揮了如哥白尼般的影響力，該書指出歷史學家們一直以來都沒有弄清楚狀況。<sup>53</sup>柯班在一連串才華洋溢的短篇篇章中論述，並借用一位後來的歷史學家的話，「法國大革命不是引發政治後果的社會革命，而是引發社會後果的政治革命」。<sup>54</sup>這個領域的學者不久後便開始留意到有許多眾所周知而過去被忽視的事實都不符合現有的典範。法國當時或許是個富裕的國家，但其仍然是相當傳統的農業經濟體，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在其中都仍微不足道。貴族式的價值觀念仍然穩坐最主流的地位：當偶爾有商人或銀行家賺了一大筆錢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要

買下一座城堡、一個國王賜予的官職，還有一個假的貴族頭銜，並且試著被他人當成貴族(伏爾泰本人便這麼做過)；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貴族都反對改革：啟蒙時代的作家如果沒有貴族的資助不太可能生活得下去，因為貴族購買他們的著作、保護其免受審查並且在沙龍中款待他們。國王往往在壓制與寬容之間搖擺，尤其是在路易十六(Louis XVI)在位(一七七〇—一七九一年)時，國王試圖要展開全面性的開明改革，不但不支持貴族，還在政治事務上與他們激烈衝突。

這種受馬克思主義觀點啟發的「正統」法國大革命解釋，最終讓位於「修正主義」的解釋，由於這解釋已經被廣泛接受也已經不再被視為修正主義。該領域的大多數學者現在都同意，一七八九年的劇變並非源於資產階級階級的崛起，而是源於舊政權的政治體系的崩潰以及大規模的文化轉型。<sup>55</sup>在這種觀點中，法國大革命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其發生的原因，因為原因大多數都是偶然的(政府失靈陷入混亂)，而是其所帶來的後果：此革命為法國、歐洲和世界提供了強而有力的革命和民主模式，並且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

關於某個歷史問題上看似理所當然的「正統」觀點，被乍聽之下違反常理的「修正派」論點挑戰與取代，類似的例子發生於歷史學中的許多領域與問題中。例如，美蘇兩國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武裝僵局(一九四五—一九九一年)，這場冷戰的歷史便歷經了好幾波重新詮釋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對冷戰起源作出了

「正統」解釋，將其歸咎於蘇聯充滿敵意地強化著特別是在東歐的種種富侵略性的謀劃。在一九六〇—七〇年代，知識分子中富批判性的左派潮流發展出「修正主義」解釋，這顛覆了早先所設想的情境：美國人在此解釋中往往被視為侵略者，他們將其帝國野心隱藏在「捍衛自由」這樣冠冕堂皇的聲明下。第三個階段「後修正主義」試圖找到一個折衷性觀點，其作法是將意識形態排除在故事之外，並且冷靜地將強權國家視為「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行動者來分析。更為晚近的學者們(受益於新近開放的檔案庫)透過觀察東西軸以外的冷戰，在方方面面撼動了這個領域：例如從地理「邊緣」的角度來切入、對非國家行動者和聯合國等組織作用的強調、還原較小國家的能動性，以及像是对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素的重新省視。<sup>56</sup> 正統觀點和修正主義沒有既定的政治主張：在法國大革命的历史研究中，左派為正統觀點而右派是修正主義，不過在對冷戰歷史的研究中情況則正好相反。對現有觀點的挑戰並不必然是受到政治觀點的影響。戈德哈根試圖對納粹大屠殺提出修正觀點，顯然不是出於一個明顯的左翼或右翼的主張，而是出於強烈的猶太人認同，還有其父親為大屠殺倖存者的事實，他自己承認這有很深刻的影響。對既定解釋的挑戰並不是每次都由政治或是其他具有強烈信念的主張所推動的，不過修改和重新解釋的過程總是提供了讓歷史領域或歷史問題保持活力的能量和刺激。

學術研究的革新並不一定涉及到新一代的歷史學家攻擊前人的著作。事實上，企圖摧毀你所屬領域的傑出研究，這種做法日漸被視為根植於一種過時的零和學術觀，認為

只有藉由證明別人錯誤才是正確的。正如我們在前幾章所看到的，歷史研究的作法在近幾十年來已經發生了變化，不過是以一種不同於攻擊前人的方式進行的，像是研究新的歷史行動者、新的空間視角並且將新的物品納入考量：一場革命若改從女性的角度切入便會截然不同，若從奴隸的角度來看待蓬勃發展的經濟體也是如此；如果觀察的角度是從該國的邊疆而非核心區域的話，一個民族國家的出現似乎不再是那麼必然的。不同解釋之間的改變，因此可以是從「內部」發生的，像是一位主流歷史學家對另一位主流歷史學家的解釋提出異議的時候，也可以是從「外部」發生的，即當某人從(社會的、性別的、種族的、地理的)邊緣角度提出重塑整個歷史圖景的觀點之時。

## 史料和檔案是否創造了歷史？

讀者現在可能會問自己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當歷史學家找到的史料當中有他們先前不知道的事情時，歷史是否會改變？此問題的簡短答案是：不會。從事歷史研究已經不再是去發掘能「解釋一切」或「改變一切」的文件，就像從事考古學研究不再像印第安納·瓊斯(Indiana Jones)那樣，披荊斬棘地前往尋找失落的法櫃<sup>57</sup>；尋找到令人驚訝的史料通常是饒富新意的研究之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如果有人找到希特勒下令大屠殺的實際文件，這肯定是頭條新聞，但到頭來大屠殺研究領域並不會因此轉變，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同意種族滅絕乃是出自於一系列複雜的原因和不斷變化的情況。歷史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有許多「突然發現什麼的時候」(eureka moments)<sup>15</sup>，但是這些時候之所以會出現，則是奠基於在該領域所受的訓練加上在該主題中的浸淫，是這些才會讓你有力鑑別出某個史料的可能性。一個曾經令一位學者興奮不已的文件，其他人在讀完之後可能會覺得困惑、無聊，或兩者兼有。罕見的史料確實存在，不過唯有當一位極富創意的歷史學家想出該如何運用它的時候，這史料才會獲得特殊的地位。

最近的北美史研究中最著名的史料之一是緬因州的助產士瑪莎·巴拉德 (Martha Ballard) 從她五十歲即一七八五年起直到一八一二年她去世為止每天記錄的日記。這份文件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並非無人知曉，數十年來都有被當地的學者和分娩歷史學家引用，不過甚至是這些學者也傾向視其為大量重複的「瑣事」而沒有認真看待它。<sup>57</sup>確實，如果一個人隨意地稍加研究此日記 (原始手稿和打字的謄錄版本都可以在網上找到)，一些古怪有趣的記事很快會變得單調乏味。一七九一年六月七日寫道：「(今天) 上午晴天結霜。我鋤了(我的) 玉米田和豆田。我的(女兒們) 和帕台提娜 (Parchena) 去了漢姆斯 (Hamlin) 先生家，懷特 (White) 女士還有蘇爾西·諾克羅斯 (Sulcy Norcross) 則在這裡。我後來跟她們一塊去了立佛摩爾 (Livermore) 先生家。」六月八日：「晴。立佛

摩爾夫人在這裡織東西，舒伯爾·辛克萊斯 (Shuball Hinkys) 先生的千金在此。我一直在家，我全部的孩子都跟我用餐。喬納 (Jona) 吃「早餐和喝茶。居魯士 (Gyrus) 出門後帶著豬回家了。」一日復一日地記錄下諸如此類的簡短條目有接近一萬則。確實也有戲劇性的事情發生過：兒童和成年人死於疾病和分娩，巴拉德風雨無阻地來回於肯尼貝克河 (Kennebec River) 之間艱難的路程協助婦女分娩，她參與了屍體解剖並描繪於日記中，一名法官被指控強姦鄰居妻子隨後被無罪釋放，以及有人被謀殺。這些戲劇性的事件在當時所激起的情感起伏，在巴拉德璞玉般的紀錄風格下只被呈現出極小的部分：「薩維奇 (Savage) 先生在這兒。他通知說，福斯特 (Foster) 太太已經宣誓並且指控一群男人強姦了她，其中包括了諾斯法官 (Judge North)。真令人震驚。」<sup>58</sup> 歷史學家烏爾里奇以這

<sup>14</sup> 譯注：印第安納·瓊斯為電影《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 主角，《法櫃奇兵》為一九八一年由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 所導演的一部動作冒險電影，由哈里遜·福特 (Harrison Ford) 主演，敘述二次大戰時期納粹德國尋找失落的法櫃 (又稱約櫃)，並意圖創造無敵軍隊，而印第安納·瓊斯與之對抗的故事。

<sup>15</sup> 譯注：又稱「尤里卡時刻」(eureka moments)，尤里卡是一個源自希臘用以表達發現某件事物、真相時的感嘆詞。

份沒有發展性的史料為基礎創作了一部著名的婦女史著作《助產士的故事》(A Midwife's Tale)。烏爾里奇逐一檢視了這二十七年的日記，再補充以像是稅卷、地契、法庭記錄、其他日記，甚至小說等各種資料，她完成了不凡的重建壯舉，將一位不起眼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的各種作為，與其社區在十八世紀末的生活景況拼湊在一塊。烏爾里奇從數千則日記中提供的訊息中梳理出了一位出色的助產婦的故事，她共接生了八百一十四個孩子，自己生下了九個孩子，並協助進行屍體解剖，但其才華在當地男醫生的陰影籠罩下因而顯得不起眼。在這個世界裡，丈夫和妻子分別在兩個平行的經濟體中工作，兩個經濟體當中都有買賣和交換行為；當時婚前性行為很普遍，孩子們大多是自由戀愛，而且婚姻不需要大費周章；外來者時常進出此地、婦女們一塊工作，不過人與人之間親密的友誼似乎不存在。<sup>59</sup>多虧這位歷史學家的堅韌和耐心，一個完整的過去世界從日記紀錄中重新活了過來。烏爾里奇寫道：「這本日記的難處和價值都在於其驚人的持續性。」「這本日記之所以如此強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使用起來是如此地困難，還有其堅持每日記錄的不屈不撓上。」<sup>60</sup>烏爾里奇的書是一個歷史學家憑直覺知道其潛在價值進而「創造出」史料的絕佳例子。其具有更普遍意義的地方是，當問題被構想出來之後資料也就會隨之浮現；如果社會史和婦女史沒有出現，不會有人會想得到要投入許多年去細讀十八世紀新英格蘭婦女的日常紀錄。

突顯歷史學家在「製造」史料上的角色，並不是要否認文件的具體存在和可獲取性有其重要性；對於文件的使用規定會隨著政權改朝換代而縮緊或是放寬，或者是被收藏的文件會隨著時間流逝對外開放，又或者相反地，當天災人禍導致檔案遭到破壞時，這對整個研究領域會有很嚴重的影響。而且儘管歷史學家的確透過提出某些特定問題而非其他問題來「製作」他們的證據，不過另外一樣常見的狀況是，史料的存在決定了歷史被表達的方式，這個命題在近年來引發了一整套批評性思維——什麼才算得上是一間「檔案館」，為什麼？是誰決定哪些文件應該被保存？那些沒有被記錄的往事，它們的歷史怎麼辦？

關於寫作歷史的標準教材通常包括了不同種類史料的清單：敘事和回憶錄、州和地方政府檔案、報紙、宗教和司法記錄、私人文件和日記、各種圖像、錄影和錄音等等。<sup>61</sup>在列出這些清單之後，往往是必須對上述史料進行批判性評估的忠告，以及如何糾正偏見或虛構的建議。<sup>62</sup>史料問題應該是歷史研究工作技術面中最沒有爭議的，因為我們都同意必須要找到最好最多的史料，並以最大的努力、責任感和謹慎的態度運用它們。

與此領域的其他許多方面一樣，近幾十年來史料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有趣。歷史研究的標準觀點是一名學者前去一間充滿塵埃的檔案館中工作；在大多數的時候情況確實仍然如此，不過許多檔案已經不再佈滿塵埃（特別是那些更近期的時代），而且「前去」越來越有可能是指透過網際網路搜尋數位化版本的文件。但「檔案館」究竟是什麼呢？是誰創造了並決定什麼東西可以被收入其中？我們現在所認知的檔案一直以來都是被社會

上掌握權力的群體和個人所創造的：擁有讀寫能力等資源的人相信有關他們過去的紀錄必須要被保存下去。幾十個世紀以來，佔有支配地位的個人、家庭、統治機構以及宗教和教育機構出於兩個理由保存紀錄，其一是實際考量：建立起對權力的所有權以及管道、記錄下仲裁和懲罰；其二是相信自己的行為和決定值得被銘記。如同西方現代歷史寫作其他面向，「革命時代」（一七八〇年代至一八五〇年代）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各國的國家檔案館在此時代陸續成立，確保新建立的民族國家擁有能安置其集體記憶的儲存場所。例如，法國國家檔案館（The French National Archives）於一七九〇年跟著新政權一起成立，作為「奠定國家憲法、公民權利以及法律相關法案的收藏地。」這個國家機構的建立傳達了新秩序的意識形態信條，表現在頒布了統一性（單一收藏地）和民主透明（至少在理論上提供公眾閱覽的政府紀錄）這兩個原則。<sup>63</sup>其他歐洲國家也很快地群起效仿。

檔案館定義了現代國家，而政府具有控制什麼可以被收入檔案館的特殊權力，藉此來塑造國家的過去：各國政府基於廣泛的考量來決定哪些訊息應該保密以及保密期限的長短，這深刻地影響了國家的過去如何被敘述。正如海地裔學者特魯約（Michel Rolph Trouillot）所評論的，檔案館藉由規定寫作歷史必須具備的條件，勾勒出了歷史學家現代式公會的面貌。他們藉此認證歷史研究，「控制檔案館的權力，決定了歷史學家與業餘者或專業人士和騙子之間的差異。」<sup>64</sup>借用波頓（Antoinette Burton）的話，檔案館不僅僅是

被動的文件庫，也是「具有完全自主權的歷史行動者」。例如，殖民地檔案庫的情況顯然就屬於後者，檔案庫中對紀錄的保存與實行和維持海外控制密不可分。<sup>65</sup>

因此，文件的收集和保存方式都暗地規範了歷史應該如何書寫。建立於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家檔案庫，與政治及制度史寫作十分契合。即使被研究的機構是反對者（例如勞工、爭取選舉權運動者、或者民權組織），檔案記錄一般來說也是側重領導階層的活動，還有人們生活中最為刻意營造以及與公共有關的那些層面。希望重建普通百姓生活的歷史學家們不得不採取某些策略，像是多線並進式的艱苦重建——就如同烏爾里希的《助產士的故事》那樣，或是以違反常理的角度來閱讀史料。例如，傳教士或探險家關於遭遇到「野蠻人」的敘述，告訴我們的只是故事中的一面，但藉由留心字裡行間的弦外之音，我們可以嘗試重建出故事的另一面。

社會史家經常運用各式文件來取得與原始目的無關的訊息。司法記錄是典型的案例，這已被證明是蒐集不識字者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態度相關訊息的寶山。寫下這些紀錄的法官和調查人員目的是要證明有罪或無罪，但社會史學家則在被告或證人的證詞邊緣之處尋找其所透露出的不相干細節。例如在十四世紀初，一位名叫賈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的主教成立了一個宗教法庭來交叉詰問法國西南部的一個小村莊蒙大猶（Montaillou）的居民，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堅信一種叫做卡特里派<sup>66</sup>（Catharism）的異端邪說。富尼埃的法庭留下了大量宗教歷史學家所熟知的紀錄，但是在一九七〇年

代，法國社會史學家勒華拉杜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之所以挖掘這些紀錄，不僅是在尋找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證據，而且還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建中世紀村莊的社會生活。在他們洩漏了自己以及鄰居的祕密宗教觀點的同時，村民們提供了一幅已失落的社會世界景色。舉個例子，一個女人談到兩個鄰居在聊天的同時，「他們的女兒正在日光下替他們除蟲……他們四個人都在他們家的屋頂上。」無疑富尼埃主教感興趣的部分是兩位女性在聊天中討論人們如何忍受在火刑柱上被火燒之痛苦。「無知的生物！上帝當然會把這些痛苦攪到自己身上」不過這樣的故事也提供了關於衛生和社會關係的訊息：從別人的頭髮上摘下蟲子是一個漫長而親密的過程，這是情侶、家人和朋友之間親密的場合，也是交流訊息的場合。<sup>66</sup>

諸如此類的小插曲便是生動地重現出過去一切的基礎，包括了從村莊態度、衛生、性別、性別角色到少年牧羊人的世界觀。總而言之，社會史往往會在官方文件的邊緣處和「被刪除的部分」中找到最豐富的證據。即便如此，正如特魯約提醒我們的，歷史也建立在沉默之上，因為每一個故事的被傳誦都是建立在其他故事不被述說，或是被埋於其他許多層的敘述下這樣子的代價上。特魯約的《讓過去噤聲》(Silencing the Past) 開頭首章講述了一整組故事，當中每個故事都如俄羅斯娃娃一般逐個嵌套在一起。<sup>67</sup> 它首先描述了一座位於海地北部山丘上，名為聖·蘇西 (Sans-Souci) 優雅的十八世紀宮殿之廢墟，這是由亨利·克里斯多夫 (Henry Christophe) 建造的，他是海地革命的英雄，並於

一八〇四年以亨利一世 (Henry I) 的名義成為該島北部的國王。除了海地本地人以外，很少歷史學家聽說過這宮殿，因為加勒比海地區的歷史長久以來都被其他地方的歷史故事所掩蓋，而且聖·蘇西這個名稱 (法語直譯為「無憂無慮」之意) 讓人聯想到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於一七四〇年代後期在柏林郊外建造的那座著名洛可可式宮殿「無憂宮」。在亨利去世的前後這段時間來到這個島嶼的西方遊客，都從這名稱推論海地國王是按照腓特烈宮殿的樣式來建造他自己的宮殿；雖沒有直接證據能表明這一點，但是亨利精通歐洲歷史，並且熟識一些居住於其王國的德國居民。不過這種被假想出來的與普魯士之聯繫，正如特魯約所表明的，掩蓋了一個名為聖·蘇西的人之存在，一位可能以海地某個農村地區或街區為名的男子。聖·蘇西 (Jean-Baptiste Sans-Souci) 曾經是種植園的奴隸，後來在奴隸反抗軍中升任為指揮官，在亨利的統治之下與法國人作戰。到了一八〇二年，像是亨利這樣的黑膚色法裔克里奧人 (海地出生) 指揮官與像是聖·蘇西這些在非

<sup>66</sup> 譯注：卡特里派在十二、十三世紀於西歐相當活躍。他們信仰兩個神，一個是創造無形的精神世界的善神，一個是有形的物質世界的惡神。卡特里派甚至認為當時的教牧界也與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不是基督的代表，因此反對教階制度和神職人員擁有財產，也不認為聖事具有效力。



洲出生的領導人所帶領的部隊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中的戰爭」；亨利以談判為藉口召集他的前下屬參加會議並將其殺害。國王的宮殿和他所殺害的敵人有著相同的名字，這不是一個奇怪的巧合嗎？

注意到宮殿和屠殺場景之間的地理重疊，特魯約結論道這不可能是巧合：「更有可能是的，國王是在進行一場變革性的儀式來吸收他過去的敵人。」<sup>68</sup> 每個聖·蘇西的故事中都隱藏著另外一個故事：著名的德國宮殿掩蓋了在海地的那一座；將亨利國王描述為親歐人士的故事掩蓋了非洲人聖·蘇西的死亡。就如同西方的歷史學家記得的是腓特烈而不是亨利，海地的歷史學家們選擇不去回憶在他們光榮的民族解放戰爭當中有另外一場海地出生的克里奧人與非洲出生的「剛果人」之間的戰爭。特魯約指出，在歷史記錄中，有些事實佔據了中心位置，而另外一些事實則被消音，就跟「滅音器消除槍枝的聲音一樣」。<sup>69</sup> 最顯而易見的史料是當時歐洲和美國遊客的記錄，其自然而然地把歷史學家引向海地君主以令人欽佩的歐洲楷模來命名其城堡的這種故事。這個被謀殺的非洲人對手的故事因而被消音，所以需要更細膩的心思以及挖掘方能讓其重見天日。

挖掘出藏在既有敘事背後的故事並不是一定辦得到的。許多我們尋求答案的問題（十七世紀易洛魁<sup>⑦</sup> [Iroquois] 婦女如何看待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其材料往往不足或者不存在。當歐洲人來到美洲時，易洛魁聯盟主要佔據今日美國的東北部地區。儘管不識字的社會和沒有權力的人群，特別是那些遠古時代的人群，很容易被預設沒有留下什

麼蹤跡，但是研究人員的巧妙心思和耐心經常證明懷疑論者是錯誤的。例如，中非歷史學家已經打破赤道非洲或班圖大湖區（Bantu Great Lakes region）位於熱帶雨林中的社會在幾個世紀或幾千年當中都不會改變，這種以所謂歷史語言學方法建立起的神話。<sup>70</sup> 這些方法便是從十八或十九世紀最早的紀錄開始倒推，像是當時語言學家寫的文章，或是需要用當地語言溝通的傳教士所留下的文件。這些被保存下來的文字描繪了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現實狀況，不過它們所記載下的不僅止於這些而已；如果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語言包含了相似的術語，那麼這些術語可以追溯到一個最初的根源語言，讓歷史學家得以拼湊出更早的生活模式。<sup>71</sup> 例如，假設東庫希特語（Eastern Cushitic）的兩個分支語當中擁有關於驢的詞彙，而兩個分支語唯一連結的地方是在東庫希特語這個原語言的節點上，那麼歷史學家可以假設驢存在於說著原始東庫希特語的社會中。<sup>72</sup> 早期語言和後期語言在意義範疇上存在的差異，讓特別是非洲的歷史學家得以打破有些人活在「時間

⑦譯注：易洛魁聯盟（Iroquois）是北美原住民聯盟。使用易洛魁語言的北美原住民部族在今紐約州中部和北部逐漸開始共同生活，並在十六世紀或更早前結成聯盟關係，由五大部族莫霍克人、奧奈達人、奧農達加人、塞內卡人和卡尤加人組成。

不會流動的地方」這樣的神話。歷史語言學的實踐是非常勞動密集的，而其成果往往充滿令人生畏的專業術語，但是這方法，展現出想像力和執著在歷史重建中的價值，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只有研究相當晚近時期的歷史學家才能夠藉由口述歷史的方法創造出自己的史料來直接解決欠缺記錄的問題。<sup>73</sup>這種方法透過系統地採訪那些經歷過過去的人來捕捉過去，主流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對此抱持著懷疑態度；他們聲稱，訪問者可能帶有某種動機或偏見，而且受訪者的記憶和動機無法被信賴，而且口語一般是不可靠和主觀的，遠不如書面文件。遲至二〇〇一年，一本歷史研究指南仍警告道，「歷史學家必須透過其他方式進行驗證後，才能信任口述材料」，而訪談「本身就是種解釋，這是一種必須非常謹慎分析的材料」。<sup>74</sup>

如今，許多歷史學家都反對書面資料比口頭資料「更好」這種觀點，因為這是針對過去不識字群體的隱性偏見。書面文件中有非常多種實際上是事件口頭紀錄的謄錄，例如演講、集會中的辯論和法庭上的證詞。訪談固然有其扭曲和主觀性，不過它能夠讓歷史學家得知的，與其說是關於過去的一些難以捉摸的「真相」，還不如說是對於那些經歷過過去的受訪者而言，過去的意義為何，這是口述歷史的實踐者同樣採納的方式。甚至連證言中的錯誤和歪曲都可以透露出許多事情，談話錄音中奇怪的地方——節奏、暫停、猶豫等等，則提供了有關感受和態度的線索。正如這類史學中的一位頂尖學者所說

的：「對歷史學家而言，口頭史料當中獨特而珍貴的部份……便是言說者的主觀性。」<sup>75</sup>

口述歷史的作法也與所有其他的方法極為不同，因為這是歷史學家唯一會在進行研究的同時創造出史料的例子。歷史學者和訪談者通常都帶著自我意識進入自己的角色，充分意識到他們的參與和提問都非常有可能讓材料有所改變。賀蕭（Gail Hershatter）與一位中國同事一塊花了許多年訪問陝西省偏遠農村的婦女關於她們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革命和集體化經歷，賀蕭對於自己作為外國學者所吸引的關注感到不安——特別是當她回到以前訪問過的家庭，發現自己的照片和珍貴的家庭肖像被擺在一塊展示的時候。<sup>76</sup>賀蕭盡可能地讓自己已不那麼顯眼，她利用口述歷史來打破長久以來中國革命為女性做了什麼的說法。

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成立政權後，聲稱把婦女從隱蔽的「家中」工作中解放出來，並一視同仁地將她們引入過去只有男性的公共性、支薪以及受肯定的工作，並且參與政治生活：現在婦女們和丈夫一起耕田，有些婦女則作為「勞動模範」投身領導階層。<sup>77</sup>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些都是有積極意義的發展，但是賀蕭透過與村中的老年婦女交談，發現了許多革命「進步」的黑暗面。除了作為男性在公共田野工作的平等夥伴之外，婦女還得繼續從事更為傳統的家務勞動「第二班」（second shift），包括無休止的夜間縫紉，好讓全家人有衣服可穿，這種「家中」勞動並不存在於官方說法中，「當沒有電時，我會點上一盞燈來做針線活。當我的兒子們醒來的時候，我抱他們去撒尿，然後再把他們放回床上。我為兒

子們做衣服到三更半夜。我白天在集體農場工作。我都是不眠不休，那時候的自己真是太可憐了」<sup>78</sup>名為蕭改葉的婦女所說的這些話，與其他人的說法雷同，她們描述自己會把握所有可能的空檔（黨的會議時、田野工作的休息時間）來完成針線活，也陳述了這樣蠟燭兩頭燒所造成的精疲力竭。這些婦女生命中許多特點，與國家認可的進步敘事背道而馳：降低嬰兒死亡率對革命來說是種成功，但對母親來說卻是一個問題，因為必須要用早已不足的資源來撫養更多的孩子。女性的記憶模式與男性大相逕異，她們的回憶並未與官方說法中的大躍進「之前」及「之後」聯繫在一起，而是以中國十二生肖的動物來加以區別的孩子出生年份聯繫在一起。如果沒有質蕭的訪談，這些婦女及其邊遠社區在這場巨大的政治變革時期的經歷就會喪失，並會因偏重於菁英、男性和城市經歷的政治變化，而讓我們對一九四九年革命如何影響社會的理解貧乏許多。

歷史作為主題，其內容擺盪於描述和解釋之間，而後者通常是由辯論形成的。作為「單純的故事」的歷史，在某些大眾歷史作品中仍然存在著，不過即便是暢銷傳記和軍事編年史，其中也必然隱含著某種觀點或價值判斷，而且這類作品直截了當地提出明確論點的情況亦十分常見。書籍、紀錄片和博物館展品的製作，當中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會有明顯的取捨，而最「公共」的歷史形式——博物館與遺址，不時也會捲入激烈的爭端之中。

專業的歷史學公開地歡迎辯論，因為這是推動研究與詮釋的動力來源：從大學生到

退休教授，所有學者的目標就是要在學術對話中發表有新意的東西。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驅動著對史料的搜羅（而不是史料刺激了研究的計畫）。從事歷史研究需要大量的堅持、耐心和有創意的原創性，有時候還得需要天外飛來一筆的好運氣：在大多數情況下，你必須受過多年訓練才有可能「撞見」絕妙史料，而且你會找到什麼東西都是來自於你所提出的問題。研究者在口述歷史這個特例中將這個觀點發揮到極致，他們真的創造出自己需要的史料。然而，有很多研究問題永遠都不會有材料，而那些被視為不值得被紀錄的人們，他們的故事永遠都無法被訴說。

1. Adam Hochschild, "Statement about Writing," <http://www.liquisearch.com/adamhochschild/statementaboutwriting> (accessed January 27, 2016).
2. 關於歐洲歷史研究專業化女性被邊緣化的情況，請參閱 Bonnie Smith, *The Gender of History: Men, Women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salind O'Hanlon, "Premodern Pasts: South Asia," in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Wiley Blackwell, 2014), 107-21. 中譯本：杜希德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Jan Vansina,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2.7-44.
5.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Age*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第一章。中譯本：格奧爾格·伊格斯著，楊豫譯，《二十世紀史學》（臺北：明明出版社，2003）。
6. Ibid.; Georg G. Iggers,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2002), 226-29.
7. 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4), 300. 我感謝丹尼爾·伊莫因 (Daniel Immervahr) 讓我注意到這段話。
8. Iggers, "Professionalization," 230-31; Robert Townsend, *History's Babel: Scholarship,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Enterpri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第一章、二、四章。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第一章。中譯本：彼得·諾維克著，楊豫譯，《那高貴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史學界》（北京：三聯出版社，2009）。
9. Iggers, "Professionalization," 234-35.
10. Peter Mandler, *History and National Lif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2) · 第一章。
11.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 第三章。
12. Townsend, *History's Babel*, 31-35. 美國歷史協會的成員在二〇一四年的統計有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十六·二的人任職於「四年制學院」，五十七·三為「大學」。二十一·七的人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合理推論教授佔目前美國歷史協會成員的八成以上。（由美國歷史協會的主任莉茲·湯森 (Liz Townsend) 於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透過電子郵件提供的會員調查報告。）
13. 伊恩·泰瑞爾 (Ian Tyrrell) 描述了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以前美國學術與通俗歷史的複雜關係，請參閱其著作 *Historians in Public: 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 189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第二、十一章。遺憾的是，對於更為晚近時代還未有類似的綜合研究。
14. 關於英國「名人史學家」的討論，尤其是賽門·夏瑪，請參閱 Jerome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Historians and Heritage in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9), 17-22.

15. Stetanie Cohen, "Fourscore and 16000 Book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2, 2012. 在華盛頓特區的福特劇院博物館 (Ford's Theatre Museum) 的特色是其中一座三十四英尺高全部都是由關於林肯相關書籍組成的書塔。
16. Gordon Wood, "The Man Who Would Not Be King," *New Republic Online*, December 16, 2004,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george-washington-founders-gilbert-st> (accessed January 27, 2016).
17.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entral Af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中譯本：亞當·霍赫希爾德著，厲喜林譯，《利奧波德德國王的鬼魂：貪婪、恐懼、英雄主義與比利時的非洲殖民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18. *Ibid.*，第八〇一、一〇五章。
19. Alan Riding, "Belgium Confronts Its Heart of Darkness: Unsavory Colonial Behavior in the Congo Will Be Tackled by a New Stud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02; Debora L. Silverman, "Diasporas of Art: History, The Royal Tervuren Museum,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Belgium, 1885-20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7 (September 2015): 16-18.
20. 大衛·哈倫 (David Harlan) 寫道：「肯·伯恩斯是全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而且哈倫指出，有二千三百萬人觀看其內戰紀錄片的頭兩集，一千四百萬人觀看了全部九集。Harlan, "Ken Burns and the Coming Crisis of Academic History," *Rethinking History* 7, no. 2 (2003): 169.
21. De Groot, *Consuming History*, 149-60;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History Goes to the Movies: Studying History on Film* (London: Routledge, 2007) - 第六章。
22. Eric Foner, *Who Owns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2) - 第六章；Robert Brent Toplin, ed., *Ken Burns's The Civil War: Historians Resp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第六、七章 (並請參閱在同一卷中婦女和軍事歷史學家對他的批評，第四、八章)。
23. 即使大衛·哈倫這位比較認同伯恩斯的評論家，也指出他製作影片的方法總體來說比起大多數專業史家樂觀以及較不帶批判性。Harlan, "Ken Burns," 171-80.
24. Sean Wilentz, "America Made Easy," *New Republic*, July 2, 2001, 35-40.
25. 洛文塔爾對其立場的簡短又格外激烈的陳述，請參閱他的「Fabricating Heritage," *History and Memory* 10 (Spring 1998): 5-24. 或見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第六章。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關於馬薩達，請參閱 Yael Zerubavel, "The Death of Memory and the Memory of Death: Masada and the Holocaust as Historical Metaphors," *Representations* 45 (1994): 72-100; Zuleika Rodgers, ed., *Making History: Josephus and Historical Method* (Leiden: Brill, 2007).
26. Lowenthal, "Fabricating Heritage," 8.
27. James Oliver Horton and Lois E. Horton, eds., *Slavery and Public History: The Tough Stuff of American Memor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 關於蒙蒂塞洛，見第七章。
28. James Oliver Horton, "Sla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An Uncomfortable Debate," in *ibid.*, 49-53.
29. 「公共史學」通常指的是歷史學家在向公眾提供有關過去的文化遺產、博物館、國家公園和檔案館等所做的工作，但是「公共」究竟是指公共資金、或是向公眾開放、或是致力於公共服務和進步政策，或是以

- 上這樣的組合，又或者是該領域與學術界的關係，實踐者對此仍未有定論。請參閱 Denise D. Meringolo, *Museums, Monuments and National Parks: Toward a New Genealogy of Public History*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2), xiii-xxv. 有關該領域在美國的起源之說明，請參閱 Tyrrell, *Historians in Public* - 第九章。
30. Meringolo, *Museums* - 第三章。
31. *Ibid.*, 160-63.
32. Roy Rosenzweig and David Thele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Popular Uses of Histor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 *Ibid.*, 106-7. 羅森茨維格和塞倫所調查的是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歷史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在那之後直到現在每年都持續地減少。請參閱 Cary Carson, "The End of History Museums: What's Plan B?," *Public Historian* 30 (Fall 2008): 9-27.
34. Ludmilla Jordanova, *History in Practice*, 2nd ed.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06), 126-31.
35. 以下的說法參考由 Edward Linenthal, "Anatomy of a Controversy" in Linenthal and Tom Englehardt, eds., *History Wars: The Enola Gay and Other Battles for the American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6): 9-62.
36. *Ibid.*, 20.
37. 有一些著作綜合性地處理了環繞著巴黎布朗利河岸以及馬賽歐洲和地中海文明這兩間博物館中的歷史方法（或者是不存在任何方法）的論辯，請參閱 Caroline Ford, "Museums after Empire in Metropolitan and Overseas Fran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2 (September 2010): 625-61, and Daniel J. Sherman, *French Primitivism and the Ends of Empire, 1945-19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191-211.
38. Adam Hochschild, "In the Heart of Darkn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2, no. 15 (October 6, 2005).
39. Silverman, "Diasporas of Art," 16.
40.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 第一章。
41. J. S. A. Adamson, "The English Nobility and the Projected Settlement of 1647," *Historical Journal* 30 (1987): 567-602, 以及 Mark Kishlansky, "Saye What," *Historical Journal* 33 (1990): 917-37 - 是這場如同動亂般漫長辯論中最早的文章。
42.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2nd e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8), 47-48.
43. *Ibid.* - 第一、八章。
44. *Ibid.*, xvi.
45. *Ibid.*, 第十八章。白朗寧的分析借鑒了一九六〇年代耶魯大學的史丹利·米爾格蘭 (Stanley Milgram) 著名的實驗，其中不知情的受測成員願意對其他成員（其痛苦地地尖叫，不過實際上卻是演員）進行一連串不斷增強的電擊，因為作為一個科學權威者的研究者向他們保證這樣做沒有錯。
46. Daniel Jonah Goldhagen, "The Evil of Banality," *New Republic* 207 (July 13-20, 1992), 52.
47. 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9. 中譯本· 丹尼爾· 喬納· 戈德哈根著· 黃宗誼譯· 《希特勒的核願行刑者》(北京· 新華出版社· 1998)。

<sup>48</sup> Ibid., 48.

<sup>49</sup> 關於此問題的現狀· 請參閱 Peter Longerich, *Holocaust: The Nazi Persecution and Murder of the Jew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eter Kenz, *The Coming of the Holocaust: From Antisemitism to Genoc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50</sup> 這本書在德國賣得更好· 這是該國戰後文化的許多症狀之一· 被稱為「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對於精準數字· 請參閱 John Rohl, "Ordinary Germans and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The Goldhagen Controversy," in William Lamont, ed. *Historical Controversies and Historians* (London: UCL Press, 1998), 16. 關於這本書在德國的回響· 請參閱 Robert R. Schandley, ed., *Unwilling Germans? The Goldhagen Debate*, trans. Jeremiah Riem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新戈德哈根此書在歷史學術批評· 請參閱 Ruth Bettina Birn, "Revising the Holocaust," *Historical Journal* 40 (1997): 195-215.

<sup>51</sup> Gerald Kavanauagh, "The Present State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Alfred Cobban and Beyond,"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 (Fall 1972): 587-606, 特別是頁 596-97.

<sup>52</sup> 在論這個領域中「正統」和「修正主義」的經典作品是 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 · 最近該領域的書籍· 請參閱 Thomas Kaiser and Dale Van Kley, eds., *From Deficit to Deluge: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中譯本· 威廉· 多伊爾著· 張弛譯·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sup>53</sup> Alfred Cobban,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sup>54</sup> George V.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2 (1967): 491.

<sup>55</sup> 請參閱· 例如 Suzanne Desan, "What's after Political Culture? Recent French Revolutionary Historiography,"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3 (2000): 163-96.

<sup>56</sup> 對於最近的綜合論述· 請參閱 Melvyn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4 (1999): 501-24; Odd Arne Westa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London: Frank Cass, 2000); Richard Immerman and Petra Goedd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57</sup> Laurel Thatcher Ulrich, *A Midwife's Tale: 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 Based on Her Diary, 1785-1812* (New York: Knopf, 1990), 8-9.

<sup>58</sup> Ulrich, *Midwife's Tale*, 102. 該條目錄一七八九年十月一日。

<sup>59</sup> Ibid.,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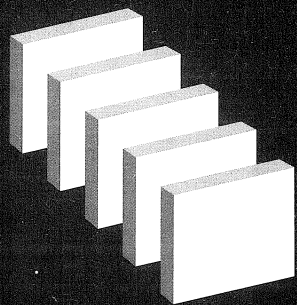
<sup>60</sup> Ibid., 21, 33.

<sup>61</sup> 請參見· 例如 John Tosh, *The Pursuit of History*, 5th ed. (Harlow: Pearson, 2010) · 第四章 · · Martha

- Howell and Walter Prevenier, *From Reliable Sources: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據 | 冊。
62. Tosh, *Pursuit of History*, 124-30; Howell and Prevenier, *From Reliable Sources*, 60-68.
63. Jennifer S. Milligan, "What Is an Archiv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France." In Antoinette Burton, ed. *Archive Stories: Facts, Fiction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1.
64. Michel-Rolph Trouillot, *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 52.
65. Antoinette Burton, "Introduction," in *Archive Stories*, 7.
66.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Montailou: 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 trans. Barbara Bra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8), 141. 中譯本：埃曼紐·勒華拉杜里著·許明龍譯·《蒙大猶》(台北市：麥田·2001)。
67. Trouillot, *Silencing the Past*, 35-69.
68. *Ibid.*, 65.
69. *Ibid.*, 48.
70. Jan Vansina, *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 尤其是第一章·David Schoenbrun, *A Green Place, a Good Place: Agrarian Change, Gender,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to the Fifteenth Century*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98), 3-61; Christopher Ehret, "Linguistic Archaeology,"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29 (September 2012): 109-30.
71. 「語區年代學」(glottochronology) 是一種名字嚇人的輔助技術·讓研究人員得以建立出語言變化的平均時間跨度·進而確定一個語言的粗略年代。Vansina, *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16.
72. Ehret, "Linguistic Archaeology," 24.
73. 有關該方法的細節·請參閱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4. Howell and Prevenier, *From Reliable Sources*, 26-27.
75. Alessandro Portelli, "The Peculiarities of Oral History,"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12 (Fall 1981): 99. 見下列書目第九章「口述歷史」Anna Green and Kathleen Troup, eds., *The Houses of History: A Critical Reader in Twentieth-Century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0-52, and Gwyn Prins, "Or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4-39.
76.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9. 中譯本：賀蕭著·張寶譯·《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7. *Ibid.*, 287-88.
78. *Ibid.*, 192.



CHAPTER 5  
CAUSES OR MEANINGS ?



第五章  
原因或意義？

## 因果關係和歷史

艾德華·卡耳 (E. H. Carr) 的《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 於一九六一年首次出版，至今仍是歷史學中最被廣泛閱讀的導論書籍之一，其中包括令人難忘的精闢聲明：「研究歷史就是在研究原因。」<sup>1</sup> 大多數人直觀地會覺得這種說法是合理的：「發生了什麼」故事與「為什麼發生」的考慮必然密不可分。當你描述一個打敗仗的將軍、戰勝雇主的罷工者或是推翻政府的不滿者，不可能不提出一些關於其原因的思考。從這種常識性的觀點出發，二〇一五年美國頂尖歷史期刊圓桌論壇的名稱可能會令人感到詫異：「解釋歷史變化，或是：原因的失落史。」此論壇進行的方式為讓一組傑出的專家學者交換意見，《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的編輯開宗明義就替此論壇定調，指出「在不久以前，歷史學家還認為思考原因是歷史分析中的基本元素。」他繼續寫道，學術書籍和文章過去糾結於如何解釋新教改革、歐洲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崛起或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但是「主流史學家已經很久不用『原因』與『因果關係』來思考問題了」<sup>2</sup> 對於那些在歷史學術界以外的人來說，在「原因」一詞上冠上引號可能會頗為費解：歷史中原因的研究怎麼會變得如此惹人非議，以至於要以「我們清楚我們早就不這麼做了」如此具防衛性的態度來使用這個詞？追究原因究竟有什麼不妥，而且如果歷史學家不再查找和描述原因，這種追求是被什麼取代了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章討論了「歷史解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這項課題是如何總是同時被朝兩個不同方向拉扯。這種分歧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像是描述相對於解釋，共時描述 (synchronic description，同一時刻彼此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歷時分析 (diachronic analysis，事物如何隨時間變化)，或者是如本章的標題：意義相對於因果關係。任何寫作歷史的人都會告訴你，這些東西在實踐中是分不開的：描述戰爭如何輸了，罷工如何取得勝利或政府如何被推翻的歷時性、因果性和鉅細彌遺的故事，對讀者來說意義不大，除非作家在敘述到某處時暫停下來，開始共時描述士兵的數量和訓練、工會的領導者和目標，或者是政權反對勢力的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在大多數時候，多數歷史學家在其散文中將描述、敘事和解釋融為一體，而在最好的情況中，這些技巧以非常巧妙的方式交織在一塊，讓讀者不會在多種思考方式轉換的中間感到突兀。不過本章認為，在分析的時候將這些方式拆解開來是重要的，因為它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研究這項事業。「因果分析」在卡爾寫作《何謂歷史》的時代確實是歷史研究的中堅力量。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一些將焦點集中在其他方面的新趨勢出現了：不再那麼關心重大事件的起源問題，而是更加關心參與重大事件的人們在其世界觀當中究竟相信自己在做什麼；不再那麼關心過去有多少人從 A 點到了 B 點，而是更加關心人們如何先是在 A 點後來在 B 點體驗自己所處的世界。這些晚近的方法與「微觀史」或「文化史」等標籤連結在一塊；一些實踐這些方法的歷史學家在原則上不去考慮因果關係，在實踐中則是直接

地忽略它們，不過還有一些人試圖讓變化和意義共同存在。這兩種策略，關注原因或關注意義——在理論上或事實上是否無法相容也還沒有定論。歷史學家傳統上重視尋找以及排列出重大事件的原因，而文化史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降的崛起正是對此感到不安的一種跡象，不過這並不是唯一。根據因果關係來思考歷史，還有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傳統西方主張，這兩者之間究竟相關程度有多高？如果因果關係在跨國和全球史等新領域中仍有影響力的話，它是如何發揮的？

歷史學家自古以來都醉心於確定他們所敘述之事情的原因。大約三千年前，荷馬（Homer）將特洛伊戰爭爆發之起因追溯到兩位女神赫拉（Hera）和雅典娜（Athena）對於特洛伊人帕里斯（Paris）的憤怒，因為帕里斯在爭執女神所惡意設計的競賽中挑選了她們的對手阿芙蘿黛蒂（Aphrodite）。<sup>①</sup>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將波希戰爭歸因於人類的眾多慾望，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波斯國王薛西斯（Xerxes）狂妄的野心。與他的所處時代相近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解釋伯羅奔尼撒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s）爆發的做法是（正如歷史學家依然在做的），分辨出背景因素（雅典國力的茁壯）以及導火線事件（強權城邦被捲入對埃及皮丹努斯〔Epidamnus〕城邦的爭奪）。古代的事件刺激歷史學家反思政治變遷的原因和性質。公元前二世紀的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Polybius）構思出了政治變革的周期性模式，即國家由專制演變為君主制，再依序演變為僭主制、貴族制、民主制、暴民統治，最終再回到專制，每一次變革

都起源於統治者們與被統治者們之間在心理層面上的不斷變化。以君主制演變為暴政為例，當國王的子孫們發展出宛如根深蒂固的優越感時，這便會導致專橫和自私的行為，並且疏遠了自己的臣民。<sup>3</sup>

只要歷史不被看作是一個關於進展卻沒有確定答案的故事，個人的性格和行為就一直會被視為是重要影響因素。羅馬共和晚期的歷史學家憂心政治體制的衰落，希冀能從過去中找出「典範」（*exempla*），也就是可以對當代人產生某種吸引力的好行為或壞行為之典型，希望可以藉此將他們導向美德並告誡他們要遠離與美德相反的特質。歷史學家如薩盧斯特（Sallust）和李維（Livy），其著作寫於公元前一世紀，他們希望讀者能成為模範公民並且將共和國從腐敗中拯救出來。<sup>4</sup>歷史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中，即便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脈絡中，皆被理解為是實用名人故事的彙編，這些名人雖然活在過去，但是他們所處的世界被想像為與史家所處的世界沒有兩樣。

① 譯注：爭執女神即為厄里斯（Eris）。她是希臘神話中的不和女神。在《伊里亞德》（*Iliad*）中她是戰神阿瑞斯（Ares）的姊妹，因此也是宙斯（Zeus）和赫拉（Hera）的女兒，她在敵對雙方間散布著痛苦和仇恨。厄里斯因為沒有被邀請參加色薩利國王佩琉斯（Pelus）及海洋女神忒提斯（Thetis）的婚禮而懷恨在心，她下了一個刻有「獻給最美的」金蘋果，引起了一連串的紛爭與混亂。

把歷史視為可以跟史家所處的時代相類比的事件與人物的彙集，並且可以被用來當作榜樣或警告的想法，在西方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然而，啟蒙時代以及在其之後的民族革命，將記錄過去的方式徹底扭轉成當今世界大多數人所熟知的「歷史」形式。十八世紀思想家，如義大利的維科（Giambattista Vico）、法國的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和蘇格蘭的羅伯森（William Robertson）都提出「階段」（stadial）歷史這樣的新理論，將過去劃分為一系列具有鮮明特點的「時期」：神權、貴族、民主、無政府狀態；狩獵採集、遊牧、農業、商業；原始、野蠻，文明。<sup>5</sup>這些設計的推測成分大於經驗成份，不過其與十八世紀末的民主革命以及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結合在一塊，促成了通常被稱為「歷史主義」思維的誕生，這最初是由德國作家如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所提出的；其假定過去與現在完全不同，而且歷史學應該特別針對的是事件的獨特之處，而非與其他事件共通的地方。在某些類型的歷史作品中，對於某位統治者的勇氣或弱點的描述，只需要稍加修改之後就能被用到另一個不同的統治者身上，而在歷史主義的說法中德國的發展則會被視為與英國或法國的發展之間毫無可相比的可能。<sup>6</sup>

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所見，西方現代歷史思想的起源正好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歐美民族主義的誕生同時發生。新興的民族歷史凝聚在（直到現在仍然如此）極具重大意義的事件上。其中一些事件是非常象徵性的（阿金庫爾戰役〔the battle of Agincourt〕<sup>②</sup>之於英國人，史達林格勒圍城戰之於俄國人，聖女貞德的勝利和殉道之於法國人），有些

事件是創傷性和變革性的（革命、重大戰爭、反殖民主義抗爭），還有些則是較為漫長的，如西班牙對「新世界」的征服或北美殖民者向西的擴張。卡耳自信地提出歷史學是「對原因的研究」這種說法的時代背景是，對當時的歷史學家而言，最重要和最令人聲望的研究領域無疑是如德意志地區宗教改革的原因、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

不過，離因果關係要從歷史探究中消失還很遠。一方面，梳理和排序各種原因仍然是教導學生歷史分析時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革命的所有原因中，哪一個最重要？革命是肇因於通貨膨脹嚴重、快速工業化，還是因為人數快速成長的都市工人階級的勞動和生活條件變得日益嚴峻？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戰俄羅斯沒有參戰，這場動亂是否會發生呢？加入這場衝突的決策與俄國在一九〇五年被日本擊敗又有什麼關聯呢？列寧是一位極其能幹的領導者，而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就一位領導者而言格外無能，我們應該如何權衡這些事實的重要性呢？農民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又

② 譯注：阿金庫爾戰役發生於一四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是英法百年戰爭中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英軍在亨利五世（Henry V）的率領下以步兵弓箭手為主力的軍隊於此擊潰了法國的精銳部隊。

應該被放置在各種原因編織而成的網絡中何處？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以及西歐社會主義的例子之重要性又如何呢？亞歷山德拉皇后（Empress Alexandra）對神祕的騙子拉斯普丁<sup>③</sup>（Rasputin）的痴迷，或是王位的繼承人是一位罹患血友病的虛弱男孩，這些事情對於結果有任何影響嗎？從一個重大事件中反思、整理和分類導致該事件發生的各種因素，這是訓練權衡不同因素的極佳方式，像是以普遍因素對照特定因素、以直接的觸發原因對照遙遠的起因再對照介於兩者之間的各種因素、以實際發生的事情對照在不同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但有違於現存事實的結果。學生、學者或讀者從了解現在和過去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東西，仍然是為何要學習歷史最有力的論點之一。

## 追尋規律和模式：社會科學式的歷史與比較

不過學生們還有其他人並未從上述練習中學到或許被人們稱為「歷史規律」（Laws of history）的東西。自十九世紀，這個盛行以決定論<sup>④</sup>來思考因果的時代開始，各種思想流派都試圖把歷史視為一門科學來崇拜。7 歷史學家過去一直渴望讓自己的學科得到聲譽，其作法是論述他們的研究與不同科系的同事一樣嚴謹，而且同樣在具體上很有用，不過自然科學和歷史之間的類比從來都不是很具說服力。科學家為了預測而構思出因果規律

（原因A會導致結果B），而歷史學家則必須以追溯的方式來找出事件的起因（結果B發生時必然有原因A）；科學家們透過研究較易於控制的整套影響因素力圖建立可複製性，而歷史學家處理的則是本質上無法被重現的事件。8 歷史無法提供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每次都導出相同結果的規則並不存在。差可比擬的或許是歷史哲學家 and 社會科學家們提出的概率法則，這種主張最早於十九世紀由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提出，他認為當專制政權開始進行改革時，往往就會爆發革命。但是就像心理學一樣，能被納入歷史學考量的頂多是歸納法而不是演繹法：人類行為在任何特定的地點和時間都龐雜到無法被壓縮為幾條普遍性規律。9 雖然對自然科學和歷史學之間相似處的比較從未引起多大迴響，但歷史研究時常對社會科學有所貢獻，同時也從後者中汲取靈感。自十八世紀以來，許多學科的學術傳統皆利用歷史證據，針對各個社會之間不同的演變

③ 譯注：拉斯普丁為俄羅斯帝國尼古拉二世時的神祕主義者、沙皇及皇后的寵臣。

④ 譯注：決定論（Determinism）是一種哲學立場，認為世界上每一件事情的發生皆是由之前的事件所導致的，認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客觀規律和因果聯繫。自然界的現象與人類的行為可以根據先前的條件、經歷來預測。決定論之所以造成歷史被視為科學，便是因為決定論認為假如人們瞭解了所有涉及某種即將發生之事件的因素，那麼這一事件就可以精確地被預測出來。

提出具有普遍性的解釋。孟德斯鳩經常被認為是寫出了比較社會科學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一七四八年），本書透過提出地理、歷史、文化與法律等決定因素作說明，來解釋世界各地的共和、君主和專制政府為何出現。晚近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領域中的經典著作則大膽地比較了不同的歷史情況，以期尋找出古今之間反覆出現的模式，藉此直探「獨裁」或「革命」等現象的本質。

歷史社會學的兩部經典著作於二十世紀中葉問世，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的《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九六六年）和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一九七九年）。摩爾將世界各個社會不可避免的現代化視為理所當然，他從歷史中尋找能夠解釋為何不同的歐洲和亞洲國家在轉型為現代經濟和政治體時採取了不同的政治形式——民主、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摩爾認為，之所以有這些不同的結果，其原因在於各社會群體之間在力量上的抗衡以及隨之而來的結盟。在「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典型例子中，英國、法國和美國等社會中有著為數甚多的富裕中產階級，他們利用早期的工業化瓦解了過去的農業菁英階層並建立起民主體制（摩爾認為在美國這發生於南北戰爭以後）。相比之下，法西斯主義源於傳統地主菁英階層歷久不衰的能耐，他們有能力，像是在德國和日本的情況，在瓦解民眾運動的同時操控了工人領袖。而當現代化國家中的社會勢力向革命農民傾倒時，共產主義便會是結局，就像俄羅斯和中國那樣。<sup>10</sup>社

會科學家借鑑歷史材料來闡述的，不是某個國家的特定發展軌跡，而是一個關於政治結果的普遍性假設，摩爾的著作便是一個經典例子。

十幾年後，摩爾的學生政治學家斯考切波發表了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國家與社會革命》，其中比較分析了法國、俄羅斯和中國的三場革命。<sup>11</sup>不同於大多數視革命為階級衝突結果的學者，斯考切波主張這些「經典」革命的起源，乃是在於內部矛盾以及舊政權國家的垮台——在所有這些情況中，參與國際競爭的需求以及對外戰爭龐大開支使得資源吃緊都加速了革命的發生。當國家在結構上的弱點因為其他國家的競爭進一步惡化時，此弱點又面臨到群情激憤的農民壓力，因為政府無力保護農民不受地主剝削，革命便在此時爆發。斯考切波因此主張，國家在成功的革命運動起源和成果當中是重要的參與者。摩爾和斯考切波這兩本經典著作展示出，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所研究的社會科學歷史，與（大部分）歷史系所研究的不同之處。類似摩爾和斯考切波著作的這類作品，其目的不是要梳理歷史情況的特殊性，而是要將幾個能夠被比較的事件結合起來，並且整理出其相同和不同之處，以利於構思出一個普遍性論點，能夠適用於具有同樣現象的多個實例：「法西斯主義肇因於在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中傳統菁英依然持續存在」或「革命爆發於功能失調的國家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的時候，這通常是出於對外戰爭的龐大開支。」

從事比較歷史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可以是心思縝密並且注重細節的，但是他們研究課題的性質要求他們甄別精華和糟粕，將不可或缺以及可供比較的訊息從特定和特殊的史

實中揀選出來，以利於作出一個具有普遍效力的主張——在他們的方法中容不下一個患有血友病又虛弱的俄羅斯王子。不過一般來說歷史學家則會很喜歡其研究領域中別於尋常的細節。正如克萊頓·羅伯茲 (Clayton Roberts) 所說：「歷史學家會去研究馬恩河戰役 (the battle of the Marne)，而不是概括地去談論全部的戰爭；他們會去尋求啟蒙運動的原因，而不是概括地談論每個地方的啟蒙運動；他們會去研究希特勒的興起，而不是概括地討論每位獨裁者。他們把那些概括而論的事情留給社會學家。」<sup>12</sup>不過這並不是在說歷史學家不是嚴謹的思想者，而是說他們是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的：他們的課題是去整理排列並且弄明白，過去某個特定的時間點所發生的一系列複雜事件。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從某個歷史情境中提取出能適用於其他情境的普遍性說法。

一些歷史學家研究和寫作比較歷史，這類歷史表面上看起來與歷史社會學頗為相近。發生於不同地理條件下的相似歷史現象，值得注意的探索成果包括了以下比較研究：美國南部和南非的種族關係、德國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法國和英國福利國家制度的發展，以及南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奴隸制度。<sup>13</sup>但是，歷史社會學家在比較中所想要尋找的是法西斯主義或奴隸制當中的一種柏拉圖式本質，歷史學家則是出於截然不同的目的來進行比較。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學家將比較限制在兩個被仔細研究過的背景，因為越是深入就越能闡明清楚兩者之特殊性。歷史比較所帶來的收穫，跟跨越到另一文化並深刻地沉浸其中所帶來的收穫是相同的：藉由強迫自己以陌生的方式看待熟悉

的情況，這讓我們的理解變得更加清晰，而且這迫使我們必須去解釋那些原本可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sup>14</sup>

這種策略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彼得·科爾欽 (Peter Kolchin) 的《不自由的勞工：美國奴隸制和俄羅斯農奴制》(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 一九八七年)，其比較了兩種形式中對個人的奴役，它們於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發展至頂點，並在同一時間被廢除：一八六一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廢除農奴制 (serfdom)，一八六五年美國國會宣布奴隸制不合法。<sup>15</sup>科爾欽問道，為何奴隸制遺留的問題在美國的歷史上，甚至一直到今日都還是棘手的議題，而農奴制在被廢除後卻沒有在俄羅斯社會留下什麼痕跡？他注意到這兩個體系在結構上有些相似之處：起源於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位於歐洲「核心」區邊緣地帶，其幅員遼闊而勞動力短缺；兩者都是被「來自上級」的命令強行終止的。在這兩個體系中，奴隸主徹底控制了其奴隸的勞動和生活。

然而，在科爾欽的描述當中，農奴制和奴隸制之間的差異，比起兩者的相似之處揭露了更多事情。農奴們在大莊園裡頭勞動，其主人通常是不住在莊園的地主，而且很少有地主認得出自己的農奴；他們雖然在個人層次上並不自由，但他們同時是村莊自治社群以及家庭的一份子，而地主對於拆散這些組織毫無興趣。美國奴隸居住在小得多的種植園，而且他們的主人往往認得他們，這些奴隸主會基於以父愛「義務」的名義或個人利益，殘暴地干涉他們的生活、強迫他們遵從宗教規範和儀式、用鞭打來讓他們屈服、

宣布他們的婚姻無效、性剝削女奴隸，並且拆散許多家庭。種族無疑是兩個體系之間的一個顯著差異，不過同樣存在顯著差異的是，農奴的生活方式在社會與文化上都具有長期連續性，而出生於非洲的奴隸及其後裔的生活方式則是以對其文化的殘酷破壞為標誌。最令人有所啟發的或許是科爾欽對兩個體系如何被終結的比較：俄羅斯傳統上是專制且等級制度嚴明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早已習慣服從沙皇的地主並不反對一八六一年的法令，而在更為民主、更為多元化的美國文化中，南方的奴隸主們為了維護其生活方式而訴諸戰爭；這自相矛盾地證明，奴隸制度在一個「更自由」的社會中更不容易被消滅。非裔美國人過去在國家中被隔離，在美國遺留下了至今仍令人痛苦的後遺症，俄國農奴很快重新融入了與他們從未被完全分離的佃農群體。正如科爾欽書中的例子所顯示的，一個論據翔實的比較能將可比的但不同的兩種情況闡釋清楚，因為這種比較必須要有一個由頭到尾皆具有高水準的分析。對過去的記述在很多時候是出於想要記錄與描述的方式，到了另一個地方就不同了。總而言之，比較歷史的目標並不是要構想出一種能適用於他們從未研究過的案例法則，而是要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能夠比較但截然不同的歷史現象提出最深刻的理解。

## 馬克思主義與年鑑學派

歷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的研究方式截然迥異，前者深入研究過去一個或多個特定脈絡而與後者企圖於歷史中尋求本質，即便如此不同，歷史學家也會依賴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理論家、人類學家等）提供的模型作為分析指南。即使明確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學家人數一直很少，但在現代歷史分析中，沒有哪個理論能比馬克思主義更有影響力。馬克思對由階級鬥爭推動的歷史和由一系列不斷演變的生產方式塑造的社會之分析，都深刻地反映在所有現代史學家的研究上，無論他們在政治或方法論上的信仰為何（詳見第一章和第四章）。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力在一九六〇到八〇年代之間遍及全世界，它是在前幾章中討論過的許多發展背後的重要推動力，包括了社會史、全球史和後殖民史。諷刺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今日之所以不再那麼引人注目，正因為它的許多前提都已經被完全吸收了：甚至許多保守派的學者也毫不懷疑地接受物質條件因素是歷史變革的核心，以及相互不平等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是敵對的。例如，在世界各地，包括了堅定反共的國家，數十年來在高中和大學生的課堂上都教授了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像是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是因為一個越來越富有的新興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從已被時代淘汰的腐朽貴族手中奪取了政治權力——即便是冷戰時期的美國人也無法免於那位鬍鬚濃密的德國人思想力量的影響。



當然，學者們數十年來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細節以及如何將其應用在歷史分析彼此爭論不休，分歧的空間相當大，因為馬克思在所有著作中都沒有提出明確的歷史理論，而且他在一些核心議題上會改變想法並且含糊其辭，其中最著名的是人類命運直接被經濟因素影響的程度。馬克思和他的合作夥伴恩格斯設想他們的計畫為「唯物主義」(materialist)的歷史，這是要反對作為當時主流的哲學家黑格爾之觀點，他把歷史解釋為一種「世界歷史精神」(world-historical spirit, 德語作 Geist)。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核心是人類的生產力，而不是一種超越性的精神。雖然馬克思主義者一致同意經濟生產中的各種力量 and 關係是歷史的動力，不過他們在人類意識於變遷過程中的作用上各執一詞。馬克思的著作強而有力地引發了在解釋上的爭議，因為他在最關心的事情上，也就是資本主義未來必然會在政治上失敗，自己都在兩個不同的理論方向之間掙扎不定：他有時寫道，不管人類如何行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都被歷史中的非個人性力量決定了，而在其他的著作中，他則認為工人出於明確意識的能動性有著很大的發揮空間。<sup>16</sup> 他經常被引用的段落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開頭充滿戲劇性的文句，這見證了他思想中的這種緊張性：「人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不在自己選擇的情況下進行；而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給予和繼承。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sup>17</sup> 讀者在馬克思對歷史決定論的幻覺隱喻影響之下，很容易就會忘記，這段有名的話中開頭簡明的幾個詞：

「人創造自己的歷史。」(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以湯普森作為典型的著名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他們在二十世紀中的重點計畫是要抵制將工人視為傀儡的說法，其作法是由他們的生平、文化以及意識切入，描繪出這些勞動男女是如何面對經濟變動的。<sup>18</sup> 勞動者不是工業化的倒霉受害者，而是依靠社群和司法上根深蒂固的傳統規範來抵抗一個殘酷新世界的能動者。正如湯普森著名的說法那樣，工人階級「脫胎於自己的創造中」。<sup>19</sup> 更一般地說，要弄清楚經濟「基礎」與法律、政治與文化等「上層建築」<sup>⑤</sup> (superstructure) 之間的關係，並且擺脫馬克思在更為激進的聲明中所主張的那種機械決定論 (mechanical determinism)，這些問題已經佔據了好幾代見多識廣的歷史思想家心靈。然而，窮人的悲慘、反抗、政治變遷等事情的終極原因討論上卻沒有任何爭議。借用在二十世紀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名言，「笨蛋！問題在經濟」。<sup>⑥</sup>

⑤ 譯注：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 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概念，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上層建築指的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 and 設施等總和。在階級社會中，政治法律制度和設施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簡稱為政治上層建築。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所有主要的歷史解釋學派跟馬克思主義史學一樣，都認為社會經濟的力量在歷史中相當重要。二戰後最具影響力的新歷史研究學派就是法國的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其名稱來自於他們的刊物，全名翻譯後為「經濟與社會史年鑑」（*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sup>20</sup>兩位史特拉斯堡的年輕歷史學者於一九二九年創立這本期刊——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布洛克（Marc Bloch），他們企圖挑戰政治歷史的首要地位，其作法為開放歷史學去採納借鑑自經濟、地理和人類學等各種社會科學方法。在一九三〇年代，布洛克和費夫賀轉移他們的期刊所在地到巴黎。布洛克於一九四四年因為參與抵抗運動被納粹的蓋世太保（Gestapo）處決。儘管如此，這個被稱為「年鑑學派」的跨學科歷史方法，自從一九四〇到七〇年代蓬勃發展，不僅在法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新歷史學派。<sup>21</sup>

年鑑學派史家既不同意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變遷動力的關注，也不同意傳統歷史學家對個人人格與事件的重視。相反，他們訴諸經濟、地理和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方法，以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和深度描述了過去社會各個方面相互關聯的方式：他們有時以「整體歷史」（*total history*，法文：*histoire totale*）的形式來描述自己理想的歷史。這個學派歷久不衰的著名作品是兩冊長達千頁的《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一九四九年），其中部分章節的草稿寫成於德國戰俘營中，作者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戰後因擔任該期刊的

編輯而享有盛名與權力，並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sup>22</sup>作為一個對時間和地點史詩般的紀錄，這個作品被與托爾斯泰（Tolstoy）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相提並論，這不僅僅是出於本書的篇幅、追求和煽動人心的力量，更因為布勞岱爾認為人類行為在浩瀚無垠的歷史時空中是徒勞無功的。<sup>23</sup>布勞岱爾的大作展示了一種針對過去社會不同面向的視野，其像婚禮蛋糕一樣層次分明，每一層都在不同的時間框架內演變。在蛋糕的底部是土壤、氣候、陸地和海洋路線的地理歷史，它們塑造著人們的生活，不過演變的速度如同冰川推移一般緩慢（布勞岱爾用矛盾的修辭將其稱為「固定不變的歷史」）；位於中間層的是社會和經濟活動，其變化往往要歷經數十年的時間。頂端是變化快速的政治和其他事件的領域。布勞岱爾最看重的是整體局面，塵土飛揚、被太陽曬乾的地中海周圍土地的「地理歷史」（*geohistory*），以及在其上長達數十世紀的生活方式；最不重要的是最上層的事件（外交、戰爭、政府），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形容這些是「位於

⑥ 譯注：本口號出自一九九二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柯林頓（Bill Clinton）陣營，批評當時的總統並未妥善處理自一九九一年以來的經濟衰退，並以此訴諸選民的支持。後來隨著柯林頓的勝選，這成為了人們朗朗上口的片語。後來不限於政治的各種場合不少口號更以此為靈感來源。

表面上的干擾起伏，就像是歷史浪潮中強勁水面頂端上的泡沫。」<sup>24</sup>

後繼的法國年鑑歷史學家跟布勞岱爾一樣，對歷史所處的自然環境有興趣，不過他們日漸轉向社會和經濟研究，這些研究往往根據於大量的數據——例如出生和死亡記錄，或是價格或貿易方式。在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啟發下，年鑑學派也開展其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文化研究：關於宗教習俗長期的歷史，或是探討童年、恐懼或死亡態度的經典研究。<sup>25</sup>但是，對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及其追隨者而言，過去的種種現實之間存在著明確的等級階層：如同基石一般的經濟和社會領域勝過文化和「事件」等存在時間較為短暫的領域。雖然有一些年鑑學派學者贊同馬克思主義，但是其中大多數的人會與他們認為是種束縛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他們的目的不同，他們的主張是在知識上而不在政治上，而且他們的分析項目往往是固定的而非不斷變化的，不過他們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一樣，堅信社會和經濟的因素在歷史上發揮了高於一切的影響力：在（或不在）人們餐盤上的東西，總是比起在他們腦袋裡的東西重要。<sup>26</sup>如同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偏向於採用「大歷史」：更長的時間跨度、海量的數據、成千上萬的歷史角色。

## 多元歷史與事件的回歸

由於馬克思主義和年鑑學派等不同流派的影響，二十世紀中葉的許多歷史學家傾向於去強調位於人格、心理、信仰或行為等等難以預測的事情背後深層的社會與經濟因素。當卡耳在一九六一年寫道：「每一個歷史論證都圍繞著在各種原因中何者優先這個問題。」他其實是在間接地指出學者在研究歷史因果關係所採用的方法往往與其政治信念相一致：保守的「觀念派」(idealists) 強調性格、思想，以及偶然性的作用，反對包括卡耳本人在內「決定論派」(determinists)，這群人受到馬克思認為某些歷史進程必然發生的觀點影響。<sup>27</sup>

在《何謂歷史》中卡耳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日常謎題，作為他如何看待歷史因果關係的一個實例：一天晚上，一位名為瓊斯的男子帶著幾分酒意開著煞車故障的車子從派對返家，在行經一個能見度差的路口時，他撞死了另一名碰巧要過馬路買香煙的男子羅賓遜。羅賓遜的死因是什麼？卡耳認為，歷史學是「以歷史意義為標準的挑選過程」，而且只有可被概括的原因才具有歷史意義。<sup>28</sup>醉酒駕車、剎車失靈和視線死角都已經被認為是造成事故發生的原因，他認為這些都是「合理和真實」的原因，因為他們可以被概括化（「視線死角對行人相當危險」）而且也可以亡羊補牢；這些因素在歷史上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可以從中學到開車不應喝酒、行車安全以及街道照明等教訓，他們賦予了歷史一

個道德目的；另一方面，如果說羅賓遜去買包菸的渴望「造成」其死亡，這渴望在所有因素當中的比重頂多就像是，在與事實相反的歷史冷知識經典例子中，埃及艷后克麗奧佩特拉<sup>⑦</sup>（Cleopatra）鼻子的長度對羅馬命運的影響力：一個人突然決定去辦點事情或者是另一個人（馬克·安東尼〔Marc Antony〕）對一位迷人女性的愛慾，我們若是把這些作為根據的話，是無法建立起對於歷史的概括性論點的。卡耳是一個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堅定的決定論者」，認為若是將重要性擺在意外或「偶然」上，無論在邏輯或是道德上都有其缺失，因為這種立場剝奪了歷史的道德意義。<sup>29</sup>

瓊斯和羅賓遜這場致命遭遇的這個簡明比喻，因為相當引人入勝所以數十年來都能引發課堂上激烈的辯論。但是，卡爾對理性原因和偶然原因的直截了當的區分，以及認為只有能夠提供教訓或預測的原因才是歷史中重要原因的觀點，這兩者被後來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嚴厲地批判為是一種對於因果關係具有嚴格限制性的觀點。<sup>30</sup>一個被更多人接受的普世性立場認為，歷史上所有的原因肯定都有某種意義，即使它們的重要性並不相同：不論這條路在任何一天發生事故的機率有多高，羅賓遜急著去緩解菸癮是這場致命車禍發生的必要原因。如果某個重大事件，所有可以找出的原因都有不一的影響力，那麼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是將其中某些因素排除在外，而是要決定如何整理還有列出其中的優先順序。

在整理尚未展開以前，歷史學家也必須決定界線在何處，因為每一個事件都能追溯到無窮無盡的可能原因。正如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說，沒有人會把轟炸珍珠港的行動追溯到「日本最古老的島嶼在日後被稱為太平洋的水域中伴著巨大的煙霧升起」的那個時代。<sup>31</sup>一個歷史學家之所以追溯到五個月、五年、五十年甚至更久以前，可能是基於他們在哲學或方法論上的信念，不過有時候原因可能很簡單，就是取決於他們的研究主題：為了尋找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起因，經濟史家會將回顧長達一個世紀的物價上漲；思想史家可能會上溯好幾十年藉此來描述啟蒙思想的腐蝕性影響；而傳統政治史的研究者則會關注在動蕩之前的幾年或幾個月內，路易十六與其大臣的個人缺點和失敗的政策。大多數時候，歷史學家們在各自的孤島上愉快地工作，將他們的研究發現與一些既有的因果解釋連結起來，無論是要對其加以修正或是使其更加完

⑦譯注：克麗奧佩特拉七世（西元前六九年～前三〇年），世稱「埃及艷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西元前五一年托勒密十二世去世，他留下遺囑指定克麗奧佩特拉和她的異母兄弟托勒密十三世為繼承人並且共同執政。克麗奧佩特拉後來遭到其他勢力放逐，她為了奪回失去的權位與凱撒結盟並成為其情婦，重攬了埃及的統治大權。在西元前四四年凱撒遭到刺殺後，克麗奧佩特拉與馬克·安東尼一同對抗凱撒的合法繼承人屋大維，並與安東尼生了三個孩子。安東尼在與屋大維軍的戰役失利後自殺，克麗奧佩特拉隨後也跟著自殺。

備。他們只有在寫一篇綜論或向課堂講課時，才有需要去面對到哪些因素更關鍵以及為什麼的這類難題。

歷史學家經常會避免將所有籌碼孤注一擲在單一原因上而不考慮其他原因，而是會解釋各種因素如何隨著時間推移積累到不可避免的局面。研究早期現代不列顛的著名歷史學家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在幾十年前的一部簡短而受歡迎的綜述性文集《英國革命的起因，一五二九—一六四二年》（*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中，描述了英國如何推翻君主制，並且最終處決了國王查理一世（Charles I）。<sup>32</sup>史東並未將經濟、社會、思想和政治的原因分開來處理，他汲取了革命理論家的觀點，構思出具有三個層次的方案來解釋革命起因，包括：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前的各種「先決條件」（preconditions）；涵括了一六二九—三九年時間的「誘發因素」（precipitants）；國會罷黜查理一世前兩年期間的「觸發因素」（triggers）——「先決條件」主要包括英國經濟和社會上的各種結構性變化，像是鄉紳和專業階級的茁壯，以及包括政府的不穩定和效能不彰；至於「誘發因素」，史東特別強調了一再出現的政治因素，也就是在整個一六三〇年代國王在宗教和財政問題上一貫的不妥協；最後，「觸發因素」將一場動亂的發生從一種可能轉變為一種必然，這包括了查理一世及其心腹在一六四〇—四二年間所做出的一系列草率決定，比如密謀爭取蘇格蘭支持他們對抗議會，以及企圖逮捕五名下議院的領導成員。考慮到革命的普遍性起源，史東區分了使革命成為可能的條件（經濟快速的

發展等社會的重大變化）、使之變得可能的那些人（一個僵化的反動菁英階層），以及使得危機成為無法避免的一些短暫的事件、決策或是人物（統治者愚蠢的挑釁行動、反對派中極具魅力的領導人崛起）。<sup>33</sup>有些情況的轉變會讓某件事從可能或很有可能發生變成不可避免，我們應該如何描述這個轉變呢？加迪斯認為，我們應該從物理學中借鑒「相變」（phase transitions）這個概念，一個穩定的系統變得不穩定和變形的點——例如水沸騰或凍結的時刻，或是斷層線斷裂的那一個時間點。通常來說，這樣的轉變是出現在該事件的不久以前而不是遙遠的過去；對於加迪斯而言，若以珍珠港事件為例，「相變」便是美國於一九四一年限制對日本的石油出口，而不是日本先前對法屬印度支那的併吞，也不是讓此併吞成為可能的法國於一九四〇年對德國的敗戰。<sup>34</sup>加迪斯這種基於常識的立場——所有事件都很重要，不過越是晚近的事件對結果的影響越大——反映了晚近的思想氛圍。

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歷史學家對哲學和方法論的堅定信仰正在減弱：現在越來越難得見到有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生產方式是一切的重心、有唯心主義的信奉者堅持思想具有純粹的力量、有決定論者認為哪個歷史事件是註定要發生的，或是有偶然論的愛好者喋喋不休地大談像是埃及豔后的鼻子這種事情。如果被逼問的話，他們應多會支持歷史學者版本的混沌理論（chaos theory）：歷史中確實存在一些法則，不過由於其中包含著如此複雜的變數以至於結果並無法從一組已知的條件中精確地推導出來。<sup>35</sup>克萊頓·羅伯茲提

出「綜述」(colligation) 這個術語來描述歷史學家進行解釋的過程：追蹤許多被歸入一個既定結果中的因素和事件，這是一個結合了敘述和分析的方法。<sup>36</sup>目前歷史學家對宏大的因果關係體系的不安，呼應了過去幾十年科學的發展趨勢，也就是告別線性思維，而走近於富含分叉與分支的碎形幾何與混沌理論。<sup>37</sup>簡而言之，歷史寫作已經遠離了總體性的因果框架，儘管馬克思對權力和歷史變化的洞察力，以及布勞岱爾極富創意的跨學科方法仍持續不斷地替此學科的研究注入活力。歷史學家傳統上之所以如此關注不同原因之間的上下階層，是因為其已經帶有某特定觀點，預設了過去當中什麼至關重要，以及它是如何重要。相對前幾頁中頻繁提到的革命，戰爭是緊追在後的第二名，反映了以歐洲人為主的民族主義者對於民族國家建立時，所發生的慘烈事蹟以及轉折點的關注。但是傳統上對歷史原因的關注也意味著一條在原因和事件之間的尖銳分界線，而後者在學術上所得到的重視則遠比前者來得少。在歷史的作坊中，傳統的分工方式是教授們對戰爭和革命的成因和後果進行分析和辯論，而「通俗史學家」則針對戰鬥和路障寫下鉅細彌遺的敘述——並且經常在去銀行的路上開懷大笑。

原因／事件的二分方式可以被映射到另一個相似的對立上，也就是經常被社會科學家所援引的結構與事件之間的對立。即使是專家也很難定義何謂一個「結構」，而且會發現舉例來說會容易許多，羅伯茲便是這麼作的，「教會和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的，郡和教區的，學校和大學的，思想和信仰的組織」。結構——無論是具體的，比如官僚機

構，還是意識形態的，比如神學，理論上都讓社會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中，因為它們「推動了合法的行動、習慣性的行為、受規則和角色規範的活動，以及具有一定標準的事件。」<sup>38</sup>總之，社會和文化結構是某些可預測的行為和事件的不斷重複。當然，結構從來就不是真正穩定的，它們的長久存在經常受到系統失靈和人類的能動性兩者加在一塊的威脅，無論是由馬丁·路德、馬丁·路德·金恩，還是由一群無名的馬丁們所發起。在這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中，特殊的「事件」——某人將對神職人員行為的譴責釘在威登堡(Wittenberg)的一間教堂門上，或是某人在賽爾瑪(Selma)市遊行，這些都是結構功能出現障礙的結果。若是將其原因納入考量，它們所造成的後果就變得可以理解。<sup>③</sup>

但正如威廉·西威爾所主張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其原因，能夠造成變革性的影響。西威爾借鑑了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著作，以英國船長庫克

③ 譯注：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南方黑人經常被以各種理由否定了其合乎憲法的投票權；金恩博士開始領導公民抗命運動，這場運動在一九六五年持續了三個月，最終以一場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市的非暴力抗議遊行作結。一九六五年塞爾瑪市由於當地警察鎮壓黑人民運而造成傷亡，包含金恩在內的人士策劃了從塞爾瑪走向州首府蒙哥馬利的和平抗爭，旨在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爭取非裔美國人的基本權利，要求時任總統的詹森(Lyndon B. Johnson)儘快簽署已被國會同意的《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

(James Cook) 於一七七九年抵達夏威夷並隨後遇害這全球歷史上著名的事件為例。<sup>39</sup> 庫克是在於一月抵達凱阿拉凱灣<sup>④</sup> (Kealekekua Bay)，這與一七七九年一月份恰好與慶祝洛魯 (Lono) 的冬季節日相一致，洛魯為每年冬季隨著為土地施肥的降雨返回群島的繁殖之神。庫克不僅在恰當的時間出現，而且也在幾天之後，就像洛魯會做的，身上充滿著法力或說是精神力離開了。但是桅杆的破損迫使庫克出乎他們意料地回到島上，當地的統治者將此解讀為對其權力的威脅，雙方一系列的戰鬥導致庫克被國王的臣民刺死。雖然英國人已舉行儀式將他們在海裡能找到的庫克遺體處理掉，不過一些信奉洛諾的夏威夷人，則把他們號稱是庫克的遺骸融入了敬拜已故君主的傳統中。他們認為，庫克的力量已經轉移到了新興的國王卡梅哈米哈 (Kamehameha) 身上，他敬拜庫克的亡靈並開啟了與英國人友好的政策。他從庫克的死亡獲得的精神力量和隨後結成的新聯盟讓卡梅哈米哈得以獲得資源——船隻、槍支和戰略建議，來完成征服整個夏威夷群島這樣前所未有的壯舉。

西威爾利用人類學家對這一經典歷史遭遇的分析，對事件在歷史中發揮作用的方式提出了新看法。他指出，庫克抵達夏威夷的故事不只是歐洲人壓倒「原住民」文化，依照他們基於高等技術的意志讓該文化屈服。相反地，夏威夷人將英國到來的這些事件整合到自己文化的類型中。把庫克吸收到他們的宗教傳統中，讓他們在觀念上得以應付帶著威脅性的不尋常外來者：夏威夷人「透過庫克船長這個人馴化了歐洲神力」。<sup>40</sup> 但是，

卡梅哈米哈和他的追隨者在採納庫克作為人形神的同時，也擴展了夏威夷人對神力的概念，這是從事件出於意料的發展而來的：以前的統治者所具有的權力，從未達到卡梅哈米哈的規模。<sup>41</sup> 庫克的「神化論」長期持續地改變了波利尼西亞人的文化政治範疇。庫克在夏威夷的到來就是西威爾所稱為「結構轉換的事件」過程中的一個例子。<sup>42</sup> 我們稱之為「事件」的東西，經常被視為是「真正重要的原因」所造成的富戲劇性，然而在概念上不重要的結果，但是各種事件 (events) 其實是在時間和空間當中延伸的複雜發生事物 (occurrences)，其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先前存在的結構。以這種方式來看，事件似乎與原因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因此不應該再像過去專業歷史學家經常做的那樣只給予它們二流的位置。

西威爾關於事件變革力量的主張，是晚近歷史學家對於將原因視為深刻和首要的而將事件視為膚淺和次要的，這種鮮明的區分感到不安的一種症狀。這反過來又回到了本章開頭所提到的發展，即今日的歷史作品普遍對那些傳統的因果問題感到不安。

我們先前的第四章中看到許多造成因果關係衰退的原因：國別史以及被稱為後設敘

④ 譯注：凱阿拉凱灣在夏威夷語的意思是「神之路」。

事 (metanarrative) 的宏大解釋框架的衰退，以及全球史的興起。對於國家歷史作為主要研究框架的不斷質疑以及正如我們不久後將討論的，文化史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興起，意味著辯論有關戰爭和革命等重大事件之起因的意願同時也在下降。(大屠殺的歷史可能是例外，這個歷史經常被認為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層次，並且提出的既是嚴肅的歷史問題，同時也是道德和哲學問題。) 從長遠的影響來看，殖民地獨立及其後果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以歐洲中心的民族主義史學，冷戰的結束同樣削弱了馬克思主義式的後設歷史 (metahistory) 以及與其如出一轍的資本主義式現代化理論。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二十世紀的各種進展已經逐漸動搖了一種以目的論來理解歷史的方式，也就是將歷史視為一種朝著某種被期待或是被畏懼的未來開展的線性敘事：民族命運的實現，資本主義的勝利與滅亡。

傳統上對「原因」的探究因為缺少了一個被想像出來清晰可見的終點，只能停泊於富戲劇性的不同中途站之間，所以逐漸變得不再那麼令人信服了。跨國史和全球史的興起加劇了這個過程，因為他們所處理的複雜問題，例如，大西洋奴隸貿易，並不是適用於西威爾稱為「撞球」式的因果關係模型。<sup>43</sup>這並不是說歷史學家忽視了隨時間變化的問題，遠非如此。但既然今日的歷史研究單位使得全球範圍中的各地社群更有可能參與其中，那麼對於變化的解釋也就變得更複雜、更以經驗為根據，以及更具針對性。<sup>44</sup>正如我們之前提到的那樣，歷史是一門緩慢前進而且幅員龐大的行業，實踐者不願拋棄舊工

具，即使是已過時的工具：大學生仍然被教授如何梳理美國革命的起源，研究生為了他們的資格考而需要掌握學術界過去有關英格蘭內戰或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的辯論。但是歷史學家今日不太可能將研究環繞在少數幾個重大問題上，或者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建立在駁倒其他學者的因果關係體系上頭。就因果關係而言，帶來豐富成果的混亂狀態便是現狀。

## 追尋意義：微觀歷史

一九七六年，一位已因十六世紀巫術研究聞名於世的年輕義大利學者卡洛·金茲伯格 (Carlo Ginzburg)，出版了一本有著奇怪題目的小書。《乳酪與蟲子》(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一書講述了一個名為多梅尼科·斯卡德拉 (Domenico Scandella) 又被稱作麥諾丘 (Menocchio) 的人的故事，他是義大利東北布留利 (Friuli) 地區的磨坊主人，他因為異端信仰而在一五八四年被押解到宗教法庭審問。麥諾丘因為跟蒙特雷亞萊 (Montreale) 鎮的鄰居分享了煽動性的思想而嚇壞了他們，他後來也堅決地將這些想法重復說給審判官員聽：他的異端想法包括了相信「任何經過學習的人不需要被任命就『能夠』成為一名神父，」相信「地獄是神職人員所捏造的」以及最震撼人心的是他相信



耶穌「是一個跟我們相似的人類，只不過更為高貴。」<sup>45</sup>麥諾丘對《創世紀》一無所知，而向審問他的神職人員分享他關於世界起源的理論。從四個元素所組成的混沌狀態中，他說道，一大塊物體形成了，就像乳酪是用牛奶製成的一樣；而天使便出現在這一大塊東西中，如同蟲子在乳酪中，而上帝便位居於這些天使當中（「他也是同時被創造出來的」）就像路西法和其他大天使一樣。<sup>46</sup>審判人員聽完了麥諾丘的陳述，對其從輕發落：他被命令公開宣示放棄自己的錯誤信仰，在監獄度過了三年時光。然而十五年後，他被人再次舉報褻瀆上帝後接受了審判，重複了他的一些異端說法，不過這一次被判處了死刑。

在審問的過程中，雖然貧窮但是識字的麥諾丘透露出他的一些想法是從書本獲得的；他擁有一些書籍，並且看來應該也跟該地區的其他人另外借了一些書：一本方言版本的聖經、一些宗教作品與旅行書籍，甚至可能有某個版本的可蘭經。金茲伯格的偵察工作令人印象深刻，他將磨坊主的言論跟磨坊主所知道的或是有機會接觸到的書籍連結起來。但是，這位歷史學家也表明，麥諾丘將自己對於學者所寫資料的獨特理解，跟從其所處的農民環境中直接獲得的想法和經驗直接結合起來。關於世界物質性起源的各種前基督教觀念，其歷史長達許多世紀且根植於農村傳說，被跟蛆蟲自己冒出一塊塊發霉的乳酪中這種日常景象結合在一塊。

《乳酪與蟲子》出版後造成了轟動，因為其重新形塑了在早期現代歐洲文化如何在菁英階層和庶民階層之間傳播這個問題。儘管本書出版時大多數研究者都認為學者和民眾的世界應該是完全分離的，或者是菁英文化「滲漏」至窮人之中，金茲伯格憑藉著耐心和富有想像力的研究得以記錄下這個故事，在其中一個下層階級的人不僅吸收了他的「上層者」的思想，而且從那兒擷取自己想要的東西，再將他從書本中所學到的東西，與其所處的農村文化裡的日常經驗以及口頭傳統結合起來，創造了他自己的宇宙觀以及神學。麥諾丘可能是一個魯莽的怪人（這種人的生命更有可能被記錄下來），不過他的故事告訴我們某些有關十六世紀義大利的「上層」和「底層」文化相互作用的訊息。

《乳酪與蟲子》不僅被譽為對於早期現代歐洲菁英和民間文化的辯論有特別發人深省的貢獻。更重要的是，這是首次有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針對一位完全無人知悉的古人寫作了一本專書。「新社會史」在七〇年代中期已經確立，但「社會」總是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意味著「許多人」；即使受到湯普森啟發的研究日漸捨棄了量化，而且即便個別的平民在研究中一直都是重要的角色，但是「人民」的本質還是以集體的形式的存在。

另一方面，單一人物的傳記一直是為上流社會的非凡成員特別保留的一種文類。<sup>47</sup>金茲伯格的書突破了這些慣例，指出你可以藉由個別研究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的生活從中找出歷史意義。金茲伯格關於麥諾丘低微但是戲劇化一生的編年史，是被稱為「微觀歷史」研究類型中的第一本著名作品，此類型起源於一九七〇年代一群對馬克思主義感到幻滅的年輕左派義大利歷史學家。<sup>48</sup>隨著一九八〇、九〇年代與金茲伯格相似的幾本

廣受歡迎著作的出現，微觀歷史很快地成為了各種研究歷史的方法中受到廣泛認可的一員，幾乎每個領域都有實際的研究作品：成功的例子包括了一位女性於十七世紀新英格蘭地區被美洲原住民俘虜的故事、一名十六世紀的法國農民冒充一位失蹤男性的身份、一名中國通譯被拘禁於十八世紀巴黎的瘋人院、十九世紀紐約一名妓女的謀殺案，以及年輕的美國黑人男性於一九三一年被錯誤地指控於田納西州強姦兩名白人婦女。<sup>49</sup>前幾章討論過的幾本書屬於這個範疇：詹姆斯·斯威特所著有關於跡遍布全世界的多明戈斯·阿爾瓦雷的傳記、勒華拉杜里對中世紀村莊蒙大猶及其信奉異端的居民的再現，以及烏爾里奇所著對瑪莎·巴拉德及其周遭世界的紀錄，以上這些都是對歷史上「被遺漏的人」之生命的細緻描述。

對於微觀歷史能夠被，還有應該被哪些東西構成，實際研究者和評論者的意見相當不同：即使是開創此流派的一小群義大利歷史學家對於此運動的整體方針也沒有一致意見。一些金茲伯格的同儕抱怨說他過分關注於麥諾丘的文化世界，而對於蒙特雷亞萊村中的社會世界則關注不足。有些微觀歷史著作，尤其在義大利傳統中，把重點放在整個社區而不是一個人身上。<sup>50</sup>這個流派中思想最周密的研究者強調規模的無比重要性：透過非常接近地觀看，將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人身上或世界的某個小地方，你便能在社會史中最根本的細節中大展手腳，這種層次是研究比較廣泛官方紀錄的歷史學家無法觀察得到的。<sup>51</sup>從這個意義上說，微觀歷史可以被看作是某種有關歷史的實驗室，或是一只瞄

準了過去的顯微鏡。但是，正如金茲伯格率先提出並為無數模仿者所複製的那種最為人熟悉形式的微觀歷史有三個特徵：它涉及沒沒無名的一個或一群人；它以危機為中心；而且作者運用這個故事來闡述一些更大的歷史問題，例如在金茲伯格的例子中，便是菁英與庶民文化的關係。此外，微觀歷史與其戲劇性的事件和對於生活質地細節的描繪，使其本身具有引人共鳴的寫作風格和良好的故事性；這個流派最成功的例子在課程教學大綱或甚至是暢銷書單上都榜上有名。

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微觀歷史學為歷史學家提供了一個革命性的新視角：像是金茲伯格的這本書，其重點不在於解釋歷史變遷，而在於對處在某個時刻的特定人物而言世界是什麼模樣。金茲伯格並未主張，像麥諾丘這樣的人正在鼓吹一種隨著時間推移會產生某種效果的顛覆性想法；相反地，從磨坊主乍看之下古怪的信仰出發，他開始尋找所有與麥諾丘有關的不同元素——宗教、知識階層的文化、民間傳說，以及他從中擷取了什麼意義。簡而言之，他的目的不是要解釋麥諾丘在一個更大的線性歷史敘事中的角色，而是要解釋這位異教徒磨坊主如何理解他周遭的世界。

對於意義模式的同樣關注，讓我們明白或許是今日最受歡迎的微觀歷史，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篇一九八四年由研究早期現代法國的文化史學家所發表的文章。羅伯·丹屯的〈工人暴動：聖塞佛倫街的貓大屠殺〉(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 其根據一位參與者在二十年後的描述，探討一七三〇年代末期某件發生在

巴黎的印刷舖中事情的意義，<sup>52</sup> 這個故事是肇因於印刷舖的兩名學徒傑洛姆 (Jerome) 和萊維耶 (Lavelle) 所遭受的磨難，他們的伙食以及宿舍條件都很惡劣，而且還因為店舖屋頂上的野貓在晚上吵鬧而失眠。傷害貓科動物之所以同時能作為污辱，是因為主人的妻子養了一隻寵物貓，她對貓的寵愛還有據說給貓吃的食物，比起她丈夫給工人的要好得多。一天晚上，十幾名學徒宣洩了他們心中的不甘：他們當中的一位爬上了主人臥室的屋頂，大聲地模仿貓叫聲，於是老闆命令這群小伙子們去消滅這群動物——不過特別叮嚀要放過女主人的寵物貓小灰 (la grisette)。學徒們開始大肆搜捕，抓住了附近的所有貓，小灰也在其中。然後他們和其他工人一塊即興地替死去以及將死的動物舉行了一場諷刺性的審判。「其中包括了警衛們，一位懺悔者和一位公開處刑者。」當他們用簡易的絞刑架把貓吊起來時，他們的女主人出現在那兒並且驚恐地尖叫，直到男孩向她保證她的貓並不在其中。那天晚上那些人開懷大笑，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中，萊維耶為了他的夥伴們重複演出整個故事「至少二十次」，每一次都讓他們笑得樂不可支。

丹屯所以切入這個故事是要強調對於印刷工人而言如此滑稽的笑話，在大多數現代讀者看來卻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折磨貓，審判並且處決它，並將這個場景重複一遍又一遍這麼有趣？他指出，正是當你無法理解在局內人眼中似乎充滿了意義的東西，在這個時候你已經找到了進入一個自己完全陌生的文化入口了。<sup>53</sup> 丹屯圍繞這個奇怪的事件繼續逐步建立起許多層面的背景資料，他認為正是這些背景才讓此事件給予印刷工人的

感官強而有力的衝擊。這一事件背後的一些緊張局勢關係是社會層面的，十八世紀熟練工人和印刷學徒的地位下降，再加上這一行的萎縮使得能夠有希望獲得獨立和良好生活的工人數量越來越少；所有這些在工人生活中的緊張關係，不論新舊，都會以他們所處世界中的文化對事物的分類方式來經歷以及表達。這些包括了從嘉年華語言借用來的一些含義、在四旬齋 (Lent) 前的一段時間中，對於食物以及性愛這樣的肉慾渴望可以被自由表達，而且角色倒換是被接受的，這個時節中的慶祝活動有時候亦包括了凌虐貓隻。嘉年華的活動當中有模仿審判，每個行業的特別慶典中也都有這種審判，它們分別在一年的不同時刻發生。貓出現於早期現代歐洲各個國家的文化活動當中，通常與灰暗力量有關，像是性 (法文中「貓」[chatte] 所代表的雙重意義就像英文「貓」[pussy] 一樣)<sup>⑩</sup>、魔法以及巫術。大屠殺貓隻以及定期的重複演出因此讓印刷工人能夠表達許多事情：他們作為工人在社會上的挫折感、他們缺乏食物和物質上的舒適、他們作為未婚男子缺乏性愛的管道，他們渴望報復主人，並且想要顛倒世界上的秩序。屠殺所引起的爆笑聲凸顯出他們如何理解這件暴力行為，其意義顯而易見但沒有被明說，因為在他們的處境下公

⑩ 譯注：這兩個詞在法文及英文都有女性陰部的意思。

開造反是不可想像的。

丹屯所展現出的姿態是要去貼近較為廣泛的、較傳統的歷史框架（「半個世紀之後，巴黎的工匠們也會以類似的方式進行騷亂，把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與即興的民間法庭結合在一塊」<sup>54</sup>），但他的目的並不是要對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有所著墨。此處對微觀歷史的運用，其重點是要解釋去屠殺貓對那些殺貓者而言，在他們這樣做的同時對他們可能有什麼意義——而不是去研究一位關注範圍較為寬廣的學者可能會注意到的意義之處。丹屯和金茲伯格都是從一件看似莫名其妙的事情或細節開始的（為什麼殺死貓很滑稽？為什麼有人會相信這個世界原來的形狀就像一大塊乳酪一樣？）並將其作為解鎖一個陌生文化的鑰匙。微觀歷史所追問的不是如何把這些故事置入朝現代世界邁進的那種敘事當中——準備好發動法國大革命的工人、吸收了宗教改革新思想的農民——而是去突顯那些因為其全然令人陌生的性質，所以讓我們感到困惑的行為與信仰，對於某些特定的人在他們的脈絡下卻是有其意義的。

代表性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微觀史揮之不去的問題。與追尋一位特別人物的非凡命運的傳統傳記不同，微觀歷史追求的是範例性——其目的是要表明，若是周圍的文化條件相去不遠的話，它所述說的任何故事都不是獨一無二的。<sup>55</sup>金茲伯格在《乳酪與蟲子》一書的最後所使用的修辭也達到了這種效果。他寫道，大約在麥諾丘被處決的時候，當局耳聞了該地區另一位名叫馬可（Marco）或馬卡托（Marcato）的男子的傳聞，據說他

相信靈魂會跟肉體同時死亡。「關於麥諾丘我們知道得不少。但關於這個馬可或馬卡托還有許多像他一樣的人們，他們的生活和死亡都沒有留下痕跡，我們什麼也不曉得。」<sup>56</sup>也許還有其他的麥諾丘們在某個地方散布異教思想，但是我們怎麼能確定麥諾丘不就只是「一個古怪的怪人而已？正如這位流派的領軍人物愛德華·謬爾（Edward Muir）所說的：

「關心瑣事的歷史學家該如何避免寫出微不足道的歷史？」<sup>57</sup>

對於這個困境最好的答案是，丹屯為其有關文化史的論文所建立的方法論框架。他寫道，他的方法開始於「個人的表達方式是發生於某種文化習慣之中這樣的前提，我們在此習慣中學著分類感受，並且透過由我們的文化所提供的框架來思考，藉此理解各種事物。」<sup>58</sup>在這個觀點上，微觀歷史中的事件，就像是在範圍更廣的語法背景中表達意義的話語——它們可以作為線索指引我們找到一個社會的「文化」，以及其將各種意義串連起來的體系。<sup>59</sup>丹屯一再把他過去的方法與人類學家對外來文化的闡釋進行比較，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自己承認受到其在普林斯頓的同事，著名的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影響，紀爾茲的著作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成為以文化為中心的新歷史方法的檢驗標準之一。

## 紀爾茲、傅柯與「新文化史」

紀爾茲是一位文化人類學家、印尼研究專家，他對許多實際案例的研究能夠作為他在一篇有關方法論的著名論文中提及的「厚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模範。<sup>60</sup>正如紀爾茲在此主題最常被引用的論文所解釋的，厚實描述的具體內容是要儘可能將所關注的事件或行為的各個意義層次都加以還原。他從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那借用了一位男孩跟另一位男孩眨眼這個日常可見的事情作為例子來說明。對此事件的一個「單薄描述」(thin description)會記錄這個男孩「快速地收縮他的右眼皮」，這記錄了具體可見的事實，但是卻沒有注意到這個面部運動所可能代表的社會文化意義：男孩有可能只是不由自主地抽動，但也可能是在表現這個姿態在我們社會中具有的文化意義，這是兩個人之間傳達彼此心照不宣的方式。對此，另一位男孩可能會嘲弄般地模仿第一位男孩，他根據其他的文化符碼(culture codes)，刻意很費力且笨拙地去眨眼。根據紀爾茲的說法，民族誌的核心目標並不僅僅是記錄眨眼這動作，而是要重建「各種具有特定意義結構之間的階層關係」，眨眼和故意拙劣地眨眼便是在這些意義結構中被表演以及被理解的：當人類學家儘可能地還原了人類的某種表達方式背後所有可能的意義層次時，他便是在進行厚實描述。<sup>61</sup>這些意義的模式構成了一個文化，也就是這位民族誌學者首要的採集對象。紀爾茲將文化定義為人造的「意義之網」，它是為了大眾之間的溝通被編織

而成，同時也要透過大眾之間的溝通才能夠被編織出來。文化不存在於人們的頭腦中，而是存在於實際的事例中，如人際間的手勢以及從稀鬆平常(眨眼)到複雜周密(涉及複雜計算方式的峇里島鬥雞賭博)的種種行為。<sup>62</sup>

紀爾茲的著作是歷史學一系列新研究課題的靈感來源之一，這些新研究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在美國被稱為「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sup>63</sup>在此之前，歷史學家視「文化」作為研究對象，不論是菁英的「高尚文化」，還是平民的「大眾文化」。「文化」包括了圖書館的館藏、一系列的民俗節日、一整套宗教儀式、學校的課程表：它被逐條記錄、被加以描述，有時甚至是被量化，但它是一個被研究的客體，而不是一個脈絡。相比之下，新文化史學家沿著紀爾茲提出的「意義之網」的思路，採納了一個受人類學影響對文化的抽象定義：他們的計畫是要去追蹤各種符號系統、不同文化中會反覆出現的習慣性動作以及各種模式，藉此來描述那些意義之網。例如，林·亨特(Lynn Hunt)探討法國大革命政治文化的幾本暢銷著作，以論文集的形式探討下列問題：為什麼對語言的修辭和掌握在革命文化中舉足輕重？為什麼「穿得」像愛國者一樣很重要？革命黨人對瑪麗—安東尼的深仇大恨背後有什麼文化因素？對革命「兄弟情誼」的崇拜蘊含著什麼樣的含義？簡而言之，到底是哪些存在於政治與公共生活中心照不宣、視為當然的想法，支撐著法國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各種新作為，而且這些想法是如何透過創造和操縱符號來表達的？<sup>64</sup>

並不是所有研究新類型歷史的學者都同意紀爾茲—丹屯分析文化的方式。例如，義大利的微觀歷史學家通常批評紀爾茲的「意義之網」是強加在歷史上的行動者身上的束縛；他們批評紀爾茲的方法抹除掉了社會上的分歧以及緊張關係，因為他假設加冕儀式或鬥雞對所有參與者的意義都大致相同。其他學者同樣也反對丹屯將其故事中的角色之行為看待為表達一種普遍習慣的方式，這樣的說法實在太過簡潔單純，因此無法說明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和人們的各式經驗之多樣性。<sup>65</sup>儘管遭受許多批評，不過文化分析這種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個相當有說服力的方式去探究過去人們的內心世界，特別是那些不識字的人的內心世界；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將窮人的動作行為以及為數甚少被記錄下的言辭，置放在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下解讀，這仍然是了解這些人們在想什麼的最佳方式，因為他們無法擁有那些只有菁英階層負擔得起的表達手段。

新文化史在其最具影響力的一九九〇年代時，針對於研究過去的方法掀起了一場深刻而有爭議的革命。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二十世紀的主要歷史流派——馬克思主義和年鑑學派，視社會史和經濟史等「堅實事實」(hard facts)位居首位為理所當然；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文化領域雖然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對象，但卻是次要及衍生的，只是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現象的「反映」。文化史的研究者挑戰了這個長久以來的層級體系，指出所有的人類活動，從耕田到投票再到結婚，都是被文化規範塑造和制定的：他們不僅沒有拋棄「社會」，而且提出了一種不再那麼僵化的新方式將文化與社會聯繫起來。<sup>66</sup>

重點不在於「文化」應優先於物質條件和經驗，而是在於這兩者是密不可分：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方面能早於其文化建構而存在，或者是可以獨立於這個建構之外。對於新文化史家來說，解密那些環繞著人類行為的種種符號，尤其有關窮人的行為，成為了讓此學科獲得新活力的具體方式。

文化史家堅持認為，關注意義並不意味著忽視人的能動性。最優秀的文化史研究始終認為人們並未被文化規範所束縛，而是自己選擇了在其中行動以及透過其來行動的方式。相關例子可以追溯到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包括了早期現代群眾行為的研究，如湯普森討論十八世紀英國群眾「道德經濟」的著名論文（見第一章）。文化史家很快就發展出一套概念來描述人類活動在其分析中的核心作用：他們所使用的「實踐」(practice)、「展演」(performance)、「挪用」(appropriation)等術語，如今已經是主流的歷史詞彙。金茲伯格在討論麥諾丘這個人的時候並未使用「挪用」一詞，而是將其使用於在麥諾丘所描述的種種事物上頭：磨坊主閱讀了知識階層所寫的書籍，並且將其自己的想法挪為己用，他的做法是透過將書中自己有興趣的部分擷取出來，然後將其跟自己所處的文化還有自己的觀點結合起來。與其他任何的讀者相比起來，他都不像是一個等著被塞滿某本書原始意義的真空容器。

實際上，書籍史和閱讀史就是說明從傳統文化史到強調人類能動性新方法的絕佳例子。傳統思想史著重於書中的內容，而社會文化史學家一直以來關注書籍，則是因為將

其視為可以計算而且可以被交易的文化物品：優秀的書籍史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到現在仍然都致力於尋找和統計以下項目：書籍名稱、個人和機構所藏的書籍清單、出版社所出版還有書商向四處傳佈的書籍，或者是審查單位禁止以及被當局扣押的書籍。<sup>67</sup>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文化史學家們發展出一種互補的探究方向，那便是閱讀史——這種典型的「文化實踐」。他們問道：讀者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是如何閱讀書面以及印刷的作品？例如，歐洲和北美的歷史學家都認為，因為取得印刷品的方便性在十八世紀爆炸性地成長，因此閱讀方式從「專精」轉變為「廣泛」。不再是一遍又一遍仔細地閱讀相同的著作（通常是宗教作品），讀者開始不那麼鉅細彌遺地瀏覽為數更多的書籍，其中包括了小說和期刊；一個作品只讀一次原來是種非常現代的經驗。<sup>68</sup>在相對來說並不久遠的時代以前大部分閱讀是口頭進行而且是集體的，而像是丹屯所說的，書本「擁有的聽眾而不是讀者」；單獨的閱讀（剛出現的時候間或會被認為跟手淫一樣是令人擔憂的）只有在最近的兩個世紀左右方成為常態。<sup>69</sup>於十六世紀的德意志地區，在非常寒冷的圖書館中的木製櫃檯前站著閱讀對比於維多利亞時代獨自坐在沙發上，這兩者對於讀者閱讀的經驗會造成什麼差別？如同一位學者所表明的，當個別的讀者不再大聲地將內容朗讀出來，而是開始默默閱讀，這兩者對於讀者對文字的經驗會造成什麼差別？<sup>70</sup>歷史學家要怎麼處理讀者對文本的深刻情感反應，無論是十八世紀的感傷小說（sentimental novel）還是二十世紀的浪漫文學（romance literature）？<sup>71</sup>簡而言之，幾個世紀以來書籍讀者是如何「挪

用」以及如何「展演」出他們所閱讀的內容呢？這個新出現的閱讀史，當中所有的研究都強調了人類在接觸到文化產品的時候所作出的行為，展示出他們絕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

從紀爾茲筆下眨眼的人到湯普森的群眾，再到讀者依自己的意願和慾望來扭曲使用書籍內容，可以看出文化是人們付諸行動的成果：因此，對於文化史家而言，將能動性擺到引人注意的位置通常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有時會使文化史飽受爭議的更大問題是：如何跟隨時間變化這一點。迄今為止所討論的文化史的開山著作——丹屯、亨特、金茲伯格，以及其他廣為人知的微觀史家如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他們都以論文或短篇篇幅的書籍形式寫作。即使是微觀歷史中著名的標準篇幅書籍——像是茱蒂·華克威茲（Judith Walkowitz）對維多利亞後期倫敦性危機文化的研究，往往類似於將主題相互有關聯的論文收錄在一塊的論文集。<sup>72</sup>文化史著作通常篇幅簡短，這件事情透露出了某些實情：最純粹的文化史作品，其目標是要把許多存在於同一時刻、互有聯繫的事情圍繞一個核心串連起來——一個人、一個事件、一種行為，匯集各種各樣的情境因素，以闡明其在那個時間點的意義。雖然它可能包含或圍繞一個故事，但是典型的「新」文化史的分析模式類似快照而不是電影。許多文化史學家在法國著名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中找到了啟發以及他們「共時性的」（synchronic）方法在思想上的依據。<sup>73</sup>湯普森、布勞岱爾以及傅柯，皆是當代西方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那些對

湯普森和布勞岱爾之研究提出批評的學者們，仍然會對他們的成就表達敬意，但是傅柯卻是許多史學家恨大於愛的對象，若因為他不是歷史界的一員那倒還好，不過一個哲學家根據歷史材料撰寫書籍，這件事才是真的原因。雖然其生命相對地短（死於一九八四年，得年五十八歲），不過傅柯在仍在世之時就是一個神話般的人物，他是一位出色的通才知識分子，雖然所受的正統訓練為哲學，但很早就發展出對精神病學的興趣，並且將其發展為其長達千頁，探討早期近代歐洲的瘋狂的博士論文。他的著作包括了《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等關於早期近代與近代歐洲之知識體系的哲學史、若干思索性史的書，以及許多人公認的傑作《規則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此書研究西方社會對犯罪的標準處理方式如何由肉體懲罰轉變到監禁。

傅柯從他探討瘋狂的博士論文開始，便樂於挑戰既存的傳統觀念，指出「科學的」知識當中會受歷史偶然性影響之性質。「瘋狂只存在於社會中。」他在一九六一年如此跟記者說。瘋狂並不存在於要將它孤立起來的那些訴諸感情的形式之外，也不存在於要驅逐或擒捕它的那些訴諸厭惡排斥的形式之外。<sup>①74</sup>在這個概念變得在學術界和其他領域無處不在的數十年之前，傅柯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出，精神疾病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以不同的方式「在文化上被建構」出來。因為追索這種文化建構的邏輯，也讓傅柯開始致力於辨別出歷史上各種普遍性的知識體系，為此他創造了「知識型」（*episteme*）一詞。例如，在《事物的秩序》中，他把早期現代的知識型與後來的知識型加以對比，在早期的知識

型中，知識被組織成一個對應和反射的體系（例如在政治體系和人體之間）而成，而稍晚的知識型則是依賴詳盡無遺的分類方式來捕捉和分離人類知識中的組成要素，像是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這樣的現代「學科」。

比「知識型」更具影響力的是，傅柯從語言學中借用的「論述」（*discourse*）一詞。各種論述是由不同的符號所組成的不同系統，這些符號不僅賦予了語言內在的意義，而且當流傳於一個文化中的各種「文本」合併而成一個更大的「論述層」（*discursive formations*）時，也賦予了語言外在的意義。思想史家約翰·托斯（John Toews）描述「論述」是「在說話者和行動者背後默默運作的非個人性的形式結構，其藉由讓某些類型的言論和行為有可能存在，而另一些則不可能存在，來構築客觀現實和主觀能動性的世界。」<sup>75</sup>例如，當十九世紀美國的奴隸主把奴隸稱為他的「子女」時，這個詞就牽涉到了一個更廣泛的家父長主義論述，此論述支配著菁英們理解社會關係的方式，而這種關係

①譯注：傅柯認為孤立、驅逐以及擒捕等各種形式充斥於整個社會，因此存在於社會中的瘋狂，不可能存在於這些形式之外。關於此句的翻譯，譯者參考了部落格《周星星電影評論》（12 June 2015）。〈瘋狂只會  
在社會中存在 2——解釋跟釋義〉，[https://postar2.tian.yam.com/posts/36555556\\_74](https://postar2.tian.yam.com/posts/36555556_74)。



是由許多相互關聯的理解組成的，例如「非洲裔美國人本質上是小孩子」、「主人負責指導他們的道德」還有「主人可以而且應該對奴隸實施體罰」等等。這種論述在奴隸主階級中如此的普遍，以至於雖然它主導了奴隸主日常的一舉一動，但大多數的時候，他們甚至連對於包括自己在內的奴隸主都不需要明白說出該論述的基本信條。「論述」現在被廣泛而且經常是被不經意地使用，這個術語所起的作用，對文化史家而言，非常接近於紀爾茲的「意義之網」：它歡迎將無論是言語或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表達，都詮釋為一種論述，其含義可以在更廣泛的意義體系中被確定。

在傅柯對知識體系的研究當中的最核心部份，是要去追問在現代社會中權力的本質為何，尤其是權力如何影響人的靈魂。傅柯明白地反對馬克思主義，傅柯在思想上有著一系列出人意料又十分出色的轉向，在這些作品中他皆主張權力在社會中並非是集中的而是分散於各處（他稱為「權力的微技術」〔micro-technologies of power〕），而且其帶來的影響不是壓迫性而是富有成效的。<sup>76</sup>權力將不同身份加在我們身上並且造就了我們的樣子，而且它運作於各個地方、各個層面，甚至包括最隱私的地方：國家或統治階級禁止你做某事，這不是「權力」；你的老師、醫生或精神科醫生告訴你你是誰，這才是。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最為生動地說明了這點，該書的論點環繞著在早期近代歐洲使用的複雜體罰系統，與後來興起的現代監獄之間的鮮明對比。鞭打、烙印、截肢和戲劇般的公開處決在現代世界被唾罵為野蠻，但傅柯認為，過去的這些體罰的作用是讓社群宣洩

情感，而且體罰的儀式讓統治者、觀看者以及受刑者聚集在一塊，在儀式中透過把罪惡「銘刻」在肉體上的方式來將其驅除出這世界。另一方面，主要以監獄為基礎的現代懲罰，乃是建立在對個人囚犯的永久監視上，而且運用「改革」的修辭指出監獄的宗旨是要針對靈魂而不是肉體。傅柯透過描述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提出的理想監獄計畫，描繪出了現代懲罰的精髓，在此系統中，位於中央塔樓的一名警衛可以隨時觀察其監獄中的每個囚犯。邊沁把他的計畫稱為全景監獄（Panopticon），而對傅柯來說，「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另一個新詞）是種比喻，描述了各種形式的現代權力最不為人所察覺的樣子：最終，全景式監獄的囚犯們將會內化守衛不間斷的監視，成為了他們自己靈魂的典獄長。

幾十年來，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傅柯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啟發性，而另一些史學家則譴責這些著作誤入歧途，甚至是道德上令人反感的。有些史學家因為認為他濫用了史料和大體上缺乏歷史研究能力而攻擊他。<sup>77</sup>然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傅柯不負責任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和反目的論（anti-teleology）才是更為深層的問題。如《規訓與懲罰》中的一個主要目的是要將朝著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不斷進步的這種傳統敘事斥為一種蔑視過去文化的自吹自擂立場，而且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質疑現代「人道主義」解決方案是否真的具有良性效果。對於勞倫斯·史東這樣的典型自由主義歷史學家而言，「傅柯模式所要挑戰的核心對象便是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人道主義價值和成就」。雖然承認傅柯的洞

見在瘋狂史研究上「引領了過去十五年的研究議題」，但是史東擔心這個法國人的作品對「近代西方歷史研究的傳統觀點造成了巨大而令人不安的影響」。<sup>78</sup>

傅柯著作的一個核心特徵是蓄意迴避因果關係，這讓許多歷史學家感到不安。他對瘋狂的歷史、精神病學、刑罰和社會科學的籠統考察，從某個廣泛的文化形貌<sup>②</sup> (cultural configuration) 就直接轉換到另一個形貌，而不交代造成轉變的來源為何。這種對因果關係的嗤之以鼻完全是刻意的；傅柯曾經嘲笑為了找出這事情的原因還有那事情的起源所起的爭執是「提供給拒絕長大的歷史學家不怎麼危險的娛樂」。<sup>79</sup> 他提出了另一種關於歷史變遷的觀點，他稱為「系譜」(genealogy)，來取代傳統的因果關係理論。<sup>80</sup> 正如為人熟知的家譜一樣，「系譜」這個概念意味著，任何特定事件的發生，就像人類的誕生一樣，並不是出於單一的核心原因，而是來自許多不同、隨機、分歧的「開端」。

傅柯為了取代將歷史視為不間斷的連續性這種看法，他提出了另一種對過去的描述，其偏重於：「像是不連續和差異的這些分類以及像是門檻 (threshold)、斷裂 (rupture) 和「轉化」(transformation) 這些概念」。<sup>81</sup> 他的方法是對於傳統歷史研究的挑戰：傅柯暗示去尋找原因其實就是一種自戀，因為歷史學家是根據自己所處的當下來組織過去。

嚴格來說，傅柯的著作並未催生出一個歷史學派。雖然湯普森和年鑑學派史學家皆曾經有許多仿效者，但是迄今為止，都還沒有歷史學家被嘲笑企圖複製傅柯將構思理論的才華、充滿個人風格的博學以及在知識上的挑釁姿態結合在一塊的獨特方式：正如派翠西亞·歐布萊恩 (Patricia O'Brien) 所說的，傅柯所做的一切「其他人是不是也做得好」這件事情尚未有清楚的答案。<sup>82</sup> 然而，在開闢新的研究領域和探討舊問題的新方法上頭他的影響力是巨大的：例如，在整個關於性歷史和性身份的研究領域中都仍然可以見到他創立此領域時所留下的深遠影響。除了引入新主題和終結舊主題之外，儘管不像傅柯那樣明確地放棄因果關係，不過某些歷史寫作的形式雖然客套地不明說卻也很自在地忽視因果關係，傅柯在正當化這些寫作形式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受傅柯啟發的重要歷史著作中，湯瑪斯·拉克爾 (Thomas Laqueur) 的《製作性：從古希臘到佛洛伊德時期的身體和性別觀念》(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一九九〇年) 一書即為例子。<sup>83</sup> 本書是對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如何理解男女之間的生理和心理差異的調查。本書開卷以經典的微觀史學做法交代了讓現代讀者毫無頭緒

<sup>②</sup> 譯注：文化形貌論為一種人類學理論，露絲·潘乃德 (Ruth Benedict) 為著名的提倡者之一。此理論主張所有的文化都會發展出如同人格一般的形貌，各文化有著各式各樣差異甚大的形貌，它們也各有各的長處與優勢。

的細節：早期近代的歐洲人認為女性的性高潮是受孕的必要條件。當然，我們想要反駁道，與此說法相反的證據一定相當多。難道沒有很多女人可以證明她們沒有經歷性愉悅就懷孕了嗎？那些遭到強姦的受害者的情況該怎麼被解釋呢？不過，如果問說近年來科學史著作有讓我們學到了什麼東西，那便是科學的「事實」就存在於主流的知識框架之內，而且正如謝平非常清楚地所論證的那樣，科學的可信度深深地植根於社會地位和性別（詳見第三章）。

《性製作》令人出乎意料的主張是，歐洲人在十八世紀左右在男性女性生理差異上從「一性」模式轉變為「兩性」模式。大多數讀者震驚於拉克爾有關歐洲人曾經把男人和女人想像成一個單一性別的主張。拉克爾所說的「一性」指的是：西方古代、中世紀和早期現代的各個社會認為女人這種生物在本質上跟男人基本相同，雖然比較劣等。例如，在十六世紀的解剖圖解中女性的生殖器官被呈現為與男性的相同，只不過將位於體外的部分轉換為位於體內，陰道所對照的是陰莖，而卵巢對照的是睪丸。十六世紀的法國外科醫生巴雷（Ambroise Pare）陳述了一個年輕農民女孩的病例，她在青春期的時候因為跳過了一條溝導致其陰部韌帶斷裂，讓其男性器官跑了出來；在那一瞬間，女孩瑪麗（Marie）變成「男孩吉爾曼（Germain）」。巴雷解釋說，女性「隱藏在體內的東西就跟男性外露的東西相同。」<sup>84</sup> 女性性器官的功能被視為與男性的相同，雖然作家們對於女性在性交的時候是否產生了與精子相當的東西抱持不同看法，但都認為女性的「熱」對於懷孕

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十六世紀文學中為人熟知的經典所指出的，女性理應比男性更為淫蕩，因為她們的性別與下流的事物距離更近。<sup>85</sup> 在十八世紀期間，許多不同的新想法和理解方式相結合，推翻了這些假設：到了十九世紀，「兩性」模式是最終獲勝的思考模式，在其中男性和女性的身體被認為是完全不同的；理想的女人在這時候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生物，而且女人在性方面天生的被動性則被奉為信條。

對於性別之間差異的理解為什麼出現如此巨大的轉變，拉克爾明確指出，社會和政治變化本身無法解釋身體為何被重新詮釋：啟蒙運動、新的科學思想、法國大革命文化的後果、對革命的保守反抗或是初生的女權主義，這些都不能說是「造成一個新的性別身體」的原因。<sup>86</sup> 他認為，身體被重新構想既不是這些發展的原因也不是結果，而存在於這些發展的本質中；儘管他在書中指出其所探討的時代中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變化，但他並沒有去強調它們之間有任何因果關係。接近傅柯的著作，而不像典型的微觀歷史。《性製作》一書橫跨了大幅度的時間，它的論點和大部分的證據集中在一六〇〇年至一八五〇年這段時期。儘管本書在時間的範圍上很長，並且與文化史的實踐相一致，但這是一本迴避因果關係問題的著作：其重點是要揭露出類型的性別差異背後的各種假設，而不是解釋為什麼這些意義發生了改變。

文化史家對因果解釋的冷漠，有時候引起了歷史學家的憤慨，他們在紀爾茲或傅柯

的文化分析中看到，對歷史上的道德或政治責任的放棄，這與後現代主義的腐蝕作用十分類似（詳見第六章）。<sup>87</sup> 歷史學家質問道，如果屠貓兇手、異教徒磨坊主，和早期現代的人對司法懲罰或女性解剖學抱持的奇特態度，以上這些都無法被放入一個能夠解釋我們是如何從彼時轉變至今日的故事當中，那麼告訴我們三百年前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我們不同，又有什麼意義呢？這種大多是要我們去理解和接受歷史上激進他的歷史，其目的究竟為何？評論者批評道，因為文化分析只關注司法上的截肢刑罰這類事情的意義，他將危險的相對主義引入了學術研究中。另一方面，文化史家認為自己的方法尊重了過去社會的完整性並且具有道德價值，因為它可以被用來對抗某些人認為只有現代的理解和解決方案值得研究的傲慢態度。

對於許多歷史學家和讀者而言，歷史學的倫理目的就是建構一種「過去是因、現在是果」的敘事，並且鼓勵我們針對這種敘事採取行動，無論是延續或是改變它。他們主張，原因之所以重要，除了因為它連結了過去與當下，還因為能夠替我們指引未來。另一方面，對於文化史家來說，如其本然地探索與接受過去事物的陌生性（strangeness），便是在學習包容性的相對主義，也是在鼓勵批判當下：例如，如果我們知道三個世紀前沒有人認為女性不如男性對性有興趣，那麼我們或許就能挑戰這樣的觀念。紀爾茲本人承認，文化分析並沒有去處理人類的首要問題，它所提供的，他寫道，是一種人文主義的觀點，孕育此種觀點的是去理解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各種回應這些質問的方式。他

也寫道，文化人類學的目的不是「去回答我們最深刻的問題，而是要提供給我們，其他人在其他山谷中守護其他綿羊的時候，曾經給過的答案，並因此將它們納入可供查閱的記錄人們言論的檔案中。」<sup>88</sup> <sup>⑬</sup>

在文化史如日中天之時，一些學者擔心，正如其中的一位所說的，新的方法就像是恐怖的浮士德式交易，「其提供的條件是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意義的領域，不過其代價是我們歷史研究的靈魂。」<sup>89</sup> 今天，因為文化史而敲響的警鐘已經停止，歷史學家們可以放心地使用文化分析，而不必將自己的生命出售給被視為如梅菲斯托<sup>⑭</sup>（Mephisto）一般的傅柯。宏大的因果敘事作為一種方案，詳盡而且在文化上曲折變化的微觀史作為另一種方案，兩種選擇之間存在的鮮明不同在近年來似乎已經變得模糊，因為歷史學家選擇了各種更具折衷性的方法，既使用了人類學與論述分析，也使用了他們所擁有的為數更多的方法。雖然大多數的通俗歷史仍然堅持傳統的敘述形式，不過就分析的層面而言，大

<sup>⑬</sup> 譯注：由於紀爾茲在其著作中曾討論於一九二二年發生在摩洛哥中部高原地區的羊群盜竊的故事，所以這裡才提及守護綿羊。

<sup>⑭</sup> 譯注：梅菲斯托為梅菲斯托費勒斯（德文：Mephistopheles）之簡稱。最初於文獻上出現是在浮士德傳說中作為邪靈的名字，此後在其他作品成為代表惡魔的定型角色。

多數學術著作則會視需求程度不一地使用各種理論。一位曾撰寫關於十九世紀美國原住民歷史研究的史學家，可能會以廣泛的因果發展來構架她的故事，如工業和生態變化，同時藉助紀爾茲式的分析來解釋這些發展在各地不同的世界觀中如何發揮作用。這兩種方法在理論上或許是不相容的，但在實踐中未必如此。不同於歷史社會學研究者偏好將自己的研究整理成不同的命題，歷史學家默認般地接受，若是要追尋歷史上任何領域中盤根錯節的真相，在方法論上就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龐大因果體系的倡議者以及熱衷於新文化史和微觀史的倡導者們一度勢同水火。正如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的，圍繞著「後現代主義」這一趨勢的二十世紀八〇、九〇年代的相關糾紛則是有變得更加棘手的可能性存在。今日的（不過又能維持多久？）歷史學家們已經不再為了方法論而戰得不可開交，而是開始採納林·亨特所謂的「有意識的折衷主義」的立場：「不同問題往往需要不同的方法，而且沒有一種方法可以回答我們所有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歷史領域的創新動力來自於要「全球化」歷史研究的呼籲，這正如她所說的不是一種方法或理論，而是一個過程。<sup>90</sup>一些歷史學家擔心對於這門學科而言，目前的發展過於平靜，在研究方法上作為主流的折衷主義，除了意味著歷史理論被「馴化」了，也意味著歷史學失去了這領域在批判和分析上的銳利性。<sup>91</sup>我們希望情況不是如此，或者不會持續太久。關於方法和方法的激烈辯論對於歷史研究或是其他學科都是至關重要的：爭辯原因與意義之間何者才是最重要的、或者爭辯我們研究過

去的作法中的任何層面，都對於闡明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以及為何我們要這樣做是至關重要的事。

- 1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113.
- 2 Robert Schneider, "Explaining Historical Change, or: The Lost History of Caus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0, no. 4 (October 2015): 1370.
- 3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5-16, 46-48.
- 4 J. E. Lendon, "Historical Thought in Ancient Rome,"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London: Blackwell, 2002), 60-77; Clayton Roberts,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4.
- 5 Johnson Kent Wright,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Era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123-42.
- 6 Roberts,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274-75; Peter Reill,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7 關於十九世紀的因果決定論和其後來由懷察·諾參閣 Stephen Ker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ausality: Science, Murder Novels, and Systems of Th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26.
- 8 我頗感謝英迪拉·拉曼 (Indira Raman) 在翻譯本文時的這個差異之闡述。
- 9 Roberts,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3-15.
- 10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關於該書及其後來由皮里尼維·諾參閣 Jonathan Weiner, "The Barrington Moore Thesis and Its Cr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2 (Autumn 1975): 301-30. 在該書·· 巴林頓·摩爾著· 王亞· 顧繁謙· 《巴林頓·摩爾的社會制度論》(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
- 11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在該書·· 吳在民波著· 羅其俊譯· 《國家與社會革命》(台北· 桂冠圖書· 1998)。
- 12 Roberts,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8.
- 13 George Fredrickson, *White Supre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American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Susan Pedersen, *Family, 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elfare State: Britain and France, 1914-194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nathan Steinberg,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3* (London: Routledge, 1990). 在該書中方式來研究奴隸制度· 相關成員之概述請參閱 Enrico Dal Lago, "Comparative Slavery" in Mark M. Smith and Robert L. Parrel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664-84.
- 14 Peter Baldwin, "Comparing and Generalizing: Why All History Is Comparative, Yet No History Is Sociology," in Deborah Cohen and Maura O'Connor, eds., *Comparison and History: Europe in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04), 1-22; George Fredrickson, *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 Nation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sup>5</sup> Peter Kolchin, *Unfree Labor: American Slavery and Russian Serfdo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sup>6</sup> Walter L. Adamson, "Marxism and Historical Thought,"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209-16.

<sup>7</sup> Mark Cowling and James Martin, eds., *Marx's "Eighteenth Brumaire": (Post) modern Interpretations*, trans. Terrell Carv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19.

<sup>8</sup>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sup>9</sup>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3), 9.

<sup>10</sup> Traia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第五章。中譯本：格奧爾格·伊格斯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

21. 林·亨特指出，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國際歷史研究手冊》(*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中收錄了研究東西歐、印度、拉丁美洲、日本和非洲各地歷史的文章，其中「在所有主題中只有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的詞條在數量上多於年齡學派」。Hunt, "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 (1986): 210.

22.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1973). 中譯本：費爾南·布勞岱爾著·唐家龍、曾培耿等譯·《菲力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23. Burk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42.

24. 同書 *ibid.*, 35.

25. 一些代表性的著作是 Philippe Ariès, *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Plon, 1960); Ariès, *L'homme devant la mort* (Paris: Le Seuil, 1977); Jean Delumeau, *La peur en Occident, XIVe-XVIIIe siècles* (Paris: Fayard, 1978); Michel Vovelle, *La mort et L'Occident de 1300 à nos jours* (Paris: Gallimard, 1983). 中譯本：菲力浦·阿利埃斯著·沈堅、朱曉罕譯·《兒童的世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6. Hunt, "French History," 213-14.

27. Carr, *What Is History?*, 117; 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44-56.

28. Carr, *What Is History?*, 137-38.

29. *Ibid.*, 137-43.

30. Mark Hewitson, *History and Causality* (London: Palgrave, 2014), 87-93; Ferguson, *Virtual History*, 54-55; 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羅氏譯。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93-95. 甘繼本·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歷史學辯護》(台北·巨流·2002)。

31. Gaddis, *Landscape of History*, 96.

32. 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33. *Ibid.*, 9-10.

34. Gaddis, *Landscape of History*, 95-100. 羅伯茲的說法也是如此·指出這與確立個人罪行的法律標準是一致的。Roberts,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123.

35. Ferguson, *Virtual History*, 71-90.

36. Roberts,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 特別是第一章。

37. John Holte, ed., *Chaos: The New Scienc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38. Roberts, *Logic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135, 137. 一篇討論定義結構的困難之處·富有啟發性的討論·請參閱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第四章。

39. Sewell, *Logics of History* · 第七章· 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第一、三、四章。正如西威爾所指出的·薩林斯對庫克到來之後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之解

釋受到「奧貝賽克拉 (Gananath Obeyesekere) 的嚴厲批判·請參閱其著作 *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奧貝賽克拉認為·夏威夷人把庫克的到來轉化入他們的宗教範疇·這種想法是基於歐洲史料而來的猜測。

40. *Ibid.*, 202.

41. Marshall Sahlins,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1), 22-26.

42. 西威爾將這個短語應用於他所分析的另一個例子·即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對巴士底獄的攻擊· Sewell, *Logics of History* · 第八章。

43. William H. Sewell, in Schneider, "Explaining Historical Change, or: The Lost History of Causes," 1380. 正如對話的標題所表明的·所有參與者皆強調「變遷」(change) 在歷史學家研究中歷久不衰的重要性·即便傳統研究因果關係的方法正在消褪。

44. R. Bin Wong, "Causality," in Ulrika Rublack, ed., *A Concise Companion to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56, 特別視圖 40。

45.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10, 76.

46. *Ibid.*, 5-6.

47. 這個問題發人深省的討論見 Jill Lepore, "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 Reflections on Microhistory and Biograph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 (2001): 129-44.



48. 關於義大利第一代微觀史學家介紹，請參閱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s of Europe*, trans. Eren Branc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49. John Demos, *The Unredeemed Captive: A Family Story from Early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94);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Jonathan Spence,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Vintage, 1988); Patricia Cline Cohen, *The Murder of Helen Jewett: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Prostitu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ew York: Vintage, 1998); James E. Goodman, *Stories of Scottsboro* (New York: Pantheon, 1994). 中譯本：呂東燾譯·李季楷譯·《婦人王氏之死》(臺北：麥田，2001)；呂東燾譯·陳信宏譯·《胡荅寧的疑團》(臺北：時報出版，2011)；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江政寬譯·《馬丹·蓋赫叛鄉記》(臺北：聯經，2000)。
50. 關於義大利微觀史家創始成員們的內部分歧，請參閱 David Bell, "Total History and Microhistory: The French and Italian Paradigms," in Kramer and Maz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267-73; Francesca Trivellato, "Is There a Future for Italian Micro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 History?," *California Italian History* 2 (2011): 5-6; Sigurdur Gylfi Magnússon and István M. Sziántó, eds., *What Is Micro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13)·銀1章。
51. Giovanni Levi, "On Microhistory," in Peter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5-98; Trivellato, "Is There a Future?," 5.
52.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75-104.
- 中譯本：羅伯·丹屯著·呂健忠譯·《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台北：國立編譯館·聯經出版社，2005)。
53. *Ibid.*, 77-78.
54. *Ibid.*, 98.
55. Lepore, "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 133.
56.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128.
57. Muir and Ruggiero, *Microhistory*, xiv.
58. Darnton, *Great Cat Massacre*, 6.
59. *Ibid.*, 260.
60.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3), 3-30. 中譯本：克利福德·紀爾茲著·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1. *Ibid.*, 6-7.
62. 紀爾茲對文化的定義經常被引述：「與馬克斯·韋伯相同，我認為人是懸在他自己所紡織的重要網絡上的一種動物，我認為文化就是這些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性研究，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詮釋性研究。」*Ibid.*, 5. 關於峇里島的鬥雞，請參閱 *Ibid.*，第十五章。
63. 這個新研究趨勢隨著一本具有影響力的論文集出版而開始被如此稱呼：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中譯本：林·亨特著·江政寬譯·《新文化史》

(包式·麥田·2002)。

- <sup>69</sup>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Hunt,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中譯本：林·亨特著，汪珍珠譯，《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林·亨特著，鄭明萱、陳瑛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台北：麥田·2002）。
- <sup>70</sup> Levi, "On Microhistory," 108-9; Magnússon and Sziártó, *What Is Microhistory?*, 19; 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1985): 689-94.

<sup>71</sup> Lynn Hunt, "Introduction," in *New Cultural History*, 1-6; 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41. 中譯本：彼得·伯克著，蔡玉輝譯，《什麼是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sup>72</sup> 為了概述這個巨大的領域，請參閱 David Finkelstein and Alistair McCreary,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6); Alexis Weedon et al., eds,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the West: A Library of Critical Essays*, 5 vols.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0).

<sup>73</sup> Robert Darnton, "History of Reading," in Burke, *New Perspectives*, 148-49.

<sup>74</sup> *Ibid.*, 160. 關於單獨閱讀和手紙之間的聯繫，請參閱 Thomas Laqueur, *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2003). 中譯本：托馬斯·拉科爾·楊俊峰等譯，《孤獨的性：手紙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sup>75</sup> Roger Chartier, ed. *Pratiques de la lecture* (Marseille: Rivages, 1985); Chartier and Henri-Jean Martin,

eds., *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4 vols. (Paris: Promodis, 1982-1986) ; Guglielmo Cavallo and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3); Paul Saenger, *Space between Words: The Origins of Silent Reading*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76</sup> Darnton,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 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Great Cat Massacre*, 215-56; Janice A.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sup>77</sup> Judith R. Walkowitz,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up>78</sup> 學術界對傅柯的評論汗牛充棟，而往往非常不易理解。理解其思想如何發展的最佳方法是透過傳記，特別呢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trans. Betsy W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d James Miller,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中譯本：迪迪埃·埃里蓬著，謝強、馬日譯，《米歇爾·福柯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詹姆士·米勒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台北：時報文化·1995）。另見 Alan Megill, "The Reception of Foucault by Historian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1987): 117-41; Jan Goldstein, ed., *Foucaul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94).

<sup>79</sup> Miller, *Passion*, 98.

<sup>80</sup> John Toews, "Linguistic Tur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History," in Neil Smelser and Paul Bak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3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8917.

76. 格外明瞭的相關討論 - 請參閱 Patricia O'Brien,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 in Hunt, *New Cultural History*, 25-46, esp. 34-36.

77. 例如 - 請參閱 George Huppert, "Divinatio et Eruditio: Thoughts on Foucault," *History and Theory* 13 (1974): 191-207; H. C. Erik Midelfor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 Reappraisal of Michel Foucault," in Barbara C. Malament, 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 H. Hex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0), 247-65.

78. Lawrence Stone, "Madnes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9, no. 20 (December 16, 1982).

79.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1972), 144. 中譯本：米歇·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1993）。

80. 這個術語是從對傅柯影響最深的哲學家尼采（F. W. Nietzsche）那借來的。請參閱 Alan Sheridan,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London: Tavistock, 1980), 115-20.

81. *Ibid.*, 89-110 - 註釋 93 (fro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82. O'Brien, "Foucault's History of Culture," 44.

83.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譯本：托馬斯·拉克爾著，趙蕪鵬譯，《身體與性屬：從古希臘到弗洛伊德的性製作》（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

84. *Ibid.*, 127.

85. *Ibid.* - 第二章。

86. *Ibid.*, 11.

87. 請參閱 - 例如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 第六、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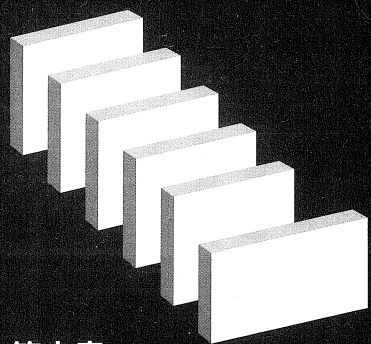
88.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30.

89. Keith Michael Baker, "On the Problem of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0. 中譯本：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斯蒂文·卡普蘭編，王加豐、王文婧、包中譯，《現代歐洲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貝克的文章為：第七章〈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意識形態起源問題〉，其本人的立場是認同文化史的。

90. Lynn Hunt, "Where Have All the Theories Gone?,"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March 2002), 5.

91. 例如 - Joan Scott, "History-Writing as Critique," in Keith Jenkins, Sue Morgan, and Alun Munslow, eds., *Manifestos for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9-38; Gary Wilder, "From Optic to Topic: The Foreclosure Effect of Historiographic Tur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7 (June 2012): 723-45.

CHAPTER 6  
FACTS OR FICTIONS ?



第六章

事實還是虛構？

## 客觀性的興衰

如果你問歷史學家自認為是「社會科學家」還是「人文主義者」，你會得到各種反應，其中最常見的可能是一「兩者皆是」。此學科之根本性質便是揉合各種事物，植根於事實，以述說故事為架構，歷史學橫跨了「人文藝術」課程中的「軟」學科和「硬」學科。一方面，歷史學家就是講究實際的典型經驗主義者，在檔案庫當中無休止地挖掘，直到他們把所有的資訊排列起來後，以對於「事實」的深度掌握來嚇倒其他學科的同儕；另一方面，歷史往往建立在許多故事之上，最成功的歷史著作，也就是那些廣泛流傳和經年不衰的，通常具有與優秀小說相同的特質。歷史學的雜合性本質是歷史學家之間不斷爭論在重建過去中「事實」與「虛構」之間界線究竟何在的主因。<sup>1</sup>表面看來，歷史究竟是事實還是虛構的問題應該很容易被回答：歷史不可能是虛構的，因為這門學科最根本的規範（至少在現代形式中）就是你不得憑空捏造事物。但是，如果現代職業規範告訴我們，歷史必須以可核查的事實為基礎，後現代主義式的理解方式讓我們不可避免地意識到所有的歷史記錄都是選擇的產物，而且只要歷史學家尊重其專業中的規範與標準，對於同一事物的不同說法都是同樣有效力的。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即使是在很少接觸學術爭論的公眾當中，會認為撰寫歷史只是將所有的證據排列起來，讓事實「自己說話」。即使考慮到已經有許多人同意關於過去的紀錄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學家的政治、

美學或其他偏好的影響，然而，其中仍有很大的爭論空間。

特別是在上個世紀末，被稱為「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潮流衝擊了學術界，以各種形式的激進懷疑主義吞噬了許多學科，並引發了歷史學家之間的激烈爭論。但是後現代主義帶來的危機也就只是歷史學家逐漸拋棄一個舊有信念的長時期演變的最後階段，上述的舊有信念認為完全客觀的態度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既是可能的，也是歷史專業的終極目標。雖然後現代主義已不再像是二十年前那般熱門的議題，但其具有深刻影響力的主張至今依然存在，無論是作為塑造歷史寫作中某些層面的思想潮流，還是作為一種提出了一些重要議題的理論性質疑，這些議題包括了歷史學家的實踐，還有歷史學家與他們在檔案庫中找尋的「過去」之間的關係為何。它以最尖銳的形式提出那些將永遠地圍繞著歷史研究和寫作實踐的問題：就算我們承認了自己是帶著某種身份和經驗，以及各種在知識、情感和政治上的目的來使用史料，我們又如何能夠準確以及負責任地重建過去？為了要把我們所使用的不同文件連結起來，我們需要採用以及應該採用多少虛構的成分？寫作歷史在什麼程度上算得上是一種文學創作呢？以及歷史學家該如何協調，對終極事實與客觀性的質疑以及寫出懷抱政治主張的歷史，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呢？

正如我們在本書第四章已經看到的，十九世紀末期歐洲和美國新興的專業歷史學模仿了當時聲望如日中天的科學學科：對於一八八〇年以後的專業史學家來說，其研究

的可信度和地位取決於是否能夠建立起不容置疑的真理，就像他們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科同事所做的那樣。十九世紀後半葉的美國歷史學家堅持，歷史既不是「文學」也非「藝術」，並且定義他們的研究計畫是對事實的嚴格和徹底的掌握。例如歷史學家愛德華·錢尼 (Edward Potts Cheyney) 在一九〇一年提交給美國歷史協會的報告中寫道，歷史學家的任務是「收集事實，客觀地看待事實，並按事實本身的要求來編排它們。」<sup>2</sup> 像牛頓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學家據說「擁有能夠反映自然的一面鏡子」，歷史學家們則被要求擁有一面能反映出過去的鏡子。他們的目標應該是透過對原始文件的批判性研究將所有的事實排列整齊；學者們認為，經過科學考察的資料來源能夠產生出一種獨一無二的意義，而且學者們有時會把歷史學是一門材料可能將被用完的學科這種不明說的推論清楚地說出來。正如一本於一八九八年法國出版的頂尖歷史研究指南直言不諱地寫道：「歷史所擁有的便是有限的文獻資料；這種情況限制了歷史科學的可能進展。當所有的文件都被找出來，而且經過了讓它們適合被運用的作業以後，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也就完成了。」<sup>3</sup>

在這種專業歷史研究的科學性理想背後的是種「歷史客觀性」的理想，彼得·納維克 (Peter Novick) 定義其為「忠於過去的實際情況，並且忠於與此實際情況相對應的事實；嚴格地區分認識主體與客體、事實與價值，以及最重要的歷史與虛構。」<sup>4</sup> 從一八八〇年代到二十世紀中葉，許多歐美歷史學家相信，完全擺脫個人偏見或信仰扭曲的過去

的研究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當這個理想還沒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挑戰時，人們很容易便會加以認同。幾十年來，這種對於歷史客觀性的看法已接近共識，因其與歷史系所是同質性非常高的工作環境密切相關，這裡被來自上層階級的白人男性新教徒學者所佔據。

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大多數歷史教授來自上層階級及上層中產階級。當歷史專業在兩次大戰間開始開放來自包括非新教徒等更多元背景的年輕人進入時，這引起了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 權勢集團的擔憂。當時猶太人從事科學研究乃至於更新穎的社會科學研究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他們被認為不能從事歷史學科的研究，因為它雖然有其科學性的理想，但是被認為需要人文背景，也就是某種特定的「教養」——這個學術專業的領導者擔心「品味」或「審美意識」可能下降。傑出的年輕猶太學者奧斯卡·漢德林 (Oscar Handlin)、丹尼爾·布爾斯廷 (Daniel Boorstin) 或理查·利奧波德 (Richard Leopold)，日後皆成為傑出的歷史學家，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替他們所寫的保密推薦信當中包括了一系列帶有戒心的背書說辭，像是候選人「不具有某些人往往與其種族聯繫在一起的那些令人不快的特徵，」<sup>5</sup> 「是名猶太人，但不是令人反感的那種，」或是因為這個人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所以「不會是那種令人討厭的猶太人。」信奉天主教的歷史學家往往任教於天主教的機構或者是神學院，而少數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則通常被派往女性院校任職。<sup>6</sup> 這種可以不帶成見、不帶個人情感地去研究過去的想法之所以蓬勃發展，部分原因便在於任職於美國頂尖機構的

歷史學家隸屬於一個大體上相當一致的社會文化世界。<sup>6</sup>

然而，歷史客觀性這種佔據主導地位的理念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並非沒有受到挑戰，甚至也出現在這個同質化的群體之中。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信奉「進步主義」的歷史學家便對不帶偏見和全體皆贊同的歷史理念加以抨擊。最著名的是比爾德（Charles Beard）引起爭論的著作《美國憲法的經濟觀》（*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 Constitution*，一九一三年），本書之所以招致許多爭議是因為其將美國建國文件解釋為一部原始資本主義的著作，而其作者們皆在尋求保護自己作為業主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帶來了概念上的衝擊，因為歷史學家目睹了政府和支持他們的學者如何塑造歷史證據以服務戰時宣傳的目的；這種現象在德國最為嚴重，也因此嚴重打擊傳統上對德國學術專業水準的崇敬。最後，兩次大戰之間在知識上的一系列發展，從知識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這個新研究領域的出現，到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等一群作家的「法律現實主義」（legal realism），再到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從一八八〇年代以來逐漸累積的影響力和日益增長的威望，以上種種除了促進了社會科學中相對主義思潮的茁壯，也促進對價值中立（value-neutral）學術存在的可能性懷疑態度的迅速增長。<sup>7</sup>

學術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的大規模轉型，對美國歷史學界的歷史客觀理想提出更根本性的挑戰。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為兩百多萬名退伍軍人提供了教育福利——該法案的效果在一個世代之後因為戰後嬰兒潮而被強化，為高等教育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創造了許多新的教授職位。在一九三〇年代，每年大約有一百五十個人被授予歷史博士學位；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後期，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一千個。與此同時，美國歷史協會的成員在一九五〇年代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六〇年代增長了百分之九十。歷史教授的成員現在包括了來自更廣泛的社會、種族和宗教背景的年輕人（和一些年輕女性）。耶魯大學歷史系主任於一九五七年為此感到擔憂「英語學科仍然吸引有教養、專業和富裕階層的（研究生）……歷史學科大體上所吸引的似乎是較低的社會階層。」門房、推銷員、文員和技工的兒子正在申請到常春藤盟校學習歷史，他擔心這個專業變成了社會階級流動的「電梯」。二十世紀中葉的這些學生留心警惕到這種身為非菁英階層的經驗，他們之後透過開拓像是「勞工史」和「下層史」（參見第一章）的主題和方法來革新歷史學。

雖然一九五〇到七〇年代的年輕人引入了與老一輩截然不同的觀點和議題，但是他們通常並未去質疑歷史研究背後所假設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他們的著作中格外強調了不同的行動者和不同的故事，但並未質疑歷史事實的地位。出身顯貴的上一輩學者們追求的是政治、軍事或外交史的「事實」，年輕一代提出另一套有關勞工運動、工人階級生活或奴隸制的「事實」作為回應。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越戰和水門案等醜聞，將校園籠罩在政治動蕩之中，雙方都指責另一方在歷史上頭強加上某種意識形態的主張，但是

雙方也都堅信自己對於那些事情真正重要說法的真實性。總而言之，一九六〇年代的衝突透過引入極為不同的各種觀點饒富成效地震撼了歷史學科，但是尚未針對歷史敘事聲稱自己具有真實性的說法提出深刻的質疑以前，這些衝突就結束了。<sup>9</sup>

歷史學科的認識論，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受到更大的震撼，因為從這時開始人數不多但是高聲表達自己意見的女性和非裔美國人等少數族群進入了歷史學系。這些群體引入了研究歷史的新方法，他們空前地要求，歷史學家的身份必須成為其學術研究中被公開承認的部分。歷史學科中的女性人數在戰後社會保守時期實際上是下降的，女性占新博士人數的比例從一九四〇年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一九六〇年代的百分之十二——但是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的「第二波」女權主義將更多的女性帶回此專業中；到一九八〇年代，女性研究者佔了歷史學位論文作者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二〇〇八年比例更達到四成二）<sup>10</sup> 不同於他們同世代的左翼男性同事，這些男性的猶太裔、義大利裔或愛爾蘭裔的民族身份在其學術研究中如果真有影響力的話，也是以一種很含蓄的方式表現——例如猶太學者並不是一向都在研究猶太人的歷史，但許多女性學者則明確地將自己的身份與所研究的內容與方法連結在一塊。跟隨著在溫尼考特（J. D. Winnicott）、麥考比（Eleanor Maccoby）和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女性主義社會科學家<sup>①</sup>所提出的，女性在情感和認知上的風格與男性截然不同的主張，支持女性主義的女性學者（當然不是所有女性學者）都開始主張，由於女性的不同經驗，女性能夠而且應該寫下與男性同

事不同的歷史。這使得一些女性歷史學家明確地承認自己的「主體性」為女性，並且最終讓她們去探索包括性別理論、精神分析學和後現代主義在內的激進新方法論。<sup>11</sup>

與此同時，激進的非裔美國學者也開始進行類似的事情，他們主張歷史學術研究當中的內容不能夠，也不應該與創作者的身份和經驗分開。其中最激進的人，質疑白人歷史學家是否具有能力講述黑人奴隸以及其他在歷史上被征服的有色人種的經歷。在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早期，在學院中的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較為激進的早期階段，這種關注有時導致了白人學者在討論奴隸制度的會議上飽受噓聲和大聲反對，黑人學者在白人同事報告時眾目睽睽之下離席，或者是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的課程中被要求不應該有非黑人族裔的教師。儘管環繞在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族群的歷

① 譯注：麥考比（Eleanor Maccoby），美國心理學家，早期的研究重點是學齡前兒童和兒童中期，近幾年主要從事對青少年的研究。一九八八年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一九九三年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吉利根（Carol Gilligan）於一九八二年發表《不同的語言：心理學理論與女性的發展》（*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本書從人們的常識性理解入手，以科學的方法建立了一個嶄新的論述，即與男性相較女性有著不同的心理發展途徑。也因為此書被視為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的開創學者。



史研究中，有關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衝突最終消退了，但是關於誰可以合理地傳達少數民族的歷史經驗這樣的問題，在歷史學的專業和實踐中留下了相關影響。<sup>12</sup>

在二十世紀末的這段時期，歷史客觀性的理想在美國是在歷史學家社群內部被破壞的：研究「底層歷史」的學者堅持認為，窮人的故事與那些掌權者的故事一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而一些女性和非白人的歷史學家認為，邊緣化群體的經驗是如此不同以至於無法與「主導敘事」（master narrative）相容。只有最激進的學者主張要擁戴「主觀性」，但隨著不同的歷史觀點日益累積，就愈難相信有任何一位歷史學家，無論多麼誠實以及帶著善意，可以從像是奧林帕斯山諸神般超脫世俗地講述過去的故事，不受階級、性別、種族、民族和其他偏見的影響。

當前的全球視角給予了過去世代對於客觀性的理想最後的一擊。我們今天撰寫歷史的形式，無論是從上層、下層還是邊緣的角度出發，我們越發意識到，這個形式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也導致了西方記錄歷史的慣例，壓倒了任何其他傳統。時至今日，將歷史想像成一條龐大時間線的作法幾乎已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所有的事件，那些有留下書面資料的，都能夠被放在這條時間線上。但是，正如丹尼爾·伍爾夫（Daniel Woolf）等人所表明的那樣，現在被普遍認為是「歷史」的東西，實際上是一套西方的記憶和敘述過去的規範和實踐，而在歐洲與後來的美國在過去幾個世紀成為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的主導強權後，這種對歷史的認識如殖民般地主宰了其他社會的心靈

層面。<sup>13</sup>

所有社會都有呈現集體過去的方式，不過當中包括了口頭和書面的各種形式，還包括了神話、傳說、史詩、家譜、年表和民族誌等。在非洲和美洲社會，回憶和傳統是口頭傳播的，而亞洲人和歐洲人在過去數十個世紀以來都一直都保存著文字紀錄。亞洲史學傳統早於西方：伍爾夫寫道「世界上沒有任何文明跟中國一樣，不曾間斷地一直將記錄以及理解自身的過去看得如此重要。」<sup>14</sup>古代中國的研究歷史時間的方法與西方所流行的方法不同，古代中國的歷史所根據的是不同朝代的一連串興替，而不是根據一個單一時間線，像是「羅馬建國以來」或是「耶穌誕生以來」，中國古代的歷史寫作發展的時代更早就更細緻，並且具有官方的規矩、習俗以及歷史學家的官位。早在公元前九〇年，歷史學家司馬遷便完成了由父親開始的一項重要的名山事業——《史記》這本體大思精的著作，包括主要朝代的歷史、年表、討論知識體系不同分支的論文、重要家族的編年史以及列傳五個部分。（司馬氏完全獻身於要完成這個著作計畫，因此當他失寵於皇帝之時，他遭受了閹刑這種極為恥辱的懲罰，而不是選擇光榮地自殺，任由其使命未竟。）<sup>15</sup>

在蒙兀兒帝國時代的印度，以及同時代的波斯和鄂圖曼帝國，與早期近代歐洲的宮廷相類似，歷史寫作不約而同地在相近的時代都作為王室、皇室和宗教等權威的擁護者而蓬勃發展。當代歐洲人肯定其他傳統的細膩和複雜，正如他們後來稱讚十四世紀伊斯蘭學者伊本·赫勒敦<sup>②</sup>（Ibn Khaldun）是維科或孟德斯鳩建立起傳統的社會學式歷

史學的先驅。<sup>16</sup>雖然早期現代的歐洲人承認了亞洲和伊斯蘭文化的文字歷史傳統，但是他們卻吝於承認以不同形式記錄過去的社會具有歷史。十六世紀的歷史學家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Garciaso de la Vega）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混血背景使他得以將其印加祖先的口頭傳統，編織入他用西班牙文寫作的祕魯歷史；他的大多數前輩和同時代人將土著對過去的描述視為不可信以及「野蠻的」，因其基於口頭傳統。<sup>17</sup>非洲是一個書寫文字非常罕見的大陸，因此被不假思索地視為一個沒有歷史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紀仍有許多人堅持此觀點。甚至直到一九六三年，傑出的英國歷史學家休·崔姆—路普（Hugh Trevor-Roper）仍惡名昭彰地宣稱，「在未來也許會出現一些可資教學的非洲歷史。但目前還沒有出現，或者說是寥寥可數，我們只有歐洲人在非洲的歷史。其餘的部分大多是黑暗的，如同歐洲尚未崛起前的歷史，或像是在哥倫布以前的美洲歷史一樣。而黑暗並不是歷史的主題。」<sup>18</sup>如果缺乏了西方風格歷史寫作所需要的材料，整個大陸的歷史可能就被草率地打發掉。

歐洲人「發現」遠方土地並宣稱擁有所有權，他們在十八世紀就設計出了一個單一且「普世性」的線性歷史概念，作為將先前的多個地區、朝代和宗教歷史都歸在其下的一個綜合體——「大寫歷史」<sup>③</sup>（History）這種觀念鼓勵了將不同的社會，無論在前或是在後，視為都位於同一條通往文明的高速公路上這樣的觀點。同樣在這個時代，由於西方歷史學家遭遇到不同類型的「歷史性」（historicity），他們開始試圖更嚴謹地編纂自己

的學術成果，其作法是指出自己追尋以及描述過去的方式與其他社會較為拙略的作法大不相同。因此，雖然法國歷史學家德經（Joseph de Guignes）對中東和亞洲歷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他卻蔑視中國史學為乾枯無聊，將「阿拉伯人」斥為「其充其量頂多就是一位編年史家」。歐洲啟蒙運動的主要人物認為，圖像和口頭資料具有致命的缺陷，卻寬以律己地不去提及某些他們過去著名的史家，如修昔底德對口述傳統的信賴。十八世紀的大衛·休謨（David Hume）寫道：「人類薄弱的記憶力、他們對於浮誇的愛好、他們因循守舊的粗心；這些天然的傾向若不透過書籍和文字來加以糾正，不用多久便會扭曲對歷史事件的敘述。」<sup>19</sup>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歐美帝國主義鼎盛時期，西方歷史學術的經典和規範被灌

② 譯注：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年）出生於現今突尼西亞，是伊斯蘭教徒統治下的西班牙貴族後裔。中世紀阿拉伯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在社會學式歷史學方面，指出人類的生存和社會活動深受物質資源、地理環境和氣候等客觀條件影響。

③ 譯注：「大寫歷史」始於十七世紀的義大利思想家維科，強調對於人類整體歷史的解釋。嘗試用科學去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並且相信歷史當中存在規律，雖然各地發展不盡相同，但是都會歷經個別的歷史階段，而且最後會趨向相同。他因此相信歷史本身有內在規律，而且人類的歷史只有一種。

輸到世界各地的大學中，殖民地國家的菁英們別無選擇只能採納之。<sup>20</sup>雖然我們現在幾乎不可能跳脫到現代西方歷史規範的框架之外來思考，但我們至少意識到這些規範在歷史上之所以不可避免的偶然性質。從全球的脈絡來看，一直被歐美學者珍視的客觀性就等同於西方對與其競爭的歷史寫作傳統的消滅，這個為期數百年的過程畫龍點睛之物，與此理想聯繫的是對於書面（「客觀的」）文件的價值，以及歷史是單一直線的過程的堅信不移。

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一連串的衝擊震撼了認為歷史學家可以得出最終的真理，這種曾經相當樂觀（或自滿）的信念：上一代的「客觀性」標準遭到學術界內外反對者的質疑，認為這僅僅是那些握有西方歷史學界權力的白人士層人士的特殊視角。在舊有想法被逐步削弱的過程中，方法論和社會學的發展這兩者一直是形影不離的：來自非菁英階層的學者質疑菁英政治史的重要性，女性和有色人種告訴白人男性學者「你的真理不是我們的」，世界文化和學術界的全球化讓我們對西方歷史規範有了嶄新的看法。

除了這些學者的身份和觀點的轉變之外，對傳統歷史認識論的一系列哲學性質疑於一九八〇年代出現，它們在廣義上被稱為「後現代主義」，並且引起了歷史學界好一段時間的動盪，並且直到今日仍然在某些地方引起恐慌。

## 後現代主義和歷史：激進的懷疑主義及新方法

「後現代主義」是一個總括性的詞，通常被用來形容在一九八〇年代衝擊了學術圈中人文學科的那場在思想上的海嘯，它起源於語言學、哲學和文學研究領域，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和德曼（Paul de Man）等困難且富爭議的思想家名字密切地聯繫在一塊。就我們的論題而言，當後現代主義開始影響歷史研究和刺激爭論，其最重要的一個面向就是其對語言和「文本」的強調。在後現代學者的系譜中惹人注目的是被稱為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和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二十世紀法國思潮。<sup>21</sup>結構主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早期的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研究，他在其領域中另闢蹊徑，發表於一九一六年的《普通語言學課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其做法是主張每一種語言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詞語的意義在此系統中不是從與他們所指定的事物（「所指」[signified]）的聯繫中得出的，而是來自與其他詞語，或說是「能指」（signifiers）的關係。例如，「貓」（cat）一詞與毛茸茸的四足動物沒有任何內在聯繫；它對於英語使用者之所以有特定意義，因為我們知道它與「帽子」（hat）或「蝙蝠」（bat）不同。結構語言學，換句話說，與傳統上訴諸歷時性來研究語言的方法（其如何隨著時間而演變？）不同，它是將語言視為一個複雜的共時格框（synchronic grid），意義在此格框中不是來自詞和事物之間的碰巧結合，而是來自於在一

個特定系統中詞語之間的差異。

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方法，被人類學家所採納之後，變成一種不僅是關於語言，而且是對於文化的各方面非常具有影響力的理解方式，當中最著名的是享有盛名的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正如索緒爾對語言所做的研究一樣，李維史陀試圖將文化看作格框來分析，在此格框中意義來源於符號——親緣關係模式、神話、圖騰系統，而符號是由對立的二元術語組成的。李維史陀認為，文化中的任何東西，唯有透過與其相反物比較方能被理解：「生」食的觀念唯有與相反的「熟」食對比方有意義，就像「男性」和「女性」或是「光」和「暗」都是只有在與另一方對立時才能被理解。(例子能夠延伸到不久前的過去：在電子時鐘出現以前，我們不知道自己時鐘是類比的，或者直到跨性別身份變得清晰可見時，順性別 (cisgender) 的意義為何才能被明白。)

結構語言學和結構人類學將具影響力的觀念引入了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的核心，而這些觀念的分支我們已經在其他背景中見識過了。結構主義認為，意義並不是「現實世界」內部所固有的，而是存在於自主的語言符號或文化符號中，又或者是要透過這些符號方能存在，而且特別是透過這些符號內所存在的差異。由於結構分析重視的是語言本身 (語言學) 或者是以語言學所表達的概念 (文化人類學)，其主要關注的是文字和文本的重要性，而不是「現實世界」：看重「能指」(signifier) 而不是「所指」(signifieds)。<sup>⑤</sup>

出於同樣的道理，結構主義將人類這個主題排除在外。<sup>22</sup>產生意義的是結構而不是人類，因此人類不是原因，而是語言和文化結構的產物：我們之所以能夠思考與說話——簡言之，存在著——完全都得仰賴那些早已存在由集體意義構成的格框。因此，結構主義是「反人本主義的」結構主義，在技術層面上並不太關心個人的行為和經驗，因為它們被視為是從屬於符號系統的。

雖然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極具影響力的結構主義反對無論男女都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這種人本主義觀點，不過其分析方法提供了徹底破譯像是語言或文化等符號體系之可能性。採取更激進懷疑論的是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 (deconstruction)，它們在一九七〇年代從結構主義當中茁壯並且取而代之。後結構主義者 (最著名的學者為德希達) 將結構主義的洞見推演到其最極端的結論。像是索緒爾或李維史陀等思想家確信他們可以從符號學意義上的結構 (由許多符號組成的體系) 挖掘出意義，這些結構在任何地點或

④ 譯注：順性別者指的是自我性別認同和出生時的生理性別相同，生理性別、自我性別認同和社會性別三者統一的人，全世界絕大多數的人類天生均是順性別。例如，出生時的生理性別是男性，自己也認為自己是男性，以及也被社會認為是男性。

⑤ 譯注：舉例而言，cat 這個詞為「能指」，貓這種動物為「所指」。

時間點都主宰了人類的存在，不過後結構主義者則將理論推向了無底深淵的邊緣。他們拒絕相信結構主義中的正反始終對立的說法，轉而主張任何一個詞的終極意義不可能被理解，因為意義必然不存在，而且要找到此終極意義所需要的不是尋找一個相反詞（「貓」不是「蝙蝠」）就足夠了，而必須要找出無窮無盡的詞語。比方說，作為一個「男人」指的除了「不是女人」，也代表了不是其他無數的東西；如果要藉由相反詞來追尋定義，像是男子氣概等任何特定概念都有著無數的相反說法，而這種情況始終威脅著對定義的追尋。因此，意義將沒有盡頭地不斷被「推遲」，因為一個詞「總是已經」陷入在要釐清數量無限可能的反義詞之過程中。<sup>23</sup>

這種深奧的理論聽起來距離多數歷史學家的關心十分遙遠，而且實際上只有極少數的人直接閱讀理論家如德希達的著作。然而，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在學術界助長了一九八〇年代一種被稱為後現代主義的廣泛思想風氣，其所蘊含的意義轉化為針對歷史學家應該如何研究過去的飽受爭議的主張。在前幾章中，我們已經見過一些廣義而言屬於後現代範疇的對歷史學有影響的作家和思潮。例如，結構主義對像傅柯和紀爾茲等思想家有很深刻的影響，他們的作品繞過了「人」，轉而主張人類深陷於「論述」或「意義之網」之中。更概括地說，西方歷史學界在一九八〇年代出現了如何研究過去的新方法，在此方法中史料並不被視為是位於「過去真實」(past reality)上的透明窗戶，而是被視為「文本」(texts)。

後來被稱為「語言轉向」(linguistic turn)的這種對「文本」的強調，是一種在觀點上的轉變，認同後現代主義和新文化史等主張的歷史學家，除了開始將史料視為有著特定模式的文字或故事來閱讀，也將史料視為廣義上的「虛構」形式而不是文獻證據來閱讀。<sup>24</sup>「虛構」[fiction]一詞原始的意義並不是指「不真實的東西」，而是「創造和塑造出來的東西」，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這種策略被廣泛運用的一個地方，舉例而言，在審判紀錄上。

一位傳統的歷史學家，若見到過去社會中刑事法律機構的種種記錄，將會用這些材料來釐清，像是各種犯罪的發生率或司法壓迫的模式：哪些人犯了什麼罪行，有多麼頻繁，還有他們是怎麼被處罰的？然而，在語言轉向的背景下，文化史學家趨近法庭不是要尋找犯罪和懲罰的證據，而是將此機構環境視為生產文字（尤其是敘事）的所在。檢察官、被告和律師總是不斷地用心編造發生於某個故事中的細節，（他們希望）這會對陪審團、法官或其他當局來說具有說服力，因為這些細節與聽眾熟悉的故事和文化類別相聯繫，或者是與普遍的刻板印象以及流行的敘事相吻合。

例如，娜塔莉·戴維斯的《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一九八七年)一書，研究在早期近代法國犯下嚴重罪行的請願人向國王提出的司法請願書，戴維斯主張，尋求皇室寬恕的被告會調整對自己罪行的自白，以便符合當代人所熟悉的敘事。戴維斯在本書頭幾頁中，解釋了她的方法論前提。她寫道：當她還是個學生的時候，「我們

通常被教導要成為使用科學方法的歷史學家，要將文件中所有人為因素剝除以便獲取事實真相。」<sup>25</sup>在她的研究中，她主張應該要把順序顛倒過來，要讓讀者見到尋求寬恕的故事中的「虛構」面向，以及這些虛構說法所模仿的故事，如何與其他故事相呼應，讓它們在其所處的文化中具有效果。請願者的故事分為幾種特定的類型，並且包括了根據不同社會階級與環境而調整的情節和細節。舉例來說，一個頻繁出現的「農民故事」的背景是某個村莊的一群年輕人闖入了在另一個村莊舉辦的婚禮。他們騷擾了當地婦女，其中一位年輕人挑釁了而且或許打了尋求寬恕的罪犯一巴掌，於是請願者出於一股「忿怒」(chaude colle) 而打死了入侵者。戴維斯認為，這樣的故事之所以有效(大多數陳情者被赦免)，因為他們描繪的情況和動機，與人們熟悉的關於合理憤怒的故事相一致。<sup>26</sup>

無論在法庭中還是在報刊上，犯罪故事都為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的許多經典文學史作品提供了佐證。例如，茱蒂斯·華克威茲的《恐怖逸樂的城市》(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圍繞著一八八〇年代倫敦的「性危險敘事」。<sup>27</sup>在此敘事中有一個系列的故事至今仍然眾所皆知，那便是報紙上對於連環謀殺妓女的兇手，人稱為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 的罪行令人毛骨悚然的報導。

已不為現代人所熟知，但是在當時同樣令人震驚的是對於雛妓問題的揭露，文章由在一八八五年頗受歡迎的《佩爾美爾街報》(Pall Mall Gazette) 的編輯斯特德(W. T. Stead) 所著，標題是宛如通俗劇的〈現代巴比倫的處女納貢〉(The Maiden Tribute of

Modern Babylon，斯特德的記載經常提到牛頭人米諾陶洛斯(Minotaur) 的傳說，還有作為現代忒修斯(Theseus) 的記者如何把這個年輕女孩從怪物手中拯救出來)。<sup>⑥</sup>在第一期的連載中，斯特德以過分渲染的細節描繪了，冒充為顧客的他如何與其母親討價還價之後以五英鎊買下了十三歲的工人階級女孩的初夜。華克威茲清楚地描述出，斯特德為了使〈現代巴比倫的處女納貢〉的故事與讀者產生共鳴，他借用了當代人所熟悉的作品類型，如舞臺通俗劇、哥德羅曼史(Gothic romance)、色情刊物以及都市社會改革者的著作。這本書將斯特德的偷窺式報導(他的報紙同樣也大量地報導開膛手傑克) 放在許多重疊的社會背景當中討論：上流男性觀眾層的傳統、女性在都市空間中所從事的新活動和新職業，以及女權主義者在煽動和解決這些性方面的警訊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然而，調查當中最為核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這個特定的環境會出現對被玷污的兒童和被謀殺的妓女的可怕記載，還有為什麼反應會如何強烈？《恐怖逸樂的城市》一書屬

⑥ 譯注：米諾陶洛斯在希臘神話中是克里特島上的牛頭人身怪物，天性殘暴尤其喜食兒童的嫩肉。忒修斯是傳說中的希臘國王，在他還是王子時自告奮勇要除去米諾陶洛斯因此作為獻祭男童前往克里特島，最終殺死了牛頭人。

於基於事實但同時圍繞著虛構組織而成的歷史研究類型，其目的是要展現出為何某些故事會在特定的地點和時間產生共鳴。

當然，大多數史料的形式並不是敘事性的：政治上或法庭上的演講由於富有故事性質，所以比起商業發票或教區在案名冊會來得更容易掌握許多。但是故事也會隱藏在從表面看起來屬於非敘事性的史料背後：例如，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法都可以追溯到「社會契約」的故事上，這是一個戲劇性的故事，講述了在假想的自然狀態下的男人們（而不是女人）在幾乎就要開始彼此屠殺之前，決定了透過設計出法律和政府會比較好的主意。<sup>28</sup> 一個嚴格的後現代方法，其中必然包括了以下假設：所有的文獻，即使是最抽象的，例如許多組數字，都不是通往一個真實過去的窗口，而是產生這些文獻的世界中的精神範疇和文化習俗的表達方式。在後現代「時刻」來臨之前，檢驗一份人口普查後的歷史學家們會用它來確認一個國家的人口，或是透過批評它來說明這份普查是如何以及為何將人口數字給縮水或是灌水，希望能夠重建位於文件之外的過去「真實」。相比之下，後現代方法將人口普查看作一個「文本」，它揭露出有關係是社會分類方式和等級這種事物背後的假設，或者人們如何刻畫社會空間，並會思考它與歷史上人口的實際情況之間的關係，無論此狀況是不相關的還是不可知的。語言學轉向邀請史學家不要再認為所有的史料都毫無問題地反映出過去的真实，而是要去認為它們是在形式上深受文化影響的文本：從這個角度來看，十六世紀的地圖並沒有告訴你一個物理地點的地理位置，

而是關於製圖師的心理世界。不過後現代主義對「文本」和「虛構」（再次強調，廣義而言）的高度重視也延伸到了歷史學家的著作：當後現代主義者開始留心歷史材料的虛構性時，學者們同時開始關注文學慣例是如何型塑過去以及現代的歷史寫作。這個作法最著名的倡導者是文學理論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他在一九七三年隨著《史元》（*Metahistory*，又譯為《後設歷史學》）一書的出版而暴得大名，並透過發表大量關於歷史理論的著作繼續保持影響力。<sup>29</sup>

懷特認為，所有的歷史寫作都是某種形式的製造虛構。因此，他並不認為歷史學家發明了文獻或是史料，但至少在現代西方模式下，歷史寫作總是遵守著來自（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文學文化中數種敘事劇情中的一種。懷特並不否認以事實作為形式的歷史證據之存在，但他認為，為了要讓歷史記錄明白易懂，這些事實必須圍繞一個富有特色的情節被組織起來。（一個歷史學家理論上可以選擇按照時間順序排列信息，不過這將構成一個「編年史」，此種形式在當代文化中是沒有意義的。）<sup>30</sup> 那些有關過去的證據並不是以故事的模樣出現在我們面前——是我們將敘事強加在上頭。

歷史的「事實」本身當中並不包含解釋性的要素；他們不像是等著被拼裝起來的拼圖。相反的，事實存在於孟思洛（Alan Munslow）稱之為「拼裝前」（pre-jigsawed）的狀態，而歷史學家塑造這些事實讓它們可以被放置入某種模式中——孟思洛寫道：「歷史事實不會影響到要用哪種詮釋，但是情節結構就會影響到哪些詮釋能被選擇。」<sup>31</sup>

在《史元》中，懷特把西方文化的基本情節模式分成浪漫劇、喜劇、悲劇和諷刺劇四種。<sup>32</sup>雖然通常不是出於有意識的選擇，但歷史學家會剪裁他們的故事以讓其符合這些情節類型：例如，湯普森就把英國工業革命的故事講成了一場悲劇，在這場悲劇中困苦工匠注定要遭受剝削和貧困；另一位歷史學家可能會將這故事置於經典的喜劇模式之中，當中儘管存在挫折和誤解，但是和諧一致則是最終的結局（每個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歷史學家經常以浪漫劇的方式來寫作，其述說著英雄們在逆境中取勝的故事。<sup>33</sup>懷特並未宣稱這些情節是普世性的：他們為西方的歷史學家所用，因為這些情節採用了西方文化中最為人熟知的文學形式。<sup>34</sup>

懷特認為，歷史寫作的這種「虛構」層面是歷史學家最有力的工具，因為歷史學家不具有共同的專業語言：「歷史學家用來編纂、溝通以及交流的典型工具是一般受過教育的人都在使用的語言。」因此，歷史學家必須借助形象化語言、被廣為接受的形式來實現他們的目標：「讓陌生的事物變得熟悉，並使神祕的過去易於理解」。<sup>35</sup>懷特堅持，指出歷史學家虛構過去的方式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夠基於研究的透徹性、邏輯的一致性、以及是否負責任地使用證據，來區別出歷史著作的良莠。這一點值得強調，懷特也並不認為指出歷史寫作遵守著熟悉的情節就意味着著歷史學家是在捏造他們的材料。懷特認為，認清楚歷史研究當中有多少部分是來自於虛構，這非但不會傷害歷史研究專業，而且除了可以讓歷史學家更加明瞭以及誠實地面對他們的實踐，還可以更加善用歷史學

科一直以來最大的優勢，也就是其與一般讀者交流的能力。<sup>36</sup>

在注意史料當中故事化的性質這點上，懷特的著作反映出在那時候的學者們開始非常留心所有「文本」被製造的過程，無論我們用作一手材料的文獻，還是歷史學家撰寫的二手材料。

## 一切事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

歷史寫作中的後現代「時刻」，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影響力達到巔峰，許多問題的方法論被徹底地改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關於社會群體和身份的問題。正如我們在一章所見，最早也是最重大的轉變發生於一九八〇年代，此時一些女權主義歷史學家要求「婦女」史應該要改變為「性別」史。如瓊·史考特這樣的歷史學家借用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方法，把婦女史（被生理特徵所決定類別的人們）改寫為性別史，或兩性之間在語言和文化上關係的歷史。史考特著名的文章〈性別：一個有用的歷史分析的範疇〉（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的開頭如此寫道：「文字有自己的歷史，一如它們所被用來傳達的觀念與事物。」「性別」本來被視為文法術語，後來被挪用為社會中的某種分類，其不僅實用而且對所有歷史學家都極為關鍵，因為其道破了口語



符號中的獨斷性，因此引導我們去反省那些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差異背後同樣變化多端的性質。一些語言具有性別分類，有的語言沒有（或有的語言有超過兩種以上分類），而在那些具有分類的語言中對性別的指派大多是隨意的：為什麼一張床在法語上是陽性的，在西班牙語上是陰性的，或是為什麼德語中的年輕女孩（maidchen）這個詞是中性的。史考特寫道，文法中的性別是「一種社會認可的區分系統，而不是對固有特徵的客觀描述。」

此外，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異隨時間和地點而變化。正如語言上的詞語（遵循著索緒爾的喜好）只有當處於與另一方的相互關係時方有意義，因此藉由組織我們談論社會世界中的對立和等級的方式，「性別正當化和建構了社會關係」。男人只能是「男人」——強大、有能力、理性等等，因為在語言所建構以及反映的方式中，他們「不是女人」。<sup>37</sup>

被運用在歷史中的性別理論，對於將社會範疇去自然化的層面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歷史學家們不再以永恆的生理事實為基礎來思考男女之間的差異，並且將這種洞見延伸到了一樣看似自然的其他類別的社會性差異。比人類各種膚色和其他身體特徵之間的差異，更自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什麼？只要當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類相遇時，「種族」始終都被格外注意，而在十九世紀的歐美，它更成了科學家密切關注的對象。在美國，奴隸制和對美國黑人的持續歧視，以及其他群體包括美國原住民、亞裔和西班牙裔的痛

苦歷史，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已經催生出為數眾多且細緻的歷史研究，專門在討論種族偏見的起源和意義。<sup>38</sup>

然而，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大多數學者理所當然地認為種族的存在是種生理上的真實，將其視為其研究的原點：人們是黑色、白色、棕色或黃色的，而擁抱進步價值的學者所從事的計畫是要批判性地分析各種負面的特質是如何以及為何被跟膚色以及其他種族特徵劃上等號。芭芭拉·費爾茲（Barbara Fields）以及其題為〈美國歷史上的種族與意識形態〉（Race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History, 一九八二年）的文章，是第一批質疑所謂種族是種不證自明的生物性質的歷史學家之一。費爾茲指出眾所周知的事實經常被忽略，因為它們不符合主流的假設，在這個例子中是有關於種族的生理特徵。如果黑色和白色是膚色，為什麼有這麼多例外？為什麼十九世紀的歐洲人總是把皮膚淺色的北非人描述為黑人？為什麼總是有些美國的「黑人」看起來像個白人？為什麼有「一滴法則」<sup>⑦</sup>（one-drop rule）？為什麼美國種族主義認為一個白人婦女能生一個黑人孩子，而一個黑人婦女不能生下一個白人孩子呢？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當然不是生物學的，而是政治性

⑦譯注：一滴法則來自於黑奴時代的美國南方，其定義是只要你與黑人有任何血緣關係，你就是黑人。

的，費爾茲呼籲對這些答案背後的政治性進行調查，而開始著手的前提便是「種族是一個生理上的事實也是每個人的外觀特徵，這種看法不再站得住腳。」<sup>39</sup>

費爾茲假設，種族是一種信仰的形式，是一種人們所持有的意識形態，並且往往面對著大量相反的證據，像是那些內戰的莊園主堅信，他們的奴隸若是沒有了白人主人，根據自然法則是無法生存下去的，雖然他們親眼目睹許多自由的黑人活得好好的。費爾茲敦促歷史學家不要再把美國歷史上的種族視為一種超越的形上學問題，而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分裂和偏見紮根或被鼓吹的具體歷史環境上——最值得注意的是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時在社會政治上造成悲慘結果的不同族群之間的角度。

儘管費爾茲並沒有借用後現代思想家的想法，但她關於種族的結論與史考特關於性別的觀點十分類似：「種族成為意識形態的一種媒介，人們透過這個媒介去提出和理解，像是權力和統治、主權和公民權、正義和權利等基本問題。」費爾茲認為，種族是一種意識形態，但這並不會使其後果變得不那麼悲慘地真切：「一旦被當作了行動的依據，妄想可以跟事實一樣地兇殘的。」<sup>40</sup>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那個時候，黑人性（blackness）是被觀看者的眼光所決定的，不過歷史學家也指出，白人性（whiteness）也是如此。直到不久之前，人們一般認為白人是一種非種族（nonrace）或者是「預設」正常的種族，其他種族根據與白人之間的不同而被視為不正常，並且假定大多數白人總是屬於一個單一的範疇中。最近的研究中已

經出現了更複雜的故事；美國的歷史經驗中，一波一波不斷的歐洲移民遭遇到非裔美國人和美國原住民等少數民族，讓歷史學家得以展示出「白人性」跟其他種族標籤相比起來，也不再是簡單的生理特徵。兩個世紀以前，在英國和美國的愛爾蘭工人被呈現的模樣都是黑皮膚以及具有像是猿猴一樣的特徵，以及美國其他移民團體（義大利人或猶太人）的白人性並不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sup>41</sup>

正如大衛·羅迪格（David Roediger）在一本有影響力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工業化時期的工人們對自身白人性的援引，是一種驅除對自己成為他人從屬的恐懼之方式。在十九世紀初，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實際的獨立性而成為了僱傭勞工，他們失去了工作坊進入了工廠，他們因此構築了一個美化的自主白人工人的身份，與黑奴的低下地位形成對比；他們堅持被稱為「僱傭人」（hired men）而不是「僕人」，並稱呼其雇主為「老闆」而不是「主人」。對於早期的工廠工人的身份來說，白人性變得至關

<sup>39</sup> 譯注：重建時期（一八六五—一八七七年），指的是當美國南方邦聯與奴隸制度一併被摧毀時，試圖解決南北戰爭遺留問題的時期。「重建」的層面包括了南方分離各州如何重返聯邦，南方邦聯領導人的公民地位，以及黑人自由民（Freedman）的法律地位等問題的解決方式。

重要，以此作為「我不是奴隸」的一種說法，這是對他們失去對勞動實際控制的心理補償：羅迪格認為，在十九世紀初作為白人的定義便是「不是黑人」，就這段歷史而言，也包括了「不是印地安人」，就像性別史家所假設的那樣，歷史上的男人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來作為「不是女人」。<sup>42</sup>在美國，和任何多民族社會一樣，白人性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或穩定的範疇：在一八四〇—一九二〇年代大批歐洲人抵達的時代，盎格魯—撒克遜菁英階層視自己是位於包括日耳曼人、凱爾特人、斯拉夫人以及希伯來人等在內的白人階層的頂端。只有當移民的水栓在一九二〇年代被關閉之後，美國的種族才變成主要是「高加索人」與黑人的二分狀態。<sup>43</sup>在西方世界之外，種族出現的形式也從來不是以單純的生理二分制：例如，最近非洲歷史學家的研究揭示了十九世紀埃及和尚吉巴<sup>⑨</sup>（Zanzibar）等地的種族分類、偏見和鬥爭的複雜性，邀請我們擺脫（實際上以及比喻上）西方社會對黑與白的分類方式。<sup>44</sup>

## 門口的野蠻人

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時，一流的性別與種族歷史學家率先提出了一種被稱為「文化建構主義」（cultural constructionism）的研究思路，主張即使是那些在我們看來無疑是

被生理特徵所決定的身份，也是由人們說話、寫作和思考的方式來定義的。（我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看到，這種方法的實例適用於性別問題，正如湯瑪斯·拉克爾和喬治·昌西這樣的歷史學家已經表明，在過去的社會中，同性戀和異性戀的關係和身份是可以多麼無限變化的。）這種研究通常強調「文本」，運用使用各種描述性的資料（小冊子、論文、醫學文獻、新聞媒體、戲劇、小說等等）來重建人們想像、理解和呈現婦女、同性戀者、少數民族成員和其他人的方式：這些作品指出，身份以及與他們相關的論述是無法被分開的。正如在強調史料來源中的虛構或「故事性」面向的研究一樣，這種方法受到後現代主義廣泛的影響。結果是，所有這些方法都成為眾多批評的對象，批評形式從根據理性的反駁到苛薄的強烈譴責都有。

對於後現代主義對歷史作品的影響，一些最雄辯以及極端的反對者始終是英國歷史學家，他們抓住這個機會發洩傳統的法蘭西恐懼症，譴責這些邪惡理論腐敗的高盧根源。「荒謬的事情若是用法文說聽起來總是比較好。」政治上和思想上採取保守立場的劍

⑨ 譯注：尚吉巴，位於東非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東部的一個半自治區，它包括印度洋上的尚吉巴群島，其包括了許多小島和兩個主要大島：溫古賈島以及奔巴島。

橋教授艾爾頓爵士 (Sir Geoffrey Elton) 作為最後一代自豪地定義自己的專業理想為「尋求真理」的傑出歷史學家一員，嗤之以鼻地說道。<sup>45</sup> 已故的艾爾頓以在論述歷史方法時的激烈言論聞名，他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發表了一系列的演說，在其中以各種不同方式去形容後結構理論，像是傳染病、惡魔般的誘惑者和某種藥物濫用的形式。後現代主義是一種「病毒」，比馬克思主義更具威脅性，「因為它起源於典型具有魅力的法國人。」他大聲疾呼道，他跟他的盟友所奮鬥的，不僅是他們作為歷史學家的生存，更是「為了被惡魔般的試探者所困擾的無辜年輕人生命，這些試探者號稱他們可以提供更高形式的思想以及更深層次的真理與見解——事實上，就像是思想上的快克<sup>⑩</sup> (Crack) 一樣。」像是瓊·史考特這樣的「瘋狂的女權主義者」便在这些試探者之列當中，他們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主義的混合物，「就像是把迷幻藥混入伏特加一樣。」<sup>46</sup> 幾年之後，艾爾頓在劍橋的年輕同事理查·伊凡斯——接替他擔任現代歐洲歷史上著名的「欽定講座教授」(Regius Chair) 的人，發表了更為持平，但仍然危言聳聽的陳述，一本名為《為史學辯護》(In Defense of History) 的書籍，其將後現代主義描述為「不可抗拒」思想趨勢，而其追隨者為「在各學科專業門口的宛如野蠻人的知識分子……帶著明顯的敵意在那裡遊蕩。」<sup>47</sup>

後現代的歷史方法究竟是什麼，會讓這些和許多其他學者認為是如此深深地令人擔憂呢？嚴格的後現代立場確實對於大多數人思考歷史的方式帶來了在哲學上的深刻挑戰，因為其主張我們永遠無法保證「過去」真的發生了。後現代主義者會說，我們所有

的歷史學家都是文字和「文本」(包括口頭證言、圖像和實體文物)，它們與「真實的過去」的關係是永遠不可知的。用歷史理論家凱斯·詹京斯 (Keith Jenkins) 的話來說，文本是「唯一的選擇」(the only game in town)<sup>48</sup>，由於歷史是由對這些文本的解釋組成的，因此創造歷史的過程不可避免是主觀的——如我們先前所看到的，對於像海登·懷特這樣的理論家來說，書寫過去就類似於創作一本小說，歷史學家無論如何重視其證據，他們在最廣義而言上一直都是在創作文學作品。對於艾爾頓來說，一位歷史學家承認他或她自己的主觀性以及基於當前考量的主張，這構成了一種極其自戀的行為——等於是自我中心地把自己置於「我們史料的權威性」之上。<sup>49</sup>

伊凡斯並不贊同他的前輩關於真實性和客觀性的老派觀點；他的反對意見在一九九〇年代受到溫和派的歷史學家們的普遍認同。當時大概絕大多數的學術史學家都憂心後現代的主張將過去的「真實」打上括號，會削弱歷史寫作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最核心的

⑩ 譯注：快克古柯鹼是結晶狀的古柯鹼，由粉狀的古柯鹼製成。經鼻吸食為常見濫用之方式，吸食初期會產生欣快感、精力旺盛等感覺，使用劑量增加後則會產生視幻覺、感覺扭曲、多疑、猜忌、妄想等精神症狀。

理由，即重建一個可信的敘述，來闡明當代並且指引未來的方向。他們問道：一個存在與否都被我們質疑的過去，要怎麼提供我們啟迪和指引？而且，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認為，新理論對於過去經驗真實性的不可知論是對於歷史上所有受苦者的侮辱。誠然，正如許多批評後現代主義的人所指出的，有很多例子都顯示出某個社群認為聲明自己對一件往事確實發生過的信念，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必須立即被實踐的。作為研究現代德國的史學家，伊凡斯指出，如同其他學者針對大屠殺發表的言論：「奧斯威辛不是一個論述。若是將其視為一個文本，便是在淡化（trivializes）大屠殺。毒氣室不是一種修辭。奧斯威辛本身確實是一場悲劇，不能被視為是齣喜劇或鬧劇。」<sup>50</sup>

更概括地說，伊凡斯指控後現代主義對於文字和文本的這種關注，是當代學者特別強調了自己最關心的事物，而輕視歷史上的苦難和壓迫的真實性。<sup>51</sup>保守派也不是唯一攻擊後現代主義的一群人；許多左傾的歷史學家與保守派一起譴責這個在他們看來是一項歷史學的危險發展。對於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後現代主義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東西，因為它顛倒了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唯物主義關係，強調文字的抽象以及衍生的領域而忽視最根本的社會經濟生活。<sup>52</sup>更概括地說，許多左派歷史學家十分敵視那些認為權力的運作位於話語形成中而不在發生於現實社會關係的鮮血與辛勞中的理論。女權主義史學家與瓊·史考特之間著進行了相當引人注目的爭論，指責她對文本性的強調，模糊了歷史上女性歷經暴力和剝削的實際經驗真實性。

正如一篇具里程碑意義的批判性文章標題所示：「如果『女人』只是一個無意義的範疇，那麼我為什麼不敢在夜間獨行？」<sup>53</sup>雖然後現代主義者總是堅持他們所從事的研究富批判性並且具有政治意義，其揭示了權力透過論述來界定和誘騙人們的方式，他們的反對者反駁說，歷史學如果要在政治上有影響力而且富有成效，它必須建立在相信過去的受苦與不公正真實存在的信念上。許多左派學者與他們的保守派同事都質疑後現代主義是一種自我放縱而且在政治上不負責任的知識遊戲。

在一九九〇年代以降，大多數歷史學家的立場都介於這些交戰陣營之間，會借用後現代主義者的一些見解，但拒絕他們更激進的那些假設。儘管警惕的鐘聲大聲作響——伊凡斯在一九九七年寫道，後現代主義仍「被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支持」——實際上不曾有重要學者寫過後現代主義式的歷史著作；重要學者只是借鑑了此潮流中的洞見，而試驗性和理論性的後現代主義著作仍然僅侷限於歷史學的邊緣。<sup>54</sup>許多富創意的歷史學家在一九八〇、九〇年代採納了「語言轉向」，對於故事或再現（representations）抱以期待，但是在這些歷史學家當中幾乎沒有人表示不相信過去的現實。那麼，為什麼後現代主義造成如此大的騷動呢？也許是因為它最基本的前提——用德希達的名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的確很難爭辯：過去的存在是非常可信的，但終究不是可以被證實的。為了回應後現代富哲學性的質疑，那些擔憂這些發展的歷史學家往往會感到自己在仿效十八世紀的英國作家詹森（Samuel Johnson）——當詹森被要求反駁某位思想家否定

物質存在的理論時，著名地朝著一塊大石頭狠狠地踢了一腳，並說：「這就是我反駁它的方式。」<sup>55</sup>

歷史學家以書寫形式來傳達宛如詹森踢石頭的想法，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位著名歷史學家喬伊絲·艾坡比 (Joyce Appleby)，林·亨特和瑪格麗特·傑考 (Margaret Jacob) 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她們被廣泛閱讀的《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試圖找出一條中間路線，一方面是後現代主義者和其他文化建構主義者的懷疑相對主義 (skeptical relativism)，另一方面是對歷史真理的客觀性追求這種過時信念。作者們回顧了針對科學和歷史學中的絕對主義式真理於在二十世紀提出的種種質疑，她們從而高興地結論道，這些都是積極的發展，表現出美國高等教育對不同聲音和觀點的開放，以及「一種民主的歷史研究方式……鼓勵對主流觀點抱持懷疑態度。」<sup>56</sup>在此觀點中，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學術界的危機意識除了應該歸因於以下幾種「絕對主義式」信仰的失敗：像是對科學絕對正確性、進步的必然性以及對絕對客觀性的追求；也應該歸因於對這些絕對性真理與日俱增的懷疑，而這種懷疑是源於民主式質疑這種合理精神。但是，三位作者們拒絕接受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這種「玩世不恭和虛無主義」論點或屈服於多元文化碎片化 (multicultural fragmentation) 的誘惑。她們反駁後現代主義對任何客觀現實存在的懷疑，並且鼓吹她們所謂「有條件的客觀性」(qualified objectivity) 的這種立場，其既承認了研究歷史的那些人的主觀性，又承認那些客觀存在的過去所遺留

下的痕跡限制了歷史學家可以發揮的空間：過去確實存在於文本和物質遺跡中，不過它無法對「歷史著作」發號司令，因為歷史著作不可避免地是被那些寫作者所塑造的。因此，「有條件的客觀性」就等同於一種互動關係，介於必然主觀的歷史學家與會限制和塑造其研究的材料之間。但是歷史學家也受到社會學及其運作機制的限制，而且理想的民主社會中會形成學術和知識的規範，其鼓勵提出異議以及抱持懷疑態度，而且同時讓學者遵守知識界制定的規則和標準。總而言之，作者們踏實地尋找著解決民主學術機構運作中的後現代困境的方法。<sup>57</sup>

### 扭曲或想像：我們如何劃定界線？

艾坡比、亨特和傑考的妥協立場（我們不可避免地是主觀的，且受到過去遺留下的線索和所屬知識社群的規範所約束）很有可能被大多數今日從事研究的歷史學家所接受。無論如何，社會和文化史學家已經不再關注文本和再現，他們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文化如何影響人們，而是集中在人們如何與文化相處：「實踐」和「展演」的概念在近年變得來到處可見，並且有著豐富成果。<sup>58</sup>但是真實和虛構的議題，在有關史料的層面上，歷史學家的主觀性和自由性的問題，並不會就此消失。後現代主義的「威脅」造成許多

歷史學家的群情鼎沸，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無疑是，歷史與虛構之間理應相當明確的界限竟然那麼容易就變得模糊：歷史學家之所以對於位於寫作風格光譜上虛構那端的侵犯格外敏感，恰恰是因為跟學術界其他學科相比之下他們與小說家最相似。歷史學家之間在原則上的主流共識是，他們受事實約束，並且遵守對於虛構的嚴格限制。但是歷史學家的工作也包括了整理散佈四處的史料，並且將它們串連起來，而且優秀的歷史著作需要講究想像過去的能力，並以生動的散文重現它。關於哪些形式的連結和想像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史家之間常常會出現分歧，而且經常會演變為爭執。

多年來，歷史學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醜聞衝擊，像是涉嫌捏造或扭曲史料的醜聞，而歷史學家對此或是團結起來，或是痛心疾首。有時候，一個極端的「歷史弊端」案例，會在歷史學界中獲得了廣泛的共識。例如，在二十一世紀初，美國歷史界的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埃默里大學的教授麥可·貝勒斯雷斯（Michael Bellesiles）被牽扯入一場醜聞，最終迫使他離開學術圈。<sup>59</sup>在西元二〇〇〇年時，貝勒斯雷斯是大多數學院歷史學家所夢想成為的對象，他是一本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義著作的作者，而且此書在大眾媒體上得到了高度評價，並且已經獲得了歷史學界最重要的獎項之一——美國歷史研究的班克羅夫特獎（Bancroft Prize）。此外，他還得到自由派學者的尊敬和同情，因為他遭受到他們最大的敵人之一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攻擊。貝勒斯雷斯的《武裝美國：國家槍支文化的起源》（*Arming America: The Origins of a National Gun Culture*，

二〇〇〇年）是一項從美國殖民時期到內戰期間的槍支研究，以一系列令人驚訝，並且具有顯而易見政治意義的調查結果為中心。《武裝美國》推翻了殖民地美國過去被認為是每個人都驕傲地持有槍支之國度的標準形象。貝勒斯雷斯從對於遺囑和遺產清單資料的研究中發現，在一七六五—九〇年期間，只有百分之十四點七的家庭擁有槍支。到十九世紀中葉，隨著可互換零件的日益發展，工業化生產的武器生產量飆升，這一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但是他認為一直要到內戰之後，槍砲文化方真正地壓倒性影響整個國家。由此看來，美國的槍支文化乃是根植於資本主義而非憲法。以第二修正案為基礎的論述將槍支所有權以及其聲稱受到憲法保障的合理性建立在美國獨立革命世代的文化上，因此學術評論家們可想而知地對於此研究這些論述所具有的含義欣喜若狂。而全國步槍協會也一樣地憤怒，卻爾登·希斯頓<sup>①</sup>（Charlton Heston）也開始抨擊這本書及其作者。部分學者的過分樂觀以及面對共同敵人時的互相掩護，可能延誤了他們對於貝勒

<sup>①</sup> 譯注：卻爾登·希斯頓（Charlton Heston，一九二三—二〇〇八年），美國演員。代表作有《十誡》（*The Ten Commandments*，飾演摩西）、《賓漢》（*Ben-Hur*，獲第二十二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晚年曾擔任美國步槍協會（NRA）主席。

斯雷斯的史料和方法的嚴格考察，不過該領域的專家們最終在二〇〇二年於一本重要期刊的論壇中審視了他的數據表格並提出嚴厲的質疑：例如，指出十八世紀低百分比的關鍵表格並沒有交代清楚其案例的基數，而且百分比計算似乎是錯誤的，此外他所參考引用的各郡區檔案，這些郡區的實際存在與否卻是令人困惑地相當模糊。<sup>60</sup>貝勒斯雷斯為了替自己辯護，列出了許多理由：他並未清楚記錄下他前去檔案館的行程、他記下調查結果的黃色筆記本在辦公室淹水時並未倖免於難，而且無論情況究竟如何，他抗議道，這些表格只是他論證中的少部分證據而已。最後，貝勒斯雷斯所屬系所聘請的外部委員會經過三個月的調查，發現他的研究中存在著嚴重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其中包括了直接偽造證據。在接下來的一年內，貝勒斯雷斯辭去了他的終身職位，他的獎項也被取消，其出版社也不再印刷這本書。

貝勒斯雷斯的案例造成了極大的尷尬場面——各種報刊、評論家和學術委員會的臉上都被賞了一巴掌——而且這種結果還被槍支遊說團體拿來大肆渲染，讓許多教授感到懊惱。不過當貝勒斯雷斯不負責任地運用史料的過失被確定之後，這件事情並沒有在史學界內部造成明顯的分歧，因為並沒有什麼重要學者替他辯護。<sup>61</sup>還有一種眾人意見更加一致的例子，那便是否認大屠殺，這被許多人認為是最不忠實地操弄史料的最嚴重作法。現代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歷史學家拒絕參與大屠殺否定者的辯論，既是基於這樣做的話將會宣傳否認者的立場並賦予他們偽造的合法性這些道德理由，同時也是基於去鑽研

那些完全違背堅實學術知識的命題完全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在這些知識上的理由：科學家會花費時間跟一些主張地球是平的人爭論嗎？然而，一九九〇年代後期，這種爭論卻被迫呈現於公眾面前，當時名叫大衛·厄文（David Irving）的著名大屠殺否定者，在倫敦的法院提告了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期塔特（Deborah Lipstadt），她的著作記錄了那些質疑「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存在與否的人們，而歐文指控這本書詆毀了他。歐文最終打輸了官司，不過被要求參加審判的專家們當中一位是理查·伊凡斯，後來他寫了一本書將厄文的著作徹底駁倒。伊凡斯克服了他的研究圈子對於反駁一個令人憤慨的論點的不情願，並且完成了證明厄文的主張乃是基於偏頗的研究，以及對文件的歪曲和故意忽略這些艱鉅又令人沮喪的工作。<sup>62</sup>

專業歷史學家和其他人很容易聯合起來駁斥拒絕對於史料顯而易見的濫用或是捏造，特別是在否認大屠殺存在的例子，因為在此議題上，不誠實的研究行為是被用來辯護被眾人唾棄的作為。但是，帶有偏見、粗心大意和不誠實之間的界限有可能不是這麼容易就能描繪清楚，就像是在一位年輕學者大衛·亞伯拉罕（David Abraham）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充滿爭議和令人糾結的案例。<sup>63</sup>普林斯頓大學新進教員亞伯拉罕在一九八一年出版了一本關於德國工商界與納粹崛起之間關係的書《威瑪共和的崩潰》（*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這個專門研究針對有關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德國政治經濟所面對的系統性壓力，提出了一個相當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論點，本書由一間大出版社出版並且



獲得正面的評論。他的系所同意給予亞伯拉罕終身職位，但卻被普林斯頓的上層行政機構所否決，不過他在就業市場的前景仍然相當被看好。然而，大約是在亞伯拉罕拒絕被授與終身職的這個時候，他成為該領域的兩位資深歷史學家，耶魯的亨利·透納（Henry Turner）和柏克萊的杰拉德·費爾曼（Gerald Feldman）的攻擊目標。亞伯拉罕假定德國大企業和納粹之間明確存在著利害與共的關係，而透納多年來的工作則始終主張大致上相反的論點。透納仔細檢視了亞伯拉罕的著作後，開始了他寫信給《美國歷史評論》以及美國和歐洲此領域的所有重要歷史學家的行動，聲稱亞伯拉罕的論點是基於欺騙性的研究，包括捏造完全不存在的文件。當亞伯拉罕進入就業市場上並被邀請到一流大學面試時，透納的盟友費爾曼則聯繫各個系主任和院長，警告他們不要雇用一個歪曲和捏造史料的學者。許多人認為透納和費爾曼的策略令人反感——為什麼不在期刊上發表評論中批評作者，而是要在私人信件和電話中對他窮追猛打？——但是這場運動起了作用，因為各大學都擔心招致醜聞因此拒絕給予亞伯拉罕教職。這一連串發展的事件，由於牽涉到涉嫌學術造假和牽扯到美國一些最著名的大學中醜陋的學術政治角力，在美國媒體上被大肆報導。亞伯拉罕所面臨的問題是，正如他自己承認的那樣——他確實犯了一些相當嚴重的疏忽。他在被批評之後重新檢視檔案發現自己至少弄錯了一份文件的日期，誤認了一份報告的作者和收件人的身份，而且最嚴重的是，有許多處對原始史料的直接引用，實際上卻是他對該史料的改述，而且這些改述碰巧又都是其論點的根據。他

稱自己的錯誤為「不可原諒的」，但否認故意捏造了任何文件，並且承諾會在日後的版本中糾正這些錯誤。亞伯拉罕的許多辯護人同意他的研究有些粗心大意，但認為他的整體論證並未因為這些錯誤而失去效力；有些人指出，沒有一位歷史學家的腳註在受到像是亞伯拉罕所遭受的極具敵意的審視後能夠全身而退，在他的情況下這些審視的動機顯然是出於職業競爭和意識形態上的敵意。最終，亞伯拉罕的對手獲勝了：他無法在歷史界找到一席之地，因此改變了研究領域，最終成功地當上法學教授。亞伯拉罕的案例引起了相當的反省和痛苦，並且對歷史學家提出了一系列困難的問題：誰應該去告發被他們認為是不可接受的研究，而且他們應該怎麼做？一項研究中要出現多少錯誤才會失去其效力？最重要的是，這個案件讓那些最堅信「史料的首要性」的學者思考為了要建立起一個原創的論點，我們在挑選歷史資料的過程中究竟做了什麼？就算沒有任何要詐欺的意圖，歷史學家要怎麼知道在何處以及如何拿捏解釋和扭曲之間的界限呢？什麼是合理、令人欽佩的歷史想像，而且歷史學家到底要做到什麼地步才算是跨越紅線？

對歷史的想像與捏造還有兩者的界限，在現代最廣為人知的爭論發生在二十五年 前，其圍繞著娜塔莉·戴維斯的一本著作，該書是一本備受推崇的歷史經典書籍，至今仍被許多人閱讀而經常是課堂上的指定讀物。《馬丹蓋赫返鄉記》（*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一九八二年）是戴維斯對發生於一五六〇年代在法國偏遠鄉村的一起法律案件的 記述，並有可能讓人更為深入理解早期現代農民的生活——總而言之，本書是典型的微

觀歷史。這個故事關於一樁冒充行為，在十六世紀的一起身份盜竊案件，發生於法國西南部阿爾蒂加（Artigat）村。馬丹·蓋赫與貝形黨（Berrande de Rols）是兩個富有農家庭的孩子，兩人在十幾歲的時候便互許終身，但他們要到八年之後才圓房，並且有了一個孩子。馬丹在二十出頭時在偷了父親的錢後遠走他鄉。八年後，他再次出現在阿爾蒂加。他的姐妹們熱情地迎接他，他的妻子則是有些勉強，但是總的來說，這個社區所歡迎的人實際上不是馬丹，而是一個名叫阿爾諾·居·邀勒（Arnaud du Tilh）的冒名頂替者，他渴望接手失蹤的馬丹·蓋赫的婚姻和財產。（新馬丹讓人們相信了他真的是馬丹，甚至貝形黨最初也是其中之一，因為他似乎知道村裡所有人的具體細節。）然而四年後，在一場財產糾紛之後，馬丹日益起疑的叔叔相信這個所謂的侄子是一個騙子，並以貝形黨的名義逮捕了他。阿爾諾堅稱他確實是馬丹，隨後進行了兩次審判，村民的意見僵持不下因此判決懸而未決，直到真正的馬丹·蓋赫跛著一隻木腿蹣跚而行，以戲劇性方式突然出現在法庭上。阿爾諾的真實身份因此完全地暴露，隨後便被判處絞刑；他向包括貝形黨在內的每個人道歉之後便在村莊中被處決。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故事作為寓言不斷地被傳頌，因為其描繪一位狡黠的操縱者如何以各種令人驚奇的方式矇騙了人們以為自己知道以及看到了些什麼。

這是一則很棒的故事，但是直接的一手材料為數稀少，最主要的便是數則官員在法庭紀錄中所留下的詳細記載，而真正的審判紀錄已經不可考。戴維斯彌補資料不足情

況的做法是，梳理該村莊的法律記錄來獲得故事中牽涉到的家庭之細節，並藉由側面地研究該區域中其他數個村莊，重建出阿爾蒂加一般生活中的許多細節——遺產繼承之實踐、習俗、日常生活細節。她在開頭幾頁中聲明：「我在這裡呈現給你們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虛構，不過它們經過了過去人們的說法嚴格的核實。」<sup>64</sup> 這本文筆優雅的書在許多問題上引人深思，但其中中心論點之一，她對馬丹的妻子貝形黨行為的詮釋，賦予了她相當的能動性。過去的解釋主張這個被遺棄的年輕妻子和其他人一樣被矇騙了，戴維斯的說法與此形成強烈對比，她主張貝形黨一定知道那個回來的人是不是馬丹。戴維斯提出，貝形黨並不是笨蛋，而是一位有自己需求的精明女人，她明白重獲配偶能讓自己獲得更有利的社會條件，並可能愛上了冒充馬丹那位聰明而有魅力的男人。

這本書之所以歷久不衰，大多得歸功於戴維斯生動地重建出來的故事，讓人相信其中不同的角色「一定」經歷過這些。由於馬丹的父母從巴斯克移民而來，「拉布爾德（Labourd）的孩子在阿蒂加特長大也許不是那麼容易。要設法解決語言上的問題……而

⑥譯注：拉布爾德為過去法國一省份的名稱，現在此區域位於庇里牛斯—大西洋省（Pyrénées-Atlantiques）中，是巴斯克人的傳統聚居地。

且一定會因為他的名字，馬丹，而被戲弄。」在一個新生兒的重擔下艱苦生活、他多年以來性無能的恥辱，還有囂張跋扈的父親，馬丹肯定「夢想著擺脫小麥、磚瓦窯、家產以及婚姻等各種限制的生活。」至於對於還非常年輕的貝彤黨而言，在嫁給馬丹不久之後，「她可能不會以這種方式表達，但顯然他們無法行房的這件事情，有好一段時間都讓她鬆了一口氣。」多年以後，隨著她年歲增長而且有一位她更喜歡的「新馬丹」出現在她的生命中時，她便默默地幫助他冒充為她的丈夫。在他們兩人頻繁對話的期間，「我們必然會臆測，他們決定要繼續下去這段捏造的婚姻。」<sup>65</sup>所有這些關於動機的假設都是基於相關背景的資料，因為沒有任何材料能讓我們直接接觸這些文盲農民的想法。

戴維斯有所憑據的臆測被此領域另一位學者羅伯特·芬雷（Robert Finlay）質疑，他在《美國歷史評論》一篇備受矚目的文章中批評她的解釋。<sup>66</sup>芬雷無法忍受戴維斯書中許多的「可能」和「很有可能曾經」，他強烈反對她對此故事重新詮釋的方式，在他看來是對歷史記錄不正當的自由詮釋。他的批評當中的核心是戴維斯把貝彤黨描繪成冒牌者阿爾諾的幫兇，又說她的動機既是對新伴侶日益增長的感情，也是出於有個丈夫對她更有利這樣的精明計算。（戴維斯還指出，宗教改革在此地區逐漸取得影響力，由此主張貝彤黨和阿爾諾或許是將其結合視為是毋須聖禮的新教婚姻，以此來克服關於這段心照不宣的通姦的罪惡感。）芬雷堅稱，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說明甚至暗示貝彤黨在玩弄兩面手法，他指責戴維斯扭曲了記錄，把女權主義的主張強加在故事上，並把它拉向「歷史小

說」的方向。他寫道，她對貝彤黨的描繪，「與其說是歷史重建，不如說更像是虛構出來的故事」。<sup>67</sup>

芬雷的文章佔據了該論壇的一半篇幅，而戴維斯亦在該論壇以猛烈的長文反駁，她用了比起在原書中更多的文獻證據來支持其論證。<sup>68</sup>《馬丹蓋赫返鄉記》以及芬雷與戴維斯的辯論，這兩者皆提出一些引人入勝的歷史問題——例如，在一個沒有鏡子、照片和其他標誌現代自我的服飾的社會裡，一個人在消失了好幾年之後，其身份是否有可能被確定？是像戴維斯認為的那樣，假冒者的性行為讓貝彤黨識破了這場破局，還是像芬雷所指出的性行為與此並不相干，因為在這裡人們多半都是在黑暗和寒冷的房間裡偷偷摸摸地穿著衣服從事性行為？然而，就這個問題的核心來說，戴維斯和芬雷之間的爭論總歸來說來自他們對於想像力在歷史學中的角色截然不同的觀點。芬雷問道「在歷史寫作中，何處是重建與虛構之間的界線？」在他看來，戴維斯關於貝彤黨的角色以及與阿爾諾的關係性質的中心論點都不存在於過去留下的紀錄當中，因此她已經越界，變成在寫作小說。他承認，誠然歷史學家在缺乏史料時經常要使用「或許」、「也許可能」，但是猜測終究「應該臣服於史料的權威，文件的仲裁庭之前。」<sup>69</sup>戴維斯反駁說，芬雷的立場是狹隘的傳統主義：她堅稱，號稱是「至高無上」的文件中所訴說的並不只有一件事。關於此案的主要來源，法官葛哈斯（Jean de Coras）對審判的陳述，當中有許多能夠有不同閱讀方式的空間，而她的著作只是把複雜、多層次的故事交織起來的其中一種方式。

她解釋自己所說的故事版本「有部分是自己的虛構」，「我所希望完成的以及可以從史料中絕對確定地推論出來的，我明白地將這兩者區分開來；在我書中的最後一頁，讀者們被積極地鼓勵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這些證據。」<sup>70</sup>總而言之，戴維斯回應芬雷對她在史料上強加自己偏好的故事的指責，她說道，這些文件本質上是模稜兩可的，可以有無窮無盡的詮釋方式；她的故事只不過是根據這些史料能被述說的許多故事之一。在一位歷史學家看起來是不慎地陷入了「虛構」，對另一位史家來說則是作出了同情和負責任的想像。

在今日的歷史學界中，圍繞著後現代主義的爭論幾乎消失了。一方面，一九八〇、九〇年代的創新視角和方法（文化建構主義，對文本和敘述的關注）已經成為大多數史學家的第二天性；另一方面，現在很少有人想花時間和精力去爭取「過去」能否證明那些已經發生而且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在關於客觀性、虛構和對過去的再現這些問題上，過去幾十年的辯論改變了這門學科的性質。要回到歷史學家想像自己的研究牽涉到要臣服於「史料權威」的那種時代，在現在已經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了。

敘事和想像力對於歷史學這門學科的重要性，可能大於對任何其他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因為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從事歷史研究」首先在於創造出引人入勝且基於事實的故事。研究和寫過去的事情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一方面，歷史學家根據自己的職業身

份對過去的事實進行細緻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傑出的歷史研究和一流的歷史小說之間的界線往往是難以察覺地細微。加勒特·馬丁利（Garrett Mattingly）的《無敵艦隊》（*Armada*）於一九五九年問世，被認為是歷史寫作的經典之作，書中有著許多沒有腳註的段落，如下：「當她的矮人從窗戶裡呼喊著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即將來臨，女王跟他說他一定是瘋了才會這麼說，而當她用自己的雙眼在一群為其神魂顛倒的崇拜者中認出那個和藹可親的人時，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聲音哽咽而且顫抖。」<sup>71</sup>人們可能會懷疑，這和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所著，背景設定於亨利八世（Henry VIII）宮廷的著名小說有什麼不同呢？在曼特爾《血季》（*Bring Up the Bodies*）中的一個場景中，一位信使替正在向她求婚的已婚國王送了一封情書和一袋錢：珍·西摩（Jane Seymour）把這兩封信都還給了國王的使者，吻了那封信但卻沒有打開它。曼特爾自豪於自己一絲不苟的研究，她是根據同時代大使的通信信件中描繪出如此場景。<sup>72</sup>正如威廉·葛隆納所主張的，歷史與歷史小說之間的區別（曼特爾澄清自己從未在小說中加入一絲歷史捏造）並不是前者是真實的，而後者是不真實的，或者是說歷史小說家不必遵循規則。最大的區別在於，歷史小說的作者被准許重新創造在往事當中歷史學家很難接觸得到的那些領域，最典型的是人物的內在心靈和日常生活的非正式對話。葛隆納寫道，作為歷史學家，「我們處理證據的規則將一堵高牆豎立於我們自己和我們所撰寫的人們的內在情感生活之間。」<sup>73</sup>

但是，與小說家一樣，歷史學家也一直在做出會影響其述說的故事之性質的各種選擇。美國大平原（the American Great Plains）的歷史在十九世紀被稱為是進步的故事、悲劇或者是戰勝逆境的故事。這種故事的特色是以拓荒者、聯邦政府的新政規劃者<sup>⑬</sup>（New Deal federal planners）、大自然為英雄，而美洲原住民、政府和資本主義則是壞人。時間框架（一位作者選擇以某種框架來貫穿開始和結束其故事）決定了敘述的形式和語調。被歐洲拓荒者的後人記錄為開創了廣闊未來的勇氣和耐力的壯舉，然而在克勞族印第安人（Crow Indians）酋長普蘭第·庫茲（Plenty Coups）於一九三〇年問世以相同的地點與時間為背景的自傳結尾中是這麼說的：「當水牛群離去之後，我族人民的心碎了一地，而且他們再也無法將其撿拾拼湊起來。從此之後便是一片寂然。」<sup>74</sup><sup>⑭</sup> 歷史始終是某個人所寫的故事，會與其他人的故事有著交錯的重疊，而且相互之間很可能會不一致：承認這一點並不會使我們對歷史的紀錄變得更不可靠，而是會使其變得更加多樣、深刻與真實。

⑬ 譯注：在一九三〇年以前，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兩者之間的功能和責任劃分相當明確，而為了因應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緊急需要，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彼此合作，形成互動團隊以共同解決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⑭ 譯注：普蘭第·庫茲（Plenty Coups，一八四八～一九三二年）是克勞族印第安人酋長，在克勞語中其名字為 *Axaxchia Ahú*，意為戰功赫赫。他於一九一八年左右接受記者法蘭克·林德曼（Frank Bird Linderman）的訪問，林德曼後來將訪問內容寫為庫茲的傳記，於一九三〇年出版。他在政治上具有遠見，並且在與白人的談判中是傑出的談判者。他主張白人與印地安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合作而不是對抗。在其他部落被迫遷離家園時，庫茲保全了大多數克勞族的土地不被侵佔，並且在保護習俗、語言上，其狀況也較其他部落完整。

1. 有關歷史學的典型「雙重性」的深層根源，請參閱 Ann Curthoys and John Docker, *Is History Fic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 第 1 ~ 6 章。
2.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40 · 第 112 頁 38-39 · · 第 1 章。 中譯本...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 第 1 章。 中譯本... 彼得·諾維克著·楊豫譯·《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喬伊絲·艾坡比等著·韓鉤譯·《歷史的真相》(台北:正中書局·1996)。
3. Charles-Victor Langlois and Charle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 (1898), 第 11 頁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39.
4.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1-2.
5. *Ibid.*, 63-68, 169-75, 491 · · 第 112 頁 172-73.
6.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129-30.
7. *Ibid.* · 第 112 頁 · ·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 第 4 ~ 6 章。
8.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362-66 · 第 112 頁 366。
9. *Ibid.* · 第 112 頁。
10. *Ibid.*, 366-67, 491-93. Robert B. Townsend,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2008,"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September 2008. 從 1 9 次 1 到 1 0 年 · 婦女在歷史系聘用的教師在 1 9 年佔 1 1 % · 隨後幾十年佔 2 1 % 到 3 1 5 % · 1 0 0 0 年到 0 8 年佔 4 7 7 % 。
11.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491-93.
12. August Meier and Elliott Rudwick, *Black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1915-198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289-93;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472-79. 從 1 6 0 年代到 1 1 1 世紀 · 在歷史系聘請的少數民族教師比例停滯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 · Townsend, "Status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13. 最好的證據是羅維奧 Daniel Woolf, *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吠哦 · Prasenjit Duara, Viren Murthy, and Andrew Sartori,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4) · 以及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2015) 中的相關論文。
14. Woolf, *Global History*, 51-52.
15. *Ibid.*, 53-66;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其中詳細論及第 1 1 章。
16. Woolf, *Global History*, 127-29, 211-25.
17. *Ibid.* · 第 5 章。
18. 引自 *Ibid.*, 16 · · 吠哦 Frederick Cooper, "Africa's Past and Africa's Historians," *Canadian Journal of*

19. Jennifer Pitts, "The Global in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Thought," in Duara, Murthy, and Sartori, *Companion to Global Historical Thought*, 184-96; Woolf, *Global History*, 281-340。引用頁碼二八三(休謨)、頁三二七(德齡)。
20. *Ibid.*, 第八章。
21. 以下討論是根據將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闡述地極其清晰的研究。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2008)。第三章、四章。中譯本：特雷·伊格爾頓著，伍曉明譯，《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另可參較早的繁體譯本：泰瑞·伊果頓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市：書林，1993)。
22. *Ibid.*, 98-99。或見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215-16。
23. *Ibid.*, 110-16。
24. John Toews, "Linguistic Turn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History," in Neil Smelser and Paul Bak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3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8916-22。
25. Natalie Zemon Davis,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CA: Polity Press, 1987), 3。中譯本：娜塔莉·澤蒙·戴維斯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事者》(台北：麥田，2001)。
26. *Ibid.*, 36-43, 51。
27. Judith Walkowitz, *City of Dreadful Delight: Narratives of Sexual Danger in Late-Victorian Lond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8. Carole Pateman, *The Sexual Contra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帕特曼這本女權主義政治理論中的經典作品，透過強調契約論中的虛構成分將其「去自然化」。
29.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譯本：海登·懷特著，劉世安譯，《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義》(臺北：麥田出版，1999)。
30.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42-43。中譯本：海登·懷特著，董立河譯，《形式的內容：敘事性語與歷史再現》(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31.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149。或見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5), 134-35。
32. White, *Metahistory*, 7-30。
33. 懷特確實相信兩種或更多的這些情節類型可以在歷史學家的作品中同時存在，事實上，這是其中最偉大的特徵。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94。中譯本：海登·懷特著，董立河譯，《話語的轉義——文化批評文集》(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
34. *Ibid.*, 58。

- <sup>45</sup> Ibid., 94.
- <sup>46</sup> Ibid., 97-99. 關於懷特在「語言轉回」中所扮演的角色，請參閱一篇有幫助的分析文章 Lloyd Kramer,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7-128.
- <sup>47</sup> Joan Wallach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in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9, 46. 請參閱程文敏 | 華。
- <sup>48</sup> 懷國士與亞歷克西察克包斯 | 華。 George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and David Brion Davis,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5).
- <sup>49</sup> Barbara Fields, "Id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in J. Morgan Kousser and James McPherson, eds., *Region, Race and Reconstruction: Essays in Honor of C. Vann Woodwa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49.
- <sup>50</sup> Ibid., 162, 159.
- <sup>51</sup> Noel Ignatiev, *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sup>52</sup> David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2nd ed. (1991; New York: Verso, 1999).
- <sup>53</sup> Mat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up>47</sup> 例如，請參閱 Jonathon Classman, "Slower Than a Massacre: The Multiple Sources of Racial Thought in Colonial Afric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9, no. 3 (June 2004): 720-54; Classman, *War of Words, War of Stones: Racial Thought and Violence in Colonial Zanzib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Eve Trout Powell, *A Different Shade of Colonialism: Egypt, Great Britain and the Mastery of the Sud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Bruce Hall, *A History of Race in Muslim West Africa, 1600-19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up>45</sup>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Historical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7, 48.
- <sup>46</sup> Ibid., 27-29, 41.
- <sup>47</sup> 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7, 11.
- <sup>48</sup>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32.
- <sup>49</sup>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36, 42-43, 49.
- <sup>50</sup>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07.
- <sup>51</sup> Ibid., 159.
- <sup>52</sup> 例如，請參閱 Bryan D. Palmer, *Descent into Discourse: 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ex Callinicos, *Against Postmodernism: A Marxist Critiqu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53. Laura Lee Downs, "If Woman Is Just an Empty Category, Then Why Am I Afraid to Walk Alone at Nigh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 no. 2 (April 1993): 414-37. 請參對於此議題 Joan Scott 的回應 (438-43) 以及 Downs 的反駁 (444-51)。

54.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2. 伊凡斯的攻擊目標——在這場爭論的尾聲一九九七年的時候——大多是理論家，如凱斯·詹克斯·法蘭克·安克斯米特 (Frank Ankersmit)、孟思洛以及厄瑪絲 (Elizabeth Deeds Ermarth)。被他提到的實際歷史學家反而不多——帕特里克·喬伊斯 (Patrick Joyce) 和黛安·波克絲 (Diane Purkiss) 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不過也不是特別具影響力的。伊凡斯讚賞一些文化史和微觀史主要學者的著作，不過他也錯誤地稱呼他們為「後現代主義者」，如娜塔莉·戴維斯、羅伯特·丹屯、賽門·夏瑪和卡洛·金茲伯格等人。勞倫斯·史東在一九九二年也指出：「完全無法想得到有哪本重要歷史著作是基於後現代的角度書寫的。」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 Present* 135 (1992): 191.

55. James Boswell, *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86), 122. 中譯本：詹姆斯·鮑斯威爾著，增澄、史美驊譯，《約翰遜博士傳》(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56. Appleby, Hunt, and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3, 11.

57. *Ibid.*，第七~八章，特別是第254-61頁。

58. 請參閱一篇優秀的概述文章：Gabrielle M. Spiegel, "Introduction," in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尤其頁碼 11-26。

59. 以下說明是基於 Peter Charles Hoffer, *Past Imperfect: Facts, Fictions, Fraud-American History from Bancroft and Parkman to Ambrose, Bellesiles, Ellis and Goodwi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第五章。以及 Jon Wiener, *Historians in Trouble: Plagiarism, Fraud and Politics in the Ivory Tower* (New York: New Press, 2005)，第四章。維納在其所寫的立場鮮明的書中指出，學術欺詐案件主要出現在歷史學家被右翼政治利益和媒體鎖定為攻擊目標的時候，而且是勒斯雷斯的錯誤並不是那麼罪不可赦的。然而，於二〇〇二年發布批判貝氏的報告，由埃默里大學聘請的委員會則是由三位自由派學者所組成的。

60. Hoffer, *Past Imperfect*, 146-51.

61. 不過，維納 (Jon Wiener) 認為，貝勒斯雷斯只因為「徵引文獻中很小的錯誤」而不公平地被當作攻擊目標，而且寫道幾位傑出的歷史學家在電話交談中也同意他的論點。Wiener, *Historians in Trouble*, 91-93.

62. Richard J. Evans, *Lying about Hitler: History, the Holocaust, and the David Irving Tria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63. 有關亞伯拉罕事件的敘述，我根據的是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612-21 以及 Wiener, *Historians in Trouble*，第五章。

64.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5.

65. *Ibid.*, 19, 22, 44, 46.

66. Robert Finlay, "The Refashioning of Martin Guer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 (June 1988): 553-71.

67. *Ibid.*, 556-57, 562-66, 570.

98. Natalie Zemon Davis, "On the Lam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3 (June 1988): 572-603.
69. Finlay, "Refashioning," 569, 571.
70. Davis, "On the Lame," 599.
71. Garrett Mattingly, *The Armad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9), 227.
72. Larissa MacFarquhar, "The Dead Are Real: Hilary Mantel's Imagination," *New Yorker*, October 12,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10/15/the-dead-are-real> (accessed February 2, 2016).
73. William Cronon, "Storytelli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8, no. 1 (February 2013): 11.
74. 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no. 4 (March 1992): 1347-76. 可用四頁1366。

## CONCLUSION

## 結論

在美國，關於歷史價值的最經常引用的一句話是西班牙裔美國作家喬治·桑塔亞納 (George Santayana) 那句表面上有吸引力，但卻存在無限問題的格言：「那些不能銘記過去的人註定要重蹈覆轍。」正如我們從一開始就看到的那樣，銘記過去並將其中的教訓應用到當下，往往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法國人在一九四〇年便領會了這一點，因為他們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可怕經歷使他們準備進行新一輪需要耗費長時間的壕溝戰爭，其作法是在東部邊界建立一條名為「馬其頓防線」(Maginot Line) 的大規模防禦體系，不過這體系之後只是很快地被從北方突破快速移動的德軍坦克部隊給擊潰：前一場戰爭的「教訓」造成的是迅速並羞辱性的潰敗。

當然，在許多情況下，那些積極尋求忘卻過去的人注定不會重蹈覆轍，而是會創造

出新形式的混亂和恐怖，這就是每次現代革命發生的狀況，從法國、俄羅斯再到中國的革命，以千百萬人的生命為代價斷絕與舊時代和舊規矩的關係。但對過去的敬畏也同樣危險：想想那些留戀於「獨一真教會」(One True Church)的宗教狂熱分子、那些渴望勇敢舊南方的種族主義者、致力於恢復德意志帝國榮耀的納粹分子屠殺的許多人。那些選擇記住理想化、片面化版本歷史的人，對於歷史所造成的傷害，程度會與試圖消滅它們的革命者一樣嚴重。

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中，我的立場與今日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持的觀點相似，認為歷史研究並不是以適用於當前和未來情況的整齊包裝的格言形式來傳授「教訓」。不僅沒有任何歷史情況與過去的任何情況相同，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究竟哪種教訓最為適用也不為人能清楚掌握：在美國的越南戰爭中，保守派人士借用一九三〇年代歐洲的例子來為北越獨裁統治提供軍事支持辯護，而自由主義者則透過指出法國帝國主義已經於一九五〇年代被共產黨叛亂分子趕出越南來主張撤軍。<sup>1</sup>但是，儘管我們可能對歷史教訓的概念抱持理性的懷疑，但是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會本能地尋找它們，特別是在晚近發生的和造成嚴重創傷的事件中。納粹的大屠殺即為最真切的例子：谷歌搜索「大屠殺的教訓」可以獲得數以萬計的搜尋結果。我們不該為此吃驚，當我們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人為恐怖行為時，會覺得有必要從中尋找一些有用的或救贖的「精華重點」(take-away)作為對虛無主義式絕望的防範。<sup>2</sup>然而，大多數專業研究大屠殺的歷史學家，與其他領域的同事一

樣懷疑，過去是否能夠為我們提供清楚明白對未來的藍圖：當人們受到迫害的威脅時，「再也不應該發生」這句話也許是很有效的號召，但現實是——同樣的事情不會發生第二次。大屠殺和其他大規模的歷史犯罪的認識當然會加強我們的道德情操，並使我們對類似的事件保持警惕，但不會有未來情況會完全跟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德國一樣。紀念活動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正如一位大屠殺史學家所得出的結論，為了保持過去的活力，不斷重建和改寫歷史也是必要的：「這意味著爭議、分歧，以及研究與新問題，還有觀察舊問題的新方法。」<sup>3</sup>

為了使過去發揮其最佳效果，我們不能把它請上神壇，而是必須不斷地對其發出爭論。因此，本書的章節被定義為問題，這個選擇無疑反映了我的懷疑性格，但更多的是我確信當歷史變成了任何一種大家同意的正統說法時，其最好的情況是無用或無聊的，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危險的。出於同樣的原因，本書中的材料並不是從荷馬和希羅多德到現下最新趨勢的一系列方法：歷史寫作並沒有越來越好，而是不斷轉變和變化以適應今日的需要和好奇心。創新和新視角讓過去的研究保持新鮮和有趣，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批評某些領域方法過時或無關緊要而加以拋棄。正如林·亨特所指出的，歷史的任何一個領域都不應該因為其不再熱門就被拋棄，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過去被忽視的方面何時會重新變得重要。古羅馬史在大約一個世紀以前被視為如何理解政治的重要指南；而如今已經不再如此，但是誰能知道說不定什麼時候它又變得有用呢？<sup>4</sup>三、四十

年前，很少有人能預測得到伊斯蘭歷史和文化會成為西方國家關注的重心；與此同時，俄羅斯的歷史對美國人而言已不像四五十年前那麼迫切，儘管它可能會再次變得至關重要。雖然要辨別出在專業史學中當前的趨勢相當容易，許多人會認為全球史、跨國史和環境史是目前走在時代最尖端的類型，但是這些研究類型能夠影響歷史學多久和多麼成功，都僅屬於個人的猜測。即便歷史學的未來是不可知的，不過它會一直具有重要性則是毫無爭議的。為什麼學習歷史？最簡單的回答是，歷史回答了其他學科所不能提供的問題。為什麼今天美國的非裔美國人在從收入到教育、健康、預期壽命和監禁率等各方面都處於令人震驚的不利地位，即便被法律所容許的最後一點歧視痕跡，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經消失了呢？除非人們認同種族主義的信仰，不然回答這個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透過以歷史的觀點來解釋一段漫長和痛苦的故事，這個故事的時間上溯自穿越大西洋和奴隸制度，中間歷經了重建時代、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還有數十年來在都市政策、投票權以及司法制度方面的種種不平等所累積出來的一個結果，最後直到今日。在現代，民主和工業化的社會中所存在的其他任何不平等現象——男女之間、貧富之間、群體之間和民族之間存在的，都只能從歷史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科學家可以診斷今日的問題並提供政策處方，但只有歷史學家有能力藉由展示這些問題是如何發生的，並且對其加以解釋。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

時間的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歷史比其他任何學科在公共生活中產生了更為顯著的作用。這本書的另一個中心目標是強調歷史學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混合領域：高度專業化和非專業化；根據事實和依賴想像力；學術和通俗。重現與解釋過去不僅發生在學術專著和專業期刊中，而且也發生在暢銷的大眾書籍、電視紀錄片和歷史博物館中，有許多人銜接起學院和大眾兩個世界。這本書試圖說明為什麼歷史在學院之外享有如此廣泛的吸引力：不僅是因為歷史對於個人、社群和國家而言都非常重要，同時也是因為歷史學注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生動現實，而不注重理論的抽象概念。然而，這個領域的優勢也可能是它的弱點，因為歷史寫作有時會變得太具描述性和經驗性，而且歷史學家之所以埋首於資料之中，可能只是因為資料本身很有意思的緣故。在專業史學以及通俗史學中針對歷史的爭論，相當重要地提醒那些沉溺於檔案庫中枝微末節的歷史學家們哪些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

總之，這本書強調了保持歷史活力的兩大力量：作為連接學術界和公共世界之間橋樑的角色，以及它在歷史系所、學校、博物館乃至政府機構中引起的爭議。末日預言者總是預測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會下降，但是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事情正在發生。因此，在這本關於歷史的教訓、規律、危機或未來的書籍末頁並沒有冠冕堂皇的聲明。讀者學習與爭論各種形式歷史的品味和技巧，如果因為前面章節中提到的各種問題和爭議而有所提升，那麼本書就達到了其目的。

1. Michael R. Marrus, *Lessons of the Holocaus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37-38.
2. *Ibid.*, 7-9.
3. *Ibid.*, 171.
4. Interview with Lynn Hunt, "The Future of Histor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kZ5TkxwY8> [accessed November 5, 2016].

ACKNOWLEDG-  
MENTS

致謝

如果這本書是一宗犯罪的證據，我的同事們的指紋佈滿於其上，下面列出了一些最令人震驚的罪魁禍首。在西北大學歷史系幾十年的教學中，我有幸與逐漸變化的一批傑出學者進行交流，我從中學到了我所了解有關歷史的大部分內容。這本作品反映了多年來對於我們共同從事的學科，生動又時而互相爭執，但總是饒富成果的意見交流；有時寫作一本書確實需要整個社群的力量。幾年前，當我成為西北大學的尼可拉斯·查布拉加 (Nicholas D. Chabraja) 中心歷史研究中心主任之後，我在工作環境上得到了更多的支援。我以這種身份接觸到了在目前活躍的一些最優秀歷史學家的研究作品（以及好的同儕）。細心的偵探將會注意到我的章節中所引用的許多作者跟中心近期傑出的演講人名單之間有著令人起疑的重疊。因此，感謝使查布拉加中心成立並順利運作的人們：Nick

Chabraja 以及 Eleanor Chabraja, Tim Breen, Elzbieta Foeller-Pituch。

在整理本書結構的最初階段時，很多人閱讀並對我的大綱各種草稿提出很有幫助的回饋：Barbara Bloom-Genevaz, Dina Copelman, Susan Herbst, Yohanan Petrovsky-Shtern, Mike Sherry, Sean Shesgreen, Debora Silverman，瓦薩學院和倫敦瑪麗皇后大學 (Vassar College and Queen Mary University London) 的教師，以及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幾位匿名讀者。幾乎每次當我開始寫新的章節時，我都會向真正了解這個主題的人請益。許多在其專業領域給予我指導的同事有：Ken Alder, Lina Brito, Vincent Brown, Gerry Cadava, Peter Hayes, Donna Harsch, Chris Hodson, Forrest Hylton, Joel Mokyr, Susan Pearson, Dylan Penningroth, Indra Raman, Mike Sherry 以及 Scott Sowerby。當然，他們完全不需要對我如何刪節他們各自的專業領域內容負責。我非常感謝那些慷慨響應閱讀不同章節的請求的人。彼得·高登 (Peter Gordon) 和凱斯·伍德豪斯 (Keith Woodhouse) 在第三章給予我建議，艾美·史丹利 (Amy Stanley) 熱心地閱讀了大部分的草稿，並且試圖幫助我減少一些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我要特別感謝四位讀者，他們在整個撰寫過程結束之後對全書手稿進行了審視，並提供了我仔細和精闢的讀物。

由於本書主要針對課堂，所以我有幸為之介紹自己的大綱和想法的學生的貢獻是特別有價值的。格雷厄姆·霍恩 (Graham Horn) 給了我一個對這個計畫有用的最初回應，並協助了一些最初的研究。西北大學的研究生們在丹尼爾·英默瓦 (Daniel Immerwahr)

領導的提高 (Teagle) 研討會上分享了他們對大綱的反應；他們在倫敦瑪麗皇后大學的同行也在米里·魯賓 (Miri Rubin) 舉辦的會議上一樣給了回饋；並且，由於米塔·喬杜里 (Mita Choudhury) 和麗迪雅·梅鐸 (Lydia Murdoch) 的邀請，瓦薩學院 (Vassar College) 一班傑出的歷史系學生，促使我重新考慮了包括第四章的標題和內容在內的許多事情。

很高興與我的編輯凱倫·梅里康佳斯·達林 (Karen Merikangas Darling) 合作，當此書計畫未經事先安排交予她時，給予了此計畫機會，並且在每個階段工作都非常富有彈性並且得到全力協助。喬伊·史寇 (Joel Score) 用完美的技巧和細心編輯了原稿。尚恩·薛冠林 (Sean Shesgreen) 一如既往地鼓勵我相信自己的直覺，提供像是一人啦啦隊的鼓勵，並在我完稿的那一天將原稿從頭到尾閱讀和編輯。僅僅將感謝獻給他一人是不適當的，因為同樣應該感謝的還有茱麗葉 (Juliette) 所給予的愛以及充滿感染力的能量。這本書獻給參加過我的文化史研討論的許多西北大學研究生。他們聰明與銳利的反應推動著我年復一年地不斷地澄清我的想法，好跟上他們的步伐——本書便是這樣的成果。

文化思潮 195

## 想想歷史

作者——莎拉·瑪札 (Sarah Maza)  
譯者——陳建元  
主編——湯宗勳  
特約編輯——劉璞  
美術設計——陳恩安  
責任企劃——林進韋

發行人——趙政岷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七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一六八四一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一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一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new@readingtimes.com.tw](mailto:new@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定價——新台幣四八〇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成立於一九七五年，  
並於一九九九年股票上櫃公開發行，於二〇〇八年脫離中時集團非屬旺中，  
以「尊重智慧與創意的文化事業」為信念。

想想歷史 / 莎拉·瑪札 (Sarah Maza) 作；陳建元譯。-- 一版。-- 臺  
北市：時報文化，2018.4 面；公分。-- (文化思潮；195)

譯自：Thinking About History

ISBN 978-957-13-7353-9 (平裝)

1. 史學

601

107003271

### THINKING ABOUT HISTORY

by Sarah Maza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201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7353-9

Printed in Taiwan